回憶

上

龔楚 著

龔楚將軍回憶錄 上卷

作者：龔　楚
編者：聞　堂
封面：W. H.
出版：明報月刊社
發行：明報出版部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印刷：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書號：78MP01　　1978年5月初版
印數：1——5,000册　　字數：200,000字
開本：1/32
定價：港幣十元（U.S.$3.00）



龔楚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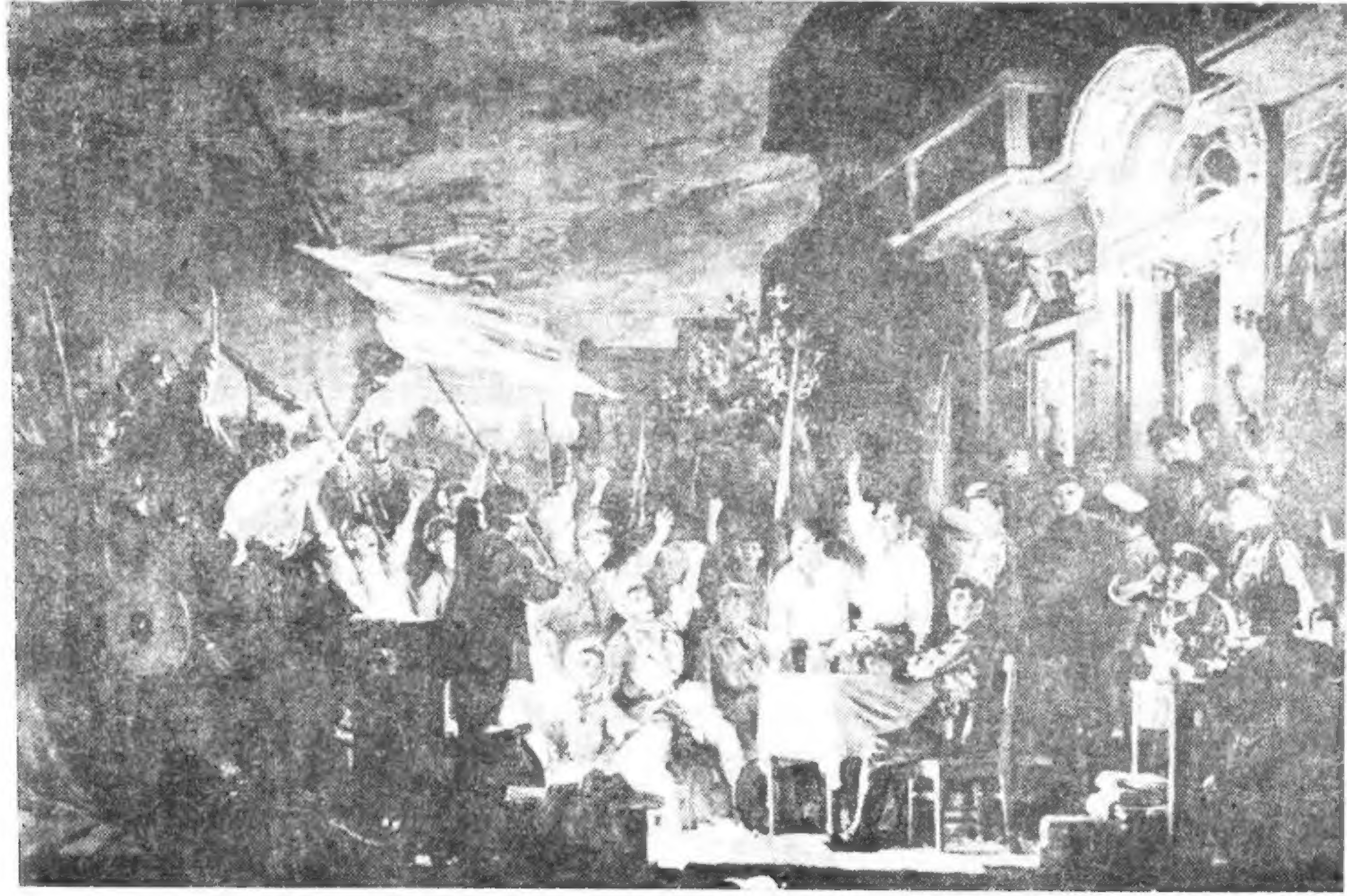
冀楚所書張九齡詩的行草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張九齡感遇詩一首

癸春書於雪友齋

永邑冀楚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共在南昌發動暴動，稱為「八一起義」。圖為描寫「八一起義」的油畫。

③



早年的紅軍，時常與農民相處，這是中共討好農民政策之一



當年蘇區油印小報上的版畫



一九二七年上海，展開清共行動，到了濫捕濫殺的地步，圖為清共的武裝士兵。



賀楚曾主張乘勝追擊，經尋鄔、平遠入梅縣、興寧而進佔惠陽，相機進攻廣州，但這意見為周恩來等所反對，理由是與、梅一帶缺之羣衆基礎。圖為梅縣的[illegible]骨潭，是梅江江水最深的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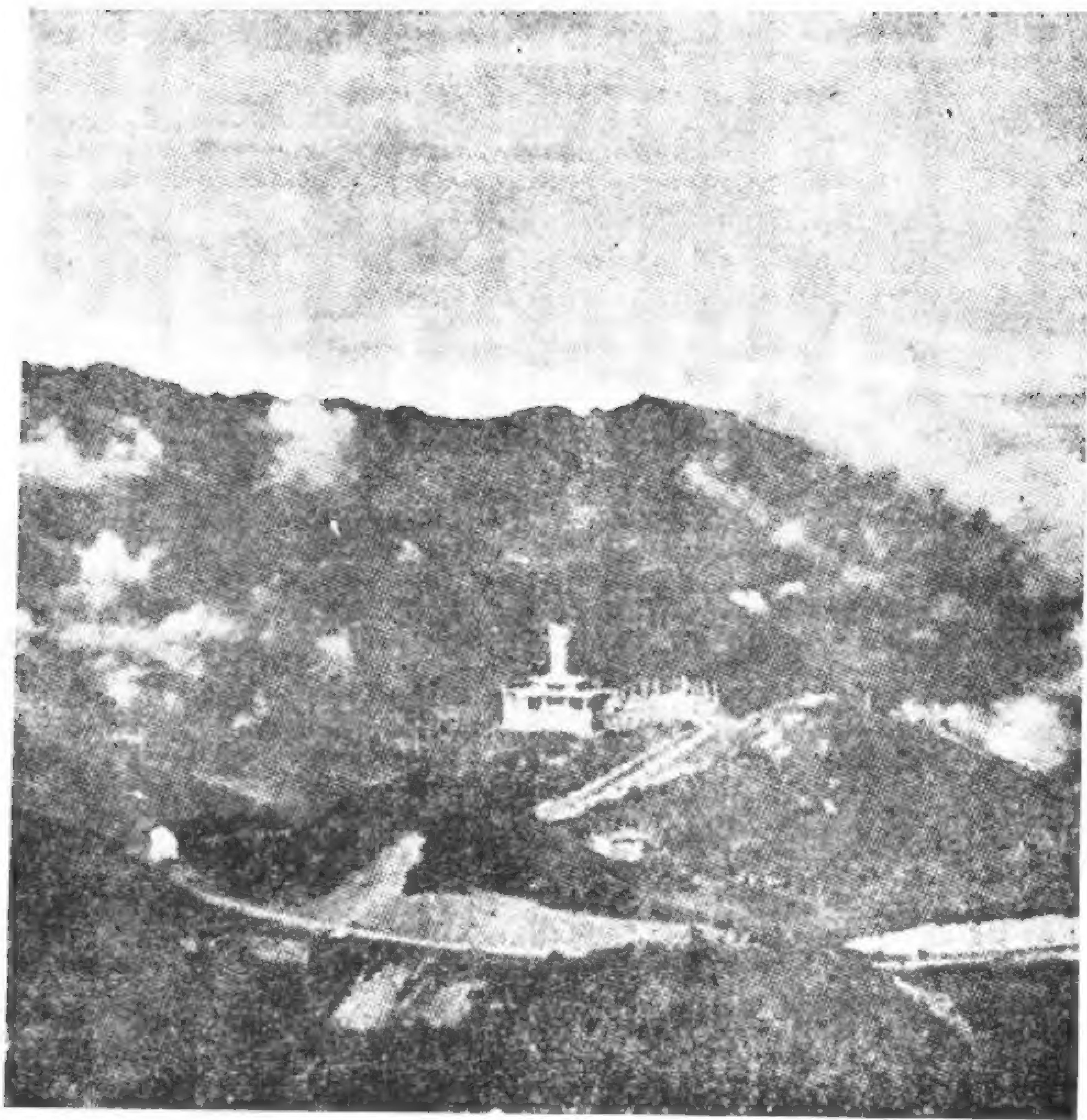
由左至右：朱德、賀龍、陳毅，他們都是當時的高級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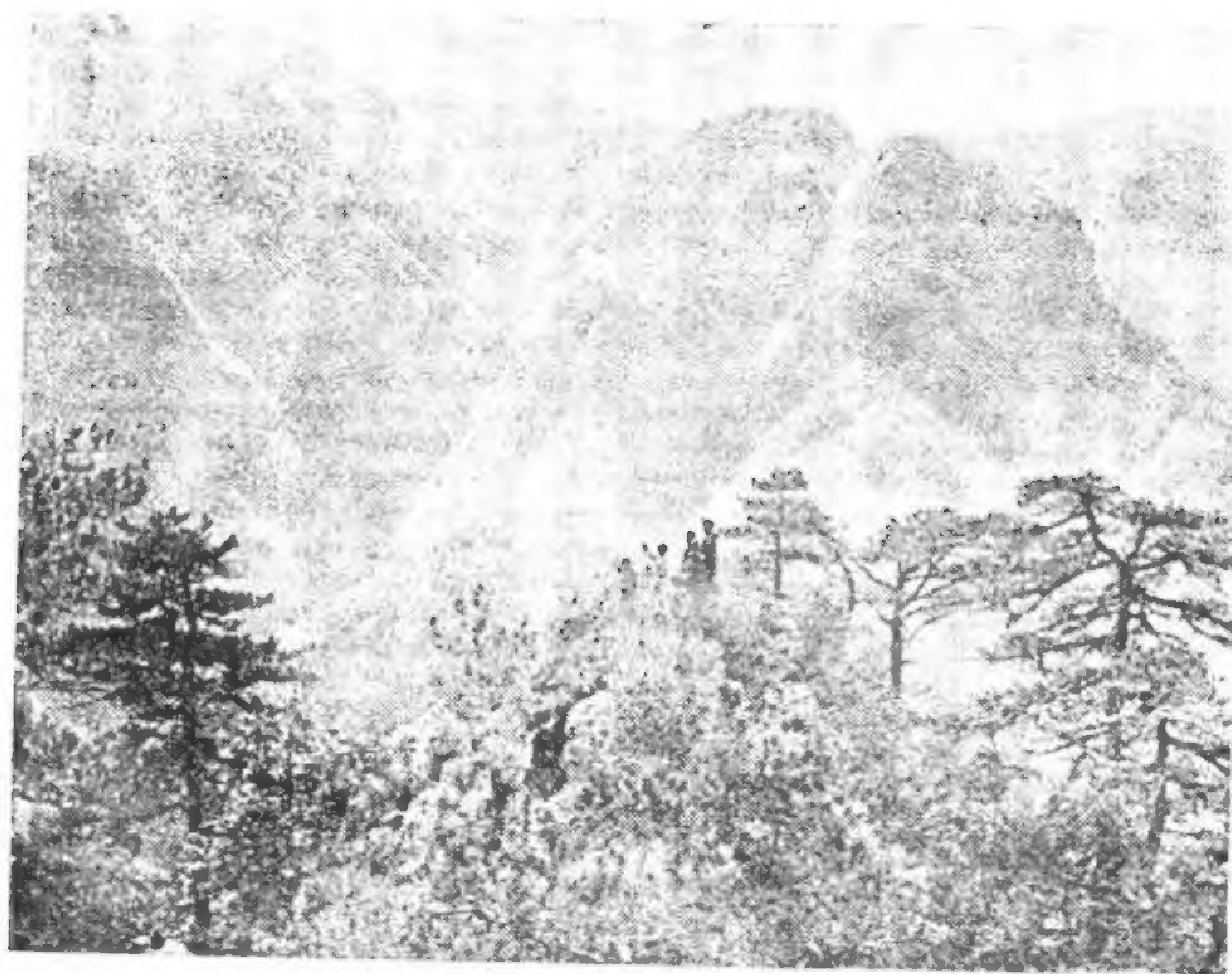
農民支援紅軍前線的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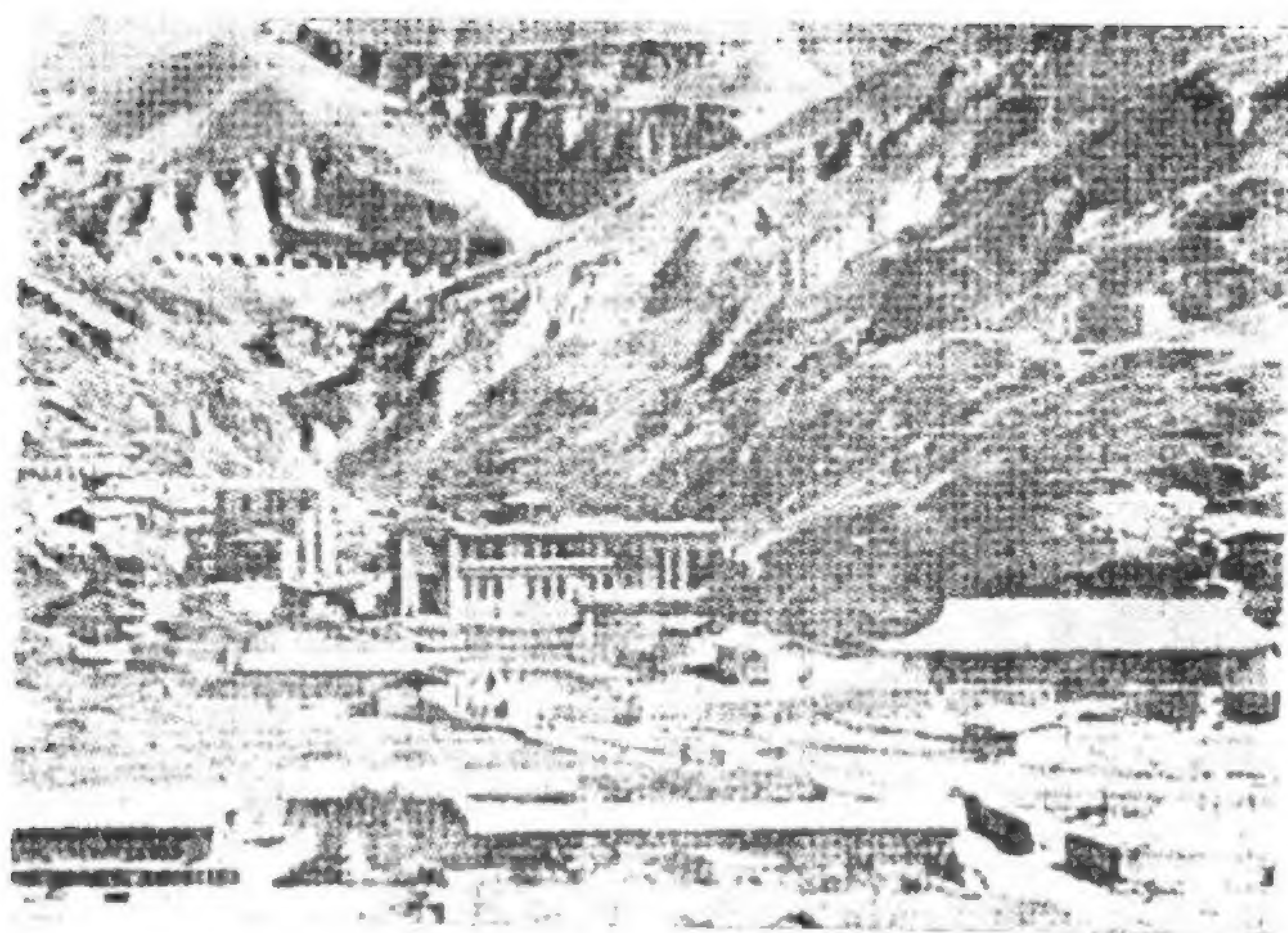
井崗山的高峯八面山，它是當年紅軍守井崗山的北路哨口。



井崗山，是紅軍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圖為井崗山的黃洋界哨口的現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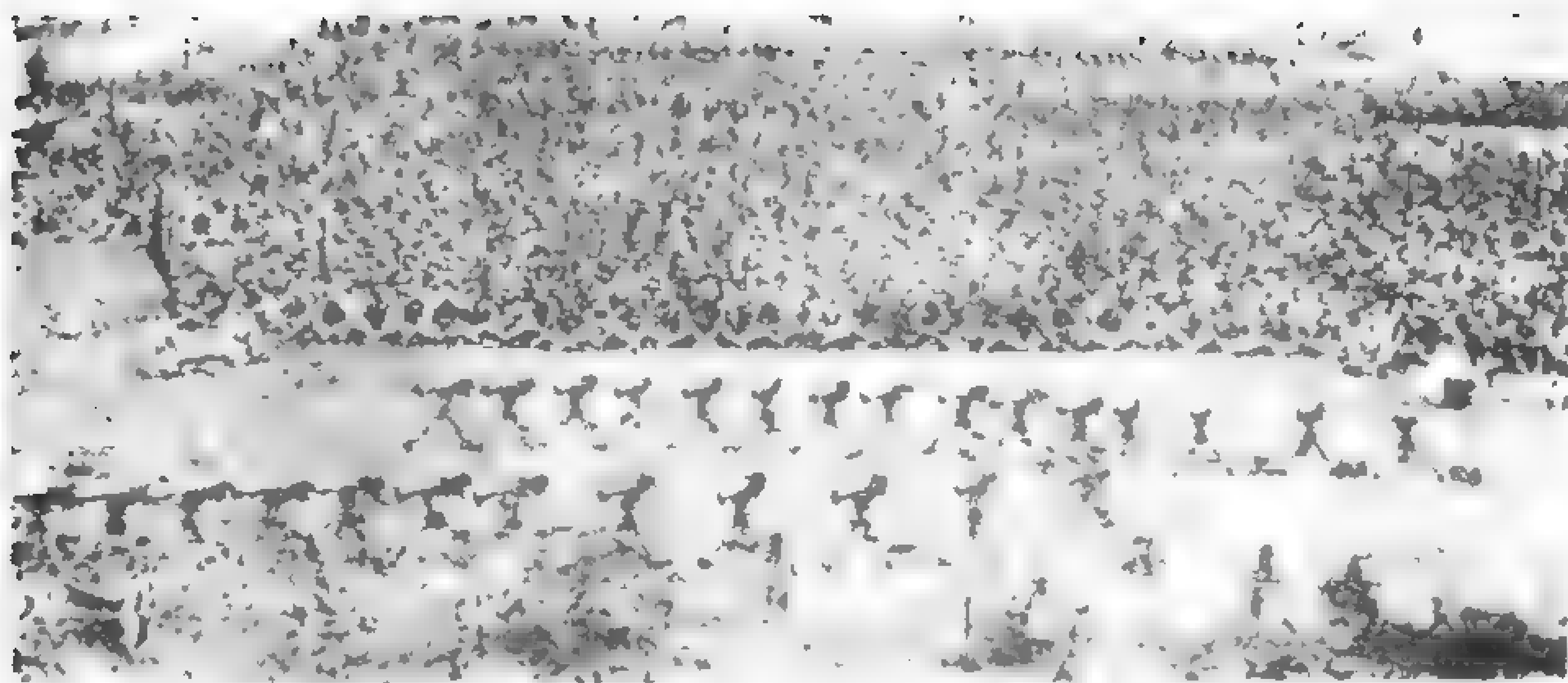
井岡山為羅霄山脈之中段，地形險要而複雜，在軍事上易守難攻，利於東西轉移作戰，不易被敵人包圍，毛澤東選擇此處為武裝鬥爭根據地頗有獨到的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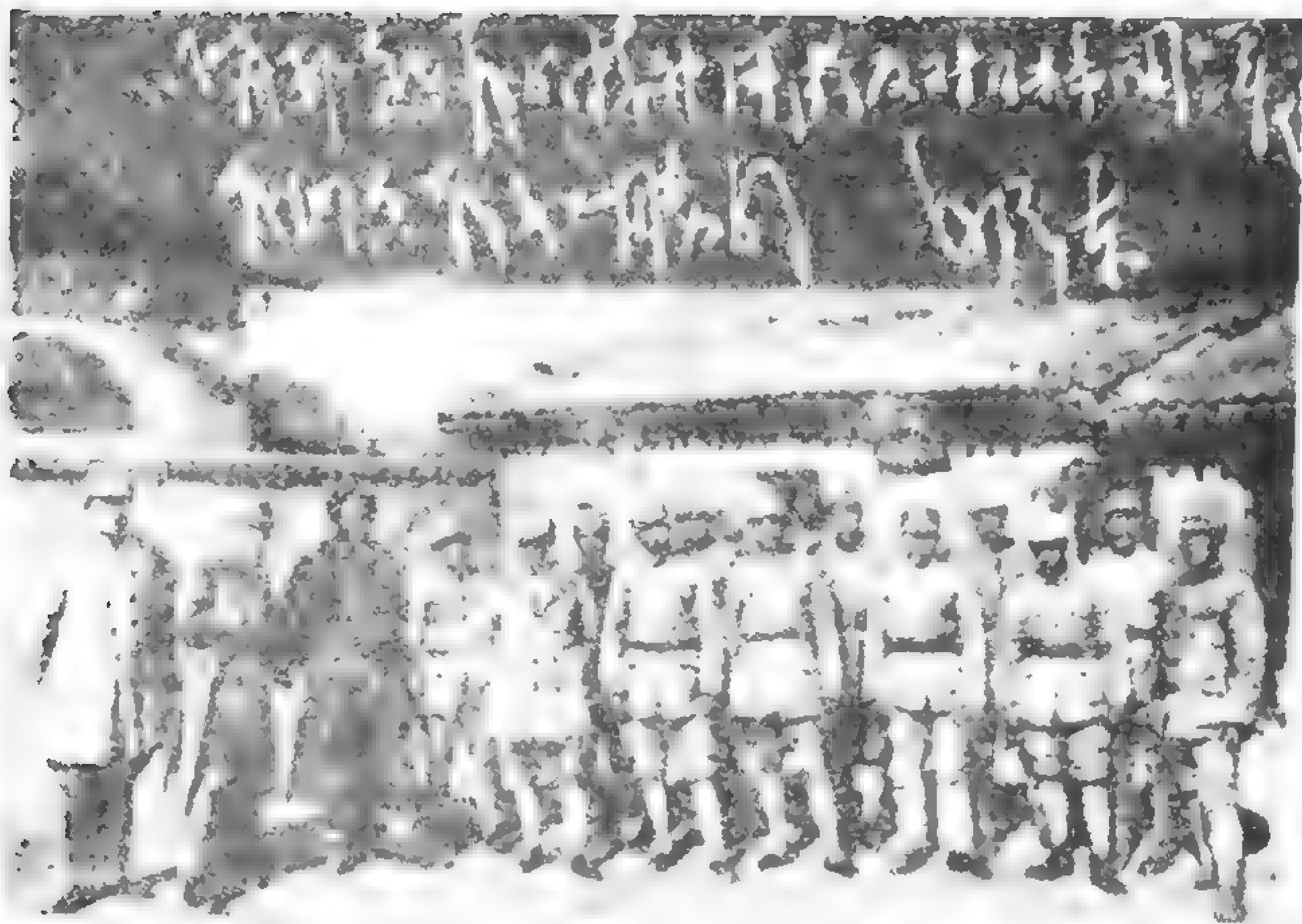
延安的楊家嶺，中共黨中央曾設於此。



一九三〇年七、八月間，紅軍第三軍團曾一度攻克長沙，圖為八月一日在長沙舉行十萬人慶祝大會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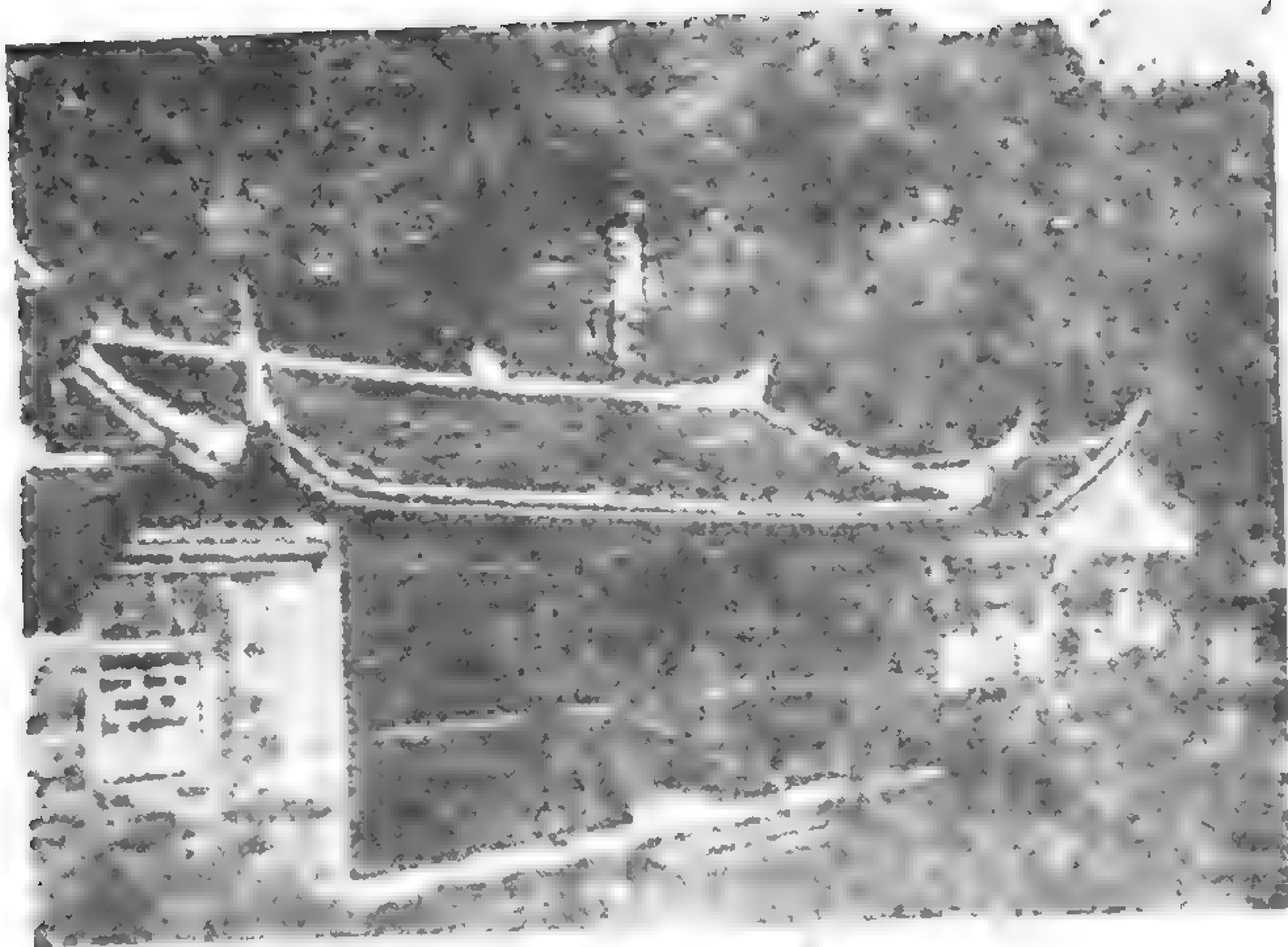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紅軍前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四次圍攻，紅軍在戰鬥中成長為一支三十萬餘人的軍隊，圖為一九三三年紅軍的一部份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進攻紅軍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餘人，在趙博生、董振堂的領導下在江西寧都起義參加紅軍。



紅軍在漳州戰役中所繳獲的一架小型飛機，站在機前是林彪和聶榮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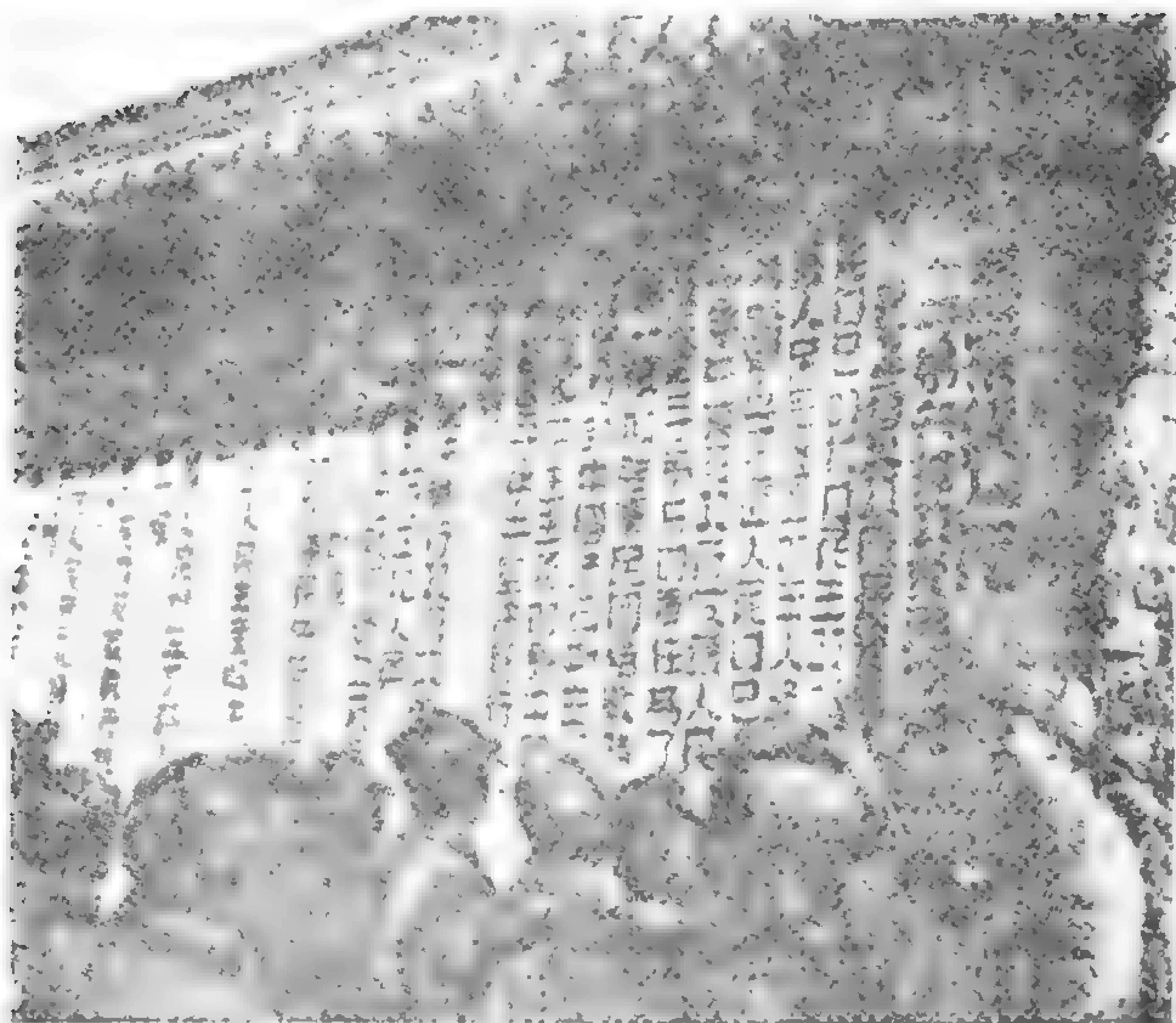
紅軍在蘇區以號角召集民衆開會

上圖　毛澤東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主持召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會議，並在會上發表了他的「關於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主要針對當時反對他的朱德。上圖為古田會議舊址、

▼人民軍隊經常展開所謂「擁政愛民」運動，圖為指戰員們在學習「擁政愛民公約」的情形。

◀正當毛、朱不洽之時，彭德懷率部相助，使毛氏的氣焰突冒升，朱、毛之間的感情更形惡化。







主持廣東軍政的李濟琛，因有反蔣嫌疑而被蔣氏扣留於南京，引起了桂系將領的不安。



一九二八年，毛澤東製定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來發展三大紀律八大注意）。兵士嚴格遵守。據說這是紅軍長征期留給房東的字條。



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中共的陳紹禹（王明），前排右邊第一人



工農紅軍在沒有戰鬥時，幫助根據地的農民收割庄稼的情形。

上卷　目錄

第四編　廣西蘇區

張序

張國燾

龔楚先生是參加中國共產黨井崗山時期的少數人物中之一，現在，這種人物即使在中共內部也是不多了。龔楚先生從參加農民運動到上井崗山，由井崗山到瑞金這一時期，固是龔楚先生的十一年紅軍生活，也是中共蘇維埃運動時期的主要歷程。至於龔楚先生本人，首先參加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繼而又參加中共，成爲紅軍主要人物，後來又脫離中共，他本人這一番經歷確是不平凡的。

五四運動前後一部份急進的學者和青年，開始仰慕俄國革命，傾向社會主義。那些參加中共的青年，實質上並非眞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既無研究，更無所謂信仰；他們對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理論和實際，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幾乎都是對於中國的積弱和腐敗，懷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們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個獨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國。中國一直被專制政權統治着，政治腐敗極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虛的，外侮紛至，國亡無日。民國以後，此種情況，並未改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動，無論在理論上行動上，已經具有急進的特色，然而孫中山先生窮畢生之力，仍未能撼動專制統治的根本；

這就使中國那一代的年青更加偏激了。

正在這個時候，俄國人來了。中國人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統治，俄國人就告訴中國人如何去反軍閥和反帝國主義侵略。俄國人教育中國人如何組織革命政黨，如何組織工人和農民，如何組織青年和婦女，如何組織軍隊，如何進行地下工作，如何革命奪取政權。這一切大體既不違反中國革命的需要，尤適合一般急進青年的口味。可是俄國人並不是爲完全無私的目的而來的，原來俄國人是要找尋它的東方打手，要將充當帝國主義後備軍的殖民地轉而成爲它自己的後備軍的地盤。俄國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並非獨立的中國。

我們讀了龔楚先生這本書，就可以了解和同情當時青年這一不平凡的經歷。面對中國半世紀來的這許多演變，也將發生無限的感慨。今日青年讀了他這本書，也可以知道今日中共的所作所爲的本質，從而對今後中國的路向有更清楚的取向。

自序

二十世紀的初期，是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推翻滿清封建皇朝，創立中華民國的大時代。中山先生的革命建國主張，雖因遭受帝國主義者及封建軍閥、官僚之反對和破壞，未克實現，且曾發生過袁世凱洪憲稱帝，以及張勳復辟的悲劇，但在中山先生奔走呼號，奮鬥不懈的革命精神感召下，使這一時代的中國青年覺醒起來，積極參與反帝、反封建，爲建立一個獨立民主新中國的革命事業而奮鬥。我也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投入革命陣營的一分子。待至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後，我在中共的宣傳吸引下加入了中共組織，成爲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由此我就在中共領導下參加革命工作，曾做過農民運動，組織農民自衞軍，並領導廣東農軍參加南昌起義，在中國紅軍從無到有的發展史上，我是紅四軍及紅七軍的組織領導者之一。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國內戰爭中，我是紅軍中一個流汗流血備嘗艱苦的高級指揮員。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政命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同時我對於閩贛蘇區在毛澤東領導時期，黨內鬥爭中殘殺了不少無辜的革命同

志，更感到不寒而慄。我為我的良心所驅使，於一九三五年五月，拋棄了過去十一年的鬥爭歷史，冒着生命的危險，脫離中共，另謀新生。

我脫離中共後，曾一度抱着營救舊日同志的心情，參與湘、粵、贛邊六屬招撫工作。抗日戰爭期間，參加國軍，轉戰南北，為國家民族生存而戰鬥。抗戰勝利退役後，曾參與民意代表活動，出任廣東省參議員。至國內戰爭再度爆發，因應當時環境，出任地方行政及綏靖工作。一九四九年，大陸全部為共產黨佔領後乃移居香港。這是我奮鬥中的艱苦經歷。

我和毛澤東私人並無仇怨，在井岡山及閩贛蘇區鬥爭時期，均在黨組織和他的領導下工作，我曾對他的獨裁作風和殘忍個性感到不滿，同時，我也曾對他領導政治軍事鬥爭的天才感到佩服，因而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當他被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排擠時，我還一度對他發生過同情之感！

但是他這二十一年來的作為，從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而參加韓戰，犧牲中國無數的生命財產，到三面紅旗運動陷全國於饑餓之中，以至文化大革命之逼害老幹部和壓制文化人，摧殘學術文化，製造史無前例的個人崇拜等等，在在足以證明他愈來愈是倒行逆施。

至於我早年參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在：改造不平等的、防礙人類生存進步的舊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我抵香港後，曾寫「我與紅軍」一書，藉我的親身經

歷，報導中共政治軍事鬥爭實況，及其領導同志間的恩恩怨怨。時至今日，十多年來，中共的措施，及黨內領導同志間的矛盾，仍然因循着過去的路綫發展，造成近年的混亂之局，至於其未來的發展，假若其領導階層的現狀不變，則其黨內的鬥爭，勢必循環相應之下，致國家建設不能得到應有發展，人民生活亦未能得到必須的改善，一旦因內爭而發生內戰，則外侮必至！其影響所及，又何祗中國人民受害而已！

關於共軍在初期國內戰爭的戰畧戰術，及政治工作的配合行動，是我們關心國家前途的人士不得不注意的問題。我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我與紅軍」一書中已有所叙述。現在特將近年回憶所得，以及寫「我與紅軍」時忽畧了的許多事件，著作本書，俾讀者對中共問題，能得到深刻的瞭解，這是我著作本書的願望。

一九七一年一月於香港

第一編

人生體驗的開始

第一章　我怎樣加入中共

前清光緒二十七年（陽曆一九零一年），我出生於廣東省樂昌縣長垓村，幼時祖父母均健在，還有兩個哥哥、一姊、一妹；父親經營商業兼農業，母親主持家務，家人和睦相處，家庭經濟亦可稱豐裕；我的童年生活是充滿了溫暖的。我七歲開始進入私塾讀書，但我的個性好動喜玩，上學的時間很少。我家裏有兩支土製鳥槍及一支日本的川田步槍，九歲便開始學習射擊，十歲已能打飛鳥；我的祖父抱着耕讀傳家的觀念，在我兄弟三人中對我的期望最殷，因而對我的管教亦較嚴，常以我好玩懶讀加以責備；我的父親的觀點則不儘同，他認爲在此動亂時代，讀書固屬重要，但武事亦不可不習，對我打獵的行爲並不阻止，還供給我所需的火藥和砂子（土製鳥槍用的彈藥）。我的身體原是稍帶文弱，但我天天運動便日漸結實起來，成爲我以後投身軍旅的有利條件。

我童年時期，正是中國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領導中國青年武裝起義，推翻滿清專制皇朝，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大時代。當我稍懂人事時，則常從鄉中父老們的談話中聽到革命黨人武裝起義、奮鬥犧牲的消息，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宣統三年（一

九一一年），一個暮春的晚上，我父親備了一席豐富的酒菜，招待一位剛由廣州回鄉的革命黨人，他名叫龔土保，年約三十餘歲，體格壯健，面目黧黑，是我同鄉同宗人。他早年投入清政府廣東的新軍當兵，此次個人參加革命黨廣州起義，進攻兩廣總督府，失敗後逃回家鄉，鄉人對這位農民出身的革命志士頗表尊敬，那天晚上參加晚餐的父老有十餘人，席間這位志士詳述廣州起義的經過，當他講述：革命黨進攻總督府的祗有百多人，每人手持兩個炸彈，一支槍，奮不顧身的衝入總督衙門，打死了很多官兵，那些高級官員聞槍聲後即跳窗逃走的情形時，在座各人非常興奮。當他說到佔領總督衙門後，敵人大隊馳援，黨人失敗，死傷甚多，被俘的革命志士視死如歸，慷慨就義的情形時，各人都唏噓嘆息，甚至感動泣下。深宵席散，人人都抱着悲憤的心情分別離去。我當時目見耳聞，幼稚的心靈已激起了仰慕革命黨人、痛恨滿清政府的心理。是年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武昌革命起義成功，接着全國大多數的省份宣告獨立響應。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由此起以陽曆紀年），中華民國誕生，建都南京，孫文就任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這個大喜訊，很快的傳到我們鄉村，一時人人放下工作，奔走相告，同慶新生。我當日即跑到本村的靈武小學堂，參加集體剪辮，是晚我的父親和大哥亦即將長辮剪掉，以示擁護國民政府之決心，鄉人亦陸續將長辮剪去，自此，留辮的風氣不復再現。

一九一二年春，我考入本村靈武小學堂讀書，收拾了過去放縱好玩的心情，專心致志於求學，以一年半的時間跳級完成三年小學的學業。一九一三年暑期，考入了樂昌縣立高等小學堂，因我是全校學生中最年少的一個，甚得老師們的喜愛和關注，常於課餘之暇，爲我介紹課外讀物和講述時事，我的學業和思想也就得到了不少的啓發，與時代緊密的聯系起來了。

在高小讀書這段期間，我開始關心國家大事，崇拜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理想，更關心他的革命事業的成敗。（因爲那時國民政府總統職已由中山先生讓位與袁世凱，他的政治措施完全違背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甚至一度恢復帝制，雖旋即失敗，但政權仍操在北洋軍閥之手。）同時我讀過汪精衛先生被清廷逮捕拘押於北平獄中所寫的那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五言絕句詩，這種悲壯激昂，視死如歸的精神，使我對他發生無限的景仰！從這時起，我就認爲：唯有中山先生和汪精衛先生才能拯救中國於水深火熱之中。我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思想，亦孕育於此一時期。

一九一六年夏，我在高小學校畢業後，即考入了廣州市立第一中學，次年（一九一七），中山先生回粵，組織軍政府於廣州，我爲急於參加革命行列，便投入粵軍當兵，旋升班長，再調旅部副官。是年，南、韶、連鎮守使李根源，開辦滇軍講武分校於韶關，我又考

入該校接受軍事教育。一九一八年七月，我患了腸熱症，八月校長張桂鑑因見我病雖痊癒，但身體孱弱，需要較長時間調理，特准回家休養，該校亦於是年遷往廣東之雷州，且因李根源曾經有過反對中山先生之嫌，我遂脫離該校。我在軍校受訓的時間雖不足一年，但因軍校的教官多是保定軍官學堂及雲南講武學堂早期畢業的軍官，他們的教育作風非常嚴格，我的軍事學術基礎，就是奠立於此。

一九二零年冬，粵軍由閩回粵，中山先生亦接着回粵，我便再回到原屬部隊（粵軍第二旅）服務，充任第一營第二連中尉排長，該連連長鄧鵬，行伍出身，作戰雖勇敢，但文化程度很低，不注意訓練士兵，我到職後，連隊內的文書及訓練部隊等工作，都交由我負責。

一九二一年六月，部隊奉命由粵開赴廣西，途次梧州，鄧連長調職，我升任連長。那時士兵對於革命，並無認識，他們以當兵爲職業，且充滿了升官發財的思想，我爲了加强他們的革命意識，常將中山先生建立民國的革命意義及革命軍人保衞民國的責任，向他們講解，頗收效果。

一九二二年二月，因丁父憂回家。不久，中山先生亦因陳烱明之變而離粵赴滬。至一九二三年春，粵、桂、湘、滇軍討伐陳烱明，光復廣州，中山先生回粵後，我由朋友介紹，參加攻鄂軍任少校參謀，跟隨總司令程潛攻湘，迨至攻湘失敗，退回廣東北江，我便被派在廣

州通訊處工作。我初期參加國民黨軍的生活，亦於此時結束。

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建立中華民國。它的性質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第二階段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召開國民會議，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它的性質是民權革命。當他在第一階段革命時期，冒險犯難，竭忠盡智，以抵於成：成爲中國獨一無二的先知先覺的革命領袖。當時追隨中山先生的仁人志士，亦無不抱着不成功即成仁的犧牲決心，在歷次起義中，擲頭顱，洒熱血，前仆後繼，爲完成中國民主革命而奮鬥；他們這種偉大的革命精神，引起了千千萬萬的有識青年所嚮往，卒於辛亥革命之役，完成革命第一階段，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任務。可是這一勝利果實，未爲全國人民所享有，反而被袁世凱及其軍閥所奪去，使中國革命失敗於成功之後。

中山先生爲了貫徹其革命主張，繼續領導第二階級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民權革命鬥爭。

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對袁世凱破壞革命的竊國行爲，無不深惡痛絕，我以一個十六歲的青年學生，毅然投筆從戎，跑進革命陣營中去，就是受了這種影響。可是當我斷身行伍之後，發覺這一革命軍隊裏士兵的思想意識，祗知當兵食糧，服從長官，對於革命事業毫無認識，他們當兵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爲了吃飯！當兵，變成了職業，他們另一個目的，是希望升官發財。

一般的軍官，多數認爲「亂世出英雄」、「有革命、有仗打」，就有飛黃騰達和升官發財的機會。高級將領們，多數懷着擁兵自雄，投機取巧，希望能割據一方，生殺予奪，爲所欲爲，以滿足其個人權利之慾。大權在握，即將革命事業置諸腦後。例如：廣西軍閥莫榮新、陳炳昆、林虎等利用中山先生護法運動的機會，進入廣州，旋即反對中山先生。廣東的陳烱明，當他掌握了廣東的軍政大權後，在當時而論，他在中山先生領導下的革命陣營中是一個傑出人物。他不惜失去巨大的稅收，嚴厲禁烟（鴉片烟）、禁賭；並且注重培養青年，廉潔自愛，不積私蓄。他的德政，爲當時粤人所樂道。可是爲了保持他的地位，主張聯省自治，反對北伐，居然於中山先生揮軍北伐，勝利進軍途中，控制廣州，斷絕北伐軍後援，甚至當中山先生隻身回粤，希圖責以大義，盼其改變方針的時候，他竟稱兵作亂，發動政變，炮轟總統府，迫使中山先生退出廣州，因而破壞了北伐大計。迨至一九二三年，粤、桂、湘、滇軍驅逐了陳烱明之後，才開始建立廣州的革命政府，政治、軍事等一切措施，才漸上軌道。

那時年青的我，親身經歷這些革命陣營中的風波，我的心內一方面慶幸自己未沾染到當時官兵的壞習氣，仍能保持自己的革命純潔精神，同時眼見革命陣營中的現象亦已日趨穩定，象徵着革命的前途已露出曙光。但在自我慶幸的喜悅中，鑒於過去革命陣營中的動亂，

不能不有所戒懼！而且當時國民黨的政治領袖間的關係仍不甚融洽；各省軍隊雲集廣東，且軍紀廢弛，毫無革命軍隊的氣象，使人十分厭惡！似這樣的軍隊，是否能擔負起北伐的任務？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也加入了這一革命陣營，今後如何？會不會還有更大的變動？這些問題常常浮現在我的腦中，不過當時我堅信中山先生必有辦法衝破一切困難，領導我們完成革命事業。

我少年時期，不好交際，生活嚴謹，惟愛讀書，經常手不釋卷。在我任職攻鄂軍廣州通訊處時，我同縣在廣州工專讀書的學生陳德釗、丘鑑志等，常在晚上或假期時來訪我，每次和我談論的都是有關中國革命的問題，並常送「新青年」、「嚮導」（中共初期刊物）等進步刊物給我閱讀，使我對於陌生和懷疑的共產黨逐漸的有了興趣和認識。但我參加中山先生的革命隊伍多年，雖未正式加入國民黨，但我老早已以國民黨員身份自居，因此，陳、丘兩人雖屢次邀我加入青年團，都給我婉詞拒絕了。

可是，我在當時，一方面因不滿國民黨軍人的腐敗，恥與為伍，另方面對將來革命出路問題又感到徬徨！

在不滿現實的徬徨情緒中，使我想到陳、丘兩人對我孜孜不倦的作「說教」式的游說時，都說：國民黨既已有「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參加中共自是更

進步的革命工作，與你的革命初衷，並無不合……等等辯論。我又覺得有其眞理，於是我卒於一九二四年六月的一個悶熱天氣的下午，在廣州市惠福路的一間樓上，正式的宣誓加入青年團。

我加入青年團後，被編入了工專學生的一個小組，組長就是陳德釗，他的年紀僅少我一歲，身材瘦小，兩眼有神，對於工作和學習都很勤奮，惟頭腦呆滯，處事無方。當時團員的組織生活，每星期就有一次小組會議，主要的是學習及討論，研究青年團省委發下的油印課題，並檢查各人對上次文件學習的心得。小組會議，每人均須提出報告，此外對於發展團員，亦爲小組工作檢討之一。

團的支部會議，通常是每月一次，主要是政治報告，接着是討論問題，最後是分配工作。

我在青年團有一年的時間，除了參加會議及學習外，並沒有被派做其他工作，也沒有介紹過同志入團，但團的同志都對我很好。

廣東省青年團省委書記是中大學生沈寶同，他的年紀比我稍爲大一點，眼有近視，身體不大好。他和我談過兩次話，態度誠懇，他要我多讀些有關書籍，如「社會發展史」、「共產黨組織原則」、「國家與革命」等等。他希望我能擔當些更重要的工作。迨至一九二五年

六月十日，沈寶同通知我，大意是：「黨已經決定將你轉爲正式黨員，並且即有工作給你，黨的省委書記陳延年同志約你今天下午八時到辦事處見面。」

我得到他的通知後，心情上有點興奮，因爲我即可參加中共的實際工作，同時又有一點恐懼！黨給我什麽工作？我能否勝任？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終於在約定的時間，踏進廣州市文明路×號的二樓。

一踏進客廳，我發現一個年約三十歲，中等身材，體格結實壯健，臉有痲子的壯漢，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白綫衫，白色的短布褲，滿頭大汗，正在近小騎樓的寫字枱伏案寫作。我一見便知道他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在留法時參加中共的），也即是當時任廣東省委的書記。他在初來廣州時，爲了要接近工人羣衆，曾親身加入廣州市人力車工會，常拉着人力車隨街跑，與人力車工人生活在一起，到處找工人談話，從而去瞭解工人，組織工人，他對革命工作的熱情，常爲同志們所樂道。

我環視這個小客廳，面積不到二百平方尺，陳設簡陋，有四張殘舊的酸枝椅和一張長椅，廳中放置有一張酸枝鑲雲石面的圓枱，四張圓石酸枝櫈。

這就是很多要人來往會議，半公開的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廳，若非熟悉內情的人，見到像這樣的陳設，就難以置信了。

我靜靜的坐在圓桌的傍邊，面對着他，靜候他的指示。他見我到了，立即就對我說：「你是龔楚同志嗎？請稍候些時。」過了約十五分鐘的時間，他才轉過身來面對着我，首先對我注視一遍，然後起來和我緊緊的握手，並即移坐在我的對面。

他很親切的對我說：「龔同志！黨已批准你轉爲正式黨員了，你應該爲取到這一資格而感到光榮！目前的黨的政策，是在國民黨的一切組織中取得實權與工作，亦即是利用國民黨各級黨部以掌握工農運動的領導權，使廣大的工農羣衆，團結在本黨週圍，以實現本黨的主張。

「你今後的工作，是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名義，前往廣東省農民協會北江辦事處，參加北江的工農運動。經過我們確切的調查，你的地位與人事關係，極適合這一任務，相信你必能完成本黨給你的使命；但在工作中特別注意的事：要在工農運動中吸收勇敢的優秀青年參加黨、團；建立與健全黨、團的各級基層組織，使黨的一切政策，都能運用黨團的作用，得以貫徹實現；關於黨團工作的主要內容是：依照黨的政策，要適應客觀環境，對每一件事，每一問題，決定適當的對策；並且具體分配給每一黨團員工作，使全體黨團員的行動言論都能一致；最重要的是每一個黨員都能確實的深入羣衆，爭取羣衆，掌握羣衆，使羣衆同意黨的主張，跟隨黨的行動而行動，在羣衆中發生核心的領導作用。」

接着他又對我說：「你過去的情形我很瞭解，你是北江人，對於北江的地方情況，你一定比我明瞭，關於開展北江的工農運動，有什麽問題，儘管對我說。」

我說：「北江的民風純樸，工農生活雖不算好，但比較安定，因此開展工農運動比較費力，不過我必努力去幹，務求對革命事業有所貢獻。」

他聽了我的答覆，點頭微笑表示滿意，跟着他囑咐我明天十時再來一次和組織部同志接洽並與省農會方面連絡。

次日，我先到省黨部見組織部同志（恕我忘其姓名），由他將一封黨的介紹信及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證件交給我。組織部的同志先問我：「何日可以起程？」我答覆他：「待我辦妥辭去軍隊的職務後，便可起程。」是日下午四時我就到百子路省農會去。

省農會的常委阮嘯仙同志親自接見我。他的身材瘦長，面目清癯，戴着眼鏡，穿着一套白綢衫褲，態度安詳而沉默，談吐斯文，但缺乏熱情，他的風度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讀書人。

我們會談的地方，是在省農會內左側的一間長方形會客室，室內擺着一張長方形的日字枱，枱的四週放置有好幾張日字枱，他招呼我坐下。

阮嘯仙同志似乎對我過去的經歷不甚瞭解，他一開首就問我：「你以前做過什麽事？」

我說：「我現在還是程潛軍隊裏的少校參謀，駐廣州通訊處的主任；現在接受黨給我的

任務要到北江去做農運工作。」

他聽了有點驚奇，接着便問我：「你曾否作過戰？」

我笑道：「我當過排長連長，當然作過戰。」

他又問：「為什麽不繼續在軍隊裏工作？」

我說：「這是黨給我的任務和安排。」

至此，他才露出笑容，顯然很高興！

他告訴我：「目前農運工作主要口號是：減租、減息、及奪取鄉村政權，但切勿操之過急。你作農運工作不過是暫時的，將來還要你做軍事工作呢。」接着他便給我一封帶給農民協會北江辦事處的介紹信，並要我常常和他通訊。

我取得介紹信後，便向他告辭，這時他竟携着我的手步出大門，握手而別。

我回到住所，立即辦理離職手續，並託朋友向程潛解釋。大約一個星期左右，我的辭職被批准下來了，於是我就摒當一切，準備離開廣州。

當我正在辦理向程潛將軍辭職時（六月十三日），廣州市發生了一件事，許崇智的粤軍及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以下簡稱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將軍的黃埔軍校教導團，以極機密而迅速的行動消滅了楊希閔的滇軍及劉震寰的桂軍。滇桂軍是當時革命陣營中紀律最壞的，

他們的高級軍官在廣州市及附近縣市包烟（鴉片烟）、包賭，截留當局的一切稅收，生活腐化，致使革命政府的稅收無法整理，使政府的財政經濟陷於極端困難之中，他們的中下級軍官及士兵則到處姦淫擄掠，强買强賣，無所不爲，廣東人民視之如虎，怨聲載道！現在一旦將之消滅，無不額手稱慶。對於粤軍及黃埔軍官學校備極讚許。

黃埔軍校成立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山先生爲了建設革命軍隊而創辦的，並得蘇聯的支助。當時中山先生兼任該校總理，蔣介石將軍爲校長、廖仲凱爲黨代表、鄧演達爲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爲副主任、聶榮臻爲政治部祕書。校內的政治部人員及政治教官多爲共產黨員，如蕭楚女、惲代英等均爲當時的政治教官；第一期學生四百六十餘人之中，有八十多人是共產黨員，並組織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全由共產黨籍的學生領導，目的是準備爭取更多的學生參加中共，以備將來控制軍隊。但可惜這個組織的領導人，工作幼稚而又盛氣凌人，不特不能爭取得同學們參加，反而常拒人於千里之外，招致非共產黨的同學反感。於是有教官甘乃光及學生賀衷寒等發起組織了一個「孫文學會」與之對抗，以致破壞了中共這一個重大計劃。

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後，是年冬又招編了兩個教導團，準備爲第二期的預備學生。一九二五年三月，東江消滅陳烱明的殘部之役，統一廣東，出力最大的就是這兩個團。由此，黃

埔軍校之名大噪，而且成爲以後蔣介石將軍的軍事骨幹。周恩來後來在武漢及南昌暴動時期亦以黃埔軍校學生爲中心。迨至中共蘇維埃政權成立及至延安時期，黃埔軍校學生在中共陣營內已爲數甚少了。以我所知是時尚存者有林彪、徐向前、蕭克、黃震、張宗遜……等數人而已。

第二章　參加農民運動

我自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後，正值香港工人在中共黨員蘇兆徵、鄧中夏領導之下，繼上海「五卅」運動①，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開始大罷工；緊接着六月廿三日，廣州工、農、商、學、兵十萬羣衆舉行反日反英的示威遊行，又發生沙基慘案②，致造成了嚴重的省港大罷工風潮，這一次巨大的大罷工風潮，充份表現出工人階級的力量。儘管如此，因爲中國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農業社會階段，全國工人的總數，根據中共當年的調查估計，僅約爲二百萬人，以中國四億人口計，它的比例，工人僅佔全國人口的二百份之一；再從質量上言，中國工人絕大多數都是剛從農村跑到城市去做工，從農民轉爲工人，所此眞正的工人無產階級實在少之又少。以這樣少數的工人階級能夠肩負起中國革命的重任嗎？

當我接受了參加農民運動工作的時候，我就考慮到農民問題。

中共的農運，開始於一九二一年，廣東彭湃所組織的海陸豐兩縣農民協會，有十萬會員之多，在當地進行了對地主階級的經濟鬥爭，甚得農民所擁護，後來雖曾被陳炯明所摧殘，但陳軍失敗後，農民協會又恢復活動。

一九二四年，毛澤東在汪精衞、廖仲凱的協助下在廣州開辦了一間「農民運動講習所」（以下簡稱農訓所），由他自己負責，學生人數不到百人，以廣東籍之知識青年爲最多，如當時在北江做農運工作的侯鳳墀、陳果强、李樂天、蔡正文，及福建的張鼎丞……等，都是當時廣東農訓所的學生。我既不是農訓所的學生，對於農民工作是否勝任？但我又想到：彭湃可以做，難道我不可以做嗎？我乃搜集有關農民問題的文件，加以研究，根據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討論的中心問題是：「黨如何展開全國性的民衆運動」，指出了工人階級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的：「在於爭取這個革命的徹底勝利後，把它引向無產階級革命，同時指出了農民是工人階級的主要同盟軍，必須盡可能的組織農民，進行政治及經濟的鬥爭，因而必須普遍的組織農民協會及農民自衞軍，以反對地主政權和地主武裝。」這個農民問題，過去未爲中共所重視，直至此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加以特別注意，但他們仍認爲農民祇是無產階級的主要同盟軍。我當時覺得：在中國現階段革命鬥爭中，他們對農民力量的認識，仍然是不夠的。我認爲：農民在數量上佔全中國人口的百份之八十以上，甚至現時各階層各業的人中包括工人在內，也多是農民出身，因此，中國革命必須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和參加，才有成功的希望，這是無可否認的鐵一般的事實。無論你是國民黨或是共產黨，不管你是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民權革命或是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脫

雖這一巨大無比的農民力量。

那麽，要爭取中國廣大農民來參加現階段這一「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是當前最主要的工作，農民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因此我覺得我的任務極有意義，而且很重要。我對農民問題得到了這個結論，就懷着興奮而又喜悅的心情，於六月廿一日乘搭粵漢鐵路的火車赴韶關。是日下午五時到達韶關後即前往省農會北江辦事處接洽。是晚與辦事處負責人侯鳳墀、盧克平及曲江農會負責人陳杲强（上述數人都是農民部特派員）開了一次會議，决定我先到樂昌協助陳德釗開展樂昌縣農民協會的組織工作，並負責指導仁化縣農民運動。

翌日晨早起程去樂昌，於晚上六時才到達了我的故鄉——樂昌縣城，便立即到民團局與陳德釗同志晤面。我們隔別了將近四個多月，又在故鄉重叙，而且共同工作，自然是喜不自勝。

當晚我洗過澡後，即與陳德釗同志到一間小酒家吃晚飯，正是：杯酒言歡，暢叙舊情，並聽他叙述過去的工作情况，直至深夜，才盡歡而散。次日一早，我就獨雇小舟，回家省親，稍事勾留，即回縣城。是夜我和陳德釗同志應樂昌民團局長李傳楷之邀宴。席上他對我回樂昌工作，表示極爲歡迎，允以全力支持，並要求我利用時間爲他整訓現有之民團，以爲將來革命之用，他這種無私精神和誠懇的態度令我感佩

李局長雖是前清拔貢，但思想開明，當中山先生組織中華革命黨時，他就是黨員之一，被派來樂昌發展組織，又曾任樂昌民選縣長，卸任後，便留在家鄉，因他是本縣大紳，具有實力，外來官吏皆必須利用他的實力來維持地方治安，故任本縣民團局長有年。後來樂昌農民協會的發展，賴他的助力不少。

北江地區橫亘着五嶺山脈，位連湘、贛之邊，這一帶大部份是起伏不斷的山巒，地形險要，由贛入粵，經梅嶺關至南雄，沿湞江南下；由湘入粵，經蔚嶺關至樂昌或經坪石，沿武水南下至樂昌；湞、武兩水滙合於韶關成爲北江，故韶關爲北江之樞紐，從來爲軍事要地，現雖有粵漢鐵路貫通南北，但仍不失其軍事要地之價値。

北江農民都具有中國農民的勞動樸實的品質，他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因爲土地並不肥沃，而耕作技術又十分保守，所以長年都生活在窮困的日子裏，吃的是青菜飯和雜糧，穿的是破爛布衣，住的是泥土築成的古老房屋，中國傳統的「樂天知命」的思想保持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根本就不會自發地從事一項要求改善生活方式的行動。

北江的可耕地面積很少，而且很分散；擁有二百畝以上土地的地主爲數很少，多半是十畝至五十畝的自耕農。他們的生活雖然比較普通農民好些，但由於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及中國社會的變亂相襲，農村的經濟破產，正如中山先生所說：只有「大貧和小貧」的分別

而已！

少數的豪、紳是農村中的特殊階級，他們與貪官汚吏相勾結，朋比爲奸，把持着地方政權。國家的糧賦和捐欵，全部分派給小商人及窮人負擔，他們不願拿出分文，還要從中竊騙。屬於人民大衆的教育基金、義賑基金、積穀基金等等，他們可以隨意侵吞，巧取豪奪，縱情浪費。農民稍有異言，小則破產，大則亡身。同時，有些劣紳，常在鄉間利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挑撥離間，製造爭訟，使人傾家蕩產，而他們卻從中漁利，藉此來增加他們在農村中的權勢。至於放高利貸和藉故强奪民產……亦爲地方土豪常做的事。

農民耕種着地主的土地，每年要將土地收益的百份之三十至百份之五十，繳納給地主作田租。每逢節日還要送禮孝敬地主，有時還要無條件爲地主義務勞動。許多刻薄的地主常利用他們剩餘的糧食和金錢，在青黃不接的夏荒時候，將糧食或相等於糧食價値的金錢，作高利貸貸放給農民。最普通的是在夏荒時借一擔（一百斤）穀子，秋收後即要還一擔半（一百五十斤），僅僅三四個月的時間，利息就等於貸金的百份之五十。

有些有田契或屋契作抵押的貸欵，年息亦達百份之三十六以上。農民終年辛勤，秋收後所得的穀物，除了繳付地租和利息外，便所剩無幾了。

農村中流行着一首民歌：「農民收了穀，家中無粒粟，田主家裏堆滿屋！」這首充滿辛

酸血淚的歌詞，正是當年中國農村社會的最好寫照。

農民在秋收後，必須以收穫的穀物去換取日用必需品，如油、鹽、火柴、布匹等。因爲運輸困難，農民無法將穀子運送到城市中去售賣，而且窮苦的農民很少有儲藏糧食的穀倉，只好忍痛的賣給附近的豪紳地主及收買的小商人。

貪婪的豪紳地主們，利用他們的金錢勢力，故意壓低穀價，大量收購廉價的穀米；到夏荒時，又以超過原價百份之七十或八十的高價賣給缺糧的農民。無錢購買的農民，只好忍受着高利貸的剝削，這樣循環下去，許多農民便成爲終身負債者。他們的勞動力也永無止境的被剝削下去了。

農民並不心甘情願的忍受這種無限無制的剝削，他們心中早已隱伏着憤怒和怨恨。可是他們缺乏積極的革命性與組織性，如果沒有外在的力量來衝擊起他們內在的反抗意識時，他們不可能也無力量來掀起一次驚天動地的革命運動。根據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曾發生過農民的革命運動，但是每一次的農民革命運動，都是由中產階級或知識分子首先發難，並不是農民自己所主動；北江農民運動的開展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這一階段中的國民黨的農民運動，可以說全部爲共產黨員所包辦。中共老黨員林祖涵，當時便是中央農民部的部長，中共爲了實際掌握廣大農民，適應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

需要，提出農民運動的口號，那便是：「反對豪紳地主壓迫！厲行減租減息！實行耕者有其田！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民生活！」這些動人的口號，雖然當時農民運動的手段還溫和，但在農民看來，已經是非常滿足了。

北江區包括了清遠、英德、佛岡、曲江、翁源、南雄、始興、樂昌、仁化、乳源、連山、連縣、陽山等十三個縣，全區的工作領導由設於韶關之廣東省農民協會北江辦事處負責，北江辦事處由負責曲江農運的侯鳳墀、盧克平等兼顧。北江的工作重點放在粵漢鐵路沿綫之清遠、英德、曲江、樂昌四縣，爲了工作的聯繫，各縣農運之特派員，每月均定期到韶關開會一次，北江的農運工作，便由此而蓬勃的展開了。

廣東農民協會的組織系統是這樣的：

省農會——縣農會——區農會——鄉農會——村農會

農民入會時每人繳交會費銀圓二毛，入會後由縣農會每人發給銅質證章一枚，作爲會員之憑證。

各級農會均有會旗，旗的大小代表農會的等級，旗的特徵是：旗桿尖端的紅纓之下，有一面繡有鐮刀斧頭的小紅旗，這一小紅旗約等於大紅旗的二十份之一，小紅旗下面便是大紅旗，旗的正中繡有一張中國農民慣用的犁，犁是白色的，紅白相襯，互相輝映，鮮艷奪目，

紅是象徵革命熱情，白是象徵純潔無邪，它的標誌，很明顯的表示出它的代表性，大旗之上的小紅旗，使人一望而知是共產黨。

樂昌農運工作，陳德釗籌備了三個多月，仍是「樂昌縣農民協會籌備處」一塊空招牌，而且是附設在樂昌民團局內。民團局本來是豪紳地主操縱地方武裝勢力的指揮部，是我們的革命對象。雖然樂昌縣民團局的情形有些特殊，因爲李傳楷局長思想進步，他不特不反對革命，而且贊助革命，但農民協會的招牌掛在民團局內，難免不使人發生懷疑。同時還有一件令我驚奇的事，樂昌竟沒有國民黨的組織。我覺得以樂昌純樸的民風，若沒有一個合法的公開機關去發動工農運動，人民會畏縮不前的。我想起了先賢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一點，李德釗同志是沒有理解到這個問題的。所以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都徒勞無功。爲着要迅速展開工農運動，我覺得必須首先組織國民黨，成立樂昌縣黨部，從而掌握住這個國民黨部，利用國民黨名義，以推動工農運動，這樣就事半而功倍了。我經過愼密的考慮後，立即約同樂昌縣長曾昭聲、民團局長李傳楷及陳德釗等發起召集地方各界舉行一次組織國民黨籌備會議，適於此時，樂昌籍在廣州讀書學成歸來的學生丘劍一、朱節山等（他們都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正好共同參加這一工作。

第一次籌備會議在七月二日舉行，出席的有二十餘人。會議由曾縣長主持，李傳楷也在

會議上發言，他說：「自中華革命黨改組後，樂昌黨務即已解體，現在龔、陳兩同志是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派來樂昌工作的，關於本縣組織國民黨及成立縣黨部等項工作，自應急不容緩……。」我繼即說明：國民黨改組後的「聯俄」、「容共」、「扶植農工」三大政策的意義，雖然中山先生今年（一九二五）三月在北京不幸逝世，但國民黨領導下的廣州革命政府仍有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諸先生繼續領導，遵循中山先生遺教邁步前進，俄國政府亦仍繼續援助中國革命事業，國民黨正在不斷的進步發展中。希望我們大家共同爲革命而努力奮鬥。

經過大家熱烈發言之後，即席選出曾昭聲、李傳楷、朱節山、陳德釗及我五人爲籌備委員，出席這次會議的人都紛紛登記加入國民黨，並分別負責徵求黨員。旋於七月十二日召開黨員大會，出席的黨員共有三十八人，即席選出：朱節山爲常務委員，曾昭聲、李傳楷、陳德釗、譚軍署、龔無害、丘劍一爲委員，我爲監察委員。樂昌縣黨部即日宣告成立，並以樂昌公局爲中國國民黨樂昌縣黨部的會址。

此次選出的黨部委員除曾昭聲、李傳楷外，其餘的均是共產黨員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且在會後在國民黨員中我們又吸收了四個青年團員。

國民黨縣黨部成立之後，我們就積極展開羣衆運動，由朱節山負責學運，陳德釗負責工

運，我負責農運，丘劍一、龔無害負責黨務，譚軍署協助李傳楷整訓民團，以加强民衆武裝力量。從此縣黨部便給我們掌握住了，爲我們所利用了。

關於樂昌農運工作之開展，我們首先遴選了知識青年李光中、楊高林、謝××（以後被殺）參加工作，接着又有白鐸聲，李家源兩位積極分子參加我們的行列。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粗布短衣，深入到農村去，先找尋一兩個農民作個別談話，繼而發動十人至二十人作集體宣傳，每到一村均注意吸收積極的青年農民參加工作，並告訴他們怎樣組織農會，怎樣造名册，向他們宣傳參加農會的好處。

我們組織農會首先是成立村農會，有了兩個以上村農會的地區即籌備成立鄉農會，若有兩個以上鄉農會的地區即成立區農會，由於農民的熱烈參加，所以農會很快的普遍發展起來了。

當農運開始時，有些狡獪的豪紳便想加入農會，企圖從中操縱，但爲農會所拒絕。另有一部份老成持重的較爲富裕的農民，對農會則心存觀望，所以農會的會員除少數係知識青年之外，其餘絕大部份都是貧苦農民。農會成立之後，鄉村政權便落在農民手裏，他們就實行減租減息運動。以前心存觀望的農民眼見農會勢力日益壯大的時候，便要求參加農會了。那些豪紳地主們，因權力被剝奪自然是大表不滿，但他們面對着龐大的農民組織力量，卻敢怒

面不敢言，也不敢有任何行動。樂昌的農運因而得以和平發展。從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至一九二六年三月，在這短短的八個月中，全縣成立了八個鄉農會，五十七個村農會。

工運方面，也成立了船員工會、店員工會、理髮工會等。

樂昌縣全縣人口約十五萬人，加入工會和農會組織的男男女女達二萬餘衆，無疑的，共產黨的勢力已遍及到全縣每一個角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下旬，廣東省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廣州召開全省代表大會，會議地點是在文明路中大附中禮堂舉行。我被指定出席這一次大會。

代表大會由陳延年、任卓宣、沈寶同等主持，會議連續達三天，在政治報告中，強調要保持與國民黨緊密合作的革命聯合陣綫，特別是組織及團結廣大工農羣衆路綫外，並指出了過去一年來團的工作的錯誤和缺點，如「祇注意學運，忽視了農村青年工作」等等。至於決議案中主要的有：「開展農村青年運動，吸收青年農民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提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口號。

大會結束後，我本來是以國民黨樂昌縣黨部代表資格出席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只可惜我病了。所以沒有出席這一次大會，至一月中旬我才病愈返回北江。

仁化縣的農民運動，原有仁化縣籍的工作同志蔡正文負責，但由於該縣國民黨黨部爲地方豪紳所把持，所以工作受到阻力，致使成績不大理想。

我於二月初前往視察，當時該縣只有附城及董塘兩個鄉農會，該兩個鄉農會擁有十二個村農會。我們經過一番檢討，認爲：農會發展緩慢，主要原因固然是缺乏幹部，其次是我們還沒有掌握住國民黨這塊正統招牌，亦爲重要原因之一。爲了解決幹部問題，遂由各鄉村農會選拔優秀青年出來，分派赴長江、扶溪、城口三個大鄉推動工作。我隨即與蔡正文同志親到董塘、石塘一帶鄉村分別召集村農會大會，並分訪當地知識青年，連開明地主也去接觸。我們爭取了不少知識青年參加工作。

在這期間，有一件事令我最難忘，就是石塘村李家一位大地主，他擁有步槍二十餘枝，並有可容五百人的水寨一座，他竟慷慨地無條件的全部獻給農會使用。對於減租、停息，他也首先實行，似此開明地主，可說是極之罕見。

當我離開仁化返回樂昌之後，仁化董塘鄉農會的農民則積極起來向地主實行減租及停止付息，因而與該鄉瀝連村之地主發生武裝衝突，雙方互有死傷。我見情勢嚴重，二月中旬，遂趕赴仁化，協同該縣劉縣長及該縣國民黨部常務委員劉玉堂進行調解，尚幸雙方均肯讓步，衝突事件總算平定下來，但已種下後來互相屠殺的惡果了！

二月底，我們在北江辦事處檢討工作時，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掌握住國民黨黨部的地方則工農運動較爲順利。因此，我們要求各縣工作同志在工作中必須儘可能的以團結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的策畧，分化國民黨內部，爭取掌握國民黨各級黨部的控制權。運用這一策畧，後來在各縣都能得到相當有效的工作成績。

廣東農民協會（以下簡稱農會）至一九二五年底，組織工作已全面展開了，惟農軍的編組，尚停留在準備階段，廣東省農民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始派來了一位黃埔軍校姓朱的第一期生（梅縣人），帶同黃埔生李資等到韶關籌辦北江農軍幹部訓練所，以造就農軍初級幹部，由農會北江辦事處通令各縣農會選派優秀青年送入該所訓練，各縣農會接到通令後即發動青年熱烈參加。於同年三月一日第一期學生入學，共有學生三百二十人。原定訓練計劃爲期一年；但因各縣農軍編組急需幹部，乃提前於是年十月底畢業，畢業學生即分派至各縣充當農軍初級幹部。第二期的學生亦於十一月一日開學。

關於農軍的編制，以分隊爲最小的單位，由八至十二人編成，每村編一個分隊至一個小隊，每鄉編一個小隊至一個中隊，每區編一個中隊至一個大隊，大隊爲農軍編組的最大單位，受縣農會軍事部直接指揮。

農軍的訓練：已編入農軍士兵的農民，不脫離生產，他們的訓練，因爲各地環境不同，

總以利用農暇時間爲原則。以樂昌而言，農軍的訓練時間，是每日下午六時至七時，星期日下午四時至七時爲集訓時間。

農軍的訓練科目：着重於射擊及利用地形地物等分別戰鬥教練。

農軍的裝備：初期接收了各鄉村民團的武器——步槍，這些步槍種類複雜，包括有德造七九、粵造七九、六八，日造六五（三八式）及川田式等舊式步槍，每槍子彈不足一百發。因槍枝數量極少，每分隊僅有二、三枝或四至五枝不等，平時集中於村農會，訓練時輪流使用。

農軍的任務：初期接替了地主豪紳的民團，維持地方治安，但與民團相反的是它專反抗豪紳地主對工農運動的鎮壓活動。

樂昌的農民自衞軍，如上述的情形組成。迨至一九二六年七月編成了八個中隊（約有一千人），另外還有樂昌民團局一個中隊，配備有德造七九步槍六十枝，駁殼（盒子炮）手槍四枝。

其餘北江各縣，如：清遠、英德、曲江、仁化，均有相當的成績。

七月，廣東省農民協會在廣州召開全省擴大會議，我偕同樂昌縣農民協會代表楊高林、鄧水石、薛仰聖等出席參加，這次會議開了五天，陳延年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說明當前的

政治形勢；他認為北伐軍已開始勝利前進，國民革命已進入勝利階段，但我們必須更加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的破壞，確保與國民黨的民族革命統一陣綫的團結。繼由省農會羅綺園報告全省農會的概況。然後由阮嘯仙、任卓宣等分別輪流主持會議。討論關於發展農會，擴大農軍編組，實行減租減息等等問題。

大會結束後，羅綺園約我於是日上午十時到省農會談話。我依時到達省農會時，他已與阮嘯仙同志坐在會客廳裏候我，他們一見到我，便起來和我握手。

阮嘯仙同志喜氣洋洋的稱讚說：「龔楚同志，你這一年來的工作表現很好，現在除了彭湃同志直接領導海陸豐農運工作成績頂好外，要算你們北江的工作最好了！你們的工作成績，連我們省農會直接領導的中區各縣農運都比不上哩！」接着又說：「羅綺園同志是負責軍事部的，關於如何武裝農民，如何擴大農軍組織，如何爭取時間在最短的期間內完成一切作戰準備……。因為你是軍人，對於這些問題比較熟悉，所以羅同志特地約你來研討。我因有特別的事要辦，請與羅同志詳細具體地作出决定性的研究。」他說罷便走了。

羅綺園身材短小，年約三十餘歲，有深度近視眼，臉色白晰，態度嚴肅，樣子是個文弱書生。他當時很鄭重的對我說：「自今年三月廿日發生中山艦事件③之後，接着國民黨於五月十五日召開第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黨務整理方案④。主要內容是：確立國民黨在國民革

命中的領導權，並規定跨黨的黨員不得在國民黨中央任部長級職位，各級黨部委員人數亦不得超過三份之一。致使本黨同志譚平山、林伯渠等均已辭去部長職。目前本黨的對策是：團結左派，抑制蔣介石，打擊右派。至於將來的演變如何，甚難預料。因此我們在這期間必須積極武裝工農，尤其是擴大農軍組織，以最快的步驟訓練成爲勁旅，隨時準備應變……。」

我當時很率直的答覆他：「發動農民參加農軍並不困難，最困難的有三點：一、槍械缺乏；二、軍事幹部太少；三、沒有政治幹部。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關於械彈補給，我問他：「能否請俄顧問鮑羅庭轉請蘇聯供給？」他說：「此事已請求過了。但蘇聯方面因不願意開罪蔣介石，要保持與國民黨合作的局面。所以農軍槍械惟有由各縣自行想辦法購買來補充。至於軍事幹部，可加强北江農軍幹部訓練所，政治幹部可商請駐韶關的國軍教導師師長陳嘉祐協助籌辦訓練，因陳師長是國民黨左派，與我們有緊密的合作，他一定能夠協助。我今天就寫信介紹你回到韶關時和他接洽，該師的政治部主任是本黨同志，一切事情你不妨多與他商討。」

我和羅綺園的談話至此結束。是日，我帶着羅綺園的介紹信，返抵韶關便與陳師長會晤，經過幾次商談，他對於開辦政治幹部訓練班問題，一切人力物力及經費等都肯負責，但學員則須由我們北江辦事處選送。關於農軍械彈問題，他亦答應盡量設法。

北江政治幹部訓練班得到陳師長的幫助，由該師政治部負責，於十月開辦，第一期學員有二百人。這些學員後來都是農軍的政治幹部。北江農軍的組織由此逐漸建全起來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至八月是國民革命軍由廣州從事北伐的時期，除第一軍入閩外，其餘所有第二、三、四、五、六各軍均經韶關、樂昌入湘。當時粵漢鐵路南段，僅由廣州通至韶關，軍運可利用火車；由韶關經樂昌入湘，既無鐵路交通，亦無可行汽車的公路，北伐軍均由陸路徒步行軍。國民革命軍連隊以上均設有黨代表，他們多是黃埔軍校政治科出身，而且多數是共產黨員，他們在行軍時都先行發動羣衆，而各地農會亦自動地踴躍的幫助國軍運輸軍需糧食，農軍負責保衛後方治安，使北伐軍無後顧之憂，順利北上；北伐軍勝利的消息亦很快的傳播到後方，振奮了民衆的革命情緒。八月初，蔣總司令及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北上，道經韶關樂昌，我便發動羣衆舉行盛大的歡迎大會。蔣總司令及加倫將軍，雖是戎馬倥偬，亦很歡愉的出席羣衆大會，接受民衆的歡呼。那時的蔣總司令，身穿布質藍灰色戎裝，精神奕奕，當他向羣衆致詞時，簡短而有力，使民衆不斷的歡呼，掌聲雷動！

這種軍民合作，連成一片的情形，是中國自古以來從所未有過的現象，在這種民氣沸騰的時候，我們便號召民衆支持北伐，武裝自衛及購買槍械，充實裝備的工作。這一號召，得到廣大民衆的熱烈擁護，所以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樂昌各鄉村農會，均將往日豪紳們用於祭

祀、酬神的祠堂、廟宇公欵，提出來作爲購買槍械之用。在這期間，樂昌發生了兩件很不愉快的事件。一是：民團局長李傳楷在坪石鎮被湖南大土匪胡鳳璋殺害，喪失了一個國民黨老同志。二是：樂昌縣長曾昭聲被調職，亦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合作得來的開明行政官。最後，還派了一個腐敗的劉應福來接任。

新來的樂昌縣長劉應福，雲南人，年約四十歲，身材短小，臉帶黝黑氣，一望便知是個抽大烟的烟精，唇上留有短鬍子，眼睛小而稍陷，看人時不斷的溜動，令人一見而知是一位工於心計的狡獪之徒。他於接任視事後約一個星期的一天晚上，在縣府衙內客廳，設宴招待我們，我們應邀到達後，他即將所珍藏的書畫給我們欣賞，表示他是一個風雅的飽學之士。接着他便舉杯勸酒，態度誠懇，狀極愉快。那天我適患胃病，他發覺後，立即請我隨他進內室，室內設有吸鴉片的烟床、烟具，對我說：「我備有上等雲南的枷楠烟膏（枷楠是一種名貴的止痛提神中藥材），你睡下抽兩口，就可立刻止痛了。」我那時正値年少氣盛，而且生平最討厭抽大烟的人，所以我毫不留情的對他說：「劉縣長，我們都是國民政府領導下的革命同志，抽大烟是最腐敗的行爲，你這番善意，請恕我不能接受，同時我還希望你能戒除這種惡習。」當時他不但面紅耳赤，而且怒形於色，但眨眼間又臉帶笑容對我說：「你的話很對，我對此並無嗜好，不過備以療疾而已，我們還是出去喝酒吧。」在他那種怒而反笑，恨

而反親的奸滑態度及殷勤招待下，我只得維持着和洽的氣氛以至席終。但是，劉縣長則對我懷恨於心，由此就種下了禍根。

我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之後，想起了今天對劉縣長的態度，深深的感到自己的衝動和魯莽。因爲他要我抽大烟的動機是善意的，他雖然不是什麽革命同志，更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他到底是一個縣的行政官，我不應該以對同志的態度來對待他。何況我們正想利用他，我這樣的傷害他的自尊心，恐怕將來對自己和樂昌今後的革命工作都會遭到不利影響，一念及此，甚感後悔。但我卻沒有設法去彌補這次過失，當時可能是自尊心太重所致。但我亦未將此事宣揚，祗是和他保持着相當客氣的態度。誰知我竟因此事而坐了三天的牢。

是年冬，十一月初，我偕同樂昌農會同志楊高林、薛仰聖同到廣州購買槍械，隨身備有省農會北江辦事處的證件。我們到達廣州後，住在西湖街西湖旅館，向第六軍後方買得粤造七九步槍二十枝，子彈二千發，正準備於次日乘粤漢路車北運。詎料我們睡至午夜，突遭廣州市公安局的偵緝和警察所的拘捕。當時我們曾出示證件和說明身份，但他們竟置之不理。當晚即被拘禁在嚴重罪犯的監獄內，且禁止對外通信。

我們三人被拘禁的監獄，是一間密不通風的小屋，犯人大小便均在室內，臭氣薰天，室內設有碌架床，但早已有五個犯人住着，我們每人分配得一個床位，空氣污濁不堪。在愁容

相對時，我們研究這次被捕的原因，懷疑到是國民黨要消滅共產黨的行動，要取締工農武裝的政策。我們這種忖測，如果是眞的話，那麽，我們的命運很可能會爲革命而犧牲了。可是我們並沒有因此有絲毫恐懼，大家皆泰然處之，靜候事件的發展。

時間過得很快，眨眼間便是三天。三天後上午九時，突然有個警官到來釋放我們，並請我們到督察長室去，當我們踏入督察長室時，即見到省農會的一位同志和督察長同坐在一起，他見到我們便立即站起來，督察長分別和我們一一握手，並以誤會兩字向我們道歉。

我們一聲不響地走出公安局，即與我的同志到省農會去。

對於我們被捕的事，省農會羅綺園同志對我說出了眞相。他說：「這件事是樂昌縣長劉應福串同國民黨右派分子攪的，他們通知公安局，指你們爲運械的罪犯，局長不查眞相，便將你們拘捕了。後來公安局發覺你是中央農民部特派員，便即通知農民部及省農會，我就去民政廳找陳樹人，陳即通知公安局放人，這才將你們釋放。」

他又告訴我：「國民黨內部，自今年五月舉行二屆二中全會後，造成了蔣介石將軍獨攬黨、政、軍大權，成爲名實相符的國民黨最高領袖，他充份表現出軍人的獨裁作風，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分子，多已對他不滿。在廣東的國民黨和各省市黨部代表，曾在十月間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他們一致反對張靜江，主張歡迎汪精衛先生回國主持國民政府，藉此來壓制蔣

介石。所以現在國民黨內部正走向分裂之途，本黨聯合左派，打擊蔣介石右派的政策，已獲得初步的勝利。關於本黨方面，今年一月的第四次大會及三月舉行的四屆二中擴大會議，均沒有提出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土地革命政策，對於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黨務整理方案又採取了忍讓妥協政策，致使黨內許多同志對黨中央大表不滿。特別是廣東省委會同志，如譚平山、陳延年、彭湃及我們等。」

他又告訴我：「目前我們不僅要提出實行土地革命，將土地分配給農民的口號，爭取農民羣衆站在我們這一邊來，並且應該抓緊北伐時機增强自己的武裝實力，準備奪取廣東政權。你回到北江後，一方面要提出土地歸農民的口號，提高農民的鬥爭情緒，另方面要加緊擴大及訓練農軍，隨時候命行動。」

我聽了他這一席話，覺得他們對農軍的實力估計過高，因當時的農軍，人數雖多，但械彈缺乏，且未經嚴格訓練，等於烏合之衆，用作鎮壓豪紳地主則有餘，若與正規軍作戰，實在言之過早。

我稍加考慮後即對他說：「現在的農軍無論裝備、訓練、幹部等等問題，均未到可用之時，請你注意並設法補救。」

他聽了很不高興，立即對我說：「這是你不相信民衆力量的機會主義觀點，須知祇要民

衆的革命情緒提高了，即使是赤手空拳，也可以暴動奪取政權，何況你們已將民衆組織起來，也編成了農軍，你應該堅定的依照我們的指示，領導北江同志，一致努力，完成黨交給你們的任務，切勿畏首畏尾，貽悞革命事業。」

他這種盛氣凌人的命令式口吻，使我十分反感。但我忍受下來，因我是軍人出身，知道服從的重要性，我只好說：「我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去做。」

他見我不再反對，就送我出門，說聲再會，握手而別。

我回到寓所，便將羅綺園對我的指示向楊、薛兩人作了一次簡短的傳達，並對他們說：「廣東的上層領導同志，心理上已有奪取廣東政權的積極企圖，但在行動上則沒有切實的加強工農的武裝，徒托空言，於事無補。我們回去必須加緊準備，否則，將來可能遭到重大的損失。」

他們聽到省農會對農軍的槍械無法補充，要自己另想辦法，表示失望，但他們對革命的前途仍是充滿信心。

十一月中旬，我們三人帶着買來的二十枝步槍和子彈，乘粵漢車返回韶關。

翌日，我去拜訪陳嘉祐師長，請求他抽撥三百枝步槍以裝備樂昌農軍，並申明給予相當代價，將來北江農軍在革命戰爭中亦必受他領導和指揮。他聽了高興之極，立即命師部軍械

處長將庫存舊步槍中挑選了二百五十枝精良的和二萬發子彈給我。祗收了我們三千元銀洋。

有了槍人為沒有人，我們立即由樂昌調集了二百名徒手農軍到韶關搬運這批槍械，並發給各鄉農軍使用。

因此，北江的農軍便日益壯大了

① 海軍局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是中共黨員，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廿日接到海軍學校副教育長歐陽格利用校長室電話，命中山艦開入黃埔接受校長，當該艦奉命駛近黃埔時，則有人密報蔣，謂中山艦叛變。蔣即下令戒備，並命中山艦立即停航。隨即到李之龍寓所將其拘捕，同時並收繳廣州市工人糾察隊武裝及俄顧問衛士槍械，所有在黃埔軍校及第一軍工作的中共黨員一律奉命離職，集中黃埔聽候處置。事件發生後，俄顧問便自動離粵回國，汪精衛亦因此而出洋。迨至四月十四日李之龍獲釋後，旋又下令通緝海軍臨時總指揮歐陽格。由此便造成蔣氏獨攬黨、政、軍大權的局面。

② 黨務整理方案，是調整國共合作的關係，確立國民黨的領導權。其主要內容是：

（一）跨黨黨員不得任部長級職。

（二）各級黨部委員不得超過總數三分之一

（三）設立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所有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指示及中共對國民黨內黨員之訓令，均須交聯席會議通過。

（四）在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名單須交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

（五）汪精衛領導權由張靜江代替，張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譚延闓接長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介石接長組織部長。

第二編

寧漢分裂至國共分家

第一章　北上武漢到南昌暴動

我們先看北伐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動態：

北伐軍主力，自入湘以來，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長沙，七月卅一日進抵武昌城下，九月七日佔領漢口、漢陽，十月十日克服武昌城。

江西方面——由蔣總司令直接指揮，於十一月十七日克南昌，東路軍何應欽，十二月十八日克福州，繼即向浙江推進，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佔領杭州。

長江方面——一九二七年一月，革命軍第二、六、七三個軍沿長江向南京推進。安徽省督辦陳調元宣佈投向革命軍，程潛統率二、六兩軍於三月廿四日佔領南京。

上海方面——當北伐軍進迫上海龍華時，上海工人於三月廿一日實行總罷工，以響應革命軍，並與上海直魯聯軍進行激烈巷戰，廿二日直魯聯軍退出上海，北伐軍於廿三日進佔上海。

自北伐主力佔領武漢後，國民政府俄顧問鮑羅庭，偕同國民黨中央及政府要員宋慶齡、徐謙、孫科、宋子文、陳友仁等，由廣州起程，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到達武漢，以

國民黨中央及國府代表名義籌備遷都事宜。並於十三日成立「國民黨中委及國府委員聯席會議」，辦理建都工作，廣州國府於十二月五日宣佈停止辦公，由譚延闓代主席及張靜江率領國府職員於是月卅一日抵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宣佈遷都武漢，正式開始辦公。但蔣總司令覺得，當時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在鮑羅庭策動之下，已有迎汪壓蔣之勢，乃於一月三日電武漢中央要員，主張國府暫設南昌，以便於領導軍事工作，及將來建都南京。並於一月十日親至武漢，企圖說服各要員移駐南昌，但當時各人民團體，已提出迎汪復職的口號。所以他此行未有獲得任何效果，遂於十八日返回南昌。

自此，遷都之爭演變而爲黨權、軍權之爭。

蔣總司令鑒於當時的政治環境關係，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越趨緊密，形勢對他愈加不利，使他不得不決心先行反共，然後再對付左派。於是由三月十一日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動。卅一日槍决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三月十六日下令解散南昌左派市黨部，十九日解散九江左派市黨部及總工會；福州、安慶等地亦先後發生殺害中共黨員的事件，三月廿六日在上海展開摧毀共黨行動，四月十二日發動了清共運動，並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這一時期，在國民革命軍中的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及一、七兩軍所有中共黨員及左派國民黨員均被清除。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將軍亦於三月間率其助手離開總司令部赴武漢，轉任武漢國

民政府軍事顧問。

最先佔領南京的二、六兩軍於四月初被七軍及一軍之一部份壓迫退出南京，蔣總司令便於四月九日由上海移駐南京，旋即召開國民黨中央會議，四月十八日宣佈在南京成立另一國民政府，於是形成了寧漢對立的分裂形勢。

汪精衛於四月一日由莫斯科返抵上海，四月五日便與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發表聯合聲明，號召兩黨同志繼續合作，聲明中有「政見即不盡同，亦無須强求一致」之句，其要求團結合作的苦心，於此可見。

四月十日，汪精衛到達武漢，當「四•一二」上海事變消息傳到武漢後，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黨員多表憤慨！汪精衛便即提出「討伐蔣介石」及「革命的站到左邊來」的口號。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蔣介石黨籍」，並罷免其總司令職，於是寧漢分裂已趨表面化。

廣東中共早有伺機奪取廣東政權的企圖，至國民黨蔣介石右派公開反共，屠殺共產黨員的消息傳到廣州後，便加速了我們的行動準備。

當時留守在廣州附近地區的國軍右派部隊，計有：李濟琛第四軍的十一師及十六軍范石山兩個師和河南區李福林第五軍的一部。

四月十四日的深夜，我在韶關北江辦事處突接到廣東省農軍指揮部的密令，大意是：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右派已公開反共，屠殺我們革命同志；廣州的李濟琛是蔣的心腹，必執行蔣的反共路綫，因此我們以奪取廣東省政權爲目的，作戰部署如下：

一、以駐留韶關的陳嘉祐師爲主力，配合廣東工農武裝進攻廣州。

二、各路農軍的指揮如下：東路指揮彭湃、南路指揮黃學增、西路指揮周其鑑、北路指揮龔楚、廣州市工人武裝及中區各縣由總指揮部直接指揮。

三、各縣農軍，必須於廿日接近廣州郊區待命。

四、各路軍立即派員來省農會連絡。

該密令署名是廣東省農軍總指揮羅綺園。

我接到這一命令後，立即由北江辦事處通知各縣農軍緊急動員，限於十九日到達粵漢路沿綫集結。並於十五日九時赴教導師請示陳嘉祐師長。他對我很乾脆的說：「我早就知道必有這樣的一天，而且希望早日到來，我駐清遠琶江墟的一個團，今晨已開始向銀盞坳、軍田（距廣州五十華里）推進，另兩個團今晚可到源潭附近（距廣州約九十華里），並準備繼續推進。你們農軍須於十九日到達新墟附近（距廣州三十華里）。關於運輸問題，我於十九日早準備火車兩列供你們使用，請即派員來師部參謀處連絡。」

我告訴他：「我們已通知各縣農軍依期集結，但我須立即返樂昌集中農軍，準於十八日，回到韶關。」

談話後，我即離開師部，是晚到仁化董塘墟督促農軍集中，十六日返樂昌事宜。

當我正在調集農軍時，十七日黃昏，又接到羅綺園的急電，要我星夜趕往韶關商討北上事宜。這時，韶樂邊界的八里排，有豪紳武裝四百多人，佔據在迴頭嶺上，深溝高壘，防備農軍進攻；並設卡在武江邊檢查來往船隻，勒收行水。農軍同志擔心我的安全，他們都勸我從陸路繞道前往韶關。但爲了時間緊迫，而且正值武江春汛時期，遂決定利用夜間乘小舟冒險偷過迴頭嶺敵方哨位赴韶，隨行僅帶副官但平同志一人。所幸船行很快，祇八小時便到達了曲江，在北江辦事處和羅綺園晤面時，他立即告訴我：「廣東的李濟琛於十五日午夜起至十六日早晨，動員廣州全部軍警分別圍攻所有與我們有關係的省黨部、省農會、工會及一切革命機關團體，被捕被殺的革命同志和進步分子不知其數！陳延年同志可能已被捕，省農會負責同志因多在郊區動員農軍，或可倖免於難。當時我在小平（近郊一小市鎮）粵漢路工人糾察隊裏，幸得粵漢鐵路局聞變即通知我們，於是立即率部退至軍田與教導師部隊滙合，並即與陳師長連絡；局長主張我們立即回韶關共商今後行動。我和陳嘉祐師長會商後，決定北上武漢，與國民黨的左派政府合作，因我們黨中央現亦在武漢，陳嘉祐師長要請你來共同商

討北上計劃。」

我聽完了他的說話，立即和他到師部與陳師長商議有關北上的問題。陳嘉祐師長對北上問題，提出了決定性的意見。北江農軍編爲一個聯隊，由我任聯隊指揮，譚軍署爲副指揮，粤漢鐵路工人糾察隊仍由羅綺園直接指揮，工農軍的一切給養概同教導師官兵待遇一樣，龔楚同志即携帶二千元隨同北江政治幹部訓練班學生先上樂昌，準備於廿一日前完成行軍準備。

我於十九日偕同副官包平，僱了兩名農民，帶着二千銀元隨同北江政訓班學生，步行至桂頭（距樂昌縣城六十華里）。政訓班學生在此宿營，我因見時間尚早（下午一時），乃在桂頭僱一隻小漁舟，化裝成漁人，冒險上樂昌。經過迴頭嶺時，因船細人少，未被檢查而通過了。方自慶幸之際，不料船行至距離樂昌二十里水程的廂風洲，突然從後面追來了五條大漢，人人手持駁壳槍，大聲吆喝停船；抓住背纜船伕，將小船拉至右岸。這時，我和副官包平同志都沒有武器携帶在身，無法抵抗。這五條大漢一上船，便將我們綑綁，威迫船伕將船開至江中廂風洲，準備在廂風洲上將我們刦殺。船靠了岸，我們像待死的囚犯，靜候死神的來臨。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忽然來了救星。一隊武裝農民巡邏隊沿河岸迎面而來，他們都認識我，見我被匪徒刦持，即向匪徒開火，匪徒見情勢不佳，丢下我們倉皇而逃。

原來在這期間各地已進入緊急狀態，樂昌農民已經動員起來，分別組成了武裝巡邏隊，巡守各交通要道，防範反動地主的進攻，是以我們得到他們的營救。

趕至樂昌縣城，我們仍通宵達旦的進行各種有關農軍北上的工作。

四月廿一日，曲江、樂昌、仁化、清遠四縣農軍，全部集中在樂昌。

我向全體農軍闡述了當前廣東的形勢：「國民黨左右兩派已分裂了！革命的左派都集中在武漢，廣東的李濟琛走向右派，在廣州進行了一連串的反革命行動。目前，教導師即要北上武漢集中，我們爲了保存廣東工農武裝實力起見，所以也決定追隨教導師陳師長及我們的總指揮羅綺園同志北上武漢，我們這次退出廣東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勝利歸來。但各位如有因家庭關係或有其他各種困難不能跟隨北上的，可以自由返回原籍，你們可以在此作出決定，向你們的隊長報告，各縣隊長請於今天下午四時前將名冊送到指揮部。」

我說完這番話之後，各縣農軍隊長就立即分頭辦理參加北上的登記工作。除了因有家室之累的農民不能參加北上，志願參加北上的計有一千一百多人。

我們將這一千一百多人編成了三個大隊，槍枝子彈都很齊備，士氣也很旺盛，整裝待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二日，我和羅綺園同志率領着農軍、農軍幹訓所第二期學生，粵漢鐵

路工人糾察隊、北江政訓班學員等，共一千六百多人，於拂曉時踏上征途。那一天，細雨霏霏，天氣陰暗，更增加了官兵們的離情別緒。在行軍中，我們靜寂的前進。是晚隊伍宿營於九峯橋（樂昌縣北），又有仁化縣的農軍三十餘人趕來加入我們的隊伍。

翌日，越過天險的蔚嶺關，不久便進入湘境，至廿五日午後二時即抵達郴州，是日天朗氣清，官兵精神稍佳。當我們抵達郴州時，郴州的工農羣衆數萬人早已集合在一個廣濶的會場，舉行盛大的歡迎大會，受到工農羣衆的熱烈慰問，頓使全體官兵們精神振奮！

羣衆大會結束後，中共湘南特委書記夏正民同志向我們報導有關當地的情況，他說：「長沙駐軍何健部團長許克祥，於廿一日發動反共政變，將長沙所有與我黨有關之機關及工農團體圍攻，殺害及逮捕革命同志和工農羣衆甚多（中共後稱爲馬日事變）。現正向長沙外圍各縣展開行動。」接着他向我們建議：「爲了愼重起見，你們最好俟教導師到達後，再行計劃北上。」

我們聞訊之下，不勝憤慨。但又有點高興，因爲國民黨這個大集團內部，已經劃清界綫，分清左右，敵我分明，各站一方，今後我們和國民黨左派合作，使這一民族統一戰綫，更能團結一致，完成北伐革命事業。

當天晚上，陳嘉祐師長已抵達郴州，翌日在郴州休息了一天，他決定將師部及該師主力

進駐衡陽，一部留駐郴州，工農軍進駐耒陽整訓。

我們到達耒陽後，便將隊伍從新整編，把農軍幹訓所第二期學生及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均編入農軍聯隊之內，政訓班學員除大部份由教導師調去參加該師政治工作外，其餘三十多人即分配到農軍中各大、中隊擔任政治工作。從此，農軍的管理與訓練都較爲便利。同時並與耒陽的中共及羣衆組織建立了密切關係。

那時，耒陽的工農，正在積極的加緊建立武裝，準備對抗許克祥及地主豪紳的進攻，但槍械甚少，到處都見有梭標隊、大刀隊。

他們見到我們農軍的裝備整齊，又歡喜又羨慕，異常歡迎。

過了大約一個星期，我們奉師部之命，移駐永興縣城。師部亦於此時奉武漢方面之訓令：將教導師改編爲第十三軍，農軍亦改編爲十三軍補充團，以龔楚爲團長，李資爲副團長，並發給軍服每人一套。官兵一聞此訊，登時議論紛紜。當時樂昌籍農軍一部（約四十人）提出反對，要求回鄉，經我幾番勸導，均難阻止去志！遂由大隊長薛仰聖率領回鄉。

但是彼去此來，在這期間又陸續有樂昌、仁化的工農同志因受不住地主豪紳的摧殘和壓迫，趕來歸隊，據他們報導家鄉的情況，大畧如下：

一、樂昌縣長劉應福於農軍北上後，即濫捕了三十餘人，三天內槍決了商會主席周、

理髮工會主席郭×、附城鄉農會主席謝×、坪石鎮李家泉等四人。現仍向各鄉搜捕農會分子，我的家裏也被搜查，所有值錢的東西及書籍全被沒收，但沒有捕人。

二、仁化縣自農軍撤退後，情形更加悲慘。地主豪紳向農會進攻，經過兩次混戰後，大部份工農積極分子在蔡正文同志領導下，退入石塘水寨據守，反動武裝，屢攻不下，第四天由韶關調來了范石山部一個團和一個炮兵營，圍攻水寨。當他們來時仍在戰鬥中。後來該水寨經過三個月的苦戰，卒因糧食斷絕，才被攻陷，工農羣衆死傷百餘人，被俘婦孺百餘人，有武裝的即突圍逃上大山（雉雞山）繼續打游擊戰。

我們聽到家鄉這些不幸消息，均異常悲憤。但對那些平日有思家觀念和意志動搖的農軍同志卻堅定下來了，他們打消了要求回鄉的意念。我則因老母無恙而稍堪告慰。

時間大約是五月十日，我們奉命經長沙抵達武漢，駐於武昌蛇山北面徐家棚的「春草堂」花園內。

「春草堂」花園，面積很大，佔地約有五十畝以上，園門「春草堂」三個大字，係出諸康有爲手筆，園內亭、臺、樓、閣、小橋、流水，一應俱全，花木繁盛，並有幾座平房，足敷一團人之營地，居住環境好極了，但缺乏操場，訓練部隊須在園外公路上，斯時正值春雨連綿，路上泥濘難行，故有美中不足之感。

我們的番號雖然標誌着國民革命軍十三軍補充團，但黨（中共）和政府（國民政府）都清楚地知道是廣東工農軍，所以特別關懷，發給了我們慰勞金一萬元（武漢國民政府發行的中央紙幣）及每人內衣兩套，頓使全團官兵皆大歡喜！

當時中央紙幣的價值是與銀洋（大洋）平兌的，但那時因武漢中央紙幣遭到南京政府禁止流通的影響，且因軍費浩繁，而稅收又短絀，幣值影響了社會的物價。武漢工人因此紛紛提出要求加薪及減少工作時間等問題，勞資的對立日趨嚴重，因此使工業生產陷於半停頓的狀態中。由於幣值貶值所影響，市面上流通的一仙銅幣，原是每元中央紙幣兌一百六十枚的，竟跌至每元兌一百四十枚至一百三十枚，此時銀洋已很少在市面流通，財政已趨於不穩定，經濟亦開始陷入混亂狀態。

軍事方面：當南京政府宣佈成立時，國府（武漢）原擬先行東征討蔣，穩定武漢後，才再行北伐，但此議爲加倫將軍反對，同時北京張作霖大軍正由京漢、津浦兩路南下，企圖分攻武漢、南京兩地，迫使武漢、南京雙方不能不暫時放棄敵對行動，各自分頭北伐，迎擊張作霖。結果，兩方面都將敵軍擊潰，津浦綫南京北伐軍北進，佔據徐州，京漢綫武漢北伐軍與由陝西東下的馮玉祥國民軍會師鄭州，張作霖部敗退至黃河北岸。於是隴海全綫爲北伐軍所控制。

以汪精衛爲首的武漢國民政府方面，正當北伐軍在前方苦戰之際，國軍夏斗寅師趁武漢空虛，於四月十四日發動濟襲武漢事件①，接着長沙許克祥於發動「馬日事變」後，深知湖南農運過火，便逮捕地主豪紳，遊街示衆，盡情侮辱，任意屠殺，連革命軍官家屬都不放過，一樣照拉照殺，甚至連中共高級領袖李立三的父親也被殺戮。武漢工人運動亦趨激烈，工農羣衆這種無原則的激烈行動，已鬧得如火如荼，無法收拾，致使社會秩序混亂，民心動搖，特別是對唐生智部的湖南籍軍官影響至大，因爲他們爲了革命事業而離鄉背井，在前方拚命作戰，而家鄉的父母妻子則慘遭農民的屠殺或侮辱，試問誰無家室之想？於是軍心動搖，影響士氣甚大！

在這時候，唐生智首先表示：擁汪反共。頓使各軍對中共日漸離心。造成這種嚴重事件，當然要中共負全部責任。

中央政府和中共雖曾一再通令各省共黨組織及工農會組織禁止侵害軍人家屬。但，湖南農運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他根本就反對黨中央的指責，不承認湖南農運有過火的說法②。所以中央政府和中共黨中央都無法糾正。繼之即發生軍人叛變事件。

江西的第三軍朱培德，原亦不滿蔣氏所爲，但受各地過火的工農運動所影響，且又遭南京方面的種種壓力，就呈現不穩狀態，致令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們亦漸動搖，以至影

響全局。

我們自到武漢後，羅綺園即離開部隊，自居漢口，當時我只是一個中級幹部，對各方情況不明，故經常奔走於漢口、武昌紙坊（十三軍軍部駐地）之間，向住在漢口之彭湃、羅綺園及陳嘉祐軍長等連絡，以探聽消息，至六月初，國共關係已走向分裂之途。

一天（六月上旬），羅綺園鄭重的告訴我，他說：「汪精衛已動搖了！唐生智已宣佈擁汪反共，現在我們可靠的部隊，祇有廿四師葉挺部，十一師周士弟團，武漢警備團。張發奎或不反對我們，至於陳嘉祐，現時的態度還好，不過他的部屬多是湖南人，將來恐怕不大可靠。你領導的一個團，現在是本黨重要軍事力量，黨中央要你們集中武昌城內跑馬場，隨時準備應變。」

羅綺園這一席話，使我十分不安，我覺得黨中央過去對軍隊的工作忽視了，等到面臨危急時，才知道重要，現在我們只有這麽少的武裝力量，試問將來怎樣應付事變？我當日即跑去見陳嘉祐軍長。他見我到來，雖臉露笑容，但眉宇間顯有隱憂。他問我部隊的情形，我告訴他有關部隊的一般情況：官兵情緒向來很好，日常訓練工作由副團長李資負責。駐地是一座大花園，環境優美，可惜無操塲可用。他聽罷我的報告，就對我說：「現在國共兩方似不甚融洽，將來演變如何，很難逆料。不過你盡可放心，不論環境怎樣變化，我都要庇護你

們，我絕不會做出對北江父老不住的事情，尤其是你本人，我對你倚望正殷，將來我必定設法提拔你。」跟着他又說：「昨日羅綺園同志曾來過，談及你們的駐地不便訓練的事，現已商得警衛團方面的同意，將跑馬塲的營地讓出給你們，此地與軍部較爲接近，以後連絡一切都便利得多了。我已告訴參謀長，日間即有命令給你。」

我回到團部已近午夜，雖經整日奔馳，但仍無法入睡。想起了今天羅綺園告訴我的一切；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所謂「民族統一戰綫」又面臨分裂階段，今後的演變如何？把這團人移駐武昌城內，顯然是黨對我們的重視，但另一方面陳嘉祐又極力想爭取我，說什麽要提拔我，這無非是一種拉攏手段。我是黨員，要遵從黨的領導，這是毫無疑義的，倘若跟陳嘉祐走，那豈不是跟國民黨跑嗎？這些問題，我怎樣應付？左右思量，眞的無法解答。

翌日八時起床，團部的幹部都來問我，外間的消息如何？他們似極關懷時局的狀況。我告訴他們：「本團即將移駐武昌城內跑馬塲。」他們聽了大爲雀躍。

大約過了一天（約爲六月八日），我們即奉命移駐武昌城內。

武漢國共關係，情勢日趨緊張，首先是汪精衞等因國民黨左派要員北上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確定分共立塲。接着傳聞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因汪精衞等對中共的態度由合作而轉向分裂，他則由親武漢政府而轉向親南京政府，且已將該軍內所有中共黨員遣送出境。

北方的閻錫山已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宣佈就任國軍北方總司令職。馮玉祥亦已表明他的聯蔣反共立場。

汪精衛等國府要員由鄭州返回武漢後，即公開表示和平分共政策。並經過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解除鮑羅庭顧問之職務。

六月十九日蔣、馮徐州會議後，廿一日馮玉祥致電武漢國民政府促進寧（南京）漢（武漢）合流。至此，由國共合作，又變成了國共分家。寧漢對立的形勢又轉變爲寧漢合流的新形勢。這時候，北伐軍已由京漢路撤回武漢附近集中

爲什麽汪精衛的態度變化得如此之快？

原因是：湘（湖南）鄂（湖北）兩省的工農運動過火，燒、殺、搶、掠等行爲使社會陷於無政府狀態，動搖了國軍軍心，致使軍人叛變，經濟混亂，影響了工商業的發展，使武漢當局財經發生了嚴重困難。而南京方面亦對武漢展開了政治分化、軍事壓力、經濟制裁等等手段，頓使武漢當局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凡此種種，都是影響武漢政府上層領導人物思想動搖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第三國際六月一日給鮑羅庭一個電報③，也是國共分家的催命符。據說這一機密電報是第三國際另一代表印度人路易私自將副本送給汪精衛，使汪精衛大爲震驚。但路

易爲什麽要將這一機密電報送給汪精衛，那就耐人尋味了。

第三國際得悉鄭州會議的情形後，又發給中共一封電報：仍主張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中共乃於六月廿日發表一項聲明，其要點是：

一、承認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二、共產黨員參加政府工作者，須本着國民黨身份，並應隨時準備退出政府；三、工農組織應受國民黨領導和管理；四、工農的要求不得超出法律之外；五、工農武裝應由政府管訓；六、工人糾察隊不得干涉司法和行政，更不得擅自逮捕與處罰任何人。

這項聲明發表後，國民黨方面的上層領導人物冷淡置之，一般中下層分子則認爲這是中共對國民黨的單戀表示，恐另有陰謀在內。

至於中共黨內的反應，黨內中下層人認爲這項聲明簡直是對國民黨屈膝投降，是領導無能的表現。甚至有人認爲是共產黨人的最大恥辱！過激的還說：這是出賣黨和工農利益的無恥行爲。

當時我對這項聲明即認爲，這是全無黨性，毫無氣節的重大屈辱。

中共六月廿六日聲明發表後，參加國民政府的譚平山、蘇兆徵即辭去農、工部長之職。

武漢工人糾察隊被武漢衛戍司令限令繳械。結果由總隊長陳賡將全部武器繳交與衛戍司令李

品仙接收。

中共中央因受黨內意見和輿情的抨擊所影響，又於七月十三日發表聲明：責備國民黨中央服從土劣出身的反動軍官，違反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及背叛中山先生的主義和政策。

國民黨中央隨於七月十六日發表聲明：指「六月一日共產國際的電令，不啻對本黨生命予以根本危害，十三日中共宣言是破壞容共政策。」

宋慶齡亦於七月十八日發表宣言：反對武漢排斥中共的舉動，認爲是違反孫總理的主義與政策，不負聯帶責任。中共黨人反譏之爲臨別秋波。

武漢國民黨於七月廿三日發表政治決議案：大意是：凡列名本黨之共產黨員均須聲明退出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不得以本黨名義做共黨工作，違此以叛黨論罪。

在這種政治激變的環境底下，我們這支廣東工農軍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人心惶惶。七月初，即有些幹部脫離部隊，投入張發奎部隊中去，七月十五日，中共透過陳嘉祐的關係，將我調任本團政治指導員，改派一名黃埔生陳東日來接替我的團長職務。當時我甚感錯愕，想不出他們這樣做的理由。黨既未向我解釋原因，唯有逆來順受，遵命交接。可是全團官兵都表示不滿，對中共領導失去信心，紛紛自尋出路，離去者不少。七月廿日陳東日又奉調離職，復由我以團指導員兼代團長職務，官兵情緒又較安定，但此時本團人數只剩得六百餘人

了。

廣東工農軍，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追隨國軍教導師入湘，爲時雖僅僅三個月，但在這三個月當中，得陳嘉祐師長幫助不少，由於他駐韶關有年，對工農運動素來熱心和關注，與北江革命同志合作得非常緊密，所以他對工農軍有濃厚的親密感。入湘後，工農軍常得到他的照顧，駐地必選擇最安全的地方，經過長沙時，他亦派軍掩護，確保安全，對於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工農軍，可說是關懷備至，所以全體官兵都對他發生眞實的感情。到達武漢時，官兵們都希望能繼續追隨於他，爲革命事業而努力。那知時局的變化，出乎人意料之外。昨日是最親密的戰友，今天又成爲仇敵，這是爲了革命嗎？偶與三兩同志叙談，無不爲之浩嘆。

七月廿一日，我們奉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我們迅速脫離十三軍，開赴南昌集中。我接到這個指示，極力攷慮離開武漢的方法。因爲我們是工農革命武裝，不能不遵命行動，但本團是屬十三軍的一部，如不遵守命令而擅自行動，會以叛變論罪，要遭到軍法的嚴厲處分。當時武漢近郊的軍隊很多，若是擅自行動，給他們發覺，必向我們追擊，以我們這麽單薄的一團人，怎能與强大的國軍作戰？我們怎樣離開武漢，確是一個大難題。

我想了一個通宵，結果，想出了一個最有效的辦法，暗中以「回廣東去」的口號去煽動

士兵的思鄉情緒，以士兵不服水土，農民家庭觀念太重等理由和十三軍軍長陳嘉祐公開談判，要求准許工農軍官兵離漢回粤。

陳軍長因與工農軍的關係很深，感情融洽，熟悉工農軍的品質。工農軍的全部官兵，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大部份是中小學生，革命情緒很高，戰鬥力很强，比當時的一般軍隊質素强得多。所以他很不願意我們離去，便親自到工農軍駐地（武昌跑馬場）召集全體官兵訓話兩次，要我們繼續留在十三軍，爲完成北伐的使命而共同奮鬥。當他向我們訓話時，眞個是聲淚俱下，言詞懇切。可是，我們已在全體官兵中掀起了一個堅决要求回粤的高潮，任得他說盡千語萬言，都無動於衷。最後，陳軍長見大家去志堅决，無法挽留，同時又不願與中共發生衝突，終於答應我們自由行動，不加干涉和阻撓。這是在政治鬥爭中絕無僅有的奇蹟。

這個最困難的關頭，結果給我們鐵一般的堅决意志所衝破了，於是我們急忙準備，離開武漢，開赴南昌。

① 國軍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原駐防於湖北省宜昌，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進攻武昌，企圖一舉推翻武漢政府，十七日占領汀泗橋，準備向武昌紙坊進攻，卒被新成立的國軍廿四師葉挺部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生千

餘人所擊潰。

② 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册十三至四六頁「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③ 第三國際六月一日給鮑羅庭、路易的電報：

（一）實行土地革命，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沒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軍官的土地。

（二）由黨的權力機關，糾正農運的過火。

（三）消滅現有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及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

（四）將新的工農分子，安排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代替原有的委員。

（五）組織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國民黨員任主席，審判反動軍官。

第二章　參加「八一」南昌暴動

我們奉到開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後，黨的組織並沒有將今後的行動決策通知我們，但在傳聞中已畧知一二，黨擬與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合作，打回廣東去，建立以廣東爲根據地的革命政府與南京政府對抗。

當時第二方面軍所屬部隊，已陸續開赴九江、南昌集中，我們這一個團是最後離開武漢的。我們分乘三艘小輪船由長江水路順流東下。時值夏秋之交，水漲流急，兩岸青山，瞬息萬變，使我惆悵的心情爲之豁然開朗。但願前途能像這隻小輪一樣，乘風破浪，共濟時艱，則今日一時的挫折又何足介意。

七月廿九日黃昏時，抵達九江，是晚即在九江市區宿營。翌日早晨，我見到九江市面到處都有歡迎汪精衞的標語，這位爲我素所景仰的革命領袖，在往日一聞其名，便感無限興奮，但今天對他卻感到失望和悲衷了。

張發奎將軍平生是信賴汪精衞先生的，今汪既來，張今後繼續與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這一個革命陣營的實力，究竟有多少？成爲一個疑問。爲此，我便急着要迅速離

開九江，以免發生意外。

當我正在徬徨的時候，二十軍賀龍部的副官奉賀軍長之命特來通知我：現已有火車一列，專爲你們而來，請立即起程。我聞訊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車，火車即在下午三時由九江開出，當我們到達南昌車站時，即有傳達人員連絡，並帶我們開赴新營房，與二十四師教導團同駐在該營之內。（今日中共第二領袖林彪，就是當日教導團的一個排長）

卅一日晚上十時，「總指揮部」送我一份最機密的緊急作戰命令，大意爲：

「我軍以解決南昌敵軍爲目的，決於明（一日）二時開始向城內外所駐敵軍進攻，一舉而殲滅之。

該部農軍於攻擊開始前，應即完成新營房駐區之防禦部署，並相機增援二十四師教導團對新營房南端敵軍之攻擊任務。」

我接到這個以總指揮賀龍、副總指揮葉挺署名發出的命令後，立即與二十四師教導團團長洽商連絡計劃。並於零時三十分，祕密的完成了一切準備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風吹在身上有無限的凉意，我們爲這一緊急任務所激動，熱情像火一般的燃燒，個個磨拳擦掌，準備迎接這一場殘酷的厮殺。

我們駐地附近，駐有國軍王均師的一個營，這一個營，就是我們奉命圍攻將之繳械的對象。我們雖同駐在新營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門進出，大門的方向，一個在南，一個在北，操場中間隔了一道短牆；新營房的地區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夠集合的廣場。因此，我們與敵軍的距離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這一道短牆遮住了彼此的視綫。我們在行動時極之謹愼，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語傳達；集合時躡手躡脚，不准有過大聲響；裝子彈上刺刀也在黑暗中進行，恐怕給國軍發覺而有所準備。

八月一日晨二時，城內城外的槍聲都響起來了。接着，連續的重機關槍，衝鋒叫殺聲，衝破了寧靜的黑夜，激起了軒然的巨浪，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一」南昌暴動便開始了。

我們農軍所擔任的任務：守備新營房及協助二十四師教導團解決新營房敵軍的一個營。二時三十分左右，負責衝鋒的教導團一營，僅以兩響駁壳手槍，便解決了敵軍的衛兵，很快的就衝進了兵房，由於敵軍營長事前毫無戒備，全營官兵都從夢中驚醒，嚇得驚惶失措。我軍一面控制了敵軍的武器，一面命令敵軍全部官兵到操場中集合，經過搜身檢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着進入我們所駐營房的操場。被俘的敵軍官兵，垂頭喪氣，滿面驚慌，有些驚恐至連衣服的鈕扣都扣不上，在晨風中顫慄，他們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綑綑的由我們的戰士興高彩烈地協助着教導團士兵抬進營房。

這時還不到四點鐘，全面戰鬥尚未結束，不時還有疎疎落落的槍聲傳來，爲了防備敵軍的反攻，我率領的農軍，專負責營房週圍的警戒任務。

天亮之後，市區已無槍聲，我們這一個戰鬥單位所派出的人員，很快便和「總指揮部」（設於江西大旅店）及參謀團取得連絡。他們接到報告後，非常高興。因爲在這次南昌暴動的整個戰鬥中，解決敵人最快，而自己並無傷亡的，只有教導團和我們這一個單位。九時左右，郊區的槍聲也聽不到了。駐在南昌城內外的國軍部隊，大部份已被繳械，一部份則突圍向西北逃竄。「八一」這次南昌暴動便順利成功了。

上午十一時，南昌全市已經解禁，祗是交通要道仍佈有哨崗。我特地到市區去巡視，整個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個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關門閉戶，街上除了少數軍人在巡邏之外，看不到一個老百姓。

十二時後，在小街中的幾間小飯館才敢開門營業。那些餓了一個上午的窮苦市民和苦力，陸續到飯館吃飯，他們都顯得很不自然，膽怯的神情溢於形表。也不敢向飯館中的軍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來的戰鬥究竟是幹什麼的。

下午二時左右，挑着疏菜食物的農民，三三兩兩的入市了，這時，總政治部才派出宣傳隊沿街的拍着商店的舖門，叫商人開門做生意。南昌全市這才逐漸的復甦過來。

好奇的市民們，來往街上，以欣賞戲劇似的心情，觀看貼滿了牆上的紅綠標語；以驚奇的眼光圍觀「中國革命委員會」的安民佈告。

在這次暴動中，有一個好現象，就是從開始以迄終止，都沒有乘機刧掠的事情發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戰鬥時炮火聲的驚駭外，並沒有其他的任何影響。一夜之間政權的變換，似是一場戲劇的演出。

「八一」暴動因爲事前極端祕密，沒有一個工農民衆預知其事，事後也沒有召開過民衆大會，告訴人民這次暴動的意義，以擴大政治宣傳影響。連隊也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政治工作，軍隊中的初級軍官和士兵，都不知道這次暴動的目的。至於市民則更不瞭解其中眞相了。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當天正式宣佈成立。以譚平山爲主席，張國燾、林祖涵、李立三、周恩來、朱德、張曙時、郭沫若、彭湃、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張發奎①等爲委員，吳玉章爲祕書長。參謀團主任周恩來，劉伯承爲參謀長。內設：黨務委員會：主任張曙時（國民黨）、工農委員會：主任張國燾、財務委員會：主任林祖涵、宣傳委員會：主任惲代英、政治保衞局：局長李立三、總政治部：主任郭沫若。賀龍爲前敵總指揮，葉挺爲副總指揮。並公佈政治主張：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實行土地革命，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

主土地，建立鄉村工農政權，鞏固革命陣綫，保證人民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等等。

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革委會）的政權名稱及人事公佈後，我覺得，國共既已分家，爲什麼還要國民黨這塊招牌？沒有鮮明的旗幟，何以發動羣衆？鄧演達等國民黨員，事前既不在場，事後又未徵得他們同意，現竟假借他們名義以作號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時，張發奎和我們已成對立，更不宜强將其人加入，這會給人一種自暴弱點的觀感。這種種疑問和感想非我個人爲然，當時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參加南昌暴動的軍隊，計有：第四軍第十師師長蔡廷楷、第廿四師師長葉挺（有步兵三團，教導團一團）、廿五師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第二十軍軍長賀龍、轄第一師師長賀敬齋（兩個團）、第二師師長陳志遠（兩個團）、第三師師長周逸羣（一個團），另外新成立的第九軍軍長朱德（人數不足一個團），連同廣東工農軍五百六十人，總共兵力約二萬多人。武器裝備：約有步槍一萬三千枝，重機關槍四十挺（德造及俄造兩種），八一迫擊炮十門。在數量上不算少，但第十師蔡廷楷部不可靠，因爲他是被迫參加的（後來由南昌出發當天，在江西進賢縣就叛變了）。

當時形勢：北面有總指揮張發奎宣佈進剿叛軍，率部沿南潯綫向南昌進逼；西南方面有

朱培德軍在吉安、樟樹鎮集中，亦準備向南昌進攻；南京及武漢的國軍亦可能很快的加入作戰。似此情形，南昌實不能久據。下一步驟，至堪憂慮。我是中級幹部，無權過問，亦無參加決策會議資格，惟有天天跑去找彭湃、賀昌（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委）、惲代英等查詢消息。據他們說：賀龍及一部份同志主張集中兵力攻樟樹鎮、吉安，消滅朱培德軍，再向湘東前進，與毛澤東、余灑度（湖南工農武裝領導人）會合，佔領湖南爲根據地。但周恩來、彭湃、譚平山等卻極力主張佔據廣東東江、潮州，伺機進取廣州；因該地區既有極好的民衆基礎，又有汕頭海口，可取得蘇聯的接濟。現已決定向廣東進軍了。

我又問他們：國共分家後，在武漢時期，黨不是要與張發奎合作打回廣東去嗎？而張發奎將軍在汪精衞宣佈國共和平分家後，不但不將我們黨內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國民黨驅逐出來的黨員同志，他這種做法，顯然有誠意和我們合作，黨爲什麽不積極爭取他，反而煽動他的部隊造他的反？這不是孤立自己，多樹敵人嗎？然而他們給我的答覆，祗是長吁一嘆，說道：「事成過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漢時流行的那一段傳說：「蔣介石屠殺共產黨，朱培德遣送共產黨，張發奎收容共產黨」，現在看到對共產黨最好的張發奎將軍，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噓嘆惜！

八月三日，我們奉命在工農軍內遴選五十名比較優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餘縮編爲教導團第二營，派張駿爲營長（張是黃埔軍校學生），我改任本營政治指導員。這種變動，對我來說絕無問題，但官兵的情緒又受到一次打擊。他們認爲中共負責人不信任我們，只信任黃埔學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們携着一枝步槍，仍跟隨着營部行動，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來是革自己的命！」我化了很多時間向他們解釋和開導，將這六個無職的官佐分配到徵發隊②工作，才將這種怨忿的情緒安定下來。

八月五日，我們奉命出發，開始向廣東進軍，次日到達撫州（臨川）。休息了一天，我們這個剛改編的營隊，又奉命再改編爲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第三營（第六團團長是黃埔生傅維鈺）。我們這個營自南昌出發以來，一直都隨着革命委員會行動，但任警衛工作。現在竟改編於二十軍部隊之下，二十軍軍紀敗壞，它先我們出發，沿途放冷槍、拉伕、捉牲口，鬧得民衆鷄犬不寧，紛紛逃避。自命是革命軍的二十軍竟如軍閥部隊一般，令人冷齒。而我們現在歸它統轄，人人心內都不以爲然。我們途經宜黃到廣昌，駐紮一天，武漢政府所發出的國庫券又不通用，士氣更爲低落。隨之改發銀洋，軍隊紀律才可維持，士氣纔較爲振奮一點。

由廣昌出發前，本營張營長病倒了，因瑞金方面已獲敵蹤，要隨時準備作戰，師長便令

張營長隨軍醫院醫治，命我代理他的營長之職，連指導員卓慶堅（廣東大埔人，廣州中山大學生）則代理營指導員職務。八月十四日由廣昌出發的行軍部署，分左右兩個縱隊向瑞金前進；左縱隊：賀龍的二十軍及革命委員會各機關，經石城向瑞金前進。右縱隊：葉挺的十一軍，經寧都向瑞金前進。我營仍隨革命委員會行進，是晚到達良田附近宿營。十五日到達石城宿營。十六日午後五時到達隆嶺墟宿營。隆嶺墟是一個小墟塲，商店及民居不多，本營駐在隆嶺墟南端一個疎落的松山上。官兵均無露營裝備，幸逢天氣晴朗，以雨衣油布舖在地上，枕着小包袱休息，下午七時，剛食過晚飯，奉到團部轉來總指揮部的命令：

（1）據報壬田市（瑞金北三十華里）有國軍第三師錢大鈞部步兵一團，其前哨營在周家排向我方警戒。

（2）本軍以殲滅該敵而到達瑞金集中爲目的，決照既定行軍路綫向瑞金前進。

（3）該營（指我營）歸朱軍長指揮爲前衛，於明日拂曉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進。

（4）二十軍爲本隊，在前衛後跟進。

我接到命令之後，和劉副營長（湖南平江人，黃埔生）、指導員卓慶堅，研究明天備戰行軍計劃，因爲我們這個營，過去未參加過戰鬥；三個連長中，以黃埔軍校出身的第九連唐連長，有作戰經驗，當即決定以該連爲尖兵連，即召集各連長和指導員到我們這個露天營部

來接受命令。當時天已入夜，月亮尚未出來，初秋的天氣，在江西的山區裏，晚上已有涼意，我們在松樹下攞出五萬份之一的地圖，九個人圍坐在地圖的四週，將一支風燈掛在松樹的枝椏上，燈光雖然微弱，幸有天上的星光增加了光綫，尚可看清地圖，我說明了敵情，沿途地形，本營任務，並計算：由隆崗墟到周家排的路程是二十五里，周家排到王田市五里，隨即口授各連的行軍命令：

（1）第九連爲尖兵連

（2）其餘按營部、第八連、第七連之次序行進。

（3）各連明天四時三十分早餐完畢，五時在隆崗墟南端路側塲地集合，候命出發。

（4）各連長回連後，須即督飭官兵檢查槍彈，完成一切行軍作戰之準備。

（5）出發前之集合，由本營值日之第七連王連長指揮。命令下達後，即由各連長複述命令。接着由卓指導員對各連長、指導員，說明三點注意事項：（A）我們的士兵全是農軍，沒有作戰經驗。但是這次任務是我們農軍表現革命精神的機會，各指導員回去後，須立即對全體官兵說明這一意義，在政治工作上完成精神準備及勝利保證。（B）我營是擔任行軍前衛，行軍要快，搜索敵情要快，戰鬥動作要快，方不延阻後續大軍的行動。（C）動員全體黨員同志，要求他們在行軍作戰時起領導作用

第九連指導員卓慶堅的話說完後，各連長和指導員便急急回連，進行他們的準備工作。那時皎潔的明月，已從東方的山上升起，照澈大地，月光、樹影、景物怡人，清風徐來，令人心曠神怡。我和劉副營長，立在小山頂上欣賞了一番良夜美景，但因我們這個營擔任初次前衛作戰，心情頗感緊張，兩人無意多耽擱時間，很快便回營就寢休息。

十七日晨五時，月亮仍掛在天空，本營已集合完畢，涼風習習，精神倍感爽快。我即下達口述命令如下：

（1）敵情如昨晚所示。

（2）本營奉命為前衛。

行軍部署：第九連為尖兵連，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進。

其餘為本隊，按營部、第八連、第七連之次序在尖兵連後二百碼跟進

（3）本營大小行李由陳副官率領，隨革命委員會之行李跟進。

（4）行軍時，我及指導員在尖兵連，副營長在營部率領前衛本隊跟進。

接着，唐連長又下達以下口述命令：

（1）奉營長命，本連為尖兵連。

（2）第一排為搜索排，即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進。

此時朱德已來到我的集合地，我立即口令「立正」，轉身向他致敬，並向他報告了本營官兵人數（三百五十人），隨即請他訓話。

他對全體官兵說：今天可能有仗打，你們怕不怕？官兵一致回答：不怕。他接着說：你們高興不高興？官兵也一致回答：高興。聲震山谷。他說：好得很！時間已到，立即出發。

尖兵連長已率搜索排先行出發了。

我向他敬禮後，也立即率尖兵連出發。

上午九時到達胡坡休息，並進自帶乾糧作午餐。唐連長報告：據由壬田來人稱：壬田市、周家排均有國軍，但沒有防禦工事。我據報後判斷敵軍無固守壬田決心，乃將情況以書面報告朱德。

胡坡接近周家排的山脚，休息十五分鐘後，即下令繼續前進，但走了不到兩里路，搜索隊停止了，我即上前到搜索排，觀察敵情，那時唐連長已派了兩個便衣偵探組（每組三人）向前方搜索，我候了十五分鐘，仍不見報告，乃對唐連長說：你帶着部隊在此，以一班人佔領右側高地，注意前方情況，我帶着我的傳達鄧松前往右前方之小高地偵察。我把軍服脫下（內是便衣），連指導員也要跟着去，他和傳達兵亦除去軍服，一同出發，前進了約三百碼，尚不見本營偵探（他們沿兩翼山上搜索，忽視了大路），正感驚奇的時候，突然被埋伏

在路邊的國軍一排包圍，刺刀已指着我們的身上，無法抵抗，我們三人當堂被俘，押解到周家排敵軍的前哨營部（約一里左右）。我清晰的記得，敵軍的營部駐在一個山坡下的小廟內，廟後是個小樹林。我們剛被押到廟門前時，我方的搜索隊已和這個營的前哨部隊發生接觸，槍聲連續的傳到我們耳鼓裏。

從廟裏跑出來的國軍營長，聽完了押解我們三個俘虜的排長報告後，怒容滿臉，圓瞪雙眼，用手向我們三個俘虜一指，對他的排長說：「將他們拖到後面通通槍斃！」

「是！」那個排長答應一聲。立即指揮着一個班長和幾個士兵，將我們三人推向廟後去。

那時候，我的血在沸騰！心在急跳，神經已有點麻木，但有一種求生的最後的感嘆，不自覺的衝口而出說了一句話：

「唉！想唔到我呢條命今日死響呢處！」

我說的是濃厚的家鄉口音——廣東話。

那個營長聽到我說的是廣東話，忙叫道：「把那個高佬拖回來！」

這一來，我的生命便從死神的魔掌中，逃出來了。兩個士兵將我推了回來，但我的指導員和傳達兵仍給他們推往廟後。

我被押回敵軍營部，那營長大剌剌地坐在一張木椅上，親自用廣東話問：「你係邊人？做乜嘢職務，爲乜嘢做共產黨？」

我聽到他說話是廣東南路人的口音，想到他爲什麽要將我拖回來。靈機一動，便編了一套謊言說：「官長！我係韶關人。嚮教導師當特務長。呢次聽說部隊要返廣東，就跟住行。我唔係共產黨，共產黨係乜嘢我都唔知道。今日佢地要我到前面來睇情形，就俾你地部隊捉住。爲乜嘢事要將我槍斃？我自己都唔知！」

我說的話用正廣東口音，態度裝得誠實天眞的樣子。那營長果然被我瞞過，吩咐士兵將我鬆了綁。就在這時，猛聽得廟後邊傳來幾聲槍響，我的指導員和傳達兵給槍斃了！正是生死殊途，心裏有說不出的辛酸！

那營長親切地對我說：「我姓張，是南路人，曾駐過韶關，我的太太也是韶關人，你既然要返去，就跟住我地行啦！」

就在他說話的時候，戰鬥槍聲已越來越激烈，且越來越近，前綫的戰鬥顯然是國軍失利。接着該營傳達兵倉惶的跑回營部報告，共軍已突破了前哨陣地。張營長從衣袋裏拿了三塊銀元給我，叫我隨同營部的行李和伙伕先行退往壬田市。他要立即到前方指揮，我如獲大赦，內心有無限的喜悅！但外表上仍力持鎭靜，離開了那個「生死場」。

由周家排至壬田市，沿途都是山地，林深草密。行李和伙食擔的行列由一位副官率領。他們對我並不十分注意，在行進中，我心裏正盤算着逃脫的辦法，沿途密察地形，走了不到三十碼，轉了個彎，路的左方一片陡坡，有百尺以上深的山坑。我於是選擇了一處有草叢的地方，就地一滾，滑落山坑，迅即躲入草叢中匐伏着；押行李的副官胡亂的向山坑放了兩槍，便匆匆的帶着行列走了。

我從草叢中看到他們的行列，走過山坳，便站起身來。衣服被荆棘割爛了，手脚和面部也受刺傷。忘記了痛楚與疲勞，辨明了方向，沿着山坑跑回自己的部隊。

同志們見我生還，非常高興。朱德正在前衛指揮，激動地握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說：「龔同志！你眞有本領！據搜索排的報告，他們在山上見你和兩個同志被敵軍俘虜。我們都以爲你已犧牲了！」

我簡畧的將我脫險的經過告訴他，即繼續指揮部隊作戰，朱德命我營從右側山地向敵軍左側攻擊，經過兩小時的戰鬥，我的前衛部隊配合本隊的二十軍的一部，以强大的壓力佔領了壬田市，消滅敵軍兩營以上的兵力。嗣後，第二十軍的一個師，連續追擊向瑞金潰退的敵軍。本營奉命在壬田市宿營，當天晚上歸還建制。這次戰鬥，本營損失了兩枝駁殼，犧牲一官一兵，傷士兵六人，繳獲了敵方四十八枝步槍，一枝駁殼手槍。

第二天，張營長已病愈回營，我依舊回復到政治指導員的崗位，繼續向瑞金前進。是日，到達瑞金宿營，我們積極準備接受新的任務。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我大軍雲集瑞金附近，下午八時我與張營長同到本團團部接受命令，傅維鈺團長對我們說明敵情及我軍作戰計劃，要點如下：

（一）敵情：

A、會昌（瑞金南九十華里）有敵軍錢大鈞全部，其中一個團駐於武陽圍對我方警戒，主力集結在會昌城附近，會昌北五里之五里排山地，構築有野戰工事。

B、筠門嶺（會昌南九十華里）有廣西軍黃紹雄一個師。

C、會昌之東、西、北三面無敵軍。

（二）本軍作戰計劃：以迅速殲滅會昌敵軍為目的。進攻部署如下：

A、十一軍廿四師為右縱隊，副總指揮葉挺指揮，明（十九）日由現駐地出發，經西江市、大西壩渡過會昌河，向會昌縣城西南面攻擊。

B、第二十軍第三師（五六兩團）及教導團由第三師師長周逸羣指揮，明（十九）日由現駐地出發，以第五團首先驅逐武陽圍敵軍警戒部隊，佔領武陽

圍，謝坊之綫宿營，準備廿日拂曉向會昌五里排敵軍陣地進攻。

C、第二十軍一、二兩軍爲總預備隊，由總指揮賀龍直接指揮。

（三）本團任務：

本團明（十九）日上午五時出發，隨第五團跟進，於第五團驅逐武陽圍之敵軍後，進佔謝坊宿營，並向會昌方面警戒。本團行軍時按團部第三營、第二營、第一營之次序行進。

我們接受了命令，研究了會昌縣城附近地形後，即携帶筆記命令及會昌附近五萬份之一的地圖，於晚上十時回到營部，立即命令各連，準備明晨六時集合出發。

十九日下午三時，本師第五團已將武陽圍敵軍驅逐向會昌退卻，本營隨團部進駐謝坊。當晚奉命於明（廿）日上午一時出發，本營爲前衞向會昌搜索前進，於到達距會昌約八里之小山崗下，距五里排約一千五百碼，以一個連佔領小山崗，掩護本團集結，團長到達後，即決定攻擊部署如下：

第三營（本營）向五里排塔山進攻，佔領塔山後，固守待命。

第二營沿通會昌大路前進，攻擊五里排塔山以西地區。

第一營爲預備隊，暫在現地待命。

我團之左翼有教導團進攻青山東端一帶高地與本團同時併進。

本營奉命後即全部向五里排開進。到達青山脚時已近拂曉，我左翼教導團方面已開始接觸，我營立即展開；張營長率一個連在右，我率兩個連在左，迅速爬山接近敵人，當我們到達青山半小時，敵軍即向我軍射擊，我軍以一個連向敵青山陣地攻擊前進，約三十分鐘的時間已佔領青山一帶高地。

那時天已大明，發現山地連綿，地形複雜，小樹遍山，敵軍主要陣地沿塔山北端一帶高地至東端之最高山地佈防，與我陣地相距約三百碼，當時我左翼教導團已開始在激烈戰鬥中，我與張營長已在青山高地會合，立即集結部隊，以兩連向敵陣地正面（約二百碼）中央突擊，當時因張營長病愈不久，精神欠佳（他在石城染病，至瑞金才歸隊），我請他率一個連在青山掩護，我率領左翼一個連攻擊前進，當我們越過一個約四十碼的窩地時，受敵方側防機槍猛烈掃射，我左翼排有三人受傷，但我們很快的接近敵人陣地，同時張營長亦以步槍火力向敵機槍陣地密集射擊（本營無機槍）掩護我們兩個連向敵衝鋒，至距敵陣地約三十碼時，即以手榴彈投入敵方野戰工事，旋即佔領該陣地，同時迅即向左翼擴張戰勢，敵方重機連被迫退回塔山。八時左右，我們正擬向塔山攻擊（塔山敵陣地與我軍所佔陣地距離約一百五十碼），敵方會昌的增援部隊約一個團向我左翼教導團反攻，張營長立即率領一個連投

入戰鬥，向敵方右翼攻擊　當時左翼之教導團被迫退至我們陣地左後方約一千碼的一個山地中，繼續抵抗　敵軍一部繼續向該團攻擊，另一部向我陣地左翼進攻，是時我營陣地已三面受敵，形勢緊急，立即固守原陣地，與敵軍展開劇烈的爭奪戰。

九時四十分，我右脚踝受傷，經包紮後，繼續作戰；十時，我營唐連長陣亡。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敵我雙方爭奪這個主要陣地，進退凡四次　十一時本團第一營一度加入作戰約兩小時，但當敵軍反攻時即退下。

是時雙方都傷亡慘重，我手下的官兵已不夠六十人，且陣地突出，唯有固守待援。

二時後，戰鬥即成膠着狀態。

三時會昌城西南方槍聲大作，我廿四師已開始進攻，我第一師亦已加入正面作戰，五里排敵軍正向後撤退，我營配合第一師猛烈追擊，直迫會昌石橋，敵軍傷亡無數，河水爲赤！一部未及撤退的敵軍繳械投降。四時左右，本營已過橋進入會昌城郊，廿四師一部已佔領會昌縣城，主力仍向敵軍進擊。

是役本營官兵三百二十八人參加作戰，當晚集合時，僅剩得官兵八十二人。翌晨返來歸隊士兵五十二人，總計本營傷亡失蹤官兵有一百九十四人。繳獲步槍四十餘枝，重機槍二挺；俘虜軍六十餘人。

廿一日，我們奉令調回瑞金休息，我因脚傷不能行動，隨營療治。

在瑞金療傷時，惲代英、賀昌等常來看我，有一天，他們告訴我：廿二日廿四師及二十軍在會昌以南擊潰黃紹雄師，戰鬥激烈，黃師現已潰不成軍，向廣東潯鄔方面退卻，我軍已停止追擊，準備調回瑞金集中，擬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東江。我說：我們爲什麽不趁此時機乘勝追擊，經潯鄔、平遠入梅縣、興寧進佔惠陽，相機乘廣州空虛，進攻廣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粤，予敵有充份時間與空間調集兵力，選擇戰場來迎擊我們，豈不是坐失良機，費時失事嗎？

他們笑道：你的意見已有人提過了，但周恩來等極力反對，他們認爲傷兵太多，運輸困難，且興梅一帶無羣衆基礎，故決定下潮州，進佔海陸豐及沿海一帶地區，然後再相機進取廣州，一則此地區有羣衆基礎，二則從汕頭海口可取得蘇聯援助，所冒風險較少。

我聽了爲之啼笑皆非，深深覺得我們黨中央這一班領導人物，缺乏軍事常識，令人失望。

我們一營在瑞金休息期間，革委會將屬於財政委員會的監護連補充於我營，並改編爲警衛營。

九月八日我們由瑞金出發，次日到達長汀，休息一天後，即分水陸兩路經上杭、峯市入

廣東大埔。廿二日佔領潮安，廿四日佔領汕頭。廿四師及教導團（缺一營）向揭陽進發，二十軍由潮安直取豐順，廿五師留駐在三河壩，第九軍及教導團之一個營，則由朱德指揮駐留隍對梅縣方面警戒。

至此，整個潮州地區已在我們控制之下。

我們抵達汕頭後，革委會即將所有直屬部隊整編爲兩個營，連同我們一個營編爲警衛團，擔任維護潮汕鐵路，護送由汕頭開赴揭陽之軍用船隻及警衛汕頭市等任務。

廿九日下午一時，革委會高級人員正在汕頭市嘉應州會館開會，我當時正在指揮警衛事宜，突聞市内槍聲卜卜，我立即命警衛部隊加强警戒，做好固守會館的一切措施之後，循槍聲響處跑去，發現敵軍百餘人正向汕頭市公安局進攻，另有百餘人正向嘉應會館前進，與我團一連展開激戰，我立即指揮該連向敵軍反攻，敵軍見我方早有戒備，即向海邊退卻，此時我另一個連已聞聲趕至，加入作戰，向敵跟蹤追擊，敵軍敗退到海岸，迅即登上飛鳶艦駛出海中，該艦亦於四時許徐徐駛離汕頭海港。

是役我方傷亡士兵五人，政治保衛局警衛連死一人，敵方傷亡十餘人，被俘五人。一場意外戰鬥，幸而迅即解決，一班領導人物亦化驚爲喜。

廣東李濟琛，得知我軍於擊潰黃紹雄師後，不跟蹤追擊，繞過福建汀洲、上杭入粵，已

判斷我軍有奪取潮汕，進窺廣州的企圖。他命黃紹雄師集中於梅縣、松口監視我軍行動外，並立即調集原駐於西北江的徐景唐旅進駐揭陽縣屬湯坑山岳地帶，構築強固陣地，以監視我潮汕軍動向，另一部即進駐陸豐縣城，部署了對潮汕大包圍的形勢。

我軍葉挺廿四師進駐揭陽城後，偵悉粵軍在湯坑據險固守情況，於三十日開始向粵軍陣地猛攻，連續三晝夜，雖略有進展，但未能將主陣地攻下，待二十軍用豐順加入作戰時，薛岳新編第一師又加入粵軍作戰，至十月三日戰鬥最烈，卒被粵軍居高臨下反攻而潰敗下來。

三日下午得湯坑戰敗消息，汕頭革委會立即下令向海陸豐撤退，我率領一個營隨同革委會乘輪出海至峽山附近，於拂曉時登陸，行至流砂市已中午二時，休息進餐。是時，由湯坑敗退下來的部隊，亦陸續經過流砂向西南海陸豐方面退卻，秩序非常混亂。革委會各首長即在流砂西南端的小教堂聚集，交換意見。下午四時後即陸續跟着向陸豐進發，我率一營掩護他們跟進，但當離開流砂約三里左右，即聞槍聲四起，子彈由前方山地射來，立即率隊跑步前進，見各首長均混集在小村中，譚平山、周恩來、葉挺、彭湃等都聚在一起。我立即跑上去問前方情況及請示行動，葉挺對我說：「前面山地一定是粵軍追擊部隊，企圖截斷我們向海陸豐的前進通路，我現在僅有一個不健全的營，正向山地之敵軍攻擊，你們來得正好，請即派一部協同攻擊，務必佔領前面大路兩側高地，掩護我們全部通過。」我正想率部前進，

他們又阻止我，命我親率一個連掩護革委會人員，派兩連增援前方作戰。我當即派劉副營長率領兩個連迅速沿蔗林接近山脚，向大路兩翼突擊，並注意與前方廿四師的一個營連絡，佔領兩翼高地後，迅速報告。

時間很快到了黃昏，那時各首長已有一部份由彭湃派當地農民同志引導離開部隊出走，譚平山、張國燾、葉挺、彭湃等亦分別離去。

前面高地已無槍聲，僅右側方面約千碼以外仍有疏落槍聲向我方射擊。我立即報告周恩來，請他迅速行動，越過前面山坳。

我們慎重沉着地掩護各高級人員通過這危險地區時，所有行李輜重盡皆拋棄，情形非常狼狽。參謀團主任周恩來正在病中，原先他是坐擔架的，在戰鬥激烈、情形混亂時，抬擔架的民伕竟乘機跑了。祇由他的隨從摻扶着，在小溝中喘息艱難地走着，在深秋的夜裏，海風淒厲，寒氣襲人，他的病更爲加重，發着高熱，不斷呻吟。我們的部隊，在茫茫的田野裏，摸索行進，部隊的建制此時已完全散亂，掉隊的人很多。村莊的碉樓，又時時向我們射擊，有些同志便在黑夜的冷槍中無聲的倒下了。

第二天早晨到達了甲子港，跟隨部隊的高級人員分批陸續由甲子港雇船逃往香港。祇有帶病的周恩來同志隨我們的隊伍繼續進發。

到達另一個小鎮宿營時，周恩來的病已沉重到不能再繼續隨部隊行動，祗好單獨雇船赴香港治療。臨走時他吩咐我：剩下的黨政軍各機關幹部一百多人和二十多個士兵，要我和周其鑑負責率領，開赴陸豐的金廂鎮，將武器交與當地區農會，然後覓船赴香港再行聯絡。

赴金廂途中我們多次改換便衣，將步槍交與地方農會，只携帶駁壳手槍三十餘枝自衛，可恨天不造美，下着傾盆大雨，將我們的衣服都淋濕了。

午後四時抵達何村村外，帶路同志先行入村與當地黨支部書記接洽，不料該村農民百餘人竟蜂湧而來，想强搶我們的手槍和隨身財物。當時我若命令開槍抵抗，勢必發生流血慘劇；但爲自衛計，乃命令所有帶武器的同志集合，並即就地散開，以防萬一；同時揪住那個地方負責同志，叫他着農民退後五十碼，否則造成不幸事件，須由他負完全責任。在這樣應急處置下，各農民才退後數十步。結果送了三枝手槍給當地農會，農民始肯散去。

我們見情勢不利，無法逗留，時間雖近黃昏，只得仍冒雨繼續向金廂前進。

傍晚時到達一小村莊，當地黨同志出來和我們接洽，代爲佈置宿營，替我們買米買菜，吃過晚飯，突然發覺連指導員宋華失蹤，立即派人四處找尋，原來他被人綑綁在隔隣的樓上，手槍也被搶去了。我即派隊將他救回，並集中宿營，嚴密戒備，幸而這一晚沒有再發生意外。

次日到達金厢，由當地農會同志招待，集中住宿在區農會內。金厢是海邊一個小鎮，人烟稠密，農會及黨的組織均較健全。但我們這一羣落難的「賀葉軍」，若單獨的散步到僻靜的街道，隨時可被當地農民搶光身上的財物。如果說這一帶是土匪巢穴，但市面秩序又很安靜；如說不是土匪區，卻爲什麼我們的同志常被搶刦？連區農會同志也無法保護。

我們就這些問題詢問當地黨負責同志，據說：這樣的搶刦是農民專爲對付我們而來的。因爲謠傳我們每人身上都有手槍，還有很多銀洋，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於是，農民們便從你們身上起了「劏肥猪」的念頭，公開搶刦也不以爲恥。事實證明黨對該地區的農民工作做得不夠。在這樣的民衆基礎上要想建立革命根據地，那有不失敗的道理。

我們在金厢住了三天，獲悉：「第二十軍一、二兩師在陸豐被粵軍繳械，賀龍被俘（後被廣東國軍將領將他釋放逃往香港），師長以下官兵全部投降。」聽到這些消息，我們再不能久留，只有依照周恩來臨行前的指示，將所有槍械交給區農協會，雇了兩艘帆船開赴香港。

由金厢乘帆船來到香港，在筲箕灣的海邊登陸，準備在香港與中共人員連絡，設法安頓。我們都衣衫不整，精神疲憊，一望而知是剛從潮汕戰敗逃亡來港的官兵。

上了岸走到太古船塢附近，香港警署的大隊警探便開來了。只有周其鑑一人見勢頭不

好，一溜烟搭上電車逃脫；我和其他的一百二十多個同志全部被捕，在維多利亞監獄監禁了三天，監房很清潔，地上是地板，我們七個人住在一間囚房內，飽經苦楚的我們，雖睡在地板上，亦覺得很舒服。每天兩餐囚糧，每餐每人有一大碗白飯，還有足夠的豆芽及小鹹魚作菜。

第三天晚上，我們便被港方當局用囚車送上港穗輪船，引渡到廣州。

廣州公安局對這批引渡歸來的逃亡者非常重視，他們認為其中必定有中共的高級人員在內。那時張發奎軍已入駐廣州，公安局長朱暉日原是張發奎部十一軍的軍長，親自主持審訊，將我們押到公安局裁判庭外的走廊上，一個個加以嚴格的訊問。我心裏暗暗着急：「完了！這次必定凶多吉少。一想到這裏，生存的信心已經動搖。心裏有點冷冰冰的感覺。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母親，更加覺得難過。唯一的願望，是能逃過審訊者的偵訊。如果我最後纔輪到審訊，就比較容易應付了。於是我緩緩地從人叢中溜到後面冷僻的角落裏。

由於人數太多，經過的時間太長，朱暉日審訊了一百人左右，便由副局長黃啓光接替審訊。我喜出望外，化名林福川，詭稱是教導師的准尉司書。恰好連日勞頓，我的形容枯槁，時值深夜，審訊者也打不起精神，被我瞞過了眞實身份，編入從犯之列。而另外有幾位總政治部的同志，在嚴格審訊下，卻給查出了身份，全給祕密處决了。我們被監禁了五天，在最

後一天的清晨，每人一隻手臂給連貫縛了，在大隊警察押送下，解至觀音山的工兵團，仍然受禁閉。

七天之後，該團團長蕭祖强向我們訓話。我們十個人被撥入第九連當二第列兵。在上操時，該連連長見我術科不錯，馬上升我爲第八班班長。他對我說：「你好好的幹吧，第三排的排長空缺還沒有適當人選，你們是鐵軍幹部，我準備向團長報告，保你在最近升爲排長。」

我聽了非常高興，有逃跑的機會了。因爲列兵非經連長批准，不能離開部隊在外行動。當時廣州中共黨方派人四處打探我的下落。有幾次調查人員找到第九連，查問有沒有龔楚這個人，我聽了也不便承認，深恐身份暴露，影響安全。因之，以後的廣州暴動，我便沒有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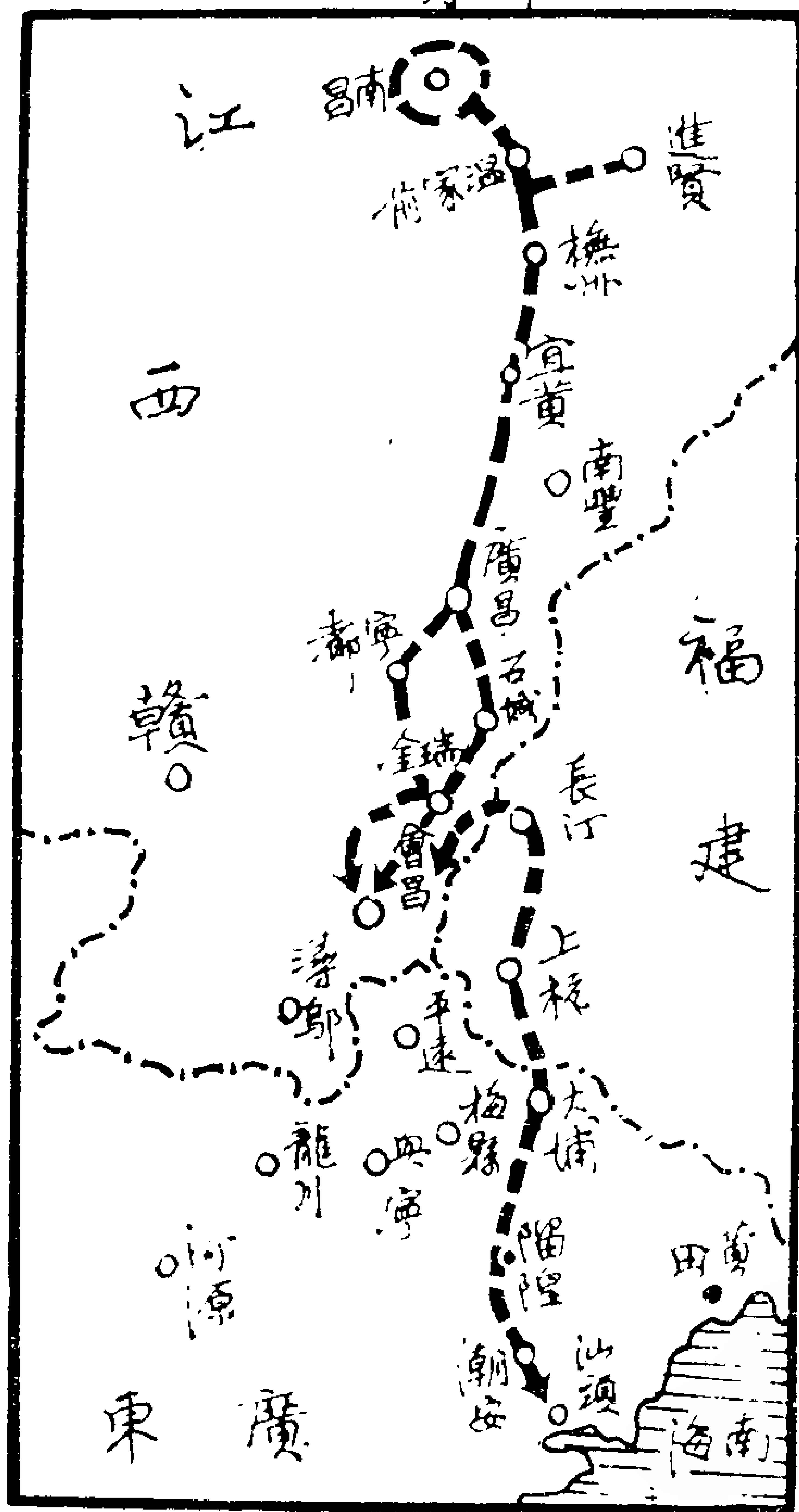
一天早上，輪到我當值日採買班長，在特務長處領了全連士兵的伙食錢，帶了兩個炊事兵到東山買米買菜。東西買好了，我將剩下的幾角錢給炊事兵，讓他們歡天喜地的去喝茶。我趁此時間，一溜烟由東山逃到惠愛西路，走到西門一個表親家中換了便服，拿了五塊錢作路費，乘搭早班的火車北上，於十一月上旬潛返樂昌故鄉。

離開故鄉七個月，村裏無限荒凉。因爲我北上武漢參加革命鬥爭，家裏給樂昌縣長劉應

附圖(1)

賀葉軍南進路線圖

一九二七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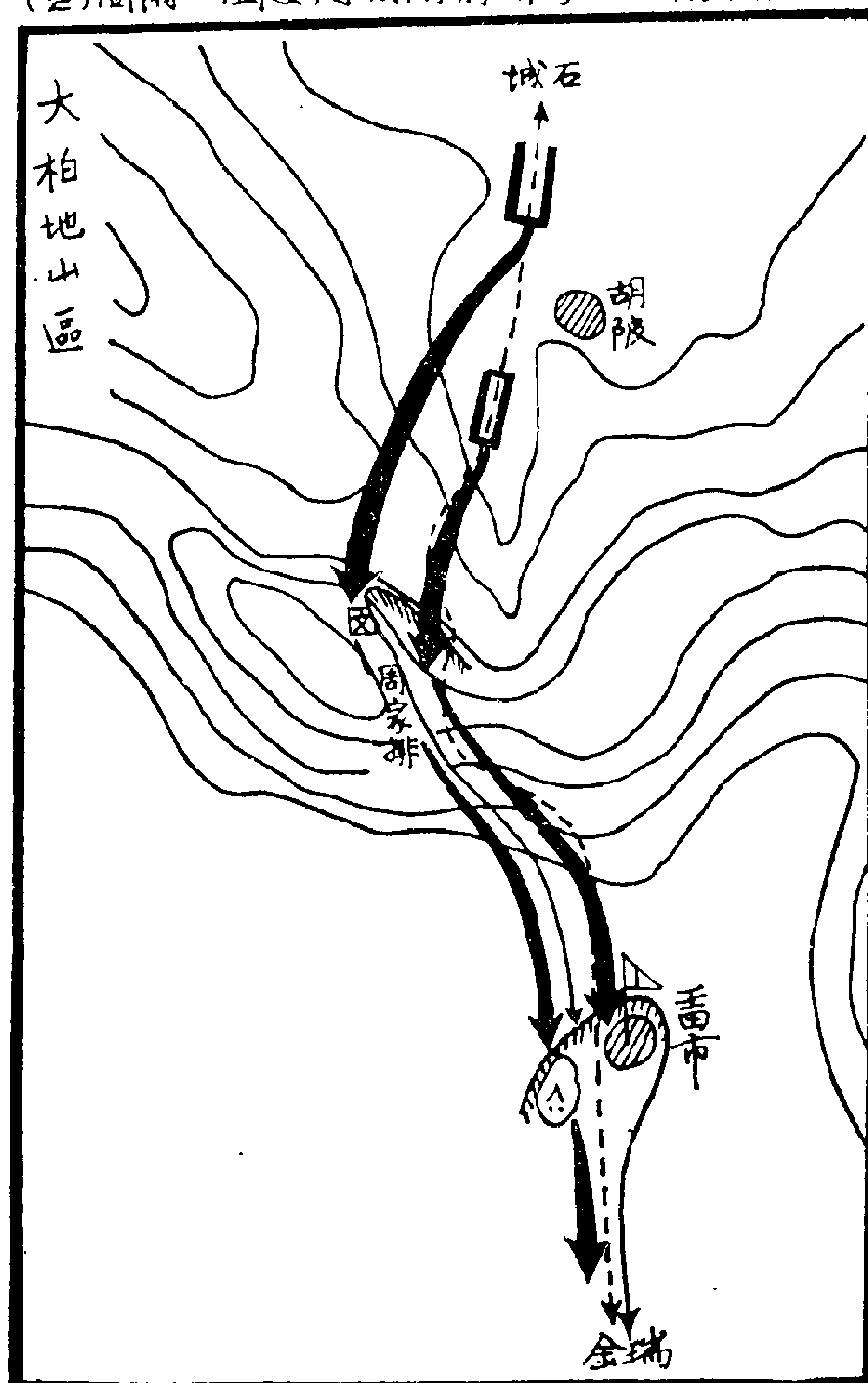
福搜查了兩次，將我所存下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先祖遺留下的很多存書全部燒燬了。最可恨的是本鄉武裝土豪，將我家裏搶刧一空；給我家屬以極大的侮辱。甚至連累全村亦遭兩次洗刧，村裏所有農民的耕牛悉被擄去，而且擄人勒索，樂昌縣政府亦置之不理。

那時我的父親和大哥已先後去世，二哥在國民黨湘軍工作，家裏只留下母親和寡嫂，靠磨豆腐維持最窮困的日子。幾個青年朋友，在國民黨清黨的時候被屠殺了，這些青年都無辜被害。土豪劣紳更耀武揚威在鄉中橫行不法。我一次又一次的傾聽親友們這些不幸和辛酸的事，血管幾乎要爆裂，仇恨在高燒。我想，我個人「犯了法」，爲什麽要迫害到我的親屬，甚至我全村的隣人呢？現時，擺在我們前面只有一條路，便是堅決的向殘酷暴虐的統治階級，和横行鄉里的封建土豪劣紳進行鬥爭。以鬥爭的手段，來謀取社會制度的改革，和廣大勞苦人民的福利。

我很快便和中共北江特委書記盧克平取得連絡。不久又聞廣州暴動已經失敗，中國革命無疑已進入低潮，正是中共所稱「廣州暴動是這一階段革命退兵的一戰一的時期。短時間內我只得潛伏在北江，晝伏夜出，經常在夜間步行百里往返長垑村至韶關犂市，與北江特委盧克平商討黨務的恢復與組織的建立。並將我的行蹤報告省委。

從盧克平的談話中，使我約畧明白這幾個月來的整個革革形勢。當葉賀軍潮汕失敗後，

附圖(2) 周家排前衛戰鬥要圖 17.8.1927



中共黨軍政首要陸續逃往香港者，有譚平山、張國燾、李立三、惲代英、吳玉章、郭沫若、徐特立、周恩來、賀昌諸氏，這是我已知道的，接着聽說葉挺、賀龍亦先後逃抵香港。當時中共中央黨部已祕密設於上海。這批逃抵香港的中共首要，抵港後與中共廣東省委取得連絡，但香港不是他們久居的地方，他們都陸續回到上海黨中央。而譚平山則因潮汕失敗有責，畏懼處分，仍潛留香港。李立三、惲代英、葉挺三人，則散處在海陸豐地區之葉挺部，正由彭湃收容指揮，以圖再舉，因此暫留香港，協同廣東省委設法連絡指揮。其餘人員均赴上海中央集中。

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瞿秋白（八七緊急會議清算了陳獨秀後即由他繼任）召開了一次潮汕失敗檢討會議，並於十月廿四日「為葉賀軍的失敗」發出通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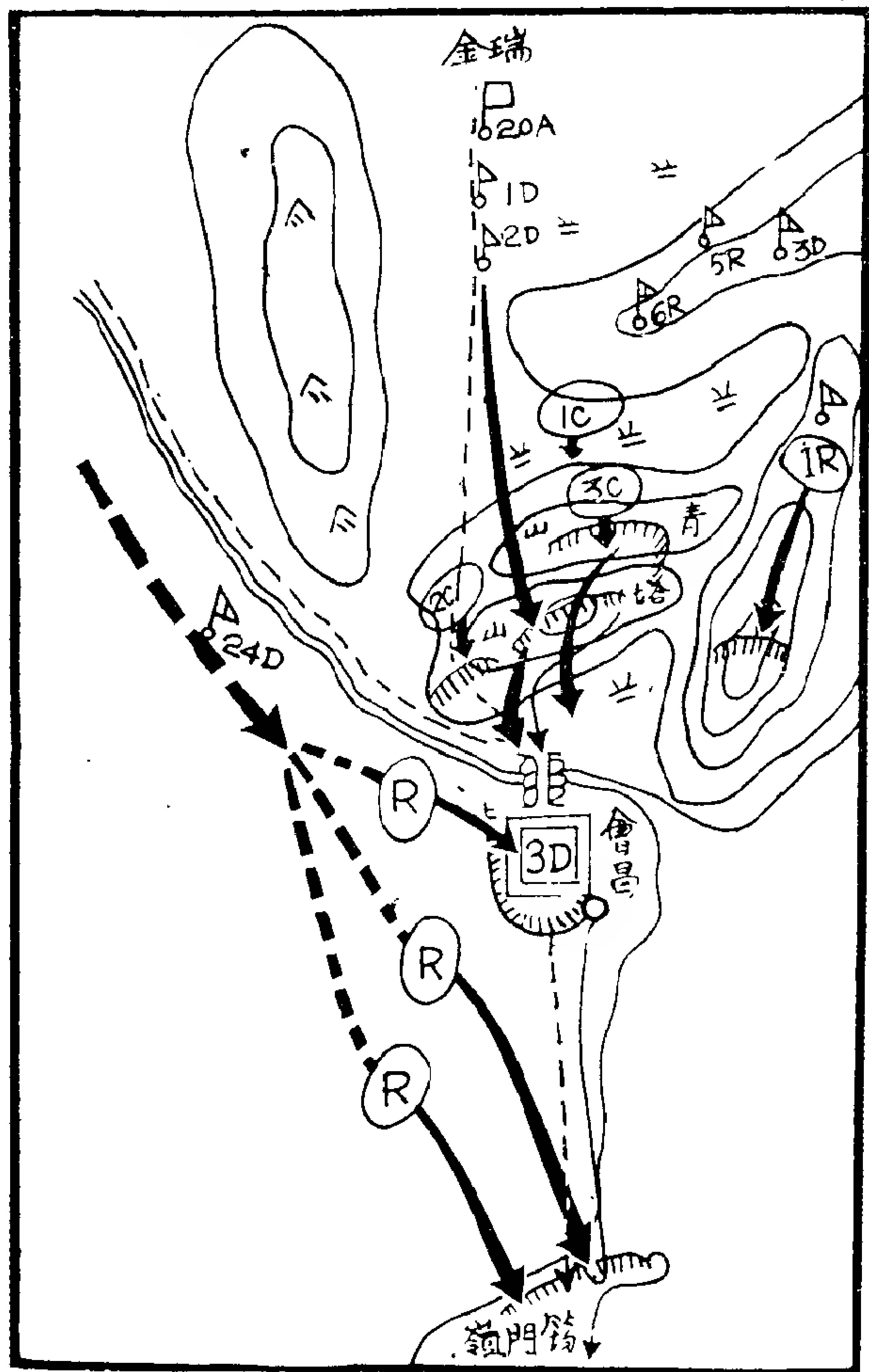
南昌暴動是國共分家後，中共一次軍事冒險行動，這次軍事冒險的行動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所策劃。當時估計中共在國民革命軍中所能控制的軍隊計有：

（一）第四軍第十師第三十團范孟聲一個團，及該師內各級軍官有五十個左右的黨員所能領導的部隊，總計約有四千人。

（二）第十一軍廿四師葉挺部四個團，及師直屬隊約一萬一千人。

（三）第十一軍廿五師七十三團周士第全團約二千五百人。

(3)圖附 圖要鬥戰昌會攻進 20.8.1927



（四）第二十軍賀龍部五個團約一萬二千人。

（五）湖北警備團約二千人。

（六）第三軍教導團朱德部約一千人。

（七）廣東農軍六百人。

（八）第二方面軍內有共產黨員的部隊約可動員五千人。

總共預定有兵力約三萬八千餘人。

可是因動員工作欠缺計劃，如湖北警備團趕不上參加，第二方面軍其他幹部亦趕不上，以至實際參加南昌暴動者不足三萬人。

八月五日由南昌出發向廣東前進當天，蔡廷楷叛變，該師的中共黨員和團長范孟聲等三十人被殺，另外有幾十人不知去向，第十師的實力全部喪失了，尚有總兵力約在二萬四千人左右。

這支軍隊，若能善爲運用，特別是能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官兵政治覺悟，以當時廣東的軍事情形，是有奪取廣東爲革命根據地的可能的。可是由於領導階層的負責同志，既不意注政治工作，又缺乏戰略戰術修養，以至一敗塗地，實非偶然。我親身參加是役，據我分析致敗的原因如下：

（一）關於政治方面的——

1、南昌暴動後，仍掛着國民革命軍的旗幟，使士兵意識模糊，民衆亦不明眞象。

2、部隊政治工作，沒有積極開展，士氣不振，且有逃亡現象，猶以朱德的第九軍，逃亡迨盡；賀龍的官兵則全無革命意識，亦多逃亡。

3、沒有發動民衆，致不能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和參加，那時的羣衆工作做得還不及北伐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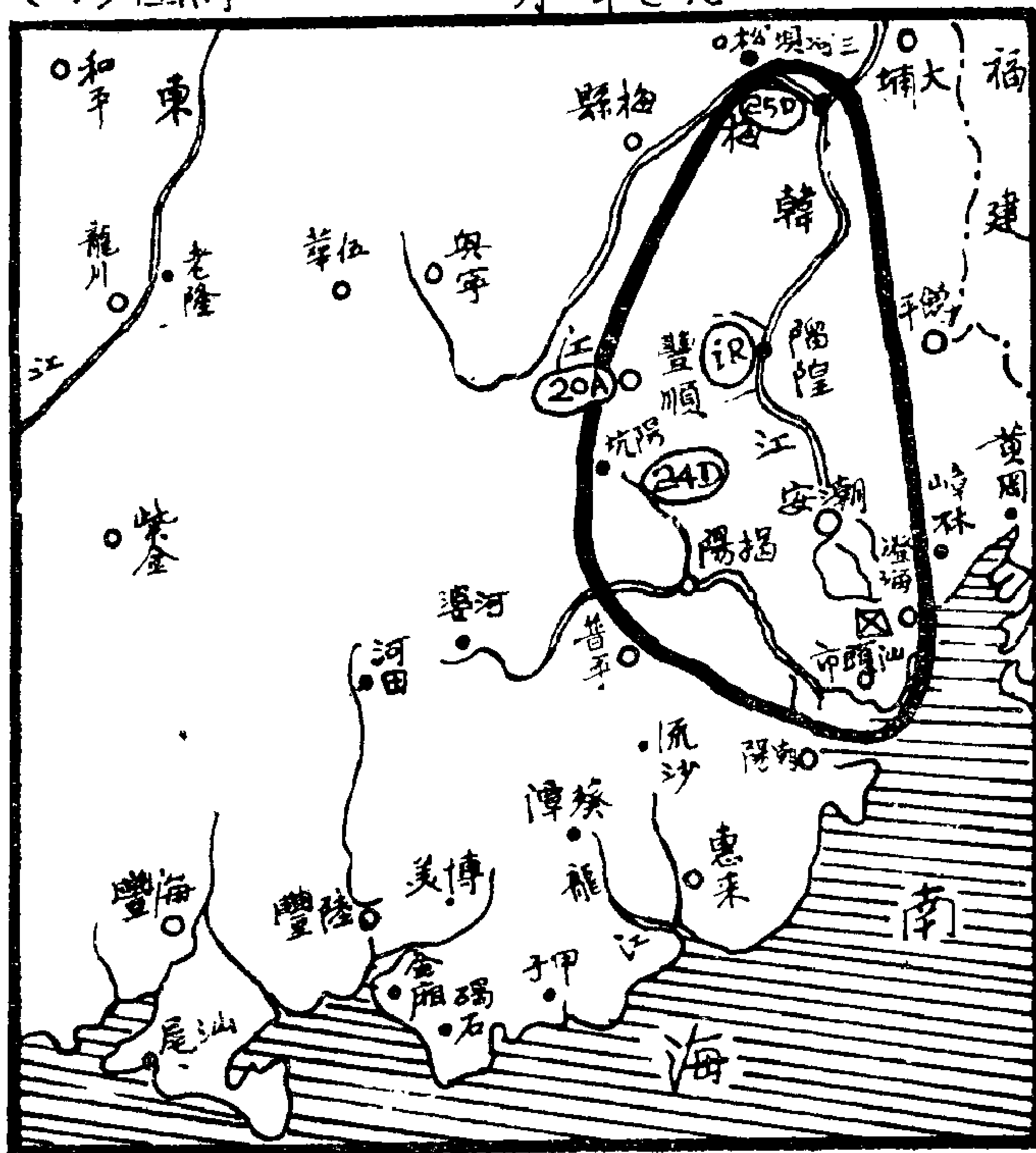
4、黨的組織極不健全，黨員在官兵或羣衆中，沒有起核心領導作用，在緊急關頭時有不少官兵不肯奮鬥，自求活命。如：第二十軍兩個師在湯坑作戰不力，在陸豐未經戰鬥便全部投降；卜四師及廿五師之一部份非黨員中上級軍官亦有自動投降……等事件。

（二）戰畧方面——

1、在會昌作戰，擊敗錢大鈞、黃紹雄兩師後，應即跟蹤追擊，消滅該師，即直下龍川、河源、博羅，乘張發奎未抵廣州之前，及廣東國軍不及集中之際，進攻廣州，成功的公算極大，即萬一失利，亦可退入惠州海陸豐進行游擊戰，這是當時最上

賀葉軍進佔潮汕部署圖

附圖（4）　　一九二七年八月



之策。

可是當時所取戰略竟不向敵軍追擊，反而迂道福建汀州，出韓江，佔潮州、汕頭，遷延時日，使敗軍有從容整頓的時間，粵軍有從遠地調集兵力向潮汕進攻的空間，實是失策。

2、湯坑作戰不集中兵力與敵決戰，而將能戰的廿五師於三河壩擔任警戒。二十軍駐在豐順，其位置正在湯坑粵軍陣地之左側背；若能同時配合揭陽葉挺之廿四師，向湯坑粵軍陣地進攻，必能將其殲滅；當時僅以廿四師單獨作戰（參戰官兵只有五千人），待至廿四師傷亡慘重後，二十軍才加入作戰，致使粵軍有時間和力量擊敗二十軍，終至整個崩潰。

（三）戰術方面——

據我以後和當時粵軍參加是役的旅長徐景唐將軍談論戰鬥經過稱：當時粵軍在湯坑以北山地，部署了三個據點，構築了簡單工事，開始是我（徐將軍）旅駐守。

葉挺部只向正面猛烈的突擊衝鋒，曾攻佔了兩個陣地據點，因傷亡慘重，得不償失，最後連一個據點都未能攻下，倘葉挺軍能從右側或左側背攻擊，粵軍早已失敗無疑。

後來賀龍軍由豐順向粤軍陣地左側背進攻時，薛岳之新編第二師已增援作戰，賀龍部不堪一擊，即潰退下去。

根據上述的作戰情形，可知當時的戰場指揮官，只知硬拚，不知運用戰術。因爲進攻敵軍陣地，以一翼包圍，或兩翼包圍，攻敵側背，爲戰術運用的先決原則；中央突破是受地形限制及任務限制的不得已之舉；豈有敵之側背可攻而不攻，反而採用中央突破戰術之理？

（四）兵力方面——

湯坑作戰的國軍兵力有二萬人以上，葉賀軍因兵力分散，參加是役兵力：葉挺廿四師約五千人，賀龍五個團約六千人，合共兵力約一萬一千人，敵我兵力對比，國軍比我方要多一倍。

根據上述情形，葉賀軍失敗，並非偶然。但當時中共的高級政治人才不少，軍事人才又有以「諸葛亮」見稱的劉伯承，及素以勇敢善戰出名的葉挺，中上級幹部又有不少能戰之士，爲什麽犯上了那麽多的政治和軍事上的錯誤？這是很可惜的，又是所不解的。唯一可想像的原因就是：周恩來以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革命委員會參謀團主席的地位，把持決策，致貽誤戎機。

①全體委員之中實際只有國民黨員張曙時一人。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張發奎等國民黨人，中共未徵求他們同意，假借名義，以爲號召，張發奎且已成爲對立者。

②徵發隊：隸屬於政治部，行軍時担任徵集粮食供應部隊工作。

第三編

井崗山　革命聖地

第一章　湘南暴動

朱德，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南昌暴動後經過撫州，由撫州出發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隊剛剛集合在大路口的旁邊空地，等待革命委員會的首長們到來，然後行進。

這一天第一批出發的是前衛部隊，朱德的第九軍，最先行的約有一排武裝士兵及幾個手上拿着紅綠標語的政工人員，接着又是兩排士兵，跟着朱德就步行來了，他身後跟隨有幾名衛士及一個馬伕牽着一匹棗紅色的馬，後面便是他們的大隊，不到一千人。行進時，政工人員不時高呼口號：「打倒朱培德，擁護朱德！」部隊士兵也跟着高叫。我當時覺得這個口號很新鮮！

朱德軍長穿着全身一色的藍灰色半新舊的軍服，脚踏草鞋，膚色黃中帶黑，約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紀已四十過頭，體格壯健，行進時步履穩重。從他的外表看來，我覺得他不像一個將軍，恰似一個伙伕，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的印象。

我第二次見他的時候，是壬田周家排作戰之役，當時我營歸他指揮（他的第九軍只有百多人），他在陣地上的表現，既沉着而又十分堅定。對幹部又很和氣，當我被俘逃回來時，

戰鬥仍在進行，他一見到我時喜極了，但立即指示我由右側高地進攻，他這種臨陣果敢、指揮若定的修養，確證他是一位卓越的戰場指揮官，頓使我改變了以前對他的「伙伕」印象。

當我軍佔領潮汕時，他留駐韓江西岸豐順縣屬的𠍣隍市，對梅縣警戒，後由教導團接替他的任務，他才移到三河壩，和二十五師周士第負責對梅縣松口警戒。湯坑作戰時，梅縣方面國軍黃紹雄師亦同時向三河壩進攻，他們苦戰四日後，駐𠍣隍之教導團一營，得悉湯坑之「賀葉軍」失敗，遂退至三河壩，與他滙合，但這時已知主力被擊敗，他便和周士第的二十五師配合當地農民武裝繼續作戰，經過苦戰三天，因傷亡慘重，迫得渡過韓江東岸，退入福建九連山區，官兵只存一千多人，稍事整理後，即向贛南流竄，進佔信豐縣城。

在信豐縣城時，朱德曾召開過一次幹部會議，堅決主張繼續打游擊，但當時有部份同志反對，他迫得公開宣佈：由各官兵自行決定，如不願意打游擊者，即日可自由離隊。會議後，當日自行離隊的有二十五師師長周士第及官兵三百餘人，朱德便將部隊從新編組，向大庾進發，佔領大庾後，休息數日，逃至崇義、上猶兩縣以西之鵝形、上堡等湘贛邊區活動，但那些地區都是貧瘠地方，田地不多，人民窮困，他們千多人的糧食，只好向山村稍有餘糧的人家打主意，但很快的便搜刮剩盡，時令將屆隆冬，山區特別寒冷，官兵的棉衣被蓋更無法解决，正在萬分焦急徬徨之際，忽然有了一綫生機，就是駐韶關的國軍十六軍軍長范石

生，派了一個姓何的參謀（是共產黨員）帶着范的親筆函件，到鶏形來見朱德。會見時，何參謀說明來意，並向朱德轉達范軍長對他們的關懷，擬請率部來歸，共同爲國家効力。

這個從天上飛來的佳音，使朱德大喜過望。答應馬上考慮，殷勤欵待來使。當晚即與王爾琢、陳毅等高級幹部舉行會議，商討是否投降問題。朱德即席說明：

「范軍長是我少年時候雲南講武堂的同學，而且是結拜兄弟，情誼甚深。因他是雲南的軍隊，素爲南京政府所歧視，我軍由南昌回粤，途經上杭時，范軍長曾使專人送信給我，相約：若『賀葉軍』能攻佔廣州，他（指范石生）即在韶關響應，如『賀葉軍』失敗，即請我率部來歸。這是他過去的諾言，必不欺我。現在我們的處境極端困難，暫時從權歸范，保存實力，將來駐紮曲江，更可與黨方取得密切連絡，再作打算。」

朱德這一主張，即爲王爾琢、陳毅等高級幹部所同意，因爲在當時再沒有比這更好的路走。但是爲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實力，乃向范石生提出了以下三個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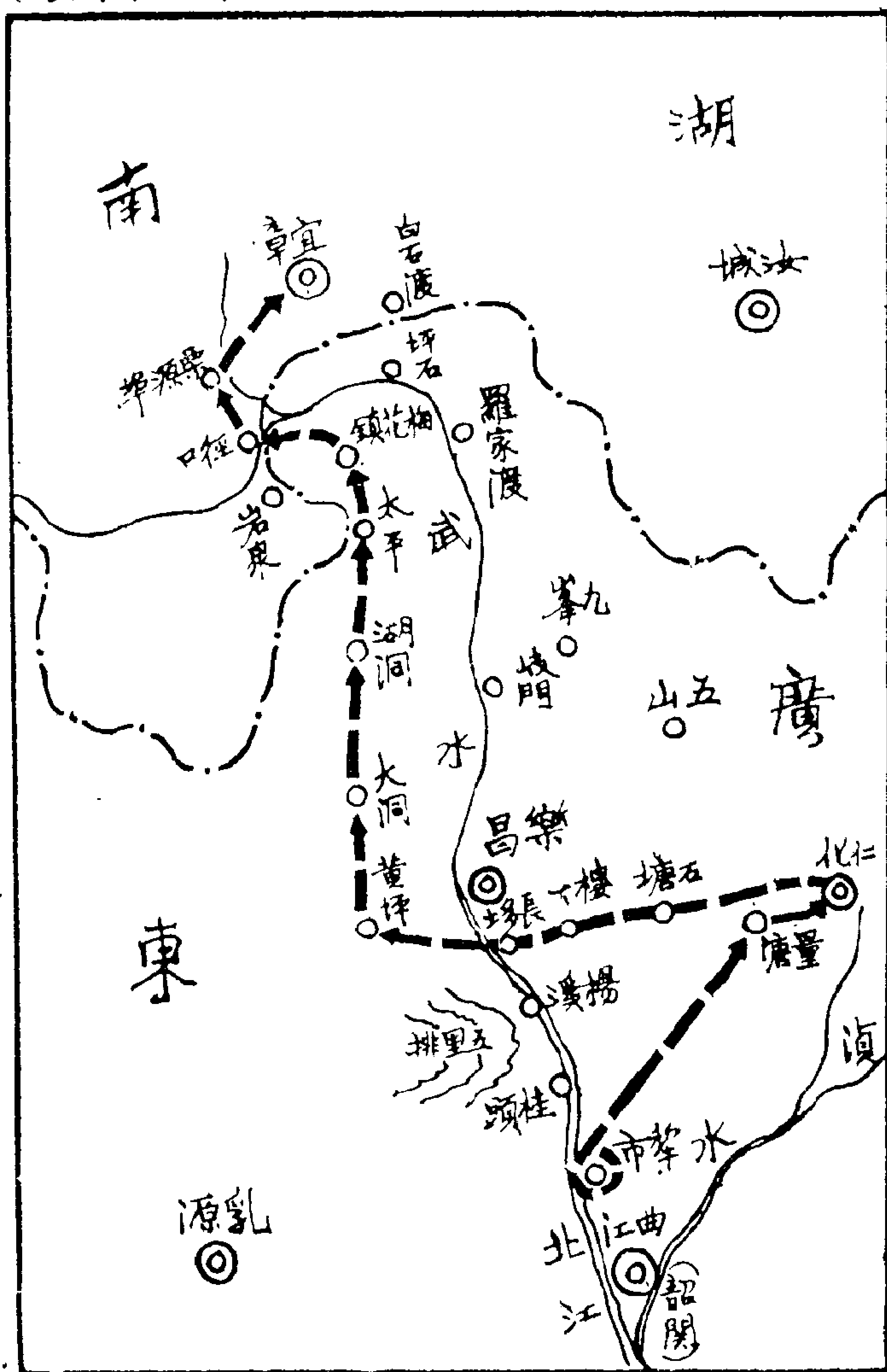
一、本部編爲一個團，不得分散。軍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權。

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獨立性質，軍政治部不得干涉。

三、本團械彈被服要從速補給，並須先發經費一個月，以便開拔赴韶。

這三個條件，由朱德寫成覆信，交由來使何參謀帶赴韶關。當時中共廣東省委也派人到

一九二八年一月 朱德部由粵入湘路綫圖 附圖(5)



鵝形來找朱德，命他率部到廣州參加廣州暴動。

朱德便決定藉投降范軍爲名開赴韶關，然後相機行事。過了十多天，何參謀帶着十名武裝士兵，押解銀洋五千元到鵝形，將范軍長覆函與銀洋一併交與朱德接收。范軍長的覆函：對所提三個條件完全接受，先送銀洋五千元作爲開拔費用，着即率部到韶北三十里之犂市整訓。

朱德接信後即於次日開拔，經大庾、南雄，行軍八天，於十二月十九日抵達犂市駐紮。當朱德率部開赴犂市途中，廣州暴動已於十二月十三日失敗，是以沒有參加廣州暴動。廣州暴動既失敗，朱德即正式接受范石生的改編命令，將該部改編爲國軍十六軍一百四十團，朱德化名爲王楷任團長（朱別字玉楷，故改此名），王爾琢爲參謀長，陳毅爲政治指導員；第一營營長周子昆，第二營營長袁崇全，第三營營長何某。林彪當時在第一營第三連充當連長。

全團官兵有一千二百餘人。裝備有俄式重機槍兩挺，手提機槍四挺，駁壳手槍一百二十餘枝，步槍五百餘枝。由范石生軍長授給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標誌的「國民革命軍第一百四十團」團旗，被服、經費均如數發給，並補充了六萬發步槍子彈。

一切問題解決了，士氣亦爲之一振。便積極從事部隊整訓，並暗中進行黨的政治教育，

準備等待有利的時機再行舉事。

韶關以北之犂市，正是北江特委的所在地，特委書記盧克平，是一位愼重而富有思考力的青年。他早就知道朱德部隊是「賀葉軍」的殘部，但不明瞭朱德本人的意向，所以不敢貿然與他連絡，他一面將情況報告省委，一面派人暗窺該團的動態。

有一天，陳毅召集全團軍政幹部開會，就當前的環境說明此次受范石生收編爲國軍的策畧，大意是說：

「……革命是常有波折的，不能全走直綫，要適應客觀情勢來決定我們的革命方法，現在我們就是適應環境，爲了保存實力，以求將來的發展，所走的是曲綫。但最緊要的是：我們不要爲環境所屈服，而忘記我們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應該擔負的偉大任務。……」

這段話爲北江特委所偵悉，這才明白朱德他們這次投降是被迫的，而且並沒有放棄黨的立場。於是派了一位充任小學教員的同志去設法再向陳毅試探。經過密談之後，這位小學教員同志便表明身份，是北江特委書記派來連絡的。陳毅知是黨方派來的人，便帶他去見朱德，由朱德詳細說明了投降經過和投降的條件，同時他表示絕對服從黨的命令，請求特委轉報省委，指示他們今後的行動，並要求派熟悉地方情形的軍事同志前來參加工作。這樣，朱德便和北江特委發生了密切關係。在交談中，朱德知道我已回到樂昌，便請北江特委轉知我

來犂市會面，及參加軍事工作。

北江特委派了一位連絡員於十二月廿五日到我家裏，找到我的母親，旋而找到了我。苦悶的我，一聽到朱德的消息，喜歡得很。我覺得參加軍事工作總比做地方秘密工作有興趣而適當。於是我即偕來人星夜起程，走了一個通宵，天還沒亮，就抵達犂市。稍事休息，即到團部會晤朱德。兩人相見，有着說不出的興奮和喜悅。我化名爲林芝，由朱德呈報范石生給我以團附之職，於是我便和朱德共同在一起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我們全團官兵很熱烈的慶祝新年。官兵組織劇團，一連三日演出話劇以娛軍民。三日上午，朱德應該師師長趙超之邀，到韶關城去會宴，宴後並作麻雀牌遊戲。就在該日下午七時許，范石生由廣州派專人送給朱德一封最緊急的密函，我連忙和王爾琢、陳毅等會同拆閱，只見信內祇有寥寥數字：「請朱德迅速離開犂市，自謀出路。」原來那時廣州政局已變，李濟琛得悉范石生收編朱德部隊，乃嚴令范石生將朱德繳械，范爲顧全與朱德的友誼，所以暗通消息與朱德，叫他立即離開犂市。

朱德在韶關接到我們轉知的秘密消息，於次日晨即趕回團部，立即準備行動。召集我和王爾琢、陳毅三人商議今後的行動。

當我們進入他的辦公室時，祇見他跨開雙脚背着手，站立在辦公室內，臉帶愁容，焦急

之情，溢於形表。一見我們來到，神態緊切地說：「我們怎麽辦？」我即提出意見，建議部隊先入仁化，然後繞道樂昌經長垓村渡過武江，沿樂昌乳源邊境大山區入湖南活動。王爾琢立即打開五萬份一的軍用地圖，我即指出行動路綫給他們看，但他卻主張由犁市沿武江北上，先消滅曲江樂昌邊境五里排之土匪（原是樂昌豪紳地主之武裝，後變爲土匪），然後沿武水西岸北上湖南。

我對王爾琢的意見立即加以說明：（一）那股土匪所在地是靠着廣大的猺民山區，佔據着險要山地，背山面水，進攻不易，欲將之消滅，殊費時日，倘後有追兵即不堪設想。（二）仁化有我們的羣衆基礎，並可迷惑追兵的方向，萬不得已時，亦可由仁化轉入湖南，較爲安全。

經過我的詳細解釋後，各人終於同意我的建議。決定照我的行軍計劃，各自分頭準備。

當時我和他們共同工作已有八天的時間，我覺得朱德是一個爲人純厚而坦白的人，他對革命充滿信心而又熱情，意志也很堅定。陳毅是高個子，體格可稱魁梧，心直口快，說起話來無所不談，能言善道，語言風趣，與人相交，很容易使人對他發生好感。王爾琢是湘西人，黃埔軍校畢業生，身材矮小，臉型稍長而小，留着披肩的頭髮，說話時語如連珠，聲音清脆，但滿口湘西土音。我和他們都相處得很融洽。

爲了這次行軍計劃，雖然各有意見，但當決定了後，我們並沒有任何成見藏在心裏。

在這時候，我又介紹一位湖南籍朋友胡少海參加本團工作，以便入湘時有所協助。胡少海是湖南宜章人，曾任國軍團長，爲人勇敢有爲，他雖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是本黨的同情者。朱德對此亦很同意，於是將部隊緊急集合，向外宣稱是「野外演習」。

我們就這樣堂而皇之的離開犂市，向仁化進發，下午六時到達仁化董塘墟宿營。我們在董塘墟和當地黨的同志以極短的時間，迅速策動農民五百餘人，次日向仁化縣城進攻，因該縣的地方團隊毫無準備，只與警戒隊稍有接觸，便即佔領縣城。鹵獲步槍三十二枝。我們即將所鹵獲的武器分配與參加的農民。在仁化縣城住了一天，籌集了二千多元現欵。第二天又回駐董塘墟，第三天便繼續前進，經樂昌長垵村渡過武江，沿樂乳邊境的黃坪、大小洞，經五日的行軍，進入乳源縣北的梅花鄉，暫且休息，派出偵察人員，打探坪石及湖南國軍的動態，再定行動計劃。

梅花鄉是廣東乳源縣北接壤湖南宜章縣的一個行政區的中心市鎮，國民黨政府的區署，就設在市內。附近農村有三百戶以上的人家，良田千畝，四面皆山，一泓流水，處身其間，有令人恬淡安逸之感。當地的區長鄧光漢，是高等小學堂的畢業生，年紀已有三十歲，區署擁有二十多枝步槍，對我們不祗全無敵意，且甚好感。我們因行軍疲勞，對湖南情況又不明

瞭，故在梅花鄉住了五天。在供應糧食和偵察敵情方面，鄧區長給我們很多便利和協助。當時我們很想爭取他入黨，建立以梅花鄉爲中心的湘粤邊區根據地，可是他對共產黨總是表示懷疑和恐懼。由於我們積極去爭取他，反而促使他逃離了梅花鄉，因此增加我們採購糧食和建立與當地民衆關係的困難。當時，宜章縣籍的中共黨員陳東日帶着十多個武裝農民由栗源埠前來連絡（他是參加南昌暴動至潮汕失敗後跑回原籍的），他與我是武漢時期的同事，而今重逢於流竄的生活中，眞是喜不自勝。因爲他是最好的助手，我立即介紹他與朱德相見，朱德亦感到高興。他一來，就告訴我們宜章縣城只有民團四百人駐守，便決定進佔宜章，作爲我們的根據地，開展湘南的革命鬥爭。

我們決定了進佔宜章縣城的計劃，便籌劃如何行動，我詳細向陳東日查詢，得悉宜章沒有無綫電台，也沒有接通廣東的電話綫，連我們脫離十六軍的消息都不知道。我遂與朱德商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去解決宜章民團，以胡少海僞充團長，扯着國軍一四零團的青天白日滿地紅軍旗，浩浩蕩蕩向宜章進發。因胡少海和陳東日俱是宜章人，沿途民衆都很歡迎。農曆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二日）的正午，我們的部隊一路無阻的進駐了宜章縣城。

宜章縣長赴省述職未返，城內的官紳都以爲是國軍的來駐防，非常高興，沿街燃放炮竹

歡迎。

這一日，正是農曆除夕，紳商爲了表示他們的敬意，送豬送酒，犒賞官兵，並於是晚八時設宴於縣政府內，歡宴本團營長以上的官長。我們便乘此機會，佈置圍繳民團槍械、逮捕官紳的計劃。

當晚的宴會，朱德、王爾琢、陳毅等都沒有參加，他們負責指揮部隊圍繳民團槍械。我與胡少海、袁營長帶了十四名幹練的士兵，服裝整齊，佩帶着駁壳手槍，不露聲色的前去赴宴。酒席還沒吃完，警察局長、縣府科長及十多個紳商等，正在歡愉的氣氛中向我們舉杯敬酒的時候，突聞外面槍聲卜卜，槍聲一響，我們的衛士立即將席旁的縣府衛士的手槍繳去。在座的官紳眼見情形突變，大驚失色，想脫身逃走，但見到我們的衛士已把守住出路，只得又復坐下。那位警察局長神色慌張，聲顫顫地向胡少海問道：「胡團長，有什麽對不起的地方？」那時，我坐在胡少海之側，便輕輕的推他一下，示意他宣佈，他立即會意，站起來說：「請各位不要驚慌，我保證各位絕對安全。今晚的事變是對宜章縣民團局鄺團長而發，可惜鄺團長不在此。今晚唯有請各位屈駕一晚，明天再與各位詳談。」各官紳聞語，才神色稍定，但紛紛要求准許回家渡歲，明晨親到團部拜年。胡少海對他們的請求不敢作主，此時我便起立對他們說：「各位請原諒，這是公事，我們不能答應各位的要求，一俟事情解决，

我們再向各位道歉。」他們聽了，面面相覷。這時，進攻警察局的一連人已將駐守縣府的所有警察全部繳械。袁營長便指揮該連將繳獲之槍械集中，並將宴會上的各官紳全部扣留。五分鐘前的主人，這時便變成失去自由的階下囚。

由於地方團隊的首長都給我們一網成擒，所有地方團隊無人領導，所以毫無抵抗。當我們回到團部時，戰事已告結束。城內的民團全部被繳械，祗有城外一小部份民團逃去。

這次戰果，繳獲步槍三百五十枝，駁壳手槍七枝，俘虜警察及民團三百多人。我軍毫無傷亡。

當天晚上，朱德、王爾琢、陳毅和我四人連夜開會，商討成立紅軍開展革命鬥爭等問題。因爲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鑑於我們這個部隊的官兵多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人，乃决定採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番號，並即派員去趕製一面斧頭鐮刀的紅軍旗備用。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革命部隊——中國工農紅軍（以下簡稱紅軍）便在我們幾個人經一夜的籌劃下，正式產生了！

第二天是農曆的新年初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三日），我們於上午八時在宜章縣立中學的操場上集合全團官兵，並發動四百多個農民參加，舉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成立典禮。我們集中了全團的號兵組成樂隊，經過奏樂、升旗，行禮如儀後，朱德便向大家致詞，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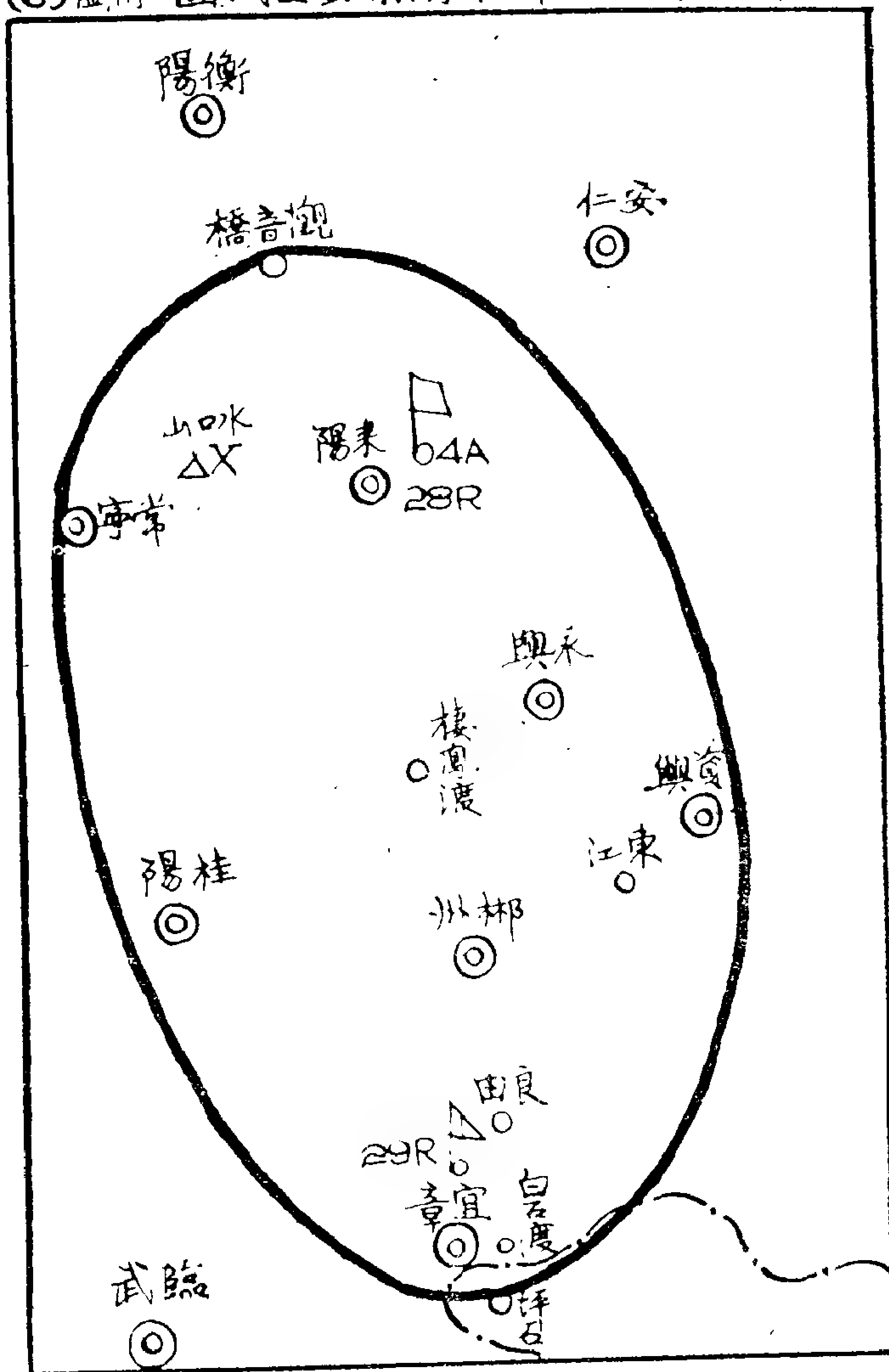
如下：

「同志們！今天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武裝——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的日子。也是中國共產黨組織正式紅軍的第一次。回想我們由潮汕失敗，退到贛南，困處上堡鴉形地區，沒飯吃，沒衣穿，部隊內的動搖分子都跑了！幸賴同志們團結一致，同艱共苦，站穩革命立場。在這一期間，我們曾忍辱受編，目的是保存實力，等待時機一到，我們就又重新舉起革命旗幟，爲中國及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奮鬥。我們現在力量雖少，但我們有千千萬萬的勞苦羣衆擁護，有世界無產階級最大的國家蘇聯的援助，更有全世界無產階級做後盾，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現在本軍的編組和人事，經過了我和陳、龔各同志開會決定，朱德爲紅軍第四軍軍長。一四零團改編爲紅軍第四軍第二十八團，王爾琢任團長，陳毅爲黨代表；粵北湘南參加的農民子弟兵編組爲第四軍第二十九團，胡少海任團長（原名胡鰲，少海是其別字，湖南講武堂出身，是國民黨左派分子，國民黨清黨後，不敢回鄉，寄居在我家裏，參加朱德部隊後，即以少海爲名），龔楚爲黨代表。二十八團的營、連、排長，仍任原職。二十九團各級幹部，稍後另令發表。……」

朱德講話完畢，全場掌聲雷動，繼則燃放炮竹之後散會。

那天晚上，全體官兵舉行聚餐，並開遊藝大會，參加的民衆有三千餘人，盛況空前。由

附圖(6) 紅四軍湘南暴動區域圖 九二八年·一—四月



此開始，便在湘南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怒潮。

除夕夜宴上被扣留的宜章官紳，也在這時經過分別審問罰欵後即釋放。其中有位教育局督學曾日山，因與宜章黨內同志有私交，思想進步，釋放後即參加了我們的工作，以後且成為黨的高級幹部，惜在長征時陣亡。

在我軍宣佈正式成立紅軍第四軍的一天，我們打開宜章縣監獄，將所有囚犯解除枷鎖，由我向他們訓話，鼓勵他們回到家鄉繼續為反抗統治階級而鬥爭到底。釋放時，不論輕重囚犯，我們發給他們每人一斤米。我看到他們與高采烈的離去，感到無限的快慰。

不久，廿九團的各級幹部職位也公佈了——第一營營長劉新，宜章人，黃埔軍校出身，在參加南昌暴動後在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任少校團附，曾與我同事，潮汕失敗後，逃返原籍。為人精明能幹，而且很謙虛，我和朱德到達宜章的第三天，他便與我連絡，適值我們正在編組廿九團，遂任他為第一營營長。（不久即在宜章作戰時陣亡，遺缺即由朱舍我繼任，朱是廣東梅縣人，亦黃埔軍校出身。）第二營營長李光標，宜章人，湖南講武堂出身，曾任國軍營長，國民黨清黨時，逃返家鄉，是胡少海的同學。第三營營長姓陳（忘其名），宜章人，黃埔軍校出身。以下各連、排長都是身經百戰的軍事幹部。

至此，紅軍第四軍之初步編組便完成了。

湖南的農民運動，在國共合作期間，不僅國民黨人攻擊爲過激，甚至中共高階層人士（除毛澤東之外）亦多認爲過火。當時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地方官——縣長——大多數失去權力，實際無法制止農會和工會的種種暴行。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並將豪紳地主綑綁，遊街示衆，濫用私刑，死人無數。國軍軍官家屬亦不能倖免。甚至連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亦慘遭農會殺害。

李立三是湘東醴陵人，生長在富裕的家庭，他的父親是個讀書人，爲人一向誠實，李立三還有一個弟弟李龍光（後改名李湛），是黃埔軍校畢業生。當湖南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後，他的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漢避難，中共中央聞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會，着即制止農會不得對李父爲難。李父這才放心返回鄉間居住，詎料農會竟將他殺害了。

李立三之父被殺後，中共黨內人士咸認爲此事應由毛澤東負完全責任，因爲當時湖南農運實際上掌握在毛澤東手上，同時，大家都知道毛與李早有成見④。加上這一次的殺父血海深仇，即更結下了宿怨。

赤色恐怖⑤籠罩着整個農村社會。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許克祥發動政變，接着武漢國共分家後，地主民團在軍隊的支持下，向農會、工會發動反攻，又屠殺了不少工農會的積極分子和共產黨員，農村社會又由赤色恐怖轉變爲白色恐怖⑥。

在此瘋狂的屠殺與反屠殺中，已不知犧牲了多少人民，可謂是一場人間浩刦。

湘南地區過去的工農運動工作，雖然比湘中、湘東地區較爲緩和，但地主階級重掌鄉村政權後，即壓迫農民補租、補息等等。經過一場農村階級鬥爭的反覆報復，殺害的人亦爲數不少。

當我們紅四軍宣佈成立，經過發動宜章市區及附近工農羣衆開過大會之後，立即瘋靡了隣近地區的工農羣衆，大大的提高了他們的鬥爭情緒，他們蜂湧的跑到宜章縣城來觀察，甚至有的立即參加各種民衆活動，以前潛伏着不敢動，不敢說的工農運動的積極分子，現在就挺身出來，紛紛前來請示工作，其中有宜章縣青年團支部書記胡世健（他是逃避國民黨當局的緝捕，潛伏在宜昌縣西約六十里的碕石村充當小學教員的），也偕同負責組織工作的同志彭祜星夜趕來連絡，準備重出活動。

那時我們忙得要命，因爲軍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陳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幹部又十分缺乏，朱德雖很喜歡接近工農羣衆，而且是一個措詞通俗的馬克斯主義宣傳家，他每與羣衆談話，首先必問人家的家庭狀況、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講共產主義的理論，和一個工人或農民常談一兩個鐘頭而不倦，他身負軍事重任，對於地方羣衆工作，確是無暇兼顧。至於陳毅，他是法國留學生，返國後即任江西永豐縣長，缺乏羣衆工作經驗，指導羣

衆工作，僅說些原則性的問題，既不夠深入，也不詳盡。因此，一切羣衆運動的計劃和指導，多由我負責，胡世健和彭祜來了，我覺得他兩人來得正好，便即召集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地方工農代表，楊子×、劉耀文、胡世健、彭祜……等，討論今後的各項工作問題，這次會議，有以下的決定：

一、以實行八小時工作，不得無故開除工人，及增加工人工資等口號，發動工人鬥爭。

二、以打倒地主豪紳，分田分地給農民的口號發動農民鬥爭。

三、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口號發動婦女參加革命工作。

四、收繳豪紳地主自置槍械及地方公置槍械，武裝工農赤衛隊和少年先鋒隊。

五、宣傳蘇維埃政府，號召工農兵聯合起來組織蘇維埃政府。

六、恢復工會、農會及一切民衆團體組織。

七、凡工、農會會員由十九歲至三十歲的壯丁編組爲赤衛隊。

八、凡十四歲至十八歲之少年編組爲少年先鋒隊。

經過這一次會議之後，地方工作立即展開，不到十天，全縣工、農會組織普遍的成立了。赤衛隊、少先隊，各鄉村蘇維埃政府亦相繼成立，接着就舉行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宜章縣蘇維埃政府，當場選出楊子×爲蘇維埃政府主席。

由此，宜章工農革命的火花，遍及每一個角落

在這短短的期間，宜章婦女運動，也有值得記述的 當時參加工作而起了領導作用的女同志即有：彭堃、彭謙、彭娟、彭儒、劉深、郭懷振、吳統蓮、楊佩蘭、李青、廖彩蘭等。因彭氏姊妹工作最積極，故在紅四軍中有「彭家將」稱號。

「彭家將」女同志，都是衡陽第三師範的畢業生，也是中共青年團員，參加紅軍後，便從事組織婦女和農村羣衆的工作，或是管理官兵伙食和抄寫文件等工作，他們對工作積極而熱情，意志堅定，對於軍隊的政治工作影響很大，這些女同志後來多數都在革命鬥爭中不幸的相繼犧牲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宜章縣的工農運動，正如火如荼的開展，於是惹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湖南省府主席何鍵調兵一師進駐郴縣，粵北方面國軍第二十四師許克祥部也由樂昌進抵坪石⑦。

我們見國軍兵力過大，便分令各赤衛隊化整爲零，潛伏鄉村或山地，待機配合紅軍作戰。紅四軍亦即由宜章縣城轉移至本縣笆籬舖以西，廣東邊界一帶山地的小村落（胡少海的家鄉），以脫離敵人的包圍。

從南北兩路進攻宜章的國軍，本就存着輕敵的心理，湖南的國軍未遇紅軍抵抗，長驅進

駐宜章　且被我們所散佈「紅軍打回廣東去」的謠言所惑，以爲紅軍眞的退回廣東去。他們因有省界和任務的限制，湖南部隊不便越境追擊，實際上，他們也要防備唐生智軍乘虛而入，不能分兵與紅軍作戰，且可乘機對上級虛報「克復宜章」、逐共匪回竄廣東之功。湖南省當局據報，即將該師調回衡陽

廣東坪石的許克祥師得悉湘軍收復宜章的情報，也即停止會攻宜章的行動

紅軍獲悉湘軍調離宜章的消息，朱德擬即復佔宜章縣城，遂於二月中旬率師向宜章縣城進發。第一天預定在岩泉墟宿營，詎料許克祥的教導團賀國光部也於同日同時到達，兩軍即在岩泉墟北端的高地展開遭遇戰，紅軍以堅決迅速的戰鬥行動，在黃昏前擊潰教導團主力，並向其殘部進擊，實施「猛打猛追」的戰術，在栗源舖附近，我又殲滅了該團之一部，紅軍士氣大振，勇猛百倍，是晚紅軍在該地宿營。

翌日上午八時許，紅軍前衛剛渡河向宜章前進時，又與許師兩個團遭遇，我們仍採用堅決迅速的戰鬥行動向敵攻擊。至正午十二時即突破其主陣地，許師另一團增援部隊還沒有展開，便被他們自己潰敗的部隊所衝亂，我與朱德立即分左右兩翼向敵包圍攻擊，敵軍無力抵抗，殘部向坪石方面敗退。紅軍並不清理戰場，仍繼續追擊，直搗坪石。敵軍二十四師師部和它的直屬部隊，因紅軍追擊來勢緊迫，無法部署抵抗，拋棄了所有的軍需用品和銀洋，狼

狽地從東南突圍向樂昌的黃圃唐村方面逃竄，該師經過這次戰鬥後，僅師長許克祥和少數官兵逃脫，其餘全被紅軍擊斃或俘虜。「猛打猛追」的戰術，第一次發揮了輝煌戰果。

這次戰役，紅軍以不足二千人的兵力，消滅了人數四倍、裝備精良的國軍，鹵獲了步槍二千五百餘枝，重機槍十餘挺，八一迫擊炮八門，各式手槍百餘枝，馬十三匹，彈藥被服銀洋不計其數。栗洋鋪的農民，也繳獲散兵的步槍五十多枝，被俘國軍官兵八百餘人。

這一勝利，不僅充實了紅四軍的實力，且振奮了整個湘南工農羣衆的革命情緒。

戰爭結束，紅軍官兵都有無上的興奮，這是我們成立紅四軍後第一次作戰便獲得了偉大的勝利，這象徵着前途有無限的光輝，朱德時時露出愉快的笑容，並對我們表示，紅四軍正缺少迫擊炮和機關槍，現在都有了，而且足夠兩個團的裝備，今後更有把握了。

在坪石休息一天，接到宜章黨支部的通報和紅軍所派出諜報人員的報告，宜章縣城已沒有國軍，少數維持治安的民團也聞風逃去，赤衛隊已入城維持秩序，蘇維埃政府也恢復辦公，並動員了五百羣衆趕來坪石搬運戰利品，歡迎紅軍回去。

紅軍在湘南民衆的熱烈歡迎和幫助之下，又回師到宜章縣地

紅軍回師宜章的晚上，朱德、陳毅、王爾琢和我四個人，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對黨政軍各方面通過了如下的決策：

關於黨政方面：

一、普遍建立湘南各縣、區、鄉、村各級蘇維埃政府。

二、策動農民向地主鬥爭，實行土地改革。

三、策動工人爲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及增加工資而鬥爭。

四、普遍組織各職業工會，各縣成立總工會以領導工人鬥爭。

五、保存黨的地下組織，但須有部份黨員公開活動，以擴大黨的政治影響，提高黨的地位。

關於軍事方面：

一、作戰方針——乘國軍何鍵與唐生智兩部內爭無暇南顧的機會，我軍對北面取攻勢，掃蕩郴縣、耒陽、永興各縣的敵軍和民團，向衡陽游擊，以開展蘇維埃運動。對南面取守勢，以鞏固宜章政權。

二、部隊區別——紅四軍第二十八團向北發展，由朱德同志指揮。第二十九團固守宜章，由龔楚、胡少海兩同志指揮，並監視廣東坪石方面動態。

三、軍事建設——發動工農組織赤衞隊和少年先鋒隊，收繳民槍以武裝人民，並利用大刀、梭標、鳥槍等舊式武器，充實鬥爭力量。

四、號召青年工農參加紅軍，充實紅軍戰鬥力。

五、目前參加紅軍的青年工農，儘先補充第廿八團和第廿九團，並迅速組成宜章獨立營。

關於俘虜號置：

一、立即由宜章縣人民團體發動物質慰勞和慰問。

二、由紅軍政工人員進行政治宣傳，揭發敵軍軍官尅扣軍餉虐待士兵的罪惡，煽動俘虜檢舉潛伏俘虜營內的軍官，並宣佈黨及紅軍宗旨。

三、待一二項工作完成後，由朱德同志對全體俘虜訓話，並宣佈，如願參加紅軍者，一律平等待遇，不加歧視，如要求回家者，給以必需的旅費遣散。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宜章特別會議的決策，也是湘南鬥爭的總方針，尤其是對待俘虜政策，便成了以後紅軍對俘虜政策的先例。這樣，便爭取了被俘國軍的同情，逐步的瓦解了部份國軍的軍心。

以這幾項決策爲中心，第二天的黨政軍幹部聯席會議上，由朱德報告今後的鬥爭工作路綫，我報告軍隊員兵協助地方工作和建立地方革命武裝的方針，並分配給與幹部以適當的任務。

經過向俘虜的教育和宣傳，潛伏在俘虜營中的國軍官佐三十餘人，很快的便被清查出來。並有士兵三百餘人和排長七人志願參加紅軍，其餘四百餘人請求准予回家，每人發給三塊銀洋遣散，我們這樣處理引起當地民衆的讚許，都說紅軍的作風比國軍不同，因此也增加了他們對紅軍的向心力。

紅四軍重新調整裝備，每個團增加一個重機槍連，一個步炮連。步兵的槍彈人員亦盡量補充齊全，剩下一千多枝步槍便送給了宜章的獨立營和赤衛隊。

坪石樂昌縣屬的一個市鎮，是湘南入粵的門戶，廣東的鹽和工業製成品，都經此輸入湘南，湘南的土產如糧食、牲口、茶油、牛皮等，亦經坪石入粵，市面旺盛，自國軍許克祥師潰散後，即被土匪胡鳳璋佔踞，並積極構築碉堡等防禦工事，坪石的人對這幫土匪的所作所爲，非常不滿。當地黨的支部書記李光中特地到宜章報告，請求我軍去消滅胡部土匪，並說當地有許多民衆參加作戰。

朱德聽了，以胡部土匪兵力不大，且有民衆協助，便決定先行進攻坪石，消滅胡鳳璋匪部，再向郴縣發展。我當時提出反對的意見，認爲：（一）胡鳳璋土匪佔踞坪石，他的兵力薄弱，絕不會也不敢進攻宜章，反而有防阻廣東國軍向我進攻的作用。（二）坪石有幾個碉堡，我軍無攻堅武器，不能迅速攻下，倘遷延時日，徒遭不利。（三）坪石是廣東地境，非

我軍應守之地，即使佔領，也得放棄，不如乘湘南空虛，士氣民氣沸騰的時候，迅速向北發展，以展開整個湘南地區的革命鬥爭，在政治上反爲有極大的意義。

可是朱德不以爲然，認爲他對坪石地形熟悉，並有民衆協助，滅此朝食，必有把握，他獨自率領了紅軍二十八團的三個營，在陰雨連綿的天氣下向坪石進攻，土匪胡鳳璋部利用既有碉堡和商店屋宇進行抵抗。街道上分段用鹽包阻塞，築成巷戰的防禦工事，紅軍雖有坪石販塘村的民衆二百多人，携帶步槍土炮協同攻擊，經過兩晝夜的艱苦戰鬥，僅佔領了坪石一半街道，無法迅將胡部解决，朱德猛然記起了我說的：「倘遷延時日，徒遭不利」這句話，於是决心放棄攻擊，將部隊撤回宜章。

回到宜章，他見到我的時候，帶着疲乏的神情，拍着我的肩膀說道：「你不錯，你估計得很對，我們還是北攻郴縣罷！」

這時宜章獨立營已經編成，由黃埔軍校出身的龔楷（四川人）任營長，第一連連長張華（宜章人）；第二連連長蕭克，黃埔軍校出身，後在共軍中歷任軍團總指揮、軍訓部長等職；第三連連長陳光⑧，附近各縣黨的負責人，亦多來宜章接洽，各縣的黨員，回鄉軍官，也陸續來宜章集中，我們的軍事幹部也就不感缺乏了，軍隊的組織也更健全了。

因爲我是粤北人，對湘南地形熟悉，在率領農軍北上時，曾與湘南特委書記夏民正，與

耒陽縣、永興縣各地方黨及當地民衆團體有過聯繫，爲了開展湘南地區蘇維埃運動，我便匆匆的來往各縣，連絡及恢復黨的地下組織和過去的農會，爲朱德的軍事發展，舖平了道路。

朱德率領紅四軍廿八團，很順利的佔領了耒陽、永興、郴縣、資興等縣，紅軍所到的地方，當地的黨員就立即起來領導民衆，很快的就恢復了過去的工會和農會組織，並自動的組成了赤衞軍、少年先鋒隊、各級蘇維埃政府。常寧縣水口山的煤礦工人宋喬生（礦工）也起來領導礦工奪取礦警步槍手槍百餘枝，組織了工人赤衞隊，響應各縣農民暴動。於是湘南的革命浪潮，一時風起雲湧，蓬勃的發展起來。

但他們打土豪，分財物，牽牛殺豬……逮捕地主豪紳，濫用刑法，强迫罰欵等等，成了普遍的現象，任意殺人，到處放火，頻頻發生。

他們那種報仇洩憤的瘋狂殘酷的行爲，無法抑制，赤色恐怖又再度籠罩着湘南

當時我曾分別與郴、宜、永各縣黨員同志談過，勸諫他們不要亂殺亂燒。但他們都說：「這是黨中央的指示，要殺絕地主，燒燬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因我自離開廣東後，就沒有與黨的省級黨委連繫，不知黨的政策轉變（當時黨中央還在執行瞿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綫），所以不便强加制止。

我是一個以人道主義思想爲出發點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爲，我

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

經驗告訴我，領導民衆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綫，而且須有正確的指導原則，否則，就會造成無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

正當紅四軍在湘南領導蘇維埃運動的時候，處在井崗山的毛澤東正陷於最艱苦困難的環境中；他是在中共「八七」緊急會議後，受中央派赴湖南策動秋收暴動的。他便跑到湘東瀏陽縣文家市，當時因爲進攻長沙的平江、瀏陽、醴陵及江西萍鄉的農民自衛軍及武昌警備團⑨等殘部正潰敗下來，毛澤東乃加以收編，於九月八日整編爲工農革命軍，本擬再攻長沙，但因自衛軍中收容國軍夏斗寅部的叛變部隊再度叛變，而農軍亦逃亡不少，致部隊零落，全部僅七百多人，乃放棄再攻長沙的計劃，匆匆率部南竄至蓮花三灣，從新整編，調整幹部，正式稱爲工農革命軍第一師，自任司令，由此人皆稱他爲毛司令，部隊整編後，他即率部於十一月間進入江西之寧岡縣城礱市東南之井崗山。

井崗山是羅霄山脈的中段，周圍二百多里，橫貫江西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和湖南的酃縣、桂東、汝城相毗連。山上有五個較大的村莊，村前都有水井一個，故稱之爲大小五井，以大井、小井、茨坪爲最大。每村各有數十戶人家。小井和茨坪還有十多間小商店，經營一些農村的日用品

井崗山的居民並不多，民風純樸而保守，與世無爭，靠着山坡上的梯田收穫一些農作物，過着最貧苦的日子。大部份的居民很少有米吃，大多是吃紅薯和粟米。但他們雖在這種生活方式下，仍感到滿足，並沒有其他的妄想。後來因爲被土匪所脅迫和引誘，壯丁才常外出搶刼行旅，甚至到較遠的鄉村去打家刼舍，藉此來增加他們的收入。

井崗山的地形，有無數座巍峨高聳的山峯，巉岩峭壁，溪谷縱橫，構成了井崗山的險要地勢。通達井崗山的道路有三條：一條是由寧岡縣經汪洋界，上山十五里，方可到井崗山腰的村莊小井；其次是由永新縣經龍源口、七級嶺而到小井；另有一條是由遂川經黃坳到井崗山。這三條路都是崎嶇的山徑，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艱難。只要憑險據守，很難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難發揮它的威力，所以，這區域向來都是匪徒們最理想的根據地。

在歷史上明朝武宗時代，朱宸濠在江西南昌叛變，失敗後即逃上井崗山落草，後被王陽明所剿滅。王氏削石爲碑，記載剿匪的史實，這個古蹟至今尚存。由此可以想見；井崗山的軍事價值，在很早以前就被人所重視了。近代有聾子匪首亦以此爲基地，打家刼舍，無往不利。

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盤據在井崗山的一批土匪，數約六七十人。匪首王佐與寧岡縣擁有步槍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聲氣，亦以井崗山這個險要的地區爲憑藉，作爲他們搶刼行

商和富戶的根據地。附近各縣人民，視爲畏途，稱王佐爲「王老虎」。因爲紳匪勾結，使地方團隊無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崗山幾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產。

毛澤東明瞭井崗山的軍事價值，當他們從湖南茶陵竄入寧岡縣城，便首先送了兩枝手槍和一些禮物給袁文才，聯絡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紹給王佐與毛澤東見面。

王佐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爲兄弟。

毛澤東運用其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他滿口仁義道德，哄得袁王兩人貼貼服服，都接受了毛澤東所委派的營長職務。從此，毛澤東便在井崗山立定了腳跟。

毛澤東自到井崗山之後，得袁文才、王佐之助，又因地勢險要，遂以井崗山爲革命根據地。但糧食缺乏，而自身的兵力又極薄弱，今後怎樣去發展？自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而外面又常有國軍在山外地區進犯。正是內憂外患，使他傷透腦筋。他們住在深山之中，經過了好幾個月都不敢遠出打游擊，生活自然感到很寂寞。

三月末，有一天下午，毛澤東在極端無聊之中和袁文才，同到王佐家裏飲酒解悶，正在這時，忽然來了一個賣絨綫的小販（該小販經常由郴州販絨綫到山區販賣，亦曾見過毛澤東），他見到毛澤東等在飲酒，便對站在門外的衛士說：「毛司令尚在這裏飲酒？現在山下

的郴州、耒陽、永興一帶盡是朱德的紅軍，到處打土豪分田地呢！」衛士便將小販的話轉報毛澤東。

毛澤東不聽猶罷，一聽到這個消息，當堂跳起來！急問道：「你說什麼？」衛士指着門外的小販答道：「他說朱德紅軍正在郴州、耒陽各縣打土豪分田地，非常熱鬧。」

毛澤東聽清楚了，登時站起來，口裏喃喃的說道：「好極了！好極了！」袁、王見他這樣子，均莫名其妙，兩人忙問道：「司令！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這才自知失態，忙說道：「是好消息！朱德是黨的軍事高級領袖，又是我的最好朋友，他到了湘南，我們沒有一點消息 如今他既來了是最好不過了 我們今後的力量大得多了，你們馬上派人去打探，迅速報告我知，切勿延誤，至要至要。」袁、王兩人聽罷大喜！立即命人前往打探。他們三人即繼續殺鷄治酒，舉杯痛飲，等候佳音。

翌日的晚上，派出的探子回來了，證明了這一消息確實。而且說：朱德的紅四軍司令部在耒陽。資興縣方面亦有一回鄉軍官李奇中領導農民自衛團進攻地主民團，打土豪……（李奇中是黃埔軍校出身，參加南昌暴動後曾任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中校團附）。

毛澤東得到朱德在湘南的眞實消息，即派何挺穎偕同兩個親信前往耒陽

何挺穎攜帶有毛澤東的親筆信，於四月初到達耒陽晉見朱德，呈上毛澤東的親筆函。朱

德閱後，非常高興。即對何挺穎說：「毛同志既在寧岡，相距這裏不遠，最好請他即來耒陽，共同領導湘南鬥爭。他的軍隊應就近向酃縣、資興、桂東等縣發展，和我們互相呼應，使與耒陽、永興、郴州連成一片，以鞏固這一後方。」並留何等人在軍部盤桓數日。

那時候正值朱德和耒陽女同志蕭貴蓮（即吳玉蘭，蕭貴蓮是衡陽第三師範讀書時的正名）結婚之後，大家都很高興。何挺穎等在耒陽住了三天，帶着朱德的覆函回到礱市時，毛澤東已將部隊移駐在此。何挺穎即將見到朱德的情形報告給毛澤東，並說：耒陽工農群衆已全部武裝起來，配合紅軍作戰

毛澤東看過朱德的覆信後，不勝感慨，因他四個月來匿居井岡山上，寂寂無聞，毫無工作表現，而朱德他們則轟轟烈烈的打了幾場勝仗，開展了湘南蘇維埃運動，創造了一個新局面出來，若現在前去和朱德會合，豈不相形見拙，於是他決定暫不去耒陽和朱德會合，準備在酃縣、桂東地區開展工作後，再和朱德相見。

① 周士第原是第四軍廿五師七十三團團長，南昌暴動後升任廿五師師長，賀葉軍佔領潮汕時，他率該師一個團駐三河壩警戒，潮汕失敗後，他與朱德率部退入贛南，至信豐時不願隨朱德打游擊，離開部隊出走，後參加十九路軍，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一九三四年一月再入中央蘇區。

②一九二七年十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回師廣州，第四軍參謀長兼軍官教導團團長爲葉劍英，警衛團長梁秉樞（均是共產黨員）。中共於賀葉軍潮汕失敗後，即派葉挺、徐光英潛入廣州會同張太雷及德、俄顧問各一人策劃廣州暴動，以葉劍英、梁秉樞兩團爲主力，發動廣州工人和近郊農民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拂曉突行暴動（葉劍英已於暴動前潛赴香港，未參加行動），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以蘇兆徵爲主席，惲代英爲秘書長，楊殷爲肅反委員，周文雍爲勞動委員，彭湃爲土地委員，何來爲經濟委員，陳郁爲司法委員。又成立紅軍總司令部，葉挺爲總司令，徐光英爲參謀長，張太雷爲黨代表，發表宣言；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耕」等口號。

並於暴動時立即分兵圍攻第四軍軍部，第十二、廿六等師後方辦事處，廣州市公安局和一切軍政機關銀行等。當時全市和郊區的工農羣衆，青年學生，都頸圍紅帶，熱烈參加，惟因缺乏嚴密組織和正確領導，一時秩序混亂。甚而將太平沙的中央銀行都放火焚燒，參加暴動者，任意搶掠商民財物，形同土匪式的搶刦行動。由十一日至十三日晨，第四軍軍部和各師後方辦事處，均未被暴動的部隊攻入。

張發奎和黃琪翔倉促走河南，留黃琪翔指揮部隊，他自己則趕赴肇慶調兵反攻廣州。並親乘軍艦至廣州指揮，以教導第一師薛岳部的兩個團由靖海門渡河，廿六師的林祥團由黃沙渡河，原駐西村的教導第一師莫雄團攻觀音山，駐防河南的第五軍李福林部亦派兵渡河協同進攻。紅軍被迫退守維新北路公安局附近一帶，負隅抵抗，戰鬥非常慘烈！至下午五時，紅軍傷亡甚大，張太雷作戰陣亡。是時，莫雄部已佔領觀音山，紅軍已被包圍，葉挺乃下令撤退向海豐轉進，所有部隊由陳團長率領指揮，但除正式軍隊千餘人遵令撤退外，所有工農武裝及部份隊伍，均不肯撤退，繼續頑抗，是晚已大部犧牲，殘餘之紅軍，乃向龍眼洞逃竄，各路國軍跟踪追擊，將紅軍在龍眼洞包圍繳械。廣州蘇維埃政府，成立只不過三天便宣告結束。

此次暴動不僅中共黨員及官兵死亡甚多，一般頸圍紅帶的工農羣衆、青年學生，亦在混亂中被殺不少，廣州市內的中華路、惠愛路、永漢路、天字碼頭一帶，遍地屍骸，慘不忍睹！徐冠英藏匿於妓館之內，一個月後才潛逃香港，葉挺藏匿在其妹家，後又逃走香港。徐向前那時名徐像謙，隨徐冠英至廣州，暴動時他任連長。

③ 汪精衛原受廣州之張發奎指揮，嗣因張發奎在廣州發起反對南京李烈鈞的護黨運動，爲張靜江、吳敬恆等通電呼籲停止紛爭，主張在上海召開第四次中央委員全體預備會議，並電在粵中委赴滬出席，國民黨內部紛爭遂告一段落。護黨運動結束，張發奎、黃琪翔即辭職出國考察。其所屬國軍第四軍三個師及教導第一、二兩個師交由第四軍軍長繆培南率領，請留中央繼續北伐，以竟全功。斯時蔣介石已準備復任總司令，復電嘉許，並令該軍隊北上，開赴南京集中待命，該軍隊遂於十二月下旬全部出發北上。李濟深、陳銘樞等又回廣州，主持軍政。

④ 參閱本編第三章。

⑤ 「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殺人放火，手段殘忍，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爲赤色恐怖。

⑥ 「白色恐怖」：白色代表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及工農羣衆積極分子，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爲白色恐怖。

⑦ 許克祥自一九二七年五月發動「馬日事變」後，不久升爲國軍廿四師師長，因國民黨討伐唐生智，許部即移駐廣東樂昌，後因擬配合湖南何鍵軍會攻湘南紅軍，遂移師於樂昌之坪石鎮。

⑧ 陳光，是湖南宜章縣栗源堡人，曾當過兵，年輕、聰明、勇敢，先爲其本縣赤衞隊隊長，不久率全部加入紅軍廿九團爲第三連長，至一九三四年已升爲師長，解放戰爭時更任兵團司令。

⑨ 武昌警備團是中共黨員領導的部隊，國共分家後，因趕不到參加南昌暴動，遂改辭湘東參加秋收暴動，失敗後，隨毛澤東上井岡山，成爲毛澤東的基本軍事力量。

第二章　朱毛會合

我在宜章正苦於工農運動有如脫韁之馬，一放而不可收拾的時候，接到朱德給我的信，知道毛澤東已在寧岡縣井崗山建立了根據地，並和我們取得了連絡的消息，使我歡喜極了。我知道毛是黨中央領導人之一，對今後羣衆運動的政治領導，自有幫助，而且他比我們強得多。我目前面臨的困難及我的責任，自然會減少許多。跟着我又接到陳毅的信，詳述何挺穎告訴他有關毛澤東的近況，並鄭重地說毛是工於心計的人，今後與他合作，要特別小心，切勿似對朱德那樣坦白。我看了他的信後，不免對毛採取了「且觀後效」的態度，但陳毅對我的關心，我是很感謝的。

那時我們沒有無綫電台和電話等通訊設備，我們只建立了以郴州爲中心的秘密交通網，二十里至三十里就有一個交通站，南至坪石，北至衡陽，東至資興，西至桂陽。交通站的工作人員，由地方黨領導工農羣衆擔任，負傳遞信件及偵察敵情等任務。他們秘密的日夜工作，由耒陽到宜章約有二百五十華里，信件發出後二十四小時即可到達。因此我們與軍部的連絡各方面的消息均很靈通。

四月間，北面的敵軍廣西桂軍，最初是兩個師佔領衡陽 耒陽民兵曾單獨冒險向衡陽突擊，結果民兵傷亡很大，桂軍隨即派出兩個團分向耒陽及常臨方面游擊，又曾與我廿八團游擊部隊在觀音橋以南地區發生遭遇戰，雙方均有傷亡，桂軍退回衡陽。繼續又有三個師開抵衡陽，有準備向耒陽大舉進攻的企圖。南面韶關之三十六軍范石生部已進駐坪石（原盤據坪石之土匪胡鳳璋已退回湖南汝城受編爲湖南保安團），范石生軍亦有向宜章進攻之企圖。朱德以南北兩面敵軍有夾攻湘南我軍之勢，通知我們於不得已時撤退至酃縣集中，以保存實力。我接到通知後，便與胡少海團長決定作戰計劃如下：

一、廿九團集中兵力於樟橋、摺嶺地區與敵決戰。

二、宜章獨立營爲前哨營，在宜章縣城及白石渡對坪石方面警戒，不得已時退回摺嶺主陣地

三、宜章縣城附近鄉村之赤衛隊準備於范軍向我主力攻擊時，積極在敵後向敵襲擊，以牽制敵軍，配合主力作戰。

四、宜章其他區鄉村之赤衛軍及少先隊，應盡可能控制其鄉村，並準備必要時對敵進行游擊戰

我們這一計劃決定後，即通知郴、宜兩縣的地方黨及蘇維埃政府 我與胡少海親到樟

橋、摺嶺一帶偵察地形，並決定作戰部署

四月末，南北兩面敵軍均同時向我進攻，我們照預定計劃作戰。范軍並於拂曉時向我白石渡獨立營攻擊，營長龔楷陣亡，正午范軍全軍五個團向我樟橋戰地進攻，激戰至黃昏後，全部退守樟橋鄉村，我們以衆寡懸殊，遂決定向郴州撤退。

范軍主力遂於翌日進駐宜章縣城，一部駐樟橋對我方警戒。

我廿九團退至郴州後，得悉范軍到處都受到赤衛隊之襲擊，是以不敢向我軍跟蹤追擊，使我們得以從容撤退。從這一次作戰，我們體會到羣衆武裝的眞正效力。

我們在郴州休息了一天，很快的便與朱德取得連絡，他要我們迅速開赴酃縣集中。

我們在郴縣休息的那天，宜章縣城近郊赤衛大隊及縣蘇維埃政府、工會、農會的負責人已來到郴縣，郴縣黨組織已經公開的同志及郴縣赤衛大隊亦準備隨同我們撤退。我便於翌日率領着大隊及男女眷屬四千八百多人取道經東江、何家山、彭公廟，向酃縣前進。

第三天，我前衞營（廿九團）第一營營長朱舍我到達酃縣縣屬之水口，發現鎮上都住滿了頸圍紅領帶的紅軍，經過連絡，才知道是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於是迅速通知正在行進中的隊伍，並告訴毛澤東，紅四軍的大部隊即將到來。

我與胡少海進入水口市區，吩咐部隊在路旁休息，正準備與毛澤東見面；這時，四個工

農革命軍的衛士，簇擁着一個身穿褪了色的淺灰色中山裝，身材瘦長，頭髮散亂，肩濶手長，而上鬍鬚似是許久沒有剃的漢子走過來，我與他通過姓名後，才知道他就是毛澤東。雖然他不修邊幅，但是他那溫和的態度，使人一見便對他發生好感。

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手心熱灼灼。開頭便問我：「你就是龔楚同志嗎？朱德同志呢？他的情形你知道嗎？」聲音雖不宏亮，但乾脆爽朗，帶有濃厚的湘潭口音。我告訴他：朱德同志日內會到酃縣。他很高興，拉着我的手，說道：「龔同志先到我住的地方坐一會，佈置宿營警戒的事情，請胡同志負責好了。」說罷，他便和我一道兒到他住的一間商店去。

我們相對地坐在一張四方桌旁，衛士為我們送上兩碗白開水，毛澤東急急的問我：「這次你們太辛苦了，湘南的情形怎麽樣？」我用手指在桌面上簡單地劃出湘南的態勢，將紅四軍成立的情形，最近與南北兩路國軍作戰的經過，和撤退時的情形說了一遍。他登時歛去笑容，露出無限焦急的神色問道：「朱德同志率領的二十八團不會被敵人截擊嗎？」我堅定的答覆他：「不會的！我由郴縣撤退時，他已退出耒陽向永興前進，而且朱同志是個老軍人，沉着機警，絕對不會有大的損失，請你放心。我們已約定在酃縣集中，再來與你連絡。」

這句話像一個定心丸，使他焦急的心情安定下來，便又滿面笑容的說：「這樣就好極了，我們今後可以共同一起為革命而奮鬥！」喝了幾口開水，他又接着道：「我帶着第一師

準備佔領汝城，與四軍聯成一片，不知湘南已發生了變化，現在總算幸運，我們依然保存着力量，革命是不怕失敗的。」他的誠懇的談吐，親熱的態度，深深地使我感動，因他是黨的中央委員，有長遠的鬥爭歷史，經驗豐富，我很激動的對他說：「我們今後能夠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來領導，我們的責任就輕了。毛同志有豐富的鬥爭經驗，今後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悅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的對我說：「好的，我們大家努力創造一個新局面！」

這時，他的衞士報告：晚飯已經弄好了，他馬上叫衞士去請胡團長過來吃飯。於是，我們三個人便愉快的邊吃邊談。那次晚餐非常豐富，他在我們未到之先早就派人買了一隻大雞，另外還有醃肉、鷄蛋和一罐米酒。在戰鬥失利的撤退部隊內，能享受到這樣豐富的晚餐，算是極難得了。

晚餐時，他問起紅四軍官兵的生活情形，我告訴他，過去的時候，紅四軍官兵每月一律發給薪餉十二元。他覺得今後必須改變這種給養方法，他說他的部隊每月僅發三塊大洋，贛南地區，非常貧瘠，大部隊的薪餉籌給不易，將來應加以調整。我們對這個主張也都表示同意。餐後，我便和胡少海回團部駐地去洗澡。

晚上九時，毛澤東又跑到我們宿營的地方來談天，我們的團部，住在街尾一家大商店。

我住在客廳中，朝南有個大窗子。那時是初夏夜晚，微微的涼風，拂過我們的頭面，消除了白日行軍的疲勞、衛士們爲毛澤東送上好茶，但卻沒有香烟奉客。因爲我和胡少海都不吸香烟。

毛澤東笑道：「你們眞是革命陣營裏的好同志，連香烟都不會吸。」說完，他自己從衣袋中拿出一包美麗牌香烟，一面吸一面和我們談話。從他的言談中判定，他確是一個深謀遠慮，富於想像力的人。

他問及我們二十九團的人數和裝備，胡少海便詳細的告訴他：「我們共有三個營，一個特務連，一個步炮連，一個衛生隊，一個通訊排，全團官兵有一千八百餘人。武器方面有迫擊炮四門，重機槍八挺，步槍八百七十餘枝，駁壳手槍三十二枝。同來的還有宜章獨立營，宜、郴兩縣赤衛隊和各機關人員三千人，步槍千餘枝。」

毛澤東聽到我們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喜出望外。因爲他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只有六百四十多人，僅及我率領的部隊的六分之一。他臉上充滿了笑容，似乎已看見了未來的美麗遠景。

毛澤東有異於常人的特徵，他的肩膀很寬濶，雙手特別長，下頷有一顆黑痣。他說話很風趣，善於抓住每個問題的關鍵，激起對方的共鳴，使人有一見如故之感。我們談談過去，

研究將來，直到午夜，他才告辭。臨行時互相約定，他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先赴酃縣，我率紅軍第二十九團和隨行部隊人員眷屬等隨後跟進。

送走了毛澤東，我和胡少海都很高興，覺得以後的政治領導更有辦法。對毛澤東這個人，我們久聞其名未見其人，這一次的晤面，他給我們的印象很好，似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樂於接受他的領導，這是他的不可抹殺的組織天才，也是他日後成功的條件。

第四天（大約是五月五日）的中午，我們到達酃縣，即赴軍部，已見到毛澤東正和朱德、陳毅等談得很融洽。朱德一見到我，即問我部隊有無損失。我告訴他：陣亡官兵十三人，負傷三十餘人，傷兵已由地方同志安置到偏僻的鄉村療治，陣亡的有宜章獨立營營長龔楷及廿九團排長兩人，士兵十一人，已在摺嶺安葬。現到此的連同赤衞隊及宜、郴兩縣之黨、政、軍幹部眷屬四千八百多人。他聽了，皺皺眉頭，站起來，背脊雙手，踱來踱去，一聲不出。這正是他考慮事情及苦悶時的神態。毛澤東立即說道：「我們先行開到礱市集中，整編隊伍，安置老弱家屬，再作打算。」朱德即答說：「就這樣辦。待廿八團第三營及水口山工人武裝，在耒陽掩護撤退的隊伍到達，全部集中後即開拔。」接着他命令胡少海立即去偵察附近地形，嚴密佈置警戒，並說：「晚上到軍部同進晚餐，大家再談談。」

我見時間尚早，即回團部休息，當我回到團部不久，我早就認識的耒陽縣黨部的負責人

雷同志來訪，他告訴我：耒陽的工農武裝戰鬥意志很强，曾自發的單獨襲擊進駐衡陽的桂軍，傷亡慘重。最近紅軍每次戰役，耒陽赤衛隊均能配合作戰；他又告訴我，毛澤東是個陰險殘忍的人物，湖南黨的中上層同志對他素無好感；但朱德軍長是坦白誠實的人，很易受毛愚弄；陳毅同志為人太爽直，無防人之心，而你又是只注意實際工作，不顧利害的人，今後你們合作，我眞的替你們躭心，希望你多多注意……

我聽了他這席話，登時感到迷惘。但，既來之則安之，我今後留心便是了。

是晚在軍部和大家同進晚餐，毛澤東笑口常開，講到前途光明，得意時，哈哈大笑，口沫橫飛，講到現時經濟糧食困難時，立即便愁眉苦臉，長吁短嘆。說到黨中央對他接二連三的嚴重警告；批評他攻平江、瀏陽是「專憑槍桿子的軍事冒險主義者」，又說他是「不肯發動羣衆的機會主義者」。當他退入井崗山時，又批評他是「不顧民衆的逃跑主義者」。他說時怒容滿面，緊握拳頭，大罵中央負責人是只尚空談、不顧實際的混蛋，大有非報復不可的態度。

當時大家見到他這般情形，朱德一聲不響，陳毅亦微笑不語，我的內心則暗自偷笑，其餘的人都面面相覷，不敢出聲。

我覺得老毛這個人是富有演戲天才的，他的喜、怒、哀、樂在一個短短的時間表現得淋

淌盡緻。

第二天，軍部下令：盡量搜集糧食、布匹，除每人準備一條布袋，各自攜帶五天糧食外，將餘糧運至礱市。這天廿八團第二營及水口山工人武裝已安全到達酃縣集中，我們遂於第三天開赴礱市休息。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紅四軍到達礱市，十三日中共湖南省委杜修經奉黨中央之命與楊開明同到礱市，是日下午二時即召集會議，參加者有毛澤東、朱德、陳毅、王爾琢、何挺穎、胡少海和我等。首先由杜修經傳達黨中央的幾點重要工作指示。他說：「中央認為：中國革命是在不斷的發展中，我們必須領導全國各地工農鬥爭，深入土地革命。由建立鄉村政權到奪取大城市至奪取全國政權，中央對朱德同志在湘南的鬥爭能發動廣大羣眾參加，認為是最正確的路綫。黨為了加强軍事領導，應組織前敵委員會負責指揮軍事，領導黨務，關於人選問題，中央指定朱德、毛澤東、龔楚三位同志為常務委員，另在紅四軍幹部中遴選委員數人，實行集體領導；關於湘贛邊區地方黨的領導，現由湖南省委派楊開明同志來此成立邊區特委，專負邊區黨的領導工作，以配合軍事鬥爭。關於紅軍編組問題，由前敵委員會按照實際情形決定，並須注意與湖南省委經常保持連系。」

杜修經報告完畢後，毛澤東便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一）前敵委員會必須設一個書記，以處理經常工作，現在是嚴重的軍事鬥爭時期，沒有軍事的勝利，就不可能有政治的勝利，沒有政治領導軍事，也不可能有軍事勝利，目前成立前敵委員會是重要的，但在此鬥爭時期，我們常委三個人不可能經常在一起，因此我認爲應該設一個書記以負責處理經常事務

（二）現在紅四軍有兩個團，第一師有一個團，尚有郴、宜、耒各縣獨立營、赤衞隊、水口山礦工武裝，總共達七千人以上，必須要從新整編，以統一指揮。

（三）紅軍及地方武裝，人數既已有七千餘人，還有地方黨政人員及眷屬，今後經濟問題，最爲嚴重，應請省委及中央設法接濟。

上述三項問題，皆是當務之急，請杜同志和各位研究。

朱德接着發言，他原則上同意毛澤東所提的意見，關於紅軍整編問題，他認爲應採精兵主義，重質量，不重數量，若濫事擴編，反會減低行動及作戰效能。對於經濟問題，認爲主要是靠自己籌給，依靠中央及省委有困難，至於前敵委員會設一個書記，應由毛澤東同志負責。

毛澤東聽到此言，面露笑容，接着他提出陳毅、王爾琢、何挺穎爲前敵委員會委員，還問大家同意不同意？

那時我們祇好表示同意。至此，紅軍前敵委員會算是組成了。

關於紅四軍整編問題，決定將湘南之赤衛隊、水口山礦工武裝與紅四軍，編爲三個師，由前敵委員會協同軍部共同處理。

會議結束後，杜修經到我廿九團部對我說：紅軍前敵委員會的組織，中央原擬以常務委員會集體領導，不設書記，目的是防止毛澤東操縱，現在又以毛澤東爲書記，將來你們須要防止他操縱，否則的話，麻煩又多了，我那時已知中央對毛澤東極不滿意，我自己又經過了湘南羣衆工作的教訓，極不願多負責任。杜修經的話雖是事實，但亦只好唯唯應之，並請他轉報中央及省委，以後多注意我們的連絡。

翌日，杜修經帶着很不愉快的心情走了。

楊開明任湘贛邊區特委書記，毛澤東原不高興，但這是省委派來的，不便公開反對，由得他自己去幹。（不久楊調回湖南省委會工作，該職又由毛澤東自己兼任。）

紅軍整編問題，原決定編爲三個師，但會議時沒有郴州、宜章、耒陽各縣黨的負責同志參加，前敵委員會於第二天召集各縣黨政負責人開會討論，由毛澤東報告會議經過，徵詢地方同志的意見，當時耒陽、郴州兩縣負責同志均提出反對，他們認爲赤衛隊只能暫時在資興、酃縣、永興等縣地區打游擊，策應紅四軍作戰，將來一有機會即須返回原籍各縣游擊，

以領導工農鬥爭。宜章的獨立營及赤衛隊只願意編入廿九團。水口山工人武裝即願意加入廿八團，各縣負責人並强調：若前敵委員會强迫改編，則必招致不良後果。毛澤東當時垂頭喪氣，一言不發。朱德是精兵主義者，他倒同意各縣負責人的意見。我對原案本來就不同意，我覺得赤衛隊必須保留，分路游擊，以發動羣衆鬥爭，因而提出：耒陽、郴州兩縣赤衛隊可各自整編爲一個獨立營，宜章獨立營歸併廿九團第一營，因廿九團第一營戰鬥損失較大，亟須補充，宜章赤衛隊除保留一個中隊以掩護宜章眷屬外，分別補充二、三營，水口山工人武裝交廿八團由王團長編配。

毛澤東雖很不滿意，但又不能强迫改編，他乃起來說：「這次改編可照各位的意見進行，但各位須要明白，我們是革命者，紅四軍是現時中國主要革命武裝隊伍，應以加入紅四軍爲榮，你們部份同志的反對意見，完全是農民意識，地方主義在作祟，此後必須要糾正。」

他的話講完後大家也就散會。

是晚前敵委員會再開了一次會議，討論整編的具體辦法。

毛澤東首先報告，他說：今天我徵得朱喬生同志的同意，水口山工人武裝願意與工農軍第一師合編，請各位就各方意見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朱德宣佈：耒陽赤衛隊約有一百人自願加入廿八團，此外可照今天上午的會議整編。

當時決定的具體辦法如下：

關於部隊編配辦法：

（一）廿八團由耒陽及各縣自動參加的赤衛隊補充

（二）廿九團由宜章獨立營與該團第一營合併。

（三）工農軍第一師改編爲卅一團，並將王佐、袁文才兩部及水口山工人武裝併編。

（四）宜章赤衛隊，除編一個宜章縣獨立中隊，負責掩護宜章縣老弱眷屬外，其餘補充廿九團第二、三營及團直屬部隊。

（五）郴、耒兩縣其餘赤衛隊，由各該縣黨政負責人整編爲獨立營，以利游擊作戰。

（六）另成立一個軍士教導隊，由各團及各縣選送優秀分子，以造就初級軍事幹部。

關於人事決定：

（一）紅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

（二）廿八團團長王爾琢，黨代表陳毅
（三）廿九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
（四）卅一團團長伍仲豪，黨代表何挺穎

以上整編計劃，立即實施，並限一天完成。廿九團整編後的人數達二千人，士兵成份除少數是廣東樂昌籍外，百份之九十八是宜章工農分子，充滿散漫的自由主義的作風，幸連長以上的軍官，大多數是黃埔軍校及湖南講武堂出身，亦多為宜章籍，對於管理與教育方面，他們努力逐漸推行，官兵關係尚稱融洽。

紅四軍既已編組完成，今後的戰略和戰術問題，必須加以研究，以適應今後的作戰環境，曾由前敵委員會召集了一次擴大會議，各團、營長及黨代表均出席參加。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一個戰略性的報告。闡述了當前革命鬥爭的形勢：「中國革命自南昌暴動、廣州暴動失敗後，整個中國已由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所控制，但爭奪中國這個殖民地的不是一個帝國主義，而是有很多個帝國主義，他們各自嗾使他們的走狗——軍閥去爭奪地盤，以擴張他們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因而中國的軍閥就不斷的在混戰中，此起彼落，永無間斷；這樣就給我們的革命力量有創建割據地及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但軍閥的內戰有時會停止，有時又會緊張；我們也就必須要有正確的政略和戰略，方能達到生

存和發展的目的」。

接着他又說：「現階段的革命，主要是軍事鬥爭，沒有軍事的勝利，就沒有政權的存在，但在經常情形下，敵人的軍隊數倍或數十倍於我們，我們以極小的軍隊力量和龐大的軍隊力量作戰，要有另一套作戰的戰略和戰術方能戰勝敵人。於是他就提出原則性的意見來請各人討論。

（一）我們隨時隨地都要發動羣衆，武裝羣衆，配合紅軍作戰，使戰爭的性質成爲人民戰爭。

（二）我們在有敵情顧慮時，須集結兵力，準備於敵人進攻時，擇其弱點，實行主動的進攻，以速戰速決的方法消滅敵人。這可以稱爲：戰略持久戰，戰術速決戰。

（三）如敵人的兵力過大，我們沒有戰勝把握時，以旋磨打圈的戰術，與敵週旋，他去東我去西，選擇其弱點打擊之，或擾亂其後方。

（四）敵軍內鬨，敵情不緊張，我們的紅軍就分散開來做羣衆的工作，波浪式的擴大我們這個以井岡山爲中心的根據地，進而推及一省而至完成建立全國的革命政權」。

接着是朱德發表意見。他說他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我們的革命事業準備長時間的進

行，所以我們就要與敵人進行持久戰，但與敵人作戰時，要以最堅決的行動迅速解決敵人，使敵人增援不及，所以稱爲速決戰。我們以少數兵力，劣勢裝備和人數衆多裝備優良的敵人作戰，要採用游擊戰來配合運動戰、游擊戰術，他提出以下各點：

（一）**敵進我退**：當敵軍向我進攻時，其兵力必多倍於我，且其銳氣正盛，我軍應主動撤退，保存實力，待機轉移攻勢。

（二）**敵退我追**：敵軍撤退時，其銳氣已減，我軍應主動追擊，相機消滅其一部份兵力，打擊其士氣，積小勝爲大勝。

（三）**敵駐我擾**：敵軍宿營時，我軍即以小部隊於夜間輪迴襲擊敵人，使敵軍無休息之時間，以疲憊敵人，造成對我有利之形勢。

（四）**敵疲我打**：當敵軍陷入疲憊狀態，我軍有可乘之機，應即集中兵力，主動進攻，以殲滅敵人。

以上四項游擊戰術十六字訣，若能靈活運用，可以制敵致勝。在作戰中我們還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們的械彈補充，要取之於敵人，無論在任何環境作戰，不能浪費一顆子彈，丟掉一桿槍。爲了保證這項要求切實執行，朱德主張每班步兵配兩名梭標手，既可用梭標衝鋒肉搏，以補救我們刺刀之不足，又可奪取敵人的槍彈以武裝自己，並且要奪取更多的槍彈武裝

人民。

我覺得朱毛兩人所提出的戰畧戰術理論，都非常正確，甚感快慰。我又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和理想，提出了二點補充意見：

（一）猛打猛追：我軍於進攻敵人，投入戰鬥時，必須立即以勇猛堅決的精神，施行衝鋒，發揮最高的威力以壓倒敵人，迅速解決戰鬥；敵人退卻時，必須絕無猶疑的猛烈追擊（包括戰場內與戰場外），使敵人無喘息的機會，一鼓而殲滅之。

（二）飄忽無常：我軍爲求得主動，無論進攻敵人或避開敵人進攻，均須行蹤飄忽，出敵意表，乘敵之虛，避敵之實，處處尋敵弱點，而施以堅强之攻擊，以短促之時間解決戰鬥，旋即迅速撤退，以保障已得的勝利。要能做到飄忽無常，必須經常明瞭敵情（番號、數量、裝備、動態、主官姓名及其特性），根據敵情來决定自己的行動與計劃，並要使自己的行動計劃，能絕對機密和迅速，這是最重要的先决條件。

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和闡述之後，會議便告結束。紅軍的戰畧戰術，從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則。

紅四軍自成立後，一直都忙於作戰及羣衆工作，對於黨的組織未加整理，過去廿八團只有一個黨支部，由陳毅任書記，廿九團在宜章時成立一個支部，由我任書記，黨員只有三十八人，整編後，自應從新調整。至於黨代表制度，只有團級有黨代表，其餘營、連均付缺如。爲了加強軍中黨的領導工作，前敵委員會特爲此召開了一次會議，出席有：毛澤東、朱德、陳毅、王爾琢、何挺穎、龔楚。

開會時，毛澤東指出：廿八、廿九兩團黨的組織太不健全，黨代表制度，亦未眞正建立起來，爲了加強黨在紅軍中的領導，必須健全黨的組織及建立黨代表制度，方能負起今後的鬥爭任務。毛澤東報告後，便由各人報告各部黨的組織情況。陳毅報告廿八團的黨務，廿八團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於上猶縣鵝形時已組織了一個支部，黨員有八十餘人，幾個月來雖有新來的同志，但亦有戰鬥死亡，現在約有九十餘人，正準備成立團的黨部，但因工作太忙，尚未實施。

龔楚報告廿九團黨的組織狀況，廿九團支部在今年二月初旬成立於宜章，當時只有黨員十六人。近三個月來部隊不斷的擴大，宜章青年團支部書記胡世健同志等十八人參加了紅軍後，均已轉爲正式黨員，胡少海團長亦已在宜章時正式加入黨，現在全團黨員有三十八人，尚有新參加的地方同志還未登記，正在準備辦理及調查中。對於黨的組織生活，仍能利用時

間開小組會議，約半個月舉行一次，支部黨員大會則久未舉行

何挺穎報告三十一團黨務，略云：卅一團原有黨員百多人，現在新加入的水口山工人亦衛隊黨員人數，尚待調查登記。但在改編前已有師黨委，各連亦有支部，黨的生活亦頗正常

各團黨代表報告後，朱德便起立講話，他的態度非常嚴肅，略謂：過去我們天天只顧打仗，忽視了黨務工作，這是我們過去最大的缺點，今後負責黨務工作的同志，必須特別注意，飯可以不吃，黨務不能放棄，我們幹革命，全靠黨的領導，黨的工作不好，革命就沒有成功的希望，今後我們應該怎樣做，請毛澤東同志提出具體意見，我們照辦就是。

毛澤東接着就提出以下的具體意見。

甲、關於黨的組織問題：

(一)連成立支部，由連黨代表兼任支部書記。

(二)營部成立特別小組，直接受團黨委領導。

(三)團成立團部黨委，由團黨代表任書記。

(四)軍成立軍黨委，由陳毅同志代理書記

乙、關於黨代表問題：

（一）連設連黨代表。

（二）營暫不設黨代表。

（三）團設團黨代表。

（四）軍設軍黨代表。

各級黨代表的職權：監督軍事主管官一切行爲，並領導黨的一切工作及貫澈黨的一切主張。

毛澤東報告後，大家都對他的建議，並無異議的一致通過了。

會議結束後，紅軍初期黨在軍中的代表制度，便照此實施。

紅軍官兵的任務，首先要談的是紅四軍士兵的成份質素。第廿八團大部份是葉挺廿四師的士兵，這部份士兵雖是職業軍人，但多數是武漢工農份子參軍，另一部份是國軍許克祥的俘虜及湖南農民。第廿九團的士兵是宜章農民，第卅一團的士兵是武漢警備團的士兵及湘東的農民。一般來說：他們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但革命精神甚佳。

過去士兵的工作，是受訓和作戰，但這時就不同了，他們除了作戰和受訓之外，還要去發動羣衆，組織羣衆，指導羣衆怎樣分田地，怎樣組織工會、農會，怎樣建立蘇維埃政權，怎樣組織工農赤衛隊，甚至負責訓練他們怎樣作戰，怎樣對付白軍（國民黨隊統被稱爲白

軍），怎樣偵察敵情，怎樣與紅軍連絡等等工作。

這一連串的新任務，大多數士兵都樂意去做。為了使士兵能夠負起這些繁重而複雜的任務，我們發動識字運動，並進行羣眾工作的訓練。

識字運動實施的方法，是每連選出文化水平較高的士兵一人至三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分班教育，但當時缺乏紙筆，我們便用樹枝燒成炭條（柳枝最好用）在地上寫字，或用柴枝在沙土上寫字，解決了缺乏紙筆的困難，亦逐漸的提高了士兵的文化水平。同時講解接近羣眾的方法和方式，使士兵認識軍民合作的重要性。

對於官佐的教育，我們經常開討論會，分別擬定軍事、政治、羣眾工作等各項問題，於晚間進行討論，以提高他們的知識水準。

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學會了各種工作和宣傳方法，於是他們不僅是上佳的戰鬥員，而且是堅強的羣眾工作隊、宣傳隊。

廿九團的官兵在羣眾工作上，成績很好，因為他們全是經過組織鬥爭的工農會員，對於學習羣眾工作駕輕就熟。我記得我們在蓮花、酃縣各地的時候，以十天至半個月的時間便將廣大地區的羣眾工作做好，特別有一次在酃縣到郴州的路上，為了爭取一家農民為交通站的事。因為那個地點只有三家人，又在大路邊，地點適中，那時我們在十都，我派了一個連在

附近工作了四天，要他們完成這個任務。開始的時候是發動農民分土豪的穀米財物，但他們不敢。我們派士兵挑了一百斤穀子及豬肉送給一家人家，他們也不敢要。正在毫無辦法的時候，一個士兵同志便向連的黨代表彭嚴說：這家農民有男女六口人，家裏很窮，他們不肯收穀子的原因，一定是怕人家知道，將來會受土豪的追究，不如待我在夜間送上，相信他們會接受。

彭黨代表同意他的計劃，便派了一班士兵於深夜送了二百斤穀及廿斤豬肉給這家農民，果然那家人很歡喜的接受了。經過了他們的宣傳和教育後，這家農民後來便成了我們很好的交通站。報告敵情和送信，又快捷又確實。

在幹部方面的例子：廿九團的一個連長陳光，他原是宜章獨立營的連長，並非軍校出身，文化程度很低，但由於他作戰勇敢，勤於學習，勇於任事，所以該營編入廿九團後，仍給他充當連長，以後他在中央蘇區紅軍突圍前已升任十五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已升至兵團司令員。似這種例子很多，足以證明紅軍官兵的教育和訓練工作十分成功。

紅軍官兵所擔負的任務雖然艱巨，可是他們擔負的任務越多，進步即越快，因爲這刺激起官兵的進取心和向上心，使他們永遠不甘居後。

紅軍的待遇，在湘南時官兵平等，每月一律發十二個銀洋，糧食全部購買，士兵的生活

過得很好，他們每月發餉後，多能送幾個大洋給家人。當時三個大洋可買一百斤糙米，因此農民都喜歡參軍。我們的經費是由廣東出發入湘時，帶來一筆范石生發給的現金，經過仁化縣城又籌了幾千元，在坪石消滅許克祥部之役，擄獲更豐，足敷支持五個月的經費。

退出湘南，進入寧岡山區以後，官兵多了一倍（包括三十一團），存款已將用罄，如何補給便成爲當時嚴重的問題。

前敵委員會曾爲此開了一次會議。決定全部糧食由沒收富戶存糧補給，每日每人發給五分菜錢（每月一元五角），另每月每人發給零用錢二元。又爲長遠之計，規定紅軍勢力所控制的地區，分了田的農民按每年生產收穫糧食總額的百份之十五繳納爲軍糧。各部隊分散工作打土豪所搜獲的現金及豪紳地主的罰金，一概繳交軍部統籌辦理（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後便依此而行）。

這個辦法決定後，通令各級黨委，發動全體黨員在羣衆中起領導作用，並向非黨員解釋，然後由各級主管官及黨代表向官兵宣佈，由六月份起開始照新規定待遇實施。官兵的反應初期尚有小部份認爲待遇太薄，表示不滿，但經過短時間後，也就無怨言了。

官兵的伙食由士兵自己輪流派人採辦，每逢到白區打土豪時，他們就可將伙食費節省下來，因此，每月的伙食費便有剩餘可分，這樣他們就可以有較多的零用錢 當時的物價低

廉，一角錢可買半斤豬肉，或十二個鷄蛋，他們的營養並不算壞，與一般農民比較生活還好得多，待遇雖薄，他們亦感滿意。

官兵開小差（逃兵）的現象幾乎沒有，除了有些農民思家觀念太重，請求離隊回家之外，沒有私自逃跑的事情。

服裝的補充較爲困難，多數士兵都穿着普通的工農服裝，有時在打土豪時遇有適用而又需要補充時，他們就向黨代表要求發給，這樣，也暫時解決了一部份衣服問題。

這是我離開紅四軍之前的情形。在我離開之後，朱毛對於軍服的補給，即逐漸改善，但零用錢就每月只發一元。

紅軍的給養儘管有困難，待遇菲薄，但並不影響戰鬥意志，因爲有黨的組織監視，同時又怕被白軍捉去殺頭，回家又怕被豪紳地主報復，故生活雖艱苦，亦只有繼續堅持下去。

紅軍中最突出的措施，是在軍隊中推行民主制度。它的內容：待遇平等，經濟公開，廢除軍閥制度打罵作風，推行自動自覺精神遵守紀律，以生活檢討、工作檢討，來糾正個人的錯誤及表揚個人的成績，用教育方法來推動工作的積極性和生活的紀律化。

檢討會大約是每個星期舉行一次，每次作戰後亦必開檢討會。這種檢討會，由全體官兵混合分組舉行，士兵在檢討會上可以批評，檢討每一個士兵，而且可以批評和檢討每一個官

長，受批評者得申述理由，經過檢討以定其情節輕重，由連長、黨代表予以適當的處分。處分的方法：有勸告、警告、做苦工等，犯錯誤嚴重者，呈報上級處置。

這就是所謂軍隊民主的內容。

士兵委員會，是爲了實現軍隊民主而組成，以連爲單位，由全體士兵大會選出五人至七人爲委員，組成委員會。任務是推行民主制度，監督連內日常生活事務；如採購伙食、管理公共衞生、稽核連內經費開支及監察官兵生活實況……等，以保障民主制度之實施。

自軍隊民主推行以後，紅軍內部發生了很多問題，主要的是：連以下幹部及士兵對上級發佈的命令，常常不切實執行，甚至發生反抗事件，他們要求上級一切行政措施，甚至軍事決策均須以「民主集權制」由下而上的經過討論決定，然後再交由上級頒佈及監督施行。

在待遇平等的口號下，他們批評朱、毛及部份上級負責同志，吃好、穿好。他們並反對官長騎馬，認爲這絕不平等，爲了諸如此類的大小事情，經常鬧情緒。

毛澤東爲了上述事件，曾經在黨內展開反極端民主主義及反對平均主義的鬥爭。以後情況雖有改善，但仍不免常有不愉快的事件。

待至一九三零年以後，士兵委員會的組織就取銷了。但戰後討論會及生活檢討會，學習檢討會，即在閩贛蘇區時期仍有舉行，這兩種會議對於作戰經驗的獲益和生活學習，均有幫

助，發揮過極大的作用。

第三章　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成立

羅霄山，北自湖北南部之九宮山，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南至廣東邊境之諸廣山，由北至南綿延八百餘里；井岡山為羅霄山脈之中段。地形最為險要而複雜，在軍事上，易守難攻，利於東西轉移作戰，而不易包圍。毛澤東選擇此地為武裝鬥爭的軍事根據地，的確是很適合的。

自朱、毛兩部軍隊會合後，軍事實力加强了很多，野心勃勃的毛澤東，自然要把握這一個良好機會，建立這個以井岡山為中心的蘇維埃政府，以加强他對內的領導和對外的號召。

根據毛澤東對於選擇羅霄山脈中段建立政權的理由有以下各點：

（一）有經營了一年多的民衆基礎。

（二）黨有組織相當穩固。

（三）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創造了富有鬥爭經驗的地方武裝，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個地方武裝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是任憑什麼敵人也不能消滅的。

（四）有很好的根據地　井岡山；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則各縣都有。

（五）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湘贛）下游各地，比較湘南、贛南只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偏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

中段的缺點，是因割據地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

五月下旬，湖南省委曾派袁德生來寧岡，他亦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計劃（毛澤東說的）。

【參「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八十一至八十二頁「割據地問題」。】

我在寧岡礱市住了幾天，紅四軍整編完竣之後，因敵情不緊張，即率領廿九團開赴酃縣，以連為單位，分散於十都地區做羣衆工作，團部駐於十都。在這期間，毛澤東曾召集寧岡、遂川、永新、酃縣等縣區蘇維埃政府代表及紅四軍士兵代表，在寧岡縣舉行了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委員及主席，毛澤東就在這次大會被選為主席。

從此，毛司令就變為毛主席了。待至一九三一年後，閩贛邊區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也就順理成章的充當了主席。以後中共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的權力有時雖曾遭到嚴重打擊，但公開的地位始終沒有動搖過。我可以說：毛澤東的地位是奠基於以井崗山為根據地的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主席之時。也可以說他的興起是從這一個主席職位為起點的。由此可知，毛澤東當日為什麽要成立這個山上蘇維埃政權了。

我還有點說明：中國紅軍前敵委員會，自五月下旬軍隊分散以後，就沒有開過會，一切決策均由毛澤東以紅四軍黨委會、邊區特委、地方縣黨委書記等聯席會議的名義處理一切問題，實際上他此時已集大權於一身了。遇有軍事問題，他只和朱德、陳毅談談，便由軍部發佈命令，他的獨裁作風，從那時起已充份表露出來了。

朱德在當時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軍隊轉移，我和他見面，他對我說：毛澤東同志對我們總有點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動時才通知我，使我連研究和考慮的時間都沒有，現在各縣送來的情報都先經過他，眞是有點麻煩；本來他個人要獨裁，我沒問題，事情總要有點時間準備才成。他的表情已表現出對毛極爲不滿。我問他：陳毅同志是軍的黨委書記，毛澤東的聯席會議，他總有份參加的，難道他沒有對你說嗎？朱德說：或者他有時也不知道吧！我聽到這種情形，已明白朱、毛之間的感情已極不融洽了。

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目的，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亦以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爲號召。中共當時的革命政策，主要是沒收地主土地給農民，以發動農民鬥爭。一九二七年的「八七」緊急會議及十一月的擴大會議的決議，均明確的決定實行土地革命。但沒收土地與分配土地的實行辦法，則從未有具體的實施方案，致我們實施的時候，感到非常困難，在湘南農民暴動時期，我亦無法定出一個指導原則，只得由各縣蘇維埃政府自己去做，

結果沒有貫徹這一個當時主要的革命任務 當我們紅軍在寧岡縣城集中整編，檢討湘南鬥爭工作時，曾爲這問題，批評我們沒有徹底實行土地革命，是湘南鬥爭工作的最大缺點。至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成立時，毛澤東就定出了一個沒收一切土地分給農民的實施辦法如下：

（一）以村爲單位，平均分配土地。

（二）由村蘇維埃政府召集全村農民開會，與報各人所耕的田畝數量與質量（分上中下三級），會後各人同去自行在每坵田上插竹簽一條，書明畝數。

（三）調査人員將全村總人口和田地數量，加以統計。

（四）根據各戶所報人口與田地數量，決定每戶應得各級土地之總數。

（五）由村政府準備編號之竹簽，帶同人民到田間插簽分配。

（六）人民既分得田地，須儘可能將舊有田基剷去，但因高低關係，不能剷去者，須保留舊田基。

（七）既分得田地之後，如發現有不均的現象，得請求政府再行調整。

（八）農民分田後，僅向蘇維埃政府納稅，不另繳付田租。

（九）田稅由各地方政府按實際情形決定徵收，以最高不超過總收入百份之二十爲原

則。

（十）土豪劣紳不准分田。

上述實施辦法頒佈後，我們的工作進行就有所依據了。我們當時正在十都工作，毛澤東曾親自來指導我們實施。

毛澤東來到十都，眼見我們宣章參軍的十多個女同志，有的正在田裏指導農民分田，有的在團部抄寫文件，他非常高興，一時忘形，笑對我說：「你天天和她們在一起，眞是艷福不淺！你有特殊的感想和艷遇嗎？」我說：「這都是革命同志，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對男女間的情愛是不感興趣的。」他搶着說：「你的年紀比我還輕，我見了尚且動心，難道你無動於中嗎？我不相信，哈哈！」他神秘的微笑着，看來他已有寂寞之感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於一個月後，就在永新縣和賀士珍女同志結合了。

毛澤東自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即被派赴湖南擔任中共湖南區委書記，他在中共黨內算是早期少數人物之一，在湖南來說，他是湖南中共的創辦人。他在中共未成立之前，肄業於長沙第一師範時（一九一七年）便組織「新民學會」領導學生鬥爭，一九一九年七月又主辦「湘江評論」宣傳反帝、反軍閥，研究社會問題，宣傳馬克斯主義學說。一九二零年十月，開始在湖南組織青年團，而且在國共合作期間，湖南的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

亦是他所領導，以他的革命鬥爭歷史來說，應該是極受湖南共黨同志所愛戴，才是正常的現象，可是事實並不如此，而且剛剛相反。原因何在？爲了解答這個疑難問題，我首先追溯兩件事：

一、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漢時期，因湖南農民不顧中共中央的指示，殺死李立三父親的事。那時武漢的中上層黨內同志，人人都知道。我曾就此事詢問過湖南籍的陳東日同志，據他說：李立三與毛澤東的宿怨，早在一九一七年，毛澤東籌組「新民學會」時，曾登報徵求學生會員，李立三見報後即按址前往查詢新民學會的入會手續，當時毛澤東親自接見，在談話時毛澤東非常傲岸，儼然以一個領導者自居，李立三那時又是個血氣方剛自命不凡的青年，對於毛的說話態度大爲不滿，遂不歡而散。後來李立三參加中共後，被黨中央派到湖南做工運，寃家路窄，毛澤東又適任湖南區黨委書記，處處受制於毛，李立三曾屢次報告中央指出毛的錯誤，於是更加深了雙方的惡感。此次李立三的父親被殺之事，當然是毛澤東向李立三的一種報復。他還說：我們湖南的同志，除了幾個老毛的死黨外，都對他不滿。此次國共關係由惡化走向分裂局面，亦與毛澤東領導湖南農運過火有很大關係。

二、一九二七年五月，我率農軍到湘南，因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逗留在耒陽時，湘南特委書記夏民正亦曾對我說：湘中、湘東的農民運動，事實是有點過火，農會以窮兇極惡

的手段對待軍官家屬，致使軍人反感。許克祥這次行動，全因軍人反感而向共產黨和工農會反擊，造成這次惡果，毛澤東應負責任，我問他：毛澤東的爲人如何？夏正民說：毛澤東的聰明才智，倒是不亞於三國時代的魏武帝曹操，但他是唯我主義，且缺乏人情，卻沒有曹操能知人善用及有容人之量的襟懷。

上述兩點，是我從湖南的同志中得到對他的批評。至於他當時和湖南省委的爭辯，即有以下幾件事實：

一、當毛澤東於一九二七年十月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同時，並組織了工農革命前敵委員會，他自己兼任書記，他所到的地方，就以前敵委員會名義指揮地方黨部，如湖南各地區特委及各縣縣委等。各地特委以其越權指揮，干涉地方黨務等專橫作風，表示極之不滿，便將他領導上的各種錯誤事實，如拋棄羣衆，逃跑主義，專攬武力，干涉地方黨務，破壞組織領導，毫無組織觀念等等罪名，呈報湖南省委，轉報黨中央當局；致中央向他提出三次嚴重警告，促他立即糾正錯誤。卒於一九二八年三月，黨中央明令將他自組的前敵委員會取銷。

二、湖南省委主張他除以少數地方赤衛隊留守井崗山外，主力應到湘東領導工農鬥爭，並創造湘、鄂、贛邊區根據地。但，毛澤東以湘、鄂、贛邊區之地形不如井崗山，當地反動

力量又比羅霄山脈中段附近地區之反動力量爲大，且在政治影響上，湘、鄂、贛邊區亦不如羅霄山脈中段，可影響湘贛兩省爲大……等理由駁斥湖南省委。

三、湖南省委派楊開明到寧岡建立邊區特委，毛澤東即把持着他一手組織的永新、寧岡縣委及酃縣、遂川之地方黨，不與楊合作，致使楊開明無法展開工作，迫得跑回湖南省委，毛即自組邊區特委，自兼書記職務，後來爲了敷衍省委，才由楊開明代理特委書記，但毛仍在幕後操縱，於是湖南省委就罵毛澤東爲新軍閥。並支持耒陽、郴州赤衞隊脫離毛澤東掌握，只繼續保持與朱德紅軍的聯系和配合紅軍作戰。

這都是反毛內鬨的情形，僅記其犖犖大者，而且都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前所發生的事。但他們相互間的指責仍不休止，而且還繼續發展下去，沒有了結。

我在當時看此情形，爲革命的前途擔憂，對毛澤東這種作風，亦感到有點失望。

第四章　國軍第一次圍剿井崗山

我們廿九團自五月下旬開到酃縣十都地區，羣衆工作已順利完成，十都的蘇維埃區政府亦已相繼成立，赤衛隊亦編成了一個中隊。時間大約是六月二十日的中午，突接到軍部十萬火急的命令，以敵情緊急，立即全部開回寧岡縣城集中，並轉飭赤衛隊立即由酃縣南區撤回酃縣東北之沔渡駐守，向茶陵、酃縣方面游擊警戒。

我們奉命後，立即率領部隊星夜行軍，於次日中午到達寧岡縣城，我即與胡少海團長到軍部請示。

朱德對我們說：安仁有敵軍十一個師，正向酃縣推進中。昨晚八時，又接到永新方面的情報：江西敵軍金漢鼎部楊池生、楊如軒兩個師，集中永新，正在拉伕準備進攻井崗山。根據這兩方面的情報判斷，湘贛兩省敵軍有會攻井崗山的企圖。昨晚，前敵委員會曾召開了一次會議，決定：對江西永新方面取攻勢，對湖南方面取守勢。部署如下：

（一）廿八、廿九兩團由朱德指揮，佔領新老七級嶺，迎擊由永新向新老七級嶺進攻之敵，把握時機殲滅之。

（二）三十一團由毛澤東指揮，主力固守井崗山，以一部進出寧岡縣城，對湖南方面嚴密警戒。
（三）耒陽、郴州赤衛隊，分向酃縣、茶陵游擊，以迷惑敵人，如敵向寧岡進攻時，須配合卅一團阻滯敵軍前進，掩護七級嶺方面主力作戰。
（四）我們這兩個團的任務：以廿八團爲左翼佔領老七級嶺，廿九團爲右翼，佔領新七級嶺。
（五）我（朱德）隨廿八團行進，指揮老七級嶺方面作戰（林彪當時是該團第一營第三連連長）。龔楚同志隨廿九團行動，指揮新七級嶺方面作戰。
朱德說完後立即給了一份井崗山附近複印的五萬分一地圖給我，並告訴我：今天黃昏前就要出發，務須於明（廿二日）拂曉前佔領新七級嶺主要陣地，若萬一作戰不利時，可向黃坳方面撤退。
我和團長胡少海同志率領着廿九團於下午六時出發，那晚下着毛毛細雨，山路崎嶇，步履難行，到達最高山坳時已是早上七時，我廿八團第一營的尖兵連，已佔領兩翼高地，發現敵軍相距僅四百碼，正在搜索前進中，我即登左側高地觀察敵情，敵軍亦發現我軍佔領了有利地形，亦立即停止前進，亦佔領路側高地，掩護其後續部隊集結，敵我兩方陣地之間是一

段山巒小路，兩則傾斜急峻，兩方陣地的正面，面積不到五十碼，兵力無法展開，且全段前進路綫，暴露在我軍陣地火力瞰射之下，地形對我軍十分有利。

我向老七級嶺方面觀察，發現一大片叢林茂密的低窪山地，相距約有十里之遙，無法相互連絡，正當我拿着望遠鏡觀察戰場的時候，敵人的重機槍就密集向我陣地射擊，我的一個司號長蘇世安，當場被擊斃，倒下來了！我方的兩挺重機亦已佔領了左側高地，向敵陣地掃射。步炮連亦佔領了稍後的一個小高地準備射擊。經過了約十分鐘，我方已停止射擊，隨即發現敵軍約一個連，陸續向我陣地躍進，我機槍連待敵進至約二百五十碼時，即向敵密集射擊，迫擊炮同時向敵陣地轟擊，敵軍進退不能，傷亡無數，我第二連連長蕭克，即率領該連在機槍掩護下向敵前進，擬將中途之敵全部消滅後，奪取敵軍機槍陣地，不幸在前進約五十碼時，蕭連長腿部受傷，乃迅即退回，立即把他送到後方療治。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敵軍連續向我陣地衝鋒，我軍沉着應戰，待敵接近，即行射擊，敵軍未至中途便死亡殆盡，無法得逞，死傷之敵軍多數是滾落山坑，雖傷亦必死了。四時後，敵軍已停止進攻，雙方射擊戰亦停止下來。那時，老七級嶺方面隱約傳來密密的炮聲，已知那邊已在激烈戰鬥中，而我們前面敵軍亦因傷亡重大，不敢再向我方進攻，遂決以一個營準備連續向敵反攻，當即下令第二營李營長，以該營擔任攻擊，約於下午四時卅分開始向敵進行堅强的反攻，並發揮機、炮

火力向敵射擊，戰鬥不到三十分鐘，敵軍即狼狽向龍源口潰退，我軍跟蹤猛追，山路幾為敵屍所塞。

黃昏前，我軍即佔領龍源口。胡團長仍率二、三兩營繼續跟蹤敵軍，向永新方面追擊。第二連黨代表彭晒向我報告：「我下山時發現敵軍約四、五百人正在龍源口東南方不遠的山地收容集結。」當時我只掌握有第二連一個連的兵力。除留一班士兵在原地駐守外，其餘全部由我率領，冒險向東南山地搜索。果然在龍源口外約千碼的山谷中，發現有國軍兩個營的殘部，正在收容集結。我立即命令各班沿山頂散開，並親率一個班和携同僅有的一挺輕機槍，下山去喝令國軍繳械。散開在山頂的士兵也同時大喊：「同志們！繳槍！」繳槍聲，山鳴谷應，響徹雲霄！疲憊的國軍，不明我軍實力，只好集中架槍，不加抵抗，舉手投降。隨連的黨代表彭晒帶着一班士兵，立即衝上，先對國軍步槍機柄除去，裝在伙食籮挑走，隨即命令俘虜將槍枝綑紮，背負上山。我即將第二連官兵集合，押着俘虜四百九十二人，和戰利品步槍三百餘枝，重機槍兩挺，返回龍源口。俘虜們看見我們只有一百多人，全都後悔莫及。

翌日，我軍已佔領永新縣城。

是役，廿九團負傷官兵，計有第二連連長蕭克等共七十餘人，陣亡官兵三十餘人。敵軍

傷亡枕籍，山上那條隘路，遍地屍骸。戰鬥時要踏着屍體前進，戰鬥的激烈情形，可以想見。廿九團此役戰果，繳獲步槍四百餘枝，俘國軍五百餘人。廿八團亦斬獲甚多。

這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農曆五月初五日）的事。也是湘贛國軍第一次會剿井岡山的慘重失敗。

紅軍經過這一次勝利，又得到了械彈的補充，軍中以俚語湊成一聯：「紅軍不費三分力，吃掉江西兩隻羊。」蓋楊與羊同音也。

我軍於佔領永新縣後，地方黨和羣衆工作幹部，跟着就進城展開羣衆運動。

據地方黨的同志報告：金漢鼎的殘部不到一千人，已向安福方面逃竄，蓮花縣城僅有國軍一個團駐守。又接毛澤東的通知：湖南國軍方面，進佔酃縣後，停留觀望，不敢向寧岡進攻等語。我軍以發展蘇區爲目的，決以廿八團進攻安福（結果因安福國軍勢大，遂停留在永新、安福之間開展羣衆工作），廿九團進攻蓮花，軍部留駐永新縣城，並請毛澤東即來永新縣城領導羣衆工作。

我廿九團奉命後，即將俘虜交與軍部處理，於廿四日拂曉，向蓮花挺進，敵軍聞風逃去，我軍即於廿五日正午佔領蓮花縣城。

蓮花是贛西南的一個小縣，但地方富庶，它的北面是萍鄉，安源礦場即在萍鄉縣境之

內。那時湖南中共省委因長沙無法立足，亦潛伏於安源礦區之內（由省委住處至蓮花約一百里）。

我軍佔領蓮花展開羣衆工作後，湖南省委即派少共負責人朱汝湘來蓮花和我連絡，他來了，對地方工作確是幫助不少。因爲當時無敵情顧慮，便安心的以連爲單位，分散做羣衆工作，廿九團的女同志亦分赴各鄉訪問她們衡陽第三師範的同學，爭取她們參加革命工作，當時蓮花廳就有三位女生參加，羣衆工作進行得很順利。第一個星期即完成了城區及附近鄉村工作，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建立了工會、農會組織，熱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赤衛隊也編成了一百多人，他們收集了二十枝步槍，我們又發給他們二十枝步槍，接着我們就向較遠的區鄉擴展。但正在全縣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七月初旬），因金漢鼎部又集中了優勢兵力反攻永新，我們便奉命調回龍源口集中。

毛澤東是在我們佔領永新後的第三天（大約是六月廿五日），帶着三十一團的一個步兵連到達永新縣城的，永新縣蘇維埃政府就在他到達後第三天宣告成立。

永新縣有黨和青年團的組織，團的支部書記是永新中學女生賀士珍，有兄妹三人，哥哥賀敏學，曾畢業於永新中學，也是個共產黨員，妹妹賀怡，是青年團員，她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在永新縣城裏開有一間書店，生活很優裕，這時（一九二八年）賀士珍才十八歲，長

得嬌小玲瓏，活潑可愛，說話很有條理，加上她的清脆悅耳的聲音和一雙晶瑩的眼睛，一見即令人有甜蜜蜜之感。我們佔領永新的那天，下午五時，她率領了四個青年，帶了兩擔蔬菜和一擔豬肉，來慰勞紅軍，我曾和她見過一次面。

當我奉命由蓮花開回龍源口集中時，毛澤東住在離龍源口約五里的一個鄉村，指揮地方工作。我佈置了宿營後，便去找他，我到達他的住處時，適他外出未返，我便和他的隨從何同志談天，詢問永新的一般情況，何答覆了我所問的一切事情，並對我說：「龔同志！我告訴你一件事，毛主席已有一位漂亮的女同志啦，你知道嗎？」我聽了接着說：「那好極了！朱德同志有位蕭貴蓮女同志，現在毛同志又找到了一位革命愛侶，使他的精神得到安慰，生活得到調劑，對於領導革命事業，更加增强他的活力了。但不知是那一位女同志？」（當時我以爲是紅軍中的女政工同志）他便源源本本的告訴我：「毛主席連續接到你們擊潰了金漢鼎軍和佔領永新的消息，他喜歡極了。嗣後，又接到酃縣游擊隊的報告，進佔酃縣的湘軍已向安仁撤退。便於第二天帶着我們及一個連來永新，展開蘇維埃運動。我們住在永新縣政府內，地方的黨、團同志都來見毛主席，其中一位女同志賀士珍，漂亮而活潑，是團的支部書記，和主席談得很投機。那天晚上，她送了兩隻鷄，兩瓶酒給主席，主席留她一起吃晚飯，他倆談得更親密。第二天晚上，主席召開永新黨團會議，商討開展蘇維埃運動和發展團組

織……等問題，這位女同志發言最多，而且又有見解，至深夜十一時才散會。會後，主席請她稍候片刻，說有要事跟她談談，那晚賀同志單獨和主席在臥室裏談了很久。次日早餐後，賀同志又來了，整天陪着主席工作，晚上也沒有回去。第二天的早上九時才起床，平時他每天早上六時起床的。主席洗過臉後，喜氣洋洋，春風滿面的對我們說：『我和賀同志兩人愛上了，由同志的愛轉變爲夫婦的愛，這是我們革命鬥爭共同生活的起點。』那時賀同志站在主席的身傍，帶着羞人答答的笑容。」何同志說完了這段話，時間快要入夜，毛澤東尚未回來，我便不再候他，留下一個簡單的報告，並約定明晨再來面報，我就返回龍源口駐地。

翌晨八時，我再往訪毛澤東，他正坐着辦公，見我來了，馬上站起來和我握手：「龔同志，辛苦你了！昨天你來時適我不在家，今天正好，我們可詳細的談談。」說時笑容滿面。我們坐了下來，談過公事後，我笑着對他說：「毛同志，我們正事談完了，現在我要向你道喜了！」他哈哈笑道：「誰告訴你的？」我說：「這是我們革命陣營中的一件大喜事，誰不知道？但你應該請我吃喜酒，看新娘才對呀！」他笑着說：「那容易得很，可惜賀同志今天回南鄉看父母，今天早上弄多點菜，先請你吃飯，將來回寧岡時，再請你喝酒，好不好？」我笑着說：「那好極了！」他立即對隨從說：「弄多些菜來，請龔同志吃早飯。」

這就是毛賀結合的經過。在寂寞艱苦的革命鬥爭生活中，毛澤東得到這樣聰明活潑的女

同志做伴侶，他的歡愉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

關於毛澤東的婚姻問題，據我所知道的，他第一位妻子是他在家鄉讀書及協助父親種田時已娶了一位鄉下姑娘。後來他在長沙第一師範畢業時，曾和一位長沙女師畢業生陶淑蓉同居，並共同經營一間書店（文化書局），卒因志趣不同而分居。隨後一九二零年又和楊開慧結婚。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字懷中，是湖南名學者，曾在長沙第一師範任教，毛澤東是他的得意門生。後來又在北平大學任教授，逝世後，他的遺孀即攜兩子女返回長沙附近潘藏村家鄉居住，毛澤東是在次年便和楊開慧結婚，婚後曾生有子女三人。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上井崗山後，楊開慧仍住在長沙母家，直至一九三零年被湖南省府主席何鍵逮捕殺害。毛澤東和賀士珍結婚時，楊開慧仍尚在人間，住在長沙母家。

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權，自佔領永新、蓮花後是爲全盛時期，那時期，佔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縣的全部，酃縣的東南部，遂川的井崗山區及安福的一部。

國軍金漢鼎部反攻永新時，朱、毛因敵軍優勢，紅軍不打無把握之仗，決主動撤退。我到龍源口後就決定：三十一團除留王佐、袁文才部及遂川赤衞隊守井崗山外，其餘均調永新，配合永新地方赤衞隊作戰，並由毛澤東親自指揮。廿八、廿九兩團由朱德率領，轉移湖南酃縣方面活動，恢復及擴展酃縣方面革命羣衆組織，並擔任湖南方面警戒。

毛澤東這次的決策，引起了紅軍中的好事者，傳播很多新聞，主要的是說毛澤東冒險率三十一團留在永新不肯走，完全是因賀子珍不願上井岡山，在此新婚時期，毛澤東只好順從妻子的意見，暫留永新活動。

但是這次卻使毛澤東發揮了他的軍事天才，創作出「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他的辦法是：以紅軍部隊配合人民武裝，控制住永新縣城的外圍所有鄉村以包圍城市，不准一切物資及人民入城，以封鎖城市，並以紅軍之一部，進出於安福至永新之交通綫上，截擊國軍的運輸、通訊部隊，斷絕城內一切接濟和通訊。這樣，城內國軍即必須派部隊出城外鄉村採購糧食物品，國軍一出城外，即遭紅軍及赤衛隊伏擊，國軍不但不能購得食物，而且死傷不少，致使他們陷於困境，迫得唯有退出永新縣城，向安福撤退。當國軍撤退時，紅軍立即就集中較大的兵力啣尾追擊。國軍通過永新以北之天龍區（是羣衆組織較好的蘇區），又遭到小部紅軍配合地方赤衛隊沿途襲擊，致損失慘重。

這是當年七月間的事，也是毛澤東在軍事上最得意的一次傑作。

這種「鄉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畧，以後便成爲紅軍對付不能强攻的城市，而鄉村有羣衆基礎的地方所經常運用的戰畧。並且提出了「控制面」（控制鄉村）、「截斷綫」（截斷交通道路）、「包圍點」（包圍城市，孤立城市），然後相機奪取城市的戰畧計劃。

毛澤東這一戰畧，直至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都充份發揮了它的效能而獲得輝煌戰果。甚至現在有些其他國家的共黨亦採取這一戰畧進行國內革命戰爭。

第五章　紅軍主力襲擊郴州

紅軍佔領永新、蓮花之後，湖南省委即派袁德生、楊開明到永新和朱、毛會商，主張紅軍乘機越萍鄉北進湖南之平江、瀏陽、江西之銅鼓、修水一帶活動，創造湘、鄂、贛邊蘇區，以袁文才、王佐部及地方赤衛隊守井岡山。省委認爲：湘鄂贛邊區羣衆基礎極好，自秋收暴動後，雖然毛澤東已退出該區，但民衆仍在鬥爭中，紅軍若重返該地，在政治上的影響極大。可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省委這一指示。他認爲：羅霄山脈北段之湘、鄂、贛邊區的反動勢力很大，同時國內反動政權暫時穩定，對我們發動圍剿極易，而該地區的革命民衆武裝薄弱，絕不如以井岡山爲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地形險要而複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且附近各縣已有良好的革命組織和羣衆基礎，我們可以因應敵情，紅軍主力隨時轉移於湘贛兩省，選擇敵人之弱點而將之殲滅，在當前的形勢，只宜於鞏固井岡山的根據地，以求逐漸發展。

當時朱德對此發表意見。最後的決定：待永新、蓮花工作告一段落後，將紅軍主力轉移到酃縣方面，以監視安仁敵軍之動態。

我們於七月十三日到達酃縣。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朱汝湘，又來到酃縣軍部，立即召集了一次營長以上的幹部會議，據杜修經報告：省委根據中央指示：紅軍主力不應困處在井崗山，必須向外發展，既可分散國軍的目標，亦可隨地策動羣衆鬥爭及解決紅軍的經濟、給養等困難問題，目前的任務應以進取湘南各縣，恢復各縣革命鬥爭爲最正確之行動方針。我們曾先到永新和毛澤東同志詳談，但他不同意，因此特來和你們商討這一行動方針，請你們研究。

朱德當即發言，他說：「現在圍繞井崗山的附近地區已民窮財盡，就是白軍不來，我們也無法維持下去，遑論軍費無法籌措，就是軍服問題也難以解決，現在必須佔領較大的城市，方能解決我們目前的困難；省委指示進取湘南的計劃，在目前是可以行的，因爲現在湘南各縣只有范石生軍，分佈於耒陽、郴州、宜章各縣，范軍的情形我很瞭解，以我們現在兩個團的兵力，用急襲的方法，先行佔領郴州，將其截爲兩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顧，然後將之各個擊破，以我的判斷，是可以成功的。」

朱德這一席話，與會的團、營長無不贊同，特別是廿九團的營團長，更感高興。於是進取湘南的計劃就決定了。自然湖南省委杜修經等更是喜形於色。

翌日，毛澤東使專人送信來，他預料到我們必同意杜修經提出湖南省委的計劃，他認爲

絕不可行，希望我們幸勿冒險，致遭損失。但軍中各級軍事幹部均不以為意，堅決照既定計劃準備行動。

第二天，杜修經和朱汝湘到廿九團團部找我，他除了詳述毛澤東與省委之間極不融洽的情形之外，並告訴我兩件事：

（一）金漢鼎軍復佔永新後，張貼了很多國民政府的佈告：通緝朱、毛及龔楚，提到一個，賞金二萬元，擊斃一個賞金一萬元，通風報信賞五千元，你們要特別防範。

（二）湖南省委對龔楚在蓮花的工作，極為滿意，你們退出蓮花後，羣衆鬥爭仍未停止，尤其是西區鄉村幹得最好，我們由萍鄉南下，經過蓮花之西區至永新龍源口，均有羣衆組織，交通連絡極為方便。

最後，他諄囑我要好好的和朱德同志合作。我說：朱德同志是很忠實的革命同志，又是很好的軍事指揮官，我很信任他的領導，我們相處了七個月，從來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事。

攻郴州計劃決定後，朱德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敵意表，決先下桂東，威脅汝城，然後轉攻郴州。於是我們即率廿八、廿九兩團及郴州赤衛隊於十七日出發，十八日下桂東，十九日至沙田，廿日進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並派出一營向汝城游擊，廿二日由南洞出發，越過資興的龍溪十二洞，經東江，於廿四日下午二時進攻郴州。

郴州市區之東面有耒水，築有大石橋溝通兩岸，上游可徒步涉水而過。進攻部署，以廿九團從耒水上游涉水過河，進攻郴州之東南，廿八團從正面大石橋進攻東門。

我們這次進攻，駐郴州之范石生軍，因事前毫無所聞，所以亦毫無準備，紅軍如從天而降，我廿八團將到橋頭時，發覺橋頭之附近有范軍重機一連警戒，正欲向我軍射擊時，紅軍即以飛快動作衝過大石橋，敵軍措手不及，即遭我軍將之解決。旋即向市區進攻。我廿九團亦於同時向東南門進攻，戰鬥約兩小時，城內國軍官兵因知道是朱德部隊，大多數自動停止抵抗，其中有兩個連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請朱德親來繳械，城內戰事即告結束。

北門范軍兩個團卻向城內反攻，戰鬥甚劇烈，至黃昏時終將之擊潰，殘敵向北退卻。我廿九團進攻南門時，南門外國軍一部未經戰鬥，即向南面宜章方面逃竄，我第一營跟蹤追擊，是晚至萬歲橋停止，即駐該地對宜章方面警戒。

是役，我軍繳獲械彈甚多，俘敵七百餘人。

攻佔郴州後，我和朱德到十六軍軍部巡視，甫抵門外，即見范軍的副官長陳屍於門外血泊中。我回想到朱德與范石生結義情深，范待朱德甚厚，以前朱德在范部一四零團充任團長時，范曾奉命將朱德繳械，而范石生竟密函通知他離犁市自謀出路一事，可說是仁至義盡。今天反被朱德襲擊潰敗，可謂以怨報德。我想至此，頓感黯然。我打趣的對朱德說：「范軍

今次被我們打得大敗，你還記得在曲江犂市時的事嗎？」他很堅定的說道：「革命沒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階級立場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況是結義兄弟？」我聽了他所說的話，猶如潑了一盆冷水似的，不禁暗自打了一個寒噤。使我想起「捉曹操」一劇曹操說的：「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的那句話。

我軍佔領郴縣後，迅即清理勝利物資，維持市面秩序。廿八團仍向北追擊殘敵，由於連日晝夜行軍，官兵過於疲勞，只追擊了十餘里，便回縣城宿營，沒有貫澈「猛打猛追」的戰術，致使敗退的國軍得有喘息機會，在棲鳳渡收容集結，與高亭司增援部隊的兩個團會合，乘夜向郴縣反攻。紅軍因疲勞太甚，且在夜間敵情不明，遂棄城向東撤退。

我正在郴縣南門集合部隊時，國軍已攻陷北門入城，我急派員赴萬歲橋通知第一營向來路東江撤退。我亦率廿九團部隊渡過耒水東岸向雅茨坪撤退與廿八團會合。因退卻時太匆忙，所獲戰利品除子彈已分發各部補充外，其餘均無法搬運，而廿九團向宜章方面追擊的第一營朱舍我部，則因此次急速撤退之故而失卻了連絡。

這個營有步兵三個連及一個重機槍連，每個步兵連有士兵一百零八名、炊事兵十二名、運輸兵二名、連長一人、黨代表一人、政工幹部二人、排長三人、特務長一人、文書一人、特務員一人，共有官兵一百三十二人，裝備有：步槍一百零八枝，駁壳手槍四枝。重機連人

數與步兵連相同，有重機四挺、步槍四十五枝、駁殼手槍四枝。營部有營長（朱舍我）一人、副官一人、司書一人、通訊兵四人、政工幹部四人、炊事員二人、運輸兵二人。配有駁殼手槍二枝，步槍四枝。全營總共有五百四十三人，步槍三百七十三枝，重機四挺，駁殼手槍十八枝。

該營自攻郴州撤退後，便失去連絡。直至八月下旬，才由一位姓蕭的班長帶同十二個上兵攜帶着原有步槍十三枝逃回歸隊。

據蕭班長說：該營當日追擊范石生軍約二百人，進抵萬歲橋時已是晚上十時，官兵已疲勞之極，即遵照團部命令在該地宿營，至第二天（廿九日）早上七時，才接到團部撤退至東江集合的命令。朱營長當即集合部隊準備出發，但郴州方面大路已發現敵軍向我前進，於是立即轉向東南方撤退，至晚上十二時到達湖南廣東邊界一小村莊宿營，是夜宜章籍官兵逃去二百多人。三十日晨，又發現敵軍向我追擊，朱營長遂率部向廣東之唐村方面逃竄，中途又散去百餘人，迨至三十一日在樂昌縣北之歧門附近山地，又被敵包圍攻擊，朱營長即下令分散逃竄。他們這十三人是沿粵湘邊界逃至資興縣屬之瑤岡仙，輾轉而至桂東歸隊。

又據宜章方面報告：廿九團第一營於七月末在粵湘邊境地區被范石生軍消滅，被俘男女政工人員二十餘人，女政工同志彭娟、楊佩蘭被俘後，國軍將其交回原籍的宜章縣政府處

理。宜章縣政府將這兩個女同志，加以刑訊和脫去她們的上衣裸體遊行示衆後，再行凌遲處死。

國軍這種殘酷的虐俘行爲，引起了紅軍的普遍憤怒，亦增加了紅軍同仇敵愾的情緒和勇敢戰鬥精神。許多意志薄弱準備隨時逃跑的官兵，受到這個慘痛的教訓，再也不敢私逃回家了。

從這一點，使我深深的理解到，殘酷虐待無抵抗力量的俘虜，是一種怯弱的野蠻行爲。它的後果是相反的，不僅不能嚇倒敵人，反而增加了更多敵人。

紅軍貫徹了前敵委員會「不虐待俘虜」的決議，在以後對抗國軍的戰鬥中，取得了攻心戰中的主要勝利，而國軍則因俘虜政策不完善，往往因一時的憤怒而屠殺俘虜，致使紅軍官兵寧願戰死，也不投降，這樣便增加國軍以後作戰的困難。

廿九團攻郴州失敗，損失極大，當我在龍溪十二洞休息整理時，全團官兵只有九百餘人了。

第六章　國軍第二次圍剿井崗山

朱德率領的紅軍主力，退出郴州縣後，經東江至資興縣屬之龍溪十二洞。這是個廣大的山區，南面與汝城毗連，東北與桂東接壤，周圍數百里，都是崇山峻嶺，絕谷深坑，村落稀疏，地形險要，眞是個游擊隊潛伏活動的理想地區。當時，湘南特委、資興縣委和資興赤衛隊，均以此爲根據地。我軍因經過多天的行軍作戰，員兵均極疲勞，且有傷兵數十名亟待安置，乃決休息數天，藉以整理部隊，安置傷兵。約經過了十天的休息，出發至汝城縣屬之南洞，做了兩天羣衆工作，並收集了糧食，轉向北進，佔領桂東縣屬一個較大的市鎭——沙田，當地有中共的秘密組織，附近村莊亦較多，且無敵情顧慮，乃協同地方同志，發動羣衆，組織民衆武裝，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空氣，甚爲熱烈。八月十八日，擊潰了桂東全縣集中進犯的民團和縣政府的警察，在追擊中乘機佔領桂東縣城。翌日的中午，毛澤東帶着三十一團到來，直到軍部與朱德會晤，我聞他到來即趕至軍部，見面時他帶着疲勞的神態和我招呼，失去了過去那種興奮的吸引人的風采。我們見面後，據說：井崗山正被國軍從東西兩面圍攻，江西方面之國軍有六個團，於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間，分經永新、遂川兩縣，向龍

源口、黃坳進攻，湖南方面之國軍亦有六個團，佔領酃縣後即向寧岡縣城進攻，並有豪紳地主反動武裝，跟隨國軍進剿，到處殺人放火，摧殘工農組織，形勢十分險惡。毛澤東說他率三十一團退守井岡山上，嚴密佈防，以井岡山的險要地形，國軍是無法攻陷的，但山上所存糧食彈藥不多，若持久作戰，恐有彈盡糧絕之虞，你們的行蹤，曾接到酃縣同志的報告，聞你們先勝後敗，退回龍溪十二洞，後來又聞你們向汝城桂東發展，爲了減少山上糧彈消耗，及與你們連絡，共商反圍剿作戰計劃，乃決定以伍中豪指揮袁文才王佐部，及永新、遂川、寧岡各縣赤衞隊，固守井崗山，本人即率領三十一團兩個營，經由井崗山南面山徑，經十都到此，幸好能順利的會合，今後我們紅軍主力必須集中行動，特別是在有敵情顧慮時更不能分散兵力，因爲我們的兵力集中就可以消滅較多的敵軍，分散則有被敵軍各個消滅的危險，你們切勿忽視等語。

朱德當即問他：現在是否立即合力，掃蕩湖南或江西一面之敵，以破壞國軍的圍剿計劃？毛澤東說：我們暫時不能輕舉妄動，破敵計劃，仍須稍待時機，以他的估計，井崗山的糧食彈藥，以現守山兵力，可維持一個月以上，目前尚無反攻之必要，我們主力應在外圍活動，避開敵軍主力之圍殲，待敵疲勞鬆懈時，選擇有利目標，各個擊破之，方爲萬全之策。朱德聽了，沉思片刻，乃說道：既然如此，就照我們的原定計劃，擬在湖南之桂東、汝城，

江西之上猶、崇義地區創造新蘇區，待機行動。毛澤東同意了這個計劃。

我們在桂東工作了幾天，因避免湖南國軍之攻擊，又轉移到江西之崇義、上猶兩縣毗連地區活動。當時，軍部及二十八團駐於崇義縣之思順、古亭，二十九團駐於上猶之左安、鵝形，毛澤東率三十一團駐於上猶之營前墟。我們經常派出探員偵察江西、湖南兩面的敵情，並特別關心井岡山的變化，對於部隊訓練、羣衆工作，亦都表現得特別的積極和堅强，充份的準備和敵軍進行生死決鬥。在這一期間，毛澤東很少到軍部，但來廿九團找我一次，並約我到營前墟他的駐地一次，所談的問題是：紅軍中的政治工作，紅軍紀律，而以克服廿八團士兵的流氓習氣，和廿九團士兵的農民意識爲問題的中心，他對於廿九團第一營的失去，認爲是重大損失，他對我的態度比前親密，且常以克服困難，共同艱苦爲勉勵，使我一時覺得和他不難相處，心下甚慰。

我軍於八月二十三日轉移到上猶、崇義地區工作，二十五日發生了廿八團第二營營長袁崇全叛變事件。袁崇全出身於黃埔軍官學校，他與該團團長王爾琢是同期同學，賀葉軍在潮汕失敗後即跟隨朱德，歷任連營長，他平時沉默寡言，但作戰尚勇敢，深得朱德和王爾琢喜愛，每在談論幹部時，常稱他是一位頗有修養的軍事幹部。自攻郴州失敗，又聞國軍圍剿井岡山，他精神頹喪，落落寡歡。是日早餐後，他以向外打游擊之名，率領機關槍連及一個步

兵連，向上猷縣城方面進發。該營營部副官，以未奉有上級命令，事前又未談及，事有可疑，立即跑到團部，將情形報告團長，王爾琢聞報，以事情緊急，且自信與袁素有情感，立即手持駁壳手槍，隻身追趕，於接近隊伍時，即大叫：各連立即停止。各連長聞命後，即在路上沿途就地停止前進。王爾琢繼續追趕上前，通過了隊伍行列，發現袁崇全帶着四名傳達兵仍向前跑，他即大叫停止，袁即手握駁壳站於路側，待王爾琢接近時，即連放兩槍，王應聲倒地，當時斃命，袁僅帶傳達兵四人愴惶逃去。朱德聞報，即與陳毅趕到現場，見王爾琢經已氣絕身亡，登時放聲痛哭，陳毅即命各連長率隊回原駐地，並即摻扶朱德回部，爲王辦理身後各事。事件發生當日，我聞訊趕至軍部，見朱德愁容滿面，悲痛欲絕，我亦不免悲從中來，相對黯然。是晚我住在軍部，共商善後。晚餐之後，朱德靠在床上，我與陳毅坐在床前，我對朱德說：王團長遭此不幸，固屬我們革命隊伍裏的重大損失，但我軍正在準備回師井崗山，粉碎國軍二次圍剿之際，第二營營長不可一日無人，團長遺缺也要立即解決，請勿過於哀傷，考慮這兩個人選問題，以免指揮無人，貽誤大事。朱德悽然的說：「第二營四個連長都不如第一營第三連連長林彪，這是大家共知的，但若將林彪升任第二營營長，又恐第二營的連長不滿，如何是好？我現在心裏很亂，你們出點主意。」當時我和陳毅都認爲林彪最好，年輕有爲，驍勇善戰，對黨忠實，是本軍最優秀的青年軍官。經過研討，陳毅提出：

將第一營營長周子昆調任第二營營長，加强該營的領導，以林彪升任第一營營長，至於團長人選，論資歷應以周子昆升任，但朱德認爲他身體弱，缺乏朝氣，唯有暫由他自己兼任。這個問題便於當天晚上解決了。第二天公佈人事調動命令後，全團幹部都感滿意。我和周子昆平時有私人往還，那天我曾到第一營營部訪問他，談及人事問題時，他對我表示：這次人事安排很合情理，並認爲林彪年青有爲，肯負責，有決心，前途極有希望。

軍部將人事處理情形通知毛澤東，他對王爾琢之死，表示可惜，對袁崇全叛變表示痛恨，並認爲廿八團黨的組織領導太弱了，此後應切實注意。林彪之升任營長，引起了他對林彪的注意。並由此引起他對加强紅軍中黨的領導，及建立紅軍紀律的決心。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①便是在此一期間定出的。

九月十九日，接到井崗山方面情報：國軍進攻井崗山以來，傷亡很大，但井崗山仍無法攻陷，但他們採取了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加上民團的報復行爲，山下所有蘇區的村莊，概被燒搶剩盡了，被殺的工農羣衆亦頗不少，往日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地主富農階級分子，在國軍進攻時有不少叛變了，他們且帶領敵人到處搜索。工農組織被摧毀殆盡，遍地殘牆斷瓦，農村變了廢墟，其狀甚慘。八月下旬我軍集中桂東時，湘軍誤以爲紅軍集中進攻酃縣，其佔領寧岡之國軍，已於八月三十日撤回酃縣，嚴防我軍進攻。江西方面之國軍，

仍盤據黃坳、龍源口及山下附近鄉村，嚴密封鎖，企圖困死井崗山。

我們得到上述情報，朱德判斷：國軍之攻勢已受到頓挫，現分兵駐守山下，正有利於我軍各個擊破，且我守山部隊已超過一個月，深恐糧彈不繼，有被困隳之虞，乃決先向黃坳進攻，繼續掃蕩龍源口，以解井崗山之圍。當我軍全部集中營前墟時，忽接探報：遂川縣城國軍劉士毅部有向上猷、崇義進攻我軍之企圖，其前鋒已抵達寺下墟。寺下墟位於營前墟之東北約八十華里，一天的行軍可抵，我們曾開了一次軍事會議，決定先消滅劉士毅部，再進攻黃坳。

作戰計劃大畧如下：

（一）選擇高車坳附近（寺下墟至營前墟之間）之有利地形爲決戰場。

（二）分兩路前進，區分如下：

1、廿九團爲左翼，經隘前向高車坳前進。

2、廿八團、三十一團爲右翼，沿通寺下墟大路前進。

（三）各路軍於到達高車坳附近時迅速佔領有利陣地，把握時機，向敵進攻。

我軍於次日上午四時即分路出發，我廿八團於上午九時左右即已到達預定戰場，佔領陣地，廿九團亦於稍後即到達，十時已發現國軍先頭部隊，旋即向我廿八團陣地進攻，我軍以

吸引國軍主力展開後再行反攻之目的，先取守勢，至十一時三十分，國軍主力已被吸住於我軍陣地之前，乃即全綫反攻，戰鬥不到一小時，即將國軍全部擊潰，向來路退卻，我軍立即跟蹤追擊，是晚午晚即佔領遂川縣城，追擊之猛和路程之遠，爲紅四軍作戰以來的第一次。是役繳獲步槍四百餘支、重機關槍六挺、彈藥甚多。

九月下旬，掃蕩了黃坳附近國軍，回抵井崗山。那時山上守軍及人民，均以南瓜、紅薯爲食，備極艱苦，見我主力勝利回師，歡喜若狂。十月一日，我軍又進攻寧岡縣城，將國軍周渾元旅擊潰，附近之國軍及民團，亦旋即被肅清。地方的羣衆，當國軍進攻時，多藏匿於深山中，聞紅軍勝利的消息，即扶老携幼，返回他們的村莊，面對着殘垣斷瓦，及荒蕪了的田園，無不感到悲憤和悽愴。他們都缺乏糧食和衣物，人力又感不足，他們在互相幫助之下，重建他們簡陋的家園，並很快的恢復了羣衆組織，準備着繼續的鬥爭。

那時桂東已被國軍閻仲儒部佔領，其官兵多屬四川人，他們素仰朱德威名。其中也有共產黨人，他們把握着紅軍勝利的消息，進行煽動叛變宣傳，爭取了一百二十餘人起義投入紅軍，朱毛即將該部編爲特務營，以畢占雲爲營長。紅軍爲了要乘機爭取更多的國軍來歸，朱毛又親率全部紅軍向桂東縣城進攻，閻仲儒聞風逃去，紅軍又佔領桂東縣城及廣大鄉村

十一月初旬，江西國軍周渾元旅一個團，乘紅軍主力在桂東之際，復佔領了寧岡。紅軍

聞訊，立即回師進攻，國軍以强弱懸殊，迫得退守龍源口，紅軍跟蹤追擊，又將該團擊潰，並乘機克復了永新縣城。國軍第二次圍剿井崗山之役，至此已全綫結束。

紅軍這次反圍剿作戰，打破了國軍的圍剿，收復了原有的蘇區，從表面看，無論軍事、政治都是勝利的，但官兵的傷亡，彈藥的消耗，損失甚大，特別是攻郴州之役，除了傷亡外還丟了廿九團一個最好的營，我們認爲得不償失。至於人民的損失，更是無可估計，以後對第三次圍剿採取了逃跑主義的決策，可說種因於此。

國軍方面：進剿軍祇注意專力圍攻井崗山，對於紅軍主力逍遙活動於附近各縣，視若無睹，我們認爲國軍指揮官當然知道：消滅紅軍主力之後，井崗山不攻自下。但他們不採這一有利的戰略，原因是沒有與紅軍主力決戰的信心和決心。對於國軍圍攻井崗山的部署，犯了兵力過於分散的錯誤，形成處處薄弱的形勢，予紅軍以各個擊破之機。遂川高車坳作戰之役，劉士毅部有四個團，裝備亦好，兵力對比，佔着絕對優勢，但因戰術運用錯誤，以主力暴露於紅軍陣地之前，不知集中主力向翼側進攻，致主力戰鬥不到一小時即全綫潰敗，我當時就認爲這次作戰是僥倖的成功。至於國軍剿共的「三光政策」迫使人民向中共一面倒，徒增加人民對國軍的仇恨，於事無補。

朱德與毛澤東自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同年十月這一期間，幾生了幾件極不愉快的事件。

（一）六月下旬，廿八、廿九兩團在新老七級嶺作戰，擊敗國軍金漢鼎部時，繳獲了幾百枝步槍及幾挺機槍，當時各團將繳獲的槍械均先行補充自己的裝備，並將自己不太好的槍械調換出來，剩餘的即送到井崗山後方，以補充卅一團及地方赤衛隊。毛澤東對此事大爲不滿，要朱德將一部份好的步槍和機槍補充卅一團。朱德則因各團已自行處理，不便再命各團交出，致沒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理，毛澤東就指責朱德爲「本位主義」

（二）七月攻郴州之役，雖然是湖南省委的主張，其實是朱德有意藉此而離開井崗山，準備在湘南自行發展，擺脫毛澤東的控制；當時毛曾力加阻止，但朱德不理，仍執行攻郴州計劃，又適遇國軍第二次圍剿井崗山，那次井崗山雖未被國軍攻陷，但山下各縣及區鄉受國軍摧殘，損失甚大，當時毛澤東見形勢險惡，便親率卅一團主力離開井崗山到桂東，適在這時朱德部因攻郴州失敗，部隊停留在桂東整理，毛澤東則公開罵朱德是單純軍事觀點的冒險主義者。

（三）九月十三日，擊敗國軍劉士毅部佔領遂川後，毛澤東要立即進攻黃坳，而朱德卻想向贛南發展，致爭持了相當時日，延至九月下旬才攻黃坳重回井崗山。毛澤東便罵朱德不顧根據地，有流寇思想。

以上三件事是犖犖大者。然則，朱德爲什麼不想回井崗山而想自由創造新局面？有以下

幾個原因：

（一）毛澤東是個權力慾極强而又獨裁的人物，凡事都自行决定，而且非常固執，處處都想控制朱德爲他守住井崗山，使朱德不滿。

（二）井崗山糧食十分缺乏，紅軍官兵常以南瓜作菜，蕃薯和米煮食，生活過於艱苦，致官兵多不願在井崗山附近駐留，影響朱德的决策很大；爲了改善官兵生活，則非急向外發展不可，故對毛澤東要以井崗山爲中心，作波浪式的緩緩向外發展的計劃，不感興趣。

（三）毛澤東常反對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朱德認爲毛澤東完全是爲了他自己個人着想，有個人主義的思想；不惜反對上級，是嚴重的抗命錯誤，朱德不願跟住毛澤東作抗命行爲。

（四）紅軍前敵委員會是中央指示成立的，紅軍的一切行動决策及地方黨工作的配合，均應由前敵委員會决定，但毛澤東爲了便利自己獨裁，就自行組織紅軍黨與地方黨的聯席會議，以代替前敵委員會，將朱德和我等置諸於外，等於不願我們參加决策會議，因此朱德就駡毛澤東獨裁。

以上四點是構成朱德反對毛澤東領導的主要原因。

我對於朱毛的不和，認爲主要的是因他們兩人的個性相反有以致之。其原因如下：

（一）毛澤東處事獨裁，一切軍政措施均由他個人決定，不想他人干預，而且個性固執，不接納他人的意見；朱德則有民主作風，凡事都和大家商量決定，然後施行。

（二）毛澤東處處以領袖自居，好似唯我獨尊，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十分濃厚；而朱德則處處謙讓，只求將事做好，而不顧個人利害與得失。

（三）毛澤東對人虛僞，凡事都轉彎抹角，以達到目的；而朱德則凡事坦白，爲人誠實，是則是，非則非，絕不假以辭色。

有了以上幾種不同的性格，自然很難相處得融洽。不過我對毛澤東個人的觀感，除了他缺點的一面外，他的聰明才智實非常人可及，是有許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

（一）他不是軍人，但他提出紅軍作戰時的戰略戰術觀點是正確的，如：戰略持久戰、戰術速決戰、戰略一當十、戰術十當一；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積小勝爲大勝；爭取主動、避免被動；及「鄉村包圍城市」……等，確是劣勢對優勢作戰的不易原則。

（二）他有組織天才，如：井崗山附近縣、區、鄉的黨及民衆組織，能很快的建立起來，並領導他們配合鬥爭。

（三）選擇以井崗山爲根據地，緩緩向外圍發展，逐漸擴大蘇區，以至達到奪取全國政權，這種遠大的政治思想，是正確的而且是比較穩健的辦法。

（四）他對中國革命堅持武裝鬥爭，必須爭取廣大農民爲鬥爭的主力，也是正確的，顯見他的眼光有獨到之處。

在當時來說，毛澤東的才智有領導革命的條件，但可惜的是和他相處不易，所以我對他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

對于朱德的優良品德則有：

（一）他凡事公開，不隱瞞，不欺詐

（二）對人態度誠懇，不作僞。

（三）對革命的態度忠誠，他認爲祇是盡他的責任。他常對我們說：他的年齡老了，不可能享受革命的勝利果實，祇希望能替窮苦的人民及你們青年人鋪平革命的道路。

（四）坦白，有「無事不可對人言」的作風

他的坦白程度，我舉兩個他親口說的有趣事情爲例，

（一）大約是一九二二年，他由四川來到上海，帶有六萬元銀洋，還有四個美麗的姨太太，他自知過去之非，準備參加革命工作，而且決心要到德國去留學，爲了處置這四個姨太太，就和她們開了一次圓桌會議，當時他對她們說：現在我不做軍閥了，我要做一個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許有一位太太，現在我尚有存款五萬多元，除二萬元留我作出國留學之

外，還有三萬多元，可分作四份，每份有八千元，你們每人一份，但我祗留一個太太，誰願跟我？請你們自己決定。當時四位姨太太都爭着要跟他，無法解決，他乃採取抽簽的辦法②，結果最美麗的那位姓賀的四姨太抽得，其餘的三位立即給資遣散。

（二）朱德和他那位賀氏太太到德國後，因她年青貌美，又喜歡交際，於是她經常和中國的留學生來往，不久便有許多留學生追求，而她又毫不隱瞞的原原本本告訴了朱德。有一天，她將一大包情書交給朱德，並對他說：你替我看看這些情書，以你的判斷那一位男朋友最可靠？朱德看完了這些情書，很誠懇的對賀氏說：你喜歡那一個都可，我絕不反對，你自己的錢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帶去，不過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沒有辦法時，可再來找我。賀氏聽他這般說，便跟一位留學生去了，可是不到半年，賀氏的錢花光了，她的愛人也無法維持她，於是她又再去找朱德，要求重拾舊歡，再做他的太太。朱德又同意她回來，以後並和她一同到蘇聯去。一九二六年秋初，朱德先行回國，賀氏則於一九二七年夏天才由蘇聯經北平到武漢。南昌暴動時，她去了上海替黨中央做交通連絡工作，又和一位情夫同居，黨知道了，以她有洩漏黨的機密之嫌疑，黨中央便派特務人員將她刺殺，命中兩槍而未致命，她便和情夫逃去無蹤。

如上所述，可見朱德爲人如何。

朱、毛之齟齬，只是開端，以後還是繼續發展，他們兩人之合作能夠維持到中國大陸變色之後，此不過是互相利用而已。以毛澤東那種睚眥必報的胸懷，則朱德的失勢及被毛林鬥批，此乃意料中事，也是必然的發展，不足爲奇。

一九二八年十月間，毛澤東、朱德和我率領紅四軍進攻閻仲儒，佔領桂東，正在開展羣衆工作的時候，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朱汝湘又到桂東，傳達黨中央調我到長沙工作的指示，當日召集了朱、毛、陳毅及我等人，宣佈新的中共中央（是在莫斯科召開六全大會改組了的中央，向忠發爲書記，李立三、周恩來分任組織、宣傳兩部長，八月間回抵上海工作，所以稱爲新中央）爲了要展開湖南全省革命鬥爭，必須要將湖南省委會由江西之安源礦區遷回長沙，同時要恢復長沙市委會，以領導長沙工人鬥爭，現因湘籍同志都不能在長沙活動，特調龔楚同志到長沙，首先建立長沙市委會，由龔楚同志任書記，同時要積極建立以長沙爲中心的各地特委會的緊密連系，準備湖南省委會遷回長沙時即由龔楚同志爲書記領導湖南黨的工作。關於今後連絡問題，龔楚同志可先到資興龍溪十二洞與湘南特委連絡，再由湘南特委介紹龔同志和郴州縣委連絡。至於白區工作經費將由中央補助，請龔楚同志早日起程。

毛澤東聽了這一個報告，立即說：龔楚同志到長沙去領導湖南黨務及工農運動，是最適當的人選，我贊成他去。

朱德即要我考慮清楚，並對我說：你在軍隊工作已久，轉變地方工作環境，不一定適合，而且我們紅四軍實在需要你，尤其是廿九團的領導，你離開後，我很躭心……。看他的表情，確有依依不捨之意。

此時杜修經立即說：龔同志你必須要去，因爲這是黨中央的決定。

我接到黨中央的命令，令我有點迷惘。因爲我與紅四軍的關係太深了，特別是廿九團是我手創的，朱德、陳毅等又和我工作了大半年，從來沒有鬧過意見，而今一旦離開，心情總有點難過，而且新調的工作任務重大而艱苦，我是否勝任？這是我沒有把握的，不去嗎？我是個老黨員，豈能違抗黨的命令，於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得壓制着難說的心情，接受黨交給我的新任務。

我奉調的消息，很快的被紅四軍的同志知道了，那天晚上，廿八團第二營營長周子昆，廿九團的團、營長及各連黨代表都跑來團部問我，並爲我的離開表示深切的關懷。甚至有幾位黨代表希望和我同去長沙，協助我工作，他們那種殷殷惜別之情，至今使我回想起來，仍感嘆不已。

那晚我決定帶彭竾同志一同去，一方面是應她的堅決請求，同時我覺得總有一個助手較方便。出發之前，毛澤東送了六十個銀洋給我做旅費，朱德要我在廿九團選一排武裝護送我

到龍溪十二洞。

次日，我在晨光曦微時，黯然離開了隊伍，向着新的環境邁進。

第二天的下午到達了龍溪十二洞，首先和資興縣的赤衞隊負責人李奇中同志（他是我的舊同事）取得連絡，我們在此再度重逢，喜不自承。他就請我們到他所住的一間造紙廠內休息，並請我吃飯。我要他替我找湘南特委來，他立即對我說：不用找了，我現在就兼任特委書記呀！我爲之大喜。

晚上，他將一切情形告訴我：「從這兒向前直走，沿途都是國軍的封鎖綫，反動地主組織的挨戶團、自衞隊、守望隊，到處都設下哨崗。最可惱的是以前土匪胡鳳璋部隊，因它們曾和紅軍數度作戰，是我們的死對頭，被湖南省主席何鍵所賞識，收編他們爲保安團，並委胡爲湘南區保安副司令，現在駐在汝城，虎視耽耽的窺伺着紅軍的動態，所以你們的行動須要特別謹愼，幸勿大意，否則就有生命危險。」

我自知兵力單薄，但身負重要任務，不能不冒險前進，所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在龍溪十二洞休息了一天，由一位資興的同志帶路，沿着山僻小徑行走。當晚到達汝城縣屬，距山店八里的一個只有七戶人家的小村落休息。這個小村落四面環山，有一條涓涓小

溪流過村前。竹籬茅舍，非常幽靜，我們便在這小村落裏宿營。我為了謹愼起見，派了一個覆哨向山店警戒，另外派了一位同志化裝農民去山店偵察。偵察同志回來報告：山店並無敵情。我們便毫無顧慮的安然去睡了。

第二天，晨光初曉，哨兵發現敵人，放槍示警。跟着槍聲和喊殺聲大作，整個山谷中轟動起來，我們已被包圍住了。幸喜有松林和野草作掩蔽。我即率領隊伍向屋後高山爬越，希望能突出敵人的包圍圈，並可在山上居高臨下抵禦敵人的攻擊。可是，我們爬至半山，山頂已被服裝不整齊的敵人佔據了。此時我們已上下有敵，在密集的火網下，我們的二十多個武裝同志已有五六人受傷，其餘四散奔逃。女政工同志彭堃也蹤跡不明，我見形勢險惡，便就地一滾鑽入草叢深處，希望避免敵人的發現。

許多同志被敵人俘虜了，我潛匿在草叢中清晰地聽到他們被捕時的掙扎聲和被毒打的慘叫聲。他們的聲音似根針不斷的刺在我的心上。我含着仇恨和憤怒的心情，靜候着難以想像的變化。

因草叢深密，地勢凹凸不平，敵人兩次搜索都沒有發現我，到了下午四時許，敵人顧慮我們還有人潛伏草叢深處，放火將草叢焚燒，火從風勢，風助火威，頃刻便蔓延起來，不久，火已逼近到我潛伏之處。在不遠的小高地上，還有兩個敵人荷槍實彈上着刺刀，注視着

燃燒的地方，不時還將刺刀向草叢中亂戳，這時，我惟有向着未燃燒的草叢中爬過去，但火在四週蔓燃，我的衣服也燒着了，我急忙用手將它按息，一股熾烈的熱浪向我衝來，使我幾乎窒息。我眞忍受不住了，正欲拿左輪手槍準備自殺，忽見那個守望的敵兵自動的走了，大概是他要避開火燄的侵襲，我頓覺機會難逢，求生的念頭使我恢復了清醒，便鼓起勇氣，從火海中一直滾落到山腰的田邊，很快的藏入一個僅可容身的土洞中，昏昏沉沉的伏着不動。

黃昏過後，明月當空，這天是十月廿八日（農曆九月十六日）晚風拂過我的臉，使我打了幾個寒噤。這時，我才發覺身上的衣服燒破了，頭部、手部、足部都被火灼傷，再仔細檢視身上物品，中共湖南特委給我赴郴縣良田墟和長沙的介紹信及連絡地址，全在火場中遺失了！我孤零零的呆坐在荒凉的山崗上，萬念紛集，百感叢生。

畧一定神，月亮已在偏東天空上，才辨清了方向，估計此地離樂昌我的家鄉約有一百多華里。便决定先回家去療治火傷，休息些時，再作打算。於是便拖着疲憊和傷痛的身軀，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晝伏夜行，在天未亮前便躲到偏僻山間的稻田草堆中。飢餓時，只靠喝些泉水來維持這一綫的生命。艱難的走了兩個通宵，總算幸運的抵達家門。母親見我歸來，含淚爲我裹傷塗藥，慈愛與憐惜，使我忘記了一切的痛苦。

我的母親受的是舊式教育，她很鍾愛兒子，並瞭解我正從事革命工作，她不但不反對，

而且還鼓勵我要謹慎行藏，因之，她對我的行動極端的保持秘密，只將我回到樂昌的消息秘密地轉告樂昌縣共黨的地下工作同志。所以我很快的便和中共北江特委取得連絡。

最難得是我的同村青年和朋友們，他們並不因我參加中共連累他們，使他們遭到政府的罰欵和其他的損失而發生怨恨，反而在我療傷期間，他們爲了我的安全，夜間輪流在村外放哨，提防敵人的搜查。熱情厚誼，使我感到無限的安慰。

我從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加入中國共產黨，便將生命投入一個不斷高漲的革命浪潮中，由組織北江農民運動，農軍北上，南昌暴動，潮汕失敗，湘南鬥爭，開展井崗山蘇區工作，以迄汝城山店附近的火海餘生。在這過程中，每天都在緊張而危險的情況下工作，唯一的願望是怎樣地去完成黨所賦予我的任務；從沒有能靜靜的去反省過一下，究竟我所做的工作，它的代價是什麽？在這廿一天的病榻中，使我想起了許多問題。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

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衆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

我睡在床上，反覆的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不過，這時候國民黨方面，已出了二萬元賞金通緝我，勢成騎虎，不得不繼續跟着共產黨走。

在病榻中，我派了一位汝城籍的老工人楊韓古，到汝城去打探在山店附近被捕同志的情況，他回來告訴我：在山店附近被捕的紅軍，都解到汝城槍殺了，其中一位女同志，她在臨刑時，還高呼共產黨萬歲！我聽到這個消息，心裏非常難過。對那些在生死患難中的親密同志悼念不已。雖然我這時對黨的作風，已有了懷疑。但卻給這一消息激起了我的憤怒。

在慈母的愛護下，休養了廿一天，身體已經復原，臉上的傷疤也已經褪去 當時我接

到廣東省委的通知，要我到樂昌黃圃鄉，出席指導全縣黨代表會議。那時樂昌縣委書記李光中，已建立了三個支部。我參加了兩天會議，檢討了過去的工作和擬定了發展組織的計劃，便又乘夜趕回家中。母親告訴我：剛才接到在縣府工作的親戚通知，韶關的中共秘密機關已被破獲，捕去負責人二名，並供出你已潛回樂昌。縣長劉應福（第二次來樂昌當縣長）正在派人查緝你。我聞訊之後，立即搬到一個親戚家裏藏匿，並派人與韶關東河壩北江特委通訊連絡站連絡；確知韶關黨的機關已被破獲。搜出印刷機和很多印刷文件，捕去兩個同志。但特委通訊處未受影響。當晚我步行到韶關，匿居在東河壩一個農民劉福家裏。由一個廣西籍的共產黨的國軍軍官，借了一套軍服及胸章，於第二天早晨，我化裝成國軍軍官乘南下的火車經廣州到達香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至於我被調的湖南省工作職務，此時黨中央已另行派人充任了。

共產黨員對黨齡與階級成份（工人為主）及其歷史關係，是很重視的。那時中央廣東省委書記黃超，組織部長盧永次，他們兩人都是工人出身。在當時黨中央雖未指定我在省委擔任什麼職務，但一切重要決策，他們都和我商量，徵詢我的意見。在這一期間，我主持了一個軍事研究班。積極培養軍事幹部。訓練的科目：特別注重大城市中暴動時的巷戰戰術，與夜間作戰的通訊連絡之研究

第一次反圍剿戰役經過要圖

一九二一年一月，這時，黨中央已注意在國軍內進行策反的工作，廣東省委由廣州及各縣調來了二十個同志接受滲入國軍的策反工作訓練，這順訓練工作，亦由我和石遲鋒同志負責（石是四川人，出身於黃埔軍校）。石的軍政理論很好，但缺乏實際工作經驗，所以我的工作特別繁重。同時，爲了展開宣傳工作，首先籌辦了一張小報「正義報」，在一九二九年二年，又創辦「香港日報」，這都是我暗中策劃的，由於我沒有公開出面，所以很少人認識我的眞面目。

我在香港工作的這段時間，使我認識了中國社會上存有許多普遍品質上的毛病，中國工人階級，也不能例外，黨認爲工人階級的革命品質最好，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才能徹底實現，我對這種理論覺得很有問題。

因爲中國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由於農村經濟破產與雛型工業的興起，農民才流入城市，蛻變爲工人。所以他們仍保留着濃厚的農民意識和半封建的保守觀念。所以他們的無產階級思想意識是薄弱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的過程中的表現，有時反而不及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富於革命性和堅强的毅力

①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是：一、絕對服從命令。二、不取人民一針一綫。三、一切繳獲歸公。八項注意是：一、說話要和氣。二、買賣要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青苗。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後來文字略有更改，但內容是一樣。）

②抽籤的辦法是用火柴枝，截成長短不同的四枝，抽得長枝者爲勝。

第七章　國軍第二次圍剿井崗山

彭德懷是湖南湘潭縣人，出生於農村的貧農家庭，童年曾讀書於本村私塾，失學後因生活艱困，投入湘軍當兵，以能克苦耐勞，勤謹好學受知於其直屬長官，選送入湖南講武堂受訓，畢業後仍在湘軍何鍵部服務，歷任排、連、營長，至一九二七年已升任團長。一九二八年夏，湘軍部署圍剿井崗山時，他的一個團及同師另一團的黃公略營，駐防於平江縣為湖南進剿軍的預備隊，並負責鎮壓當地工農革命運動。彭德懷於任團長後受中共女工作同志之煽動，成為預備共產黨員（據他說已准許他入黨但未正式入黨）。黃公略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在黃埔時期已加入中共。當國軍第一次圍剿井崗山失利之後，正準備部署第二次圍剿時，中共湘東特委書記滕代遠即策動彭、黃兩部起義，以牽制湖南方面之國軍。彭德懷等奉命後，即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平江縣城起義，當時以彭德懷任總指揮兼第五軍長，黃公略任第三軍長，滕代遠為黨代表，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

當時平江工農羣衆亦起來組織蘇維埃政府，展開革命鬥爭，殺人放火，擄人勒贖，鬧得滿城風雨。

何鍵那時已任湖南省府主席，並兼國軍軍長，聞彭、黃叛變，乃由長沙派兵兩團及抽調瀏陽剿匪軍由西、南兩方面向平江進剿。彭德懷見勢不可當，即率兩軍（兩千多人）退出平江向東北方面逃竄，平江工農羣衆千多人亦跟隨着參加紅軍，這時他們的部隊已有三千多人。以後他們在湘、鄂、贛三省邊區游擊，但因國軍到處堵剿，無法建立民衆組織，惟有似流寇式的四處流竄，那時他們活動的地區，北至長江南岸湖北省之楊森、大冶，南達江西省之銅鼓、修水，但在國軍追剿下，他們的隊伍已傷亡慘重，很多舊部隊又逃向國軍投誠，至十一月中旬只剩下二千多人，爲了分散國軍進剿目標，遂決定留黃公畧的第三軍一千人在湘、鄂、贛邊區游擊，彭德懷、滕代遠率第五軍沿羅霄山脈南下，十二月初旬到達井岡山與朱毛會合。這時彭德懷的第五軍只剩一千人，半數是工農武裝。

毛澤東那時正苦於和朱德不甚融洽，忽然得到彭德懷率部到來，而彭又是他的同鄉（彭與毛都是湘潭人），且多了一千人來相助，自然是喜不自勝了。由此而更提高了毛澤東的氣燄。朱、毛之間的感情則更形惡化。

朱、毛紅軍自十一月初旬，粉碎了國軍第二次圍剿，恢復永新縣城後，積極推動井岡山四週之工農羣衆，恢復一切革命組織及鄉村秩序，並發動民衆配合紅軍，分向外圍游擊區①及白區②搶運糧食，以備將來作戰之需 在執行這一行動計劃時，經常派出小部隊（一連至

營）掩護幾百民衆去搶運糧食，若有白軍駐守而兵力不大的地區，或地方民團控制區，紅軍常於夜間襲擊敵人，掩護民衆搬運糧食，白軍或民團因夜間情況不明，不敢外出，待至天亮時，紅軍與民衆均撤回根據地

紅軍這種積極的游擊行動，更加速了國軍進行大規模圍剿的決心，於是國軍第三次圍剿井崗山又再出現了。

國軍的第三次圍剿井崗山，動員了湘、贛兩省的兵力，計有：江西省的熊式輝、朱培德兩軍，有四個師，分由安福、吉安、遂川三路向寧岡、永新、及遂川地區逐漸推進；湖南省的何鍵軍兩個師，分由茶陵、安仁兩路向酃縣推進；另有范石生軍兩個師由郴州向資興、桂東推進；胡鳳璋之保安團亦由汝城向桂東推進。

此次圍剿井崗山的兵力比過去大兩倍。且採取四面包圍，企圖逐漸推進，迫使朱、毛紅軍困斃於井崗山上，這是徹底殲滅的戰略

國軍這次圍剿計劃，很快就由湖南省委通知朱、毛；同時湘南特委及遂川、吉安各縣黨委亦飛報朱、毛

十二月初旬，敵軍已從東西兩面開始分向永新、酃縣進攻

朱、毛知形勢嚴重，立即主動的撤退，逐漸向井崗山集中，並於十二月下旬召開了一次

黨、政、軍緊急會議，參加者有：紅四軍的毛澤東、朱德、陳毅，紅五軍的彭德懷、滕代遠，湘贛邊區特委書記譚震林③等。

會議時，先由毛澤東報告敵情，繼由朱德提出一個方案，他說：井崗山是我們建設了一年的革命軍事根據地，防禦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動的重傷官兵五百餘人，我們是不能放棄的。但是若全部紅軍守住這個山頭，則糧食不能維持長久，有被困斃的危險，因此，我主張將紅軍分為兩部，以紅四軍之卅一團及紅五軍全部，由毛澤東、彭德懷兩位同志指揮，固守井崗山，我率紅四軍廿八、廿九兩團突圍東征，轉移到閩、粵、贛三省邊區游擊，創造新根據地，如此便可分散圍攻的敵人，並可東西呼應作戰……。

當時與會各人均同意朱德這一建議。毛澤東登時目瞪口呆！他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後，便提出他的意見，他說：我原則上同意朱德同志的意見，但守山部隊仍嫌太多，突圍東征部隊則必須加强，方能達到吸引敵人跟蹤追擊，以解井崗山之圍的目的，所以他主張：

（一）由他（毛澤東）和朱德同志率領紅四軍全部，向贛南方面突圍，轉移到閩贛邊區游擊。

（二）彭德懷、滕代遠兩同志指揮紅五軍及袁文才、王佐部和遂川赤衛隊留守井崗山，並應以第五軍之主力在週圍展開游擊戰，以配合守備軍作戰。

（三）傷病官兵醫院，因地形險要，祇有一條小路可通，應以一連步兵配重機兩挺防守，以策安全。

（四）輕傷病官兵應即疏散潛匿山外各村療養。

（五）守山部隊之彈藥均須盡量抽調補充，糧食亦須盡量收集儲備，準備持久作戰。

（六）邊區特委由譚震林同志負責，可轉移到永新縣地區，繼續領導邊區各縣黨委會，發動羣衆鬥爭，以配合紅軍作戰。

毛澤東這一提議，得到全體一致通過，於是散會。

那天晚上，毛澤東又向朱德提出：

（一）廿九團自湘南八月失敗後損失了一個主力營，近來在各次戰鬥中傷亡甚大，現在兵力甚少，應併編爲一個營，以利於作戰指揮。

（二）調三十一團黨代表何挺穎任二十八團黨代表，並將二十九團政治幹部調二十八團工作，以加强二十八團的政治領導。

朱德同意了這一意見，並立即進行調整。

紅軍正在準備突圍時，國軍圍剿的大軍：江西方面，第一綫已進佔寧岡、龍源口、黃坳、大汾之綫，第二綫：已推進至蓮花、永新、遂川各縣。湖南方面：第一綫已佔領酃縣十

都、河渡之綫，第二綫推進至酃縣、桂東之綫。

朱、毛見井崗山已處在國軍四面包圍中，即於一月初旬拂曉時，選擇一條久無人跡的小路，沿井崗山南面峯巒向大汾突圍，那時已是冬寒季節，山上遍佈着薄薄的積雪，突圍部隊約有三千五百人，其中有男女政工隊員及眷屬等，毛澤東的太太賀子珍和她的妹賀怡，朱德的太太蕭貴蓮，均隨軍突圍，各自帶着一天的乾糧，踏着野草沒脛的山路，穿過叢林，爬過高山，越過一個高山又是一個山峯，突圍人員一個跟一個的前進，天快要黑時，到了一個山頭，名叫積石嶺，是砂石積成，泥土極鬆，夜間無法行走，各部按所在地形，互相依靠着渡過一夜，天剛亮，吃了一點乾糧，又繼續南行，整天在深山密林中前進，將近黃昏時，已可看見山下的大汾村，據偵探的報告，村內只有國軍一營駐守，朱德即令部隊集結休息，吃過了乾糧，朱德親率部隊先行下山，於黑夜中將大汾村包圍，立即以閃電的突擊，衝入村內，拍、拍的響了幾槍，即將國軍全部俘虜，並即佈置警戒，以備戰的姿態，全部進入村內休息。時間已是午夜，因連日飢寒，乃即派隊搜集糧食，宰了幾隻肥豬，全軍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對於俘虜的處置，因爲還要繼續前進，無時間教育爭取，即將他們全部釋放，並借他們傳播紅軍已經突圍的消息，引國軍向紅軍追擊，以解井崗山之圍。

紅軍在黎明時由大汾出發，向南急進，經過左安、營前、杰壩、鉛廠，三天的征程，又

擊潰了大庾縣城的民團，佔領縣城。由大汾至大庾所經過的鄉村，都是過去紅軍曾經佔領工作過的地區。紅軍一到，羣衆即自動起來打土豪，殺地主，替紅軍送糧食，幹得熱熱鬧鬧，大庾縣城附近的工農羣衆亦召開歡迎紅軍的民衆大會，紅軍便得到了三天的休息。是時江西的國軍已由贛州、遂川追來，紅軍佔領城外北面山地，與國軍打了一天激烈硬戰，傷亡官兵三百餘人，新任二十八團黨代表的何挺穎亦負重傷（第三天斃命），他是毛澤東最信賴的能幹勇毅同志，毛澤東聞耗深爲痛惜。朱、毛深知國軍會越打越多，紅軍會越打越少，形勢極爲不利，黃昏時即向東南之上下楊梅，及大庾嶺東之天馬山地區進發。翌日，經猷山進出廣東南雄縣屬之烏逕、大塘埔，逃避江西國軍之追擊。次日，又進入江西境之鐵石口，在國軍窮追下向東南急進，經過龍南、定南及安遠、鄢烏以南地區，轉向北進，經吉潭、項山進入閩、贛兩省邊界之羅幛山地。該地位於福建之武平縣及江西之鄢烏、會昌縣的中間，是武夷山脈之南端，九連山脈之東端，崇山峻嶺，地方遼濶，國軍不易進剿，但人烟極少，無法取得糧食，且正值隆冬，山地更爲寒冷，紅軍在疲憊飢寒的情況下僅休息了一天，首長們還開過一次會議，討論了紅軍的改組、人事、行動方向等問題，第三天便沿武平縣境北進，離開山區，進入人烟稠密的鄉村，以取得糧食的供應，但武平的民團有組織又有戰鬥力，民團團長鍾紹奎，領着三百多人駐於武平縣城，隨時增援各鄉作戰。此時紅軍只有千餘人，到處受

到民團抵抗，被逼轉向江西，越過武夷山脈南段，進入江西之武陽圍宿營，這是個比較富裕的村莊，糧食問題隨時隨地可以解決，但他們鑒於由大庾至吉潭這一期間被國軍跟蹤追擊，損失了一半以上的官兵，甚至朱德的太太亦在這段時間被國軍俘去，直至進入羅幛山地後才擺脫了江西國軍的進擊，現在回到江西比較平坦的地區，又躭心被國軍追上。是晚朱德派出了十多名密探，四出偵察敵情。次日，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正是農曆除夕（農曆十二月三十日），本擬休息一天，但在上午接獲密探報告：瑞金縣城只有民團約千人，且無作戰準備，亦不知紅軍已到武陽圍。朱德即決定出敵不意，向瑞金突襲，當即率隊向瑞金急進，至距瑞金二十里時又接報告：城內民團忙於過農曆新年，毫無準備等語。紅軍繼續急進，於黃昏時向縣城突擊，民團的官民正在準備除夕夜宴，共渡良宵，紅軍突然如從天降，全體官兵便被紅軍俘虜了，夜宴的酒菜，正好供飢餓的紅軍享受，被俘的官兵卻空着肚子被關在一間大廟之內，在驚恐飢餓中渡過他們的除夕。

翌日（二月十日），紅軍處置了俘虜之後，繼續北進，到達大柏地山區（瑞金北約四十華里），在山區內紅軍官兵都比較有安全感，他們準備稍事休息，整頓隊伍，然後向東固前進。但是第二天，國軍一個師又由南面迫近大柏地，準備圍攻紅軍。此時朱德判斷，若非戰勝敵人則不能擺脫敵人的追擊，現在祗南面有敵情，若有决心，則有戰勝敵人的把握，乃召

集全體官兵開了一次大會，很嚴肅的告訴他們：現在面臨生死關頭，非戰勝即是死亡，全體官兵鑒於過去逃跑主義損失甚大，一致贊成和國軍進行一次生死決戰。朱德判斷了敵人的進攻部署，即派林彪（這時林彪已升任二十八團團長）率二十八團於夜間出發，迂廻敵後，朱德指揮其餘部隊向國軍包圍攻擊，經過四小時的劇烈戰鬥，卒將國軍擊潰，俘虜國軍千人，繳獲械彈甚多，戰場上屍橫遍地，紅軍傷亡官兵二百餘人，其中有前二十九團之黨委書記胡世健，連黨代表彭晈等。這次勝利是紅軍的大轉機，此後國軍則停止了跟蹤窮追，紅軍亦由此而得有喘息機會。經過休息整理後，即乘戰勝餘威，一鼓攻下寧都縣城，紅軍的衣服、糧食、械彈都得到補充，並在商場籌得現金五千元，加上打土豪沒收現金及罰款近萬元，官兵精神因之大振。

紅軍在寧都縣城休息了三天，召開羣衆大會，收集了五天的預備糧食。為了保存實力，部隊必須進入比較安全而又有羣衆基礎的地方，創造新根據地。於是發動羣衆將二百多傷兵及繳獲的械彈，搬運去東固，羣衆亦尚能踴躍參加搬運工作。

由寧都至龍岡墟有兩天的路程，沿途都有很好的羣衆基礎，特別是龍岡，過去是農會組織健全的地方，工農羣衆聽到紅軍來了的消息，很多聞風而來，幫助紅軍搬運物資、護理傷病人員，使紅軍兵員得到無限的安慰和鼓舞。

紅軍到達龍岡後，駐在東固的中共贛南特委即派游擊隊長李文林（黃埔軍校畢業）帶了一個連游擊隊來與朱、毛連絡，並帶同紅軍進入東固山區，時間約是二月下旬

東固是吉安縣屬的一個區，位於贛江東岸，山深林密，地形複雜，是一個高原山地，農會組織尚稱健全，地方領導同志，多是當地知識分子，革命政策亦較爲溫和，自國民黨反共後亦從未被摧殘，可說是當時中國農村革命運動比較和平安全的地區。朱、毛在此，便決心將之建立爲一個革命新根據地。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環境，早已認識到：中共革命鬥爭，必須依靠軍事，沒有軍事的勝利，就不可能有蘇維埃政權割據的政治勝利。因此，自朱德的紅四軍與他會合後，如何控制紅四軍，是他夢寐不忘的問題，他深知朱德雖然是個樸實的忠於共黨的軍人，但對自己（指毛）的領導仍有不盡合作的表現，自井岡山突圍東竄後，毛澤東更須緊握紅四軍，否則今後不僅對革命工作無所憑藉，甚至個人生命亦非常危險，但四軍主力廿八團，是朱德兼任團長，其營級幹部，只有林彪和他認識，其餘的都是朱德的擁護者。當在井岡山準備突圍時，調三十一團黨代表任廿八團黨代表的目的，就是爲了加强二十八團的控制，但仍覺不夠，唯有提升林彪爲團長，以林彪來領導二十八團才能安心。

當紅軍佔領大庾縣城時，毛澤東即向朱德提出：在此軍事行動緊張時期，朱德應集中精

力指揮整個四軍，不應兼任廿八團團長，分散精神，關於廿八團團長一職，應在現職三個營長中遴選一個年青有爲的充任，俾能分擔一部份責任。朱德答覆他：現在兵力不大，儘可兼顧，現正在行動時期，不應更動人事，以免影響軍心。而且現在三個營長中，論資歷以周子昆爲最好，可惜他的健康不佳；林彪則勇敢有餘而經驗仍嫌不足，且資歷太淺，恐難服衆；現時不主張更動。毛澤東以朱德所說，確是有理，無可反駁，只得暫時忍耐，另行想法。那天的晚上他請林彪來談話，他對林彪說：我今天對朱軍長提出，升林任二十八團團長，但遭朱反對，勸林以後好好的努力，將來一定與他力爭，務達目的而後已，請他特別留意。那時林彪正是血氣方剛、自負不凡的青年，既感激毛澤東對他的賞識，更憎恨朱德不賞識自己，氣得滿臉通紅，他對毛澤東表示：感激毛主席提拔，並決心爲中國革命奮鬥犧牲。由此，他就一面倒向毛澤東了。

當國軍反攻大庾縣城時，林彪更奮勇作戰，掩護退卻時亦由他擔任。以後由粵贛邊區流竄途中，因山地崎嶇，行軍困難，又被國軍跟蹤追擊，處在日夜逃跑及戰鬥中，傷兵棄置於農村，落伍者被國軍俘虜，損失慘重。一天，部隊進入了閩贛邊境的山地羅幃，脫離了國軍的追擊，部隊乃能集中休息。朱、毛、陳毅等開了一次會議，在討論部隊整理問題時，毛澤東提出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案，是將廿八團（缺第二營）改編爲第一縱隊，以林彪爲縱隊

長；廿八團第二營（是廿九團改編）及團部直屬隊之獨立營、特務營，合編爲第二縱隊，以朱德或胡少海任縱隊長；三十一團改編爲第三縱隊，以該團團長爲縱隊長。第二案：以林彪爲二十八團團長，俾能確實掌握部隊，隨機應變。他並解釋說：我們是革命軍隊，任用幹部的原則，只問能力及對黨是否忠實，不能仍似軍閥軍隊那樣專講資歷或人事背境，你們對人事上的安排，必須打破舊觀念，樹立革命的新觀念，新作風，才能適合黨的要求等語。朱德認爲改編爲三個縱隊一案，本屬可行，但倉卒編組，深恐動搖軍心，乃同意第二案，將林彪升任爲二十八團團長。這一場爭執算是平息了。

紅軍到達東固後，見到當地有幾百游擊隊，號稱兩個團，給養又充足，而且是一個山區，官兵都有了安全感。贛南特委以朱、毛軍只有一千二百人左右，乃發動羣衆參軍，幾天的時間補充了紅軍三百多人　那時興國縣城只有民團防守，乃配合東固游擊隊及興國民衆，一舉攻下興國縣城，建立了以東固爲根據地的興國縣、新豐縣（龍岡）蘇維埃政府（時間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上旬），奠下了建立閩贛邊區政權的初步基礎。紅軍正在慶幸得到了這一小小勝利的時候，朱、毛之間的磨擦又發生了，毛澤東在東固召開了一次紅軍黨的幹部會議，檢討井崗山突圍決策，及突圍後的作戰行動，到會的除了紅四軍的高級黨軍幹部外，並有贛南特委同志參加。毛澤東在檢討會上作了以下的報告：畧云：這次突圍東進，紅軍的損失太

大了，按由井崗山出發時的人數，損失了三份之二，我們突圍後，井崗山的情形，根據吉安縣委由贛江西岸來的報告：井崗山已於二月十日被國軍攻陷，所有山上的一切後方機關、民房，均被燒光，民衆除被殺外，全部被迫遷離山區，彭德懷同志的紅五軍已轉移到上猶、崇義地區游擊；袁文才、王佐所部轉移桂東地區游擊；永新、寧岡附近各縣蘇區均被摧殘，燒屋、殺人無數。由此，證明這次反國軍第三次圍剿的決策是錯誤的，請各位多提意見，深入檢討，以糾正每一同志的錯誤，以爲今後的教訓。

林彪的發言：認爲突圍決策是朱德的積極主張，因這一決策錯誤，引致紅軍、蘇維埃政府、工農羣衆都受到重大損失，這一責任應由朱德同志負責，並指朱德有軍閥習氣，無政治頭腦，打仗只知硬拚，無戰畧戰術修養，黨今後對軍事領導應重行研討。

陳毅聽了毛林的報告後，起來發言，大畧是：突圍會議，他是參加的一個，當時朱德同志只是提出一個原則，具體的計劃還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出席同志的一致通過，如果要負責，應該是毛澤東同志負主要責任，朱德同志負次要責任，他自己也要負責任，林彪同志既未出席那次會議，又不明實情，便將責任推在朱德同志一人身上，這不是一個布爾塞維克的同志應有的態度，至於軍事指揮問題，當敵軍十倍於我，到處遭敵追擊、堵截，誰能保證不失敗？且襲擊瑞金縣城的成功，大[illegible]地主動採取攻勢，擊潰三倍於我的敵軍，我軍

能以少勝多，固然是全體武裝同志拚命戰鬥所致，但當時是不是朱德同志堅決要打？又是不是朱德同志親在前綫指揮？他本人和林彪同志都是同時隨同朱德同志參加軍事工作，每次作戰，我們都同在一起，這種事實是不容許抹殺的，黨對每個同志都是公正的，希望各同志，不要憑個人的喜怒而歪曲事實。

前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過去在會議席上很少發言，但這次他亦忍無可忍，接着起來發言，他反對林彪的意見，認爲是對領導同志的侮辱（胡少海於是年率領新編的第四縱隊進攻閩西的碉堡陣亡。）

朱德在會議上表示：檢討會是大家平等的，任何人有錯誤皆應接受批評，關於他的錯誤，只要是事實，他很樂意接受。突圍決策如果認爲錯誤，當然要負責，但不是一個人應負全責，軍閥殘餘習氣，他表示自己或許還有，但希望同志們幫助糾正。

毛澤東見會場情況惡劣，爲免繼續惡化，立即起來說：各位發表的意見，都各有見解，我們是共產黨員，切不要感情用事，希望大家冷靜的自我檢討，今天暫告散會，俾各人有詳思熟慮的時間，下次會議再行檢討。

散會後，議論紛紜，有人提出「擁毛反朱」的主張，企圖驅逐朱德。但另一方面有人提出「擁朱反毛」的主張，以對抗反朱派。於是鬧得滿城風雨，情勢嚴重。地方黨的同志最

大多數是同情朱德，但又覺得黨政工作不能沒有毛澤東的領導，他們立即邀同陳毅、張際春（前廿九團營黨代表，宜章人，小學教員，湘南暴動後參加廿九團工作，解放戰爭時任第二野戰軍政治部主任）進行調解。

那時毛澤東身體精神均不大好，一時又無法打破這一僵局，只好暫時忍耐，對地方黨同志表示遺憾，希望同志們不要誤會。朱德卻不以為意，他表示：革命不是為個人的事，他早年做過軍閥，當他覺悟後，黨的同志能容納他參加革命工作，是他畢生之幸，現在他之去留，悉由黨決定。林彪亦知難而退，他對陳毅表示：因一時衝動，自知失言，恕他年輕，以後希多加指導。一場「擁毛反朱」和「擁朱反毛」的風潮，暫告平息，檢討會議，亦未再召開。

福建方面，原有由地方黨員張鼎丞、鄧子恢、傅柏翠（後來反黨，自組社會民主黨，成為中共的對頭）等所領導的游擊隊，在閩西之永定、龍岩、長汀等縣活動，當朱毛紅軍佔領興國縣城後，即派人來與朱毛連絡，並報告閩西敵情。據稱：長汀城區只有新編的郭鳳鳴旅駐守，鄰近各縣無正式國軍。朱德聞此消息甚喜，即與毛澤東商議向福建長汀進軍計劃，當時決定由朱德率二十八團及軍直屬隊進攻長汀，毛澤東率三十一團留興國發展附近各縣蘇區工作，這個決策毛澤東很不願意，但朱德認為非乘此機會向福建發展，恐失去創造閩贛兩省

邊區的蘇維埃政權機會，且紅軍亦必須向外發展，方能擴大組織及解決給養問題。毛澤東以朱德的建議無可反對，最後同意了這一計劃

四月初旬，朱德率領的紅軍主力，進入了長汀西北十餘里汀江右岸的山區。郭鳳鳴得到紅軍進攻長汀縣城（汀州）的消息，立即命令他的部隊（約有三千餘人）沿汀江向山區進攻，他自己亦坐着四人抬的大轎沿江邊前進。朱德得到這個消息，喜不自勝，蓋紅軍利於野戰，不利於攻城也。當即派一個營截斷國軍的退路，主力展開於有利的地形，待郭旅接近時，一聲信號槍響，全軍向敵突擊，戰鬥時間極短，郭旅除少數逃脫外，皆被俘虜或傷亡，郭鳳鳴旅長亦被當場俘虜，全旅的械彈均被紅軍繳獲，並乘勝追擊，佔領汀州城。

是年，紅軍主力，三次進入福建，曾攻下上杭、龍岩、永定各縣，及南下廣東，攻陷梅縣縣城。紅軍實力擴大了。江西方面：以東固游擊隊擴編為紅二十軍。福建方面：以閩西游擊隊擴編為第四縱隊，以胡少海、傅柏萃為正副縱隊長，隸屬於紅四軍（那時廿八團、三十一團及直屬隊亦曾改編為第一、二、三縱隊。至一九三零年成立紅十二軍時，改編為三十四師，隸屬於十二軍，是時傅柏萃已叛變，胡少海已陣亡）。蘇維埃政權運動：是年擴大了贛東南，及閩西北蘇區，並先後成立了江西、福建兩省政府。閩贛邊區革命鬥爭形勢有了相當的發展基礎。

是年冬，朱德率軍深入廣東梅縣，目的是掠奪物資，以解決紅軍的服裝及軍費問題，但撤回時被粤軍追擊，損失不少，當他退回龍岩蘇區不久，毛澤東來了，於十二月在古田召開紅四軍黨代表大會，起草了一個議案，內容包括：加强紅軍黨的領導，糾正紅軍中的一切錯誤傾向，加強紅軍的政治教育，確立紅軍的政治體系和軍事體系，優待傷兵。並提出了反對紅軍錯誤傾向的口號如下：

（一）反對單純軍事觀點。

（二）反對極端民主化。

（三）反對非組織觀點。

（四）反對絕對平均主義。

（五）反對主觀主義。

（六）反對個人主義。

（七）反對流寇思想。

（八）反對盲動主義殘餘。

以上口號，當時毛澤東報告是根據中共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所擬訂，詳情請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八十七篇。

關於加强紅軍黨的領導問題，將黨代表制度改爲政治委員制度，凡軍事主管的一切命令、訓令，必須有政治委員之簽署，方能生效，否則下級不得執行，這是黨代表制度時未付予的職權。

這些議案，出席會議的代表，皆認爲是毛澤東加强對紅軍的控制措施，雖然心內不盡同意，但亦無人敢予反對。朱德本人，素來遵從黨的領導，且在軍事失利歸來，又聞是中央的指示，更不敢提出意見。毛澤東起草的提案，便順利的通過了。此後，因爲毛澤東是紅軍的政治委員，朱德便失去了單獨發佈命令的權力。

朱、毛不和的事件，在井崗山時期，早已傳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曾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發出指示，內容是：國軍圍剿井崗山，形勢嚴重，着朱、毛兩人暫時脫離紅軍，同回上海，將軍隊以營或連爲單位，分散到各蘇區，配合地方赤衞隊進行游擊戰。中央此項措施，是因毛澤東常不接受中央指示，有意將毛澤東調離紅軍而發。可是遭毛澤東拒絕了，他說鬥爭嚴重時期，紅軍必須集中行動，既可加强領導，又可消滅較大的敵軍，紅軍是只有在敵情和緩、爲了展開羣衆工作時纔能分散。他以這些理由，駁斥中央。毛澤東答覆中央指示，見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中。

朱、毛不和的情形，並沒有因古田會議而改善，但因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要依賴朱德，

且紅軍幹部，對朱德多有好感，故不敢貿然除之。而朱德以忍讓爲懷，得過且過。他們能夠維持到現在，是環境使然，當非毛澤東之本意

①游擊區：是中共控制區之外圍，經常有紅軍或赤衛隊出沒的地區。

②白區：是指國民黨軍事力量及政府力量所控制地區。

③譚震林：是湖南瀏陽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時是農會積極分子，失敗後隨毛澤東上井岡山，中央蘇區時期曾任紅軍十二軍政治委員，紅軍西竄時，調任中央軍區政治保衛局局長，現任中共人民政府農業部長。

第四編

廣西蘇區

第一章　中共利用廣西省府主席俞作柏

自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下旬至一九二九年四月這一期間，我在香港所辦的正義小報和香港日報均有發展，尤其是秘密軍事訓練班；因那時黨中央認爲中國革命的高潮快要到來，發動城市工人暴動，配合紅軍攻城的機會已經迫近，對於訓練工人幹部的巷戰戰術、夜間連絡等軍事知識特別重要。故陸續由上海、武漢、廣東各地調來的工人幹部日多，教官方面也陸續增加，如：前葉挺軍參謀長徐冠英（潮安人）由星加坡來香港，黃埔軍校早期畢業生史書元（湖南瀏陽人）、石遲鋒（四川人）亦由上海來港，參加軍訓工作，同時爲了要瓦解國民革命軍，爭取軍事力量，對於兵運工作，亦急待展開。我們這個軍事訓練班又負責訓練兵運人才，訓練他們如何去滲透國軍各種軍事學校及軍隊，如何連絡舊時和黨有關係的軍人，如何在軍隊中或軍校中勤於學習、守紀律、努力工作、勇敢作戰……等實際行動取得軍校當局或軍事長官的信任，陸續提高自己的地位，及在部隊中起領導作用；如何與黨取得連絡……等各種方式和方法。

正在這個時期，一九二九年春，蔣介石將軍已回南京復職，南京國民政府以主持廣東軍

政的李濟琛有反蔣嫌疑，將他扣留於南京，事因李濟琛原是廣西省的領袖人物，他一被扣留，駐於湖北武漢地區的桂系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等，便有兔死孤悲之感。且他們在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時期全力支持蔣介石的中央，西征唐生智之役，桂軍出力最大，支持北伐、反共，至建都南京、安定中樞，均立有大功，今反而不能容於蔣！一怒之下，便在武漢發動了反抗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運動。

南京政府以桂軍實力雄厚，且佔據着武漢，有長江之險，若單純以軍事解決，勢必兵連禍結，不易收拾。蔣介石將軍有見及此，遂以軍事政治雙管齊下之辦法，謀求解決桂軍之計，便想到了一個桂系的閒散人物——廣西舊將領俞作柏將軍出來收拾桂軍。因俞作柏在桂系軍中是有相當潛力的，當時第七軍副軍長李明瑞（滇軍講武堂分校第一期畢業生）是他的姑表兄弟，早年曾受俞的栽培，一九二六年北伐時已在七軍任旅長，後以北伐軍功升爲十五師師長，由於他是俞作柏的表親，故爲李、白所歧視，便將他調升副軍長，實則明升暗降，削奪其實權。但他待人和靄，且勇敢善戰，其部屬官兵對他有堅强的信仰。另有五十七師師長楊騰輝與俞、李均有深交。蔣介石將軍查清了這些情況，即派員到香港，向閒居香港的俞作柏游說，請他入京（南京），俞作柏正在寂寞無聊，正思無以報李、白之仇（見第二節）故一說即合，隨同晉京。

俞抵京後，蔣介石將軍即以賓禮接待，經過一次洽商，許以事成之後，派其爲廣西省府主席，並給予一筆巨欵，以爲運動桂軍費用，並派大軍進迫武漢策應，那時桂軍的十五師及五十七師均防守武漢，俞作柏秘密至武漢，很順利的說服李楊兩人，立即宣佈服從中央，反對李、白，並即率部撤出武漢，由中央軍接防。

至此，蔣桂戰爭立即爆發，宜川、沙市決戰，桂軍一敗塗地。李、白及少數將領僅以身免，逃往上海。

俞作柏及李明瑞，撤出武漢後，俞作柏便受命爲廣西省府主席，李明瑞受命爲第八路軍副總指揮①兼廣西省國軍編遣特派員②，率領兩個師從水路運軍至廣東之西江登陸，向梧州進攻。

那時，廣西只有黃紹竑指揮的呂煥炎及梁朝璣兩個旅。俞、李軍很順利佔領了梧州，即在梧州開府。梁朝璣旅退桂平，李明瑞率軍向桂平進攻，相持一星期，卒將梁旅擊潰。李佔領桂平後，呂煥炎旅亦投降，接着梁朝璣亦宣佈接受李明瑞編遣。李明瑞即順利佔領南寧，於是廣西全省告定

俞作柏遂率省府人員於六月間由梧州移抵南寧，正式接收廣西省府，一場蔣桂戰爭於此結束。

俞作柏是個思想左傾的人，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領導革命時，歷任廣西討逆軍縱隊司令與總指揮之職、國共合作期間，曾任廣西省政府農工廳長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校長，與中共素有連絡。國民黨清黨時，被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所排擠，寄居香港。他既不容於桂系當權將領；而南京當局又以他沒有實力，故對他不予重視。是以他的心情，非常苦悶。中共駐港的高級人員如：惲代英、李立三、黃平等，看透了俞的心理，即向他進行爭取工作；俞亦樂與合作，幾成爲一個共產黨員。他的弟弟俞作預是正式共產黨員，對他的思想影響很大，故當南京政府起用他的時候，他就事先向中共示意，並得到中共的同意，才接受新命。等到他對桂系軍隊策反成功，與李明瑞率師攻桂時，他即請求中共派員協助；中共中央便派賀昌來香港，命我參加俞李集團工作，並給我以下幾個任務：

（一）積極爭取俞李對本黨的合作，予本黨一切援助。

（二）利用俞李之掩護，發展黨的組織，建立黨直接控制的軍事力量。

（三）儘量介紹黨員同志滲入廣西軍政機關及部隊中，掌握實力，準備在可能時創立新蘇區。

我接受了這個任務後，於五月上旬離開香港。隨行的還有香港日報梁、吳兩位同志。準備到廣西創辦報紙，作爲黨的宣傳喉舌。當港梧輪途經廣東三水河口時，突有廣州公安局偵

探科長林子光，帶同武裝偵緝多人上船，將梁吳兩人拘去（後解廣州槍斃）幸而我住在另一個客房內，且在香港沒有公開活動，所以未被注意，便幸運地逃過了這一「鬼門關」，安全到達了梧州。

到達梧州後，我以龔鶴村的代名，由俞作預陪同往謁俞作柏；他即予我以廣西省政府辦公室機要秘書的名義，協助他工作

這時，廣西省政府，成了個間諜戰的大本營。南京政府要緊握它，防範它再叛變。汪精衛的改組派，也要拉緊它，要策動它「反蔣」。中共更爭取它，利用它，創造新的局面。省府秘書長黃健吾是汪派的代表；教育廳長曾如柏，是第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派的觀察員，國軍編遣特派員公署政治部主任鄭介民，是南京方面的代表人物，監督俞李的行動；另一個便是我，先任省府船務處長，後調南寧公安局長。這三個政治集團所派出的代表，外表上見面時，總是嘻嘻哈哈；骨子裏都在勾心鬥角，想盡辦法去爭取俞作柏和李明瑞。

因為我是中共派來的，俞作預是個共產黨員，李明瑞又是我的同學，憑着這種關係，所以對我的一切工作都很方便。加之俞作柏也想利用中共替他創建實力，則更使我的一切計劃得以順利進行

結果，國民黨兩派所做的僅是上層工作，沒有下層的羣眾基礎。而我們卻取得了上層的

信任，下層工作則不斷的發展，組織起來；在此情形之下，顯然我們比國民黨人高明得多了。

這時候，黨中央當局即加派了許多得力幹部，陸續前來廣西工作，計有：賀昌、鄧小平③、徐冠英（化名徐開先）、石遲鋒、張雲逸④、陳豪人⑤、馮達飛（黃埔軍校學生，曾留學俄國）等；他們並帶來大批下級軍政幹部，從事滲透廣西軍政機關工作

自這一大批軍政幹部派到廣西後，工作更順利展開，並成立了中共廣西行動委員會，由賀昌、鄧小平、陳豪人、俞作預和我五人負責領導工作，具體地分配了各項工作任務，以陳豪人任省府機要秘書，隨從俞作柏工作，藉以明瞭省府一切動態，以徐冠英任編遣特派員公署總務科長，跟住李明瑞，從中瞭解特派員公署的一切活動，以馮達飛爲公安局督察，勸助我的工作，以俞作預、張雲逸、史書元負責軍事運動工作，賀昌、鄧小平和我爲常務委員，同住在我的南寧公安局之內，負責全部策劃的領導工作。由於人少事繁，工作緊張，每天晚上均須秘密開會，非至午夜不能休息，尤其是我，一方面要辦理公安局的職務，另一方面要負責行動委員會的工作策劃，又要對外應酬，正是忙不開交。那時，我和我的妻子王慶玲（又名王蘭芬）女士尚未結婚，曾因工作繁忙致失約而發生誤會，幾至破裂。後經鄧小平、賀昌等人從中解釋，乃恢復和好，於是年九月廿一日結婚

我們在廣西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完全由於俞作柏自以爲他是共產黨員（其實他並不是黨員），中共就是利用了這種微妙關係，藉此而創造了這一軍事實力，從而作爲後來我們開闢廣西蘇區的革命鬥爭的資本。

① 國軍當時分爲各路總指揮，第八路軍總指揮是廣東陳濟棠、李明瑞任副總指揮，兩廣軍事統由第八路總指揮部指揮。

② 編遣特派員是一省之最高軍事指揮官。

③ 鄧小平，解放戰爭時任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中共統治大陸後，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現已被毛澤東整肅。

④ 張雲逸，廣東海南島文昌縣人，一九二六年國軍北伐時任第四軍十二師（師長張發奎）參謀處長，中共統治大陸後，任廣西省府主席，是中共的陸軍上將，爲人誠實，長於參謀工作。

⑤ 陳豪人，福建人，曾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離開七軍後脫黨。

第二章　廣西蘇區

俞作柏鑒於過去失敗的經驗，他認爲在混亂的中國局勢下，沒有軍事上的實力，是不能發揮自己的革命抱負的。所以他佔領南寧，統一了廣西之後，第一個措施，便是遴選優秀青年，破格委充各縣，試署縣長，以整飭行政風氣。第二個措施，決定編組廣西警衞軍，建立自己的基本部隊，以俞作預負責建軍事宜。一面派員分赴桂南各縣招募新兵，充實兵源；一面將南寧軍校重新整理，改組爲軍官教導總隊，派編遣特派員公署總務科長徐開先（徐冠英之化名）兼教導總隊的主任；教導隊的學生，由各師旅挑選優秀的班排長及地方知識青年，參加訓練，藉以培養警衞軍的初級軍事幹部。

我們對廣西的軍事工作，也就集中精力從事於警衞軍的建立，及軍官教導總隊的訓練和控制。爲了工作上的需要，立即通知中共廣西地方黨部協助，發動黨員領導青年參軍。最先成立的省府警衞連，便以中共黨員石逕鋒爲連長。以後新兵源源而來，由警衞連擴編爲警衞營，並很快的編成了三個營，即正式成立警衞軍第四大隊。初由石逕鋒爲大隊長，張雲逸爲副大隊長。後因石逕鋒生活腐化，黨便通過俞作柏將他撤職，改以張雲逸爲大隊長。按照部

隊編制常規，大隊實等於一個營。當時爲了減少外間的注意，掩蔽本身的力量，警衞軍的組織，仍以大隊名義編組，轄三個營及一個特務連，實則等於一個團的兵力。第四大隊編成後，繼即編組第五大隊，以俞作預爲大隊長，史書元爲副大隊長。兩個大隊的各級幹部，除了少數係俞作柏早年的軍校學生外，大部份是中共黨員。於是我們的軍事工作便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一九二九年秋末，汪精衞爲首的改組派，積極煽動俞作柏、李明瑞聯合「反蔣」，而中共的主張，是暫時觀望；爭取南京方面的經濟和軍械的援助，以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同時加緊整理降軍呂煥炎、梁朝磯兩個旅，使能確實控制，然後創造新的局面。並把這個主張交由俞作預向俞作柏條陳。可是俞作柏因已與湖北荆沙枝江起義護黨「反蔣」的張發奎，取得連絡；而張部起義後即將南下廣西，欲與俞共同合作。若廣西不響應，以分散南京政府的軍力，則張部有被南京政府殲滅之可能。因此，俞作柏基於道義上和形勢上的需要，當即決心響應與張合作，並興兵攻粤。

俞作柏這一決策，是他成功與失敗的分野。當時他若依照我們的主張，拒絕汪精衞立即「反蔣」，而仍與南京政府敷衍，則以後的發展局勢對俞作柏更爲有利。可惜在內部基礎未穩固，實力又未充實之前，便輕舉妄動，他的失敗，就成定局了。

十月一日當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寧舉行擁護「討蔣」大會，閱兵，宣佈就任護黨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的時候，獨立旅長呂煥炎，五十七師師長楊騰輝，十五師的旅長黃權等人，在南京政府的策動下，便兵不血刃的促成了俞、李的失敗。

俞、李失敗的局勢既定，中共雖然損失了一個建立軍事實力，和創造新局面的機會，但已經掌握了警衛軍兩個大隊，相等於兩個團的兵力；乃請求俞、李可能掌握的部隊，如降軍蒙志仁團及編遣特派員公署的衛隊，交與俞作預指揮。同時將警衛軍第五大隊，開赴左江龍州；第四大隊張雲逸部，開赴右江百色；並將庫存軍械彈藥服裝，分運左右兩江，以為將來擴軍之用。俞、李毫無異議的接受了這一請求，中共便以左右兩江為基地，準備建立新的蘇維埃區域。而我們參加廣西工作的結果，也算是得到了相當的收穫。

南京政府方面，雖得到了一時的成功；但當俞、李失敗後不久，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便再與廣西軍隊連絡，他們說服了楊騰輝及十五師的將領，讓他們由香港再回廣西，又造成了李、白、黃恢復桂系實力的局面。張發奎亦由荆沙經湘入桂，李、白、黃領導的桂系與張合作；「反蔣」運動又再次爆發了！南京政府在廣西是一無所得，只是在形式上趕走俞、李兩人而已。正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

我們於廣西國民黨的俞、李政權失敗時，即請俞作柏委任張雲逸為右江百色清鄉督

辦①，俞作預爲左江龍州對汛督辦②，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宗成了一切工作準備，我即與張雲逸率第四大隊赴百色，俞作預即率第五大隊開赴龍州。

廣西左右兩江，四面多山，峯巒起伏；北與貴州、西與雲南及越南毗連，地勢險峻。左右兩江，流向東南，在南寧之西合流。小輪船由南寧可達右江之百色，左江之龍州，運輸交通，尚稱便利。兩江沿岸，土地肥沃，盛產穀米。各山區出產雜糧，種類甚多；加以人民勤儉樸素，糧食足以自給。除漢族外，還有少數民族的苗、瑤、侗、僮四族。這四種民族中，以僮族人口爲最多，佔右江人口之半數。右江東蘭縣的中共游擊隊領袖韋拔羣，便是僮族的領袖人物。他以東蘭鳳山邊境的西山爲根據地，自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便打游擊。黃紹竑時代的廣西省政府，無法將他消滅。迨至俞作柏統治廣西，便由中共的關係，曾給予小量的械彈接濟，提高了他在右江的地位。這是我們建立右江蘇維埃政權的最有利條件。

百色，是右江的首邑。扼雲南、貴州兩省入桂的要衝，商業繁盛。行政機關，除縣府外，另設有清鄉督辦公署；稅收機關，除田糧局外，還有禁烟局，徵收雲、貴兩省鴉片烟土入桂過境稅，每月稅收極大。

我與張雲逸率第四大隊，到達百色後，即接收了清鄉督辦公署，掌握了行政權，並控制了一切稅收機關。軍費政費，不虞缺乏；便積極的開展附近各縣工農運動，及建立地方黨的

組織工作。

龍州，是左江的首邑。除縣政府外，設有對汛督辦公署，負責國防軍事及辦理中國與安南（越南）出入口護照，且爲雲南及越南入桂要道之一，商業也很繁盛。稅收機關，除田糧局外，亦設有禁烟局，還有防務經費（賭捐）。中共爲了要解决經費來源，對這種害人的稅捐，仍暫照舊辦理。因此在龍州方面的軍政費，也足以自給了。

左右兩江這兩個地區，有二十多個縣份，但因地方遼濶，我們的兵力人力，均不足分配；致蘇維埃運動和民衆組織工作，一時無法全部展開。右江方面，僅能控制百色附近幾個縣；左江方面，也僅能控制龍州附近幾個縣；使兩江的蘇區，不能打成一片，這是當時最大的缺憾。

因爲地形與民衆的條件，右江比左江優越，所以黨的指揮重心，設在右江，我也就在右江工作。右江各縣，東蘭是有羣衆基礎的。所以羣衆的鬥爭情緒特別好；我們暫時仍掛着國民黨的旗幟，提出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耕者有其田口號，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普遍的鄉村自動的幹起來。百色、奉議、田東（平馬）、果德各縣，我們領導着當地中共黨員，積極編組自衛團，建立工農羣衆自己的武裝。同時，我們在部隊中採取了官兵平等待遇，提高士兵待遇的辦法：官兵薪餉一律發銀洋二十元。在提高士兵待遇的影響下，廣泛的發動羣衆

參軍。動員羣衆參軍的結果，不僅是工農分子熱烈參軍，甚至桂系軍隊中的士兵，亦有自南寧方面出走來百色參加紅軍者，他們當時並不了解革命，主要的原因是爲官兵平等、薪餉待遇好所吸引。

關於軍隊的編組：原有的第四大隊改稱第一縱隊，以胡元爲縱隊長（不久由我兼任）。以由南寧同來的教導總隊學生爲幹部（李天祜、楊勇等均爲當時學生），以新參軍的青年編成第二縱隊，並以教導總隊副總長李謙爲縱隊長（原名李隆光，黃埔軍校畢業，又名李湛，是李立三之胞弟）。右江原有的游擊隊改編爲第三縱隊，以韋拔羣爲縱隊長。統由張雲逸以督辦名義指揮，我以參謀長名義協助張雲逸主持軍事。

當我們在左右兩江積極建軍及建立新政權時，廣西國民黨政權又輾轉落到反對中央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之手，由是，桂軍圖粵，粵軍攻桂，國民黨內部的戰爭不息，遂給予紅軍從容發展的時間和空間。

中共中央知道廣西共黨武裝力量已經逐漸擴大，特派龔仁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到達百色，攜來中央指示，命右江張雲逸部成立紅七軍，左江俞作預部成立紅八軍，以左右兩江爲基地，開展革命鬥爭，建立新蘇區。

行動委員會（廣西黨的最高臨時機構），接到中央指示後，即於翌日（六日）召開會

議，決定了以下執行辦法：

（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爲廣西紅軍成立日，右江現有部隊編爲紅七軍，並電令左江俞作預部同時成立紅軍第八軍。

（二）成立蘇維埃政權問題：右江方面：在現時軍事力量控制下之百色、東蘭、奉議、平馬（田東）、果德各縣，於是日先行樹起蘇維埃紅旗，迅速發動工農羣衆，召開工農兵代表會議，選舉蘇維埃政府主席，正式建立蘇維埃政權。在未成蘇維埃政府前之過渡期間，各縣行政及籌備工農兵代表大會工作，由各地方黨及新派去之現任縣長和政府人員負責辦理。

（三）凡成立蘇維埃政府地方，即行按人口分田，廢除一切土地契約和各種借貸債約。

（四）未成立蘇維埃政府地區，實行二五減租及停止付息。

（五）土地分配：以村爲單位，按人口平均分田。已分之田，由耕者於收成之後，向政府繳納總收成百份之十五地稅。

（六）現駐田州（奉議縣屬）之前廣西省警衛軍第三大隊熊鎬部，被認爲係反動勢力，過去又不遵督辦署指揮，須於十一日前將其解決，但俘虜官兵須由軍部處理，不得虐待。

（七）關於廣西紅軍的統一軍事指揮問題，應成立七八兩軍總指揮部，總指揮之人選，以現駐在龍州之李明瑞爲最適宜，他不是中共黨員，但尚能接受黨的領導，且桂系軍隊，多

與他有歷史淵源，有爭取部份官兵起義的可能。應即電俞作預向他說服電告。

（八）各項工作部署之負責人如下：

政治工作陳豪人。

軍事工作張雲逸、龔楚。

（九）將議案及中央指示，送龍州俞作預同志參照辦理。

會後，即分別進行準備工作，並令李縱隊長率領該縱隊於十日晚開赴田州，於十一日拂曉時將第三大隊包圍解決③。

九日我命上尉參謀莫文驊④秘密製造百色蘇維埃政府紅旗及中國紅軍第七軍紅旗各一面備用。

十日晚，假百色商會俱樂部設席，由我具名柬邀百色、奉議兩縣長（非共黨）及百色市區紳商領袖宴會，由於平時舉凡督辦公署對外協商事務均由我負責，他們對我的邀請並無懷疑，是晚八時，所請客人都很高興的依時到來，在酬酢中他們談笑如常，毫無戒心，我反而覺得尷尬，在酒醉飯飽之後，時間已近午夜，我乃對客人宣佈：我今天是代表張督辦及全體官兵酬謝各位兩個月來的熱誠幫助，同時有件重要事要向各位說明，各位聽到時切勿驚恐，因對各位絕無傷害之意。本軍是革命的武裝，明天即要正式改編爲中國紅軍，並要在右江建

立蘇維埃革命政權，今後仍請各位站在爲廣大人民利益奮鬥的革命立場，繼續協助合作。今晚，爲各位的安全設想，請屈駕留在俱樂部內，切勿外出，以免發生意外的誤會。此次事件，因事前要保持秘密，恕我沒有預先通知各位，希爲原諒等語。在塲客人本來早知我們是中共分子，他們亦預知必有公開行動的一天，但因他們多數是俞作柏的部屬，常以進步分子自命，對我們採取觀望態度。當他們初聽到我的報告時曾突然愕住，有惶惑之狀，但旋即恢復鎮定，轉而爲我們慶祝，並請我關照。事過兩天，全體恢復自由，一塲風波，便在和平的環境中渡過。

十一日晨，天氣陰暗寒冷，間中飄下毛毛細雨。八時前黨政軍人員、武裝部隊、工農羣衆，集合在督辦署門前廣塲，舉行升旗禮後，即由鄧小平、張雲逸作簡短的報告，繼由我宣佈軍部組織及首長姓名，在一片歡呼聲中鳴炮散會。軍部首長姓名如下：

軍長　張雲逸
政治委員　鄧小平
參謀長　龔　楚
政治部主任　陳豪人
參謀處長　唐　濬

副官處長　陳伯度

軍需處長　張　某（後調葉季壯接充）

軍法處長　葉季壯（後撤消軍法處）

是日上午十時，李縱隊長由田州打來電話，畧云：熊鎬大隊已全部解決，拂曉時曾發生小戰鬥，熊大隊長在戰鬥中被亂槍擊斃，其餘官兵全體被俘，雙方官兵均畧有傷亡等語。是次繳獲的步機槍七百餘支，俘虜之官兵除少數軍官發資遣散外，約有官兵一千人參加紅軍。

自此，由百色以下至果德、右江沿岸已無反動武裝，更便利於革命工作的開展。爲了擴大紅軍實力，繼續在右江各縣發動青年參軍，很多原有的地方民團士兵亦要求加入紅軍，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紅七軍的兵力在數量上增加了兩倍。一九三零年二月初旬，已編組的部隊計有：

軍直屬隊：特務營、野戰炮營、工兵連、軍士教導隊一中隊。

十九師：步兵三個團，師直屬隊有：特務連、通信連。

二十師：步兵三個團，師直屬隊有：特務連、通信連。

二十一師：步兵兩個團，師直屬隊有：特務連、通信連。

是時李明瑞已覆電允就紅軍七八兩軍總指揮職，並建議：總指揮部設在百色，他另組衛

十隊一連，待準備就緒後即來百色工作等語。當時急於統一兩軍指揮，於李總指揮未到之前，先行成立總指揮部，及將縱隊番號改爲師，並定於二月十一日組織完成開始辦公，當時人事調整如下：

七八兩軍總指揮　李明瑞
參謀長　龔　楚
第七軍軍長　張雲逸
參謀長　龔　楚（兼）
政治部主任　陳豪人
第十九師師長　龔　楚（兼）
參謀長　張運楫
五十五團團長　何子初
五十六團團長　李　顯
五十七團團長　黃子榮
第二十師師長　李　謙
參謀長　胡　元

五十八團團長　馮達飛
五十九團團長　張翼
六十團團長　章健
第二十一師師長　韋拔羣
第八軍軍長　俞作預
第二十二師師長　俞作預（兼）
第二十三師師長　史書元

是時，右江各縣蘇維埃政府已陸續成立，繼之在平馬召開右江區蘇維埃代表大會，由張雲逸親往指導，選出雷經天爲政府主席，成立右江區蘇維埃政府，以領導右江蘇維埃政府工作。（雷經天於中共統治大陸後，曾任廣西省中共黨委書記。）

紅軍第七軍的官兵待遇，前面已經說過，在未正式改爲紅軍以前，即已實行了官兵平等待遇，每月薪餉二十銀元，在那個時期，物價低廉，可以說待遇是最好的，因爲當時白軍士兵每月只有七元而已；所以紅軍的待遇是全國所未有的。官佐的待遇雖然是低些，但亦足以維持其個人生活，而且多是黨員同志或是革命青年，他們有理想有抱負，對於待遇和士兵同一樣的問題，他們不但沒有表示不滿，反而認爲這種平等待遇有促進官兵感情和團結的作

用，所以我們的部隊不論在任何一方面，都表現得最好的，官兵上下一致，從來沒有過逃兵，官佐亦只有發生兩個逃亡，他們並不是嫌紅軍待遇不好，是對共產黨不感興趣，但不是重要角色。

在政治方面：紅軍部隊裏面也是平等的；雖然沒有士兵委員會的組織，每個星期都分別舉行一次工作或學習檢討會，每次戰鬥後亦舉行檢討會；檢討會是官兵混合編組，士兵可以批評官長，情形相當融洽，確確實實的做到了平等的地位。

關於軍需補給問題：械彈方面，因爲由南寧轉移至百色時，已運來兩個師的槍械（是俞作柏準備擴充兩個師的裝備），子彈每枝槍可配二百發，我們已準備建設子彈製造廠，機器設備亦已運到。

糧食方面：在右江已被控制的各縣，農民已停止向地主交租，規定農民每年生產的總收穫量徵收百份之十五的土地稅，亦足夠紅軍及政府機關的糧食供應而有餘。

經濟方面：有國民黨政府時期的禁烟局和稅局，徵收由雲南、貴州運出的鴉片過境稅，及物資出入口稅等，收入現金頗爲可觀，足資紅軍的開支，並可補助地方政府。

衛生藥物：我們可從越南購入，毫不困難，但醫生缺乏，是一件始終未曾解決的問題。

運輸補給：因爲每縣都設有糧倉，重要交通綫上亦設有糧倉，且因有廣大工農羣衆的幫

助，雖遠在東蘭、鳳山、天峨那些山區，運輸補給，從未發生過困難。

服裝方面：我們在右江時期，設有被服廠，布匹由南寧及越南採購運來，初期每人有內衣兩套，軍便服兩套，棉衣一件，膠鞋則兩月發一對，從未缺少。

紅軍這種待遇和補給情形，一直維持到一九三零年十月，至我們離開右江之後才有改變。

要敘述紅七軍的幹部訓練，我首先要說明紅七軍的幹部狀況：紅七軍是由一個團的兵力擴為一個軍，除了廿一師韋拔羣部是過去的地方幹部外，其餘軍部及十九、二十兩個師都是新編成的。

紅七軍的幹部來源：一部份是由黨中央派來的，軍事幹部如張雲逸、我、李湛、李顯（雲南講武堂出身）、張翼（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章健（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王震⑤、馬達飛（廣東連縣人，黃埔軍校選送俄國留學生）……等；另一部份是接收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南寧分校第一期的學生，如：何子初（中共黨員）、黃子榮、唐濬、莫文驊（以上三人初非黨員後加入黨），又有一部份是張雲逸找來的，如：雲廣英⑥、胡元、張運楫等（均非黨員）。政治幹部，中共派來的有：陳豪人、佘惠、許甦魂、袁任遠⑦、李樸（四川人黃埔軍校政科畢業）、葉季壯⑧等。其餘軍政幹部，如：李天佑⑨、楊勇⑩、陳漫遠⑪等，均係

軍隊的司書，逐漸訓練提拔出來的傑出人才。至於鄧小平、賀昌等，只是在俞作柏在廣西執政時期，啣中共中央之命來廣西南寧參加短期工作，以後則來往於上海中共中央與廣西蘇區之間，傳達中央指示，紅七軍成立後，即未參加實際工作。陳豪人亦於一九三零年冬，紅七軍奉調入贛途中，藉故離開隊伍。

以紅七軍的力量及當時的鬥爭環境來說，是很可能創造一個較大的革命割據區域的，可是因爲軍政幹部的缺乏，使我們無法能夠開展這一個局面，廣西地方幹部也十分缺乏。除了雷經天負責右江區的蘇維埃運動，和韋拔羣負責東蘭、鳳山的蘇維埃運動及二十一師外，實在無法找到地方幹部以適應革命工作的需要。我們在紅七軍成立之日起，即盡一切可能去培養幹部。當時我們最急需的是初級軍事幹部，如連、排長等，因此便首先成立了一個軍事教導大隊，以二十師參謀長胡元傘任大隊長。由各師及地方團隊遴選部隊中之軍士及地方優秀青年，編成三個中隊；訓練時間亦只定六個月爲一期，畢業後分派補充部隊及地方赤衞隊，並繼續召集編訓。

政治幹部訓練：由政治部辦了一期政治幹部訓練班。全班學生有一百二十人。由右江地方黨，及紅軍中選拔優秀青年送訓。現任中共統治區的廣西省政府主席韋國清，就是當年韋拔羣選送的學生之一，他結業後，參加紅七軍任連級政治指導員。

對於現職軍政幹部之訓練：

（一）軍事訓練方面：以研究團、營、連之攻防戰術爲主，而以軍事討論，及圖上作業方式進行。對於游擊戰術之實施，及運動戰、遭遇戰之要領，亦爲經常研究的課題。

參謀人員之培養，如各種參謀業務、繪圖實習、敵情研究和判斷、通訊連絡……。在駐軍時，由參謀首長負責，每日有一小時之時間進行之。

（二）政治訓練方面：除了由軍政首長作各項政治報告及討論外，並經常由政治部擬定各項政治課題及政治教材，分發給幹部閱讀，及召集政治討論會，灌輸革命思想。

紅七軍的訓練工作，我認爲比較紅四軍的初期，以至井崗山時期，都進步得多。不過我感覺到：政治教育總不如軍事教育和軍事領導有成績，主要原因是缺乏優秀政治幹部爲中心領導。

所以後來紅七軍幹部的成就，政治幹部並不如軍事幹部有成就。

① 「百色清鄉督辦」是李、白統治廣西時所設，負責清鄉剿匪。

② 「龍州對汎督辦」是清朝時設置，負國防責任及辦理安南出入境護照及外交事宜。

③ 警備第三大隊長羅某，是俞作柏早年幹部，此次調上右江，有反動嫌疑，不服清鄉督辦公署調遣，故將他解決。

④ 莫文驊，廣西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南寧分校第一期畢業，初任上尉參謀，後升少校參謀，並曾任軍長。

⑤ 王震，湖南人，畢業於黃埔軍官學校，曾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長，參加南昌暴動失敗後，回上海，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赴莫斯科習軍事，一九二九年夏回國，是年秋由中央派赴廣西紅七軍工作，任十九師五十五團第二營營長，於同年進攻貴州省古州時受重傷，折斷左脚，後赴上海留醫，痊癒後，復入中央蘇區，任蕭克軍之政委，中共統治大陸後，任農墾部長至今。

⑥ 雲廣英，廣東海南島人，曾任紅七軍軍需處科長，後調任十九師軍需處長，再升七軍軍需處長，中共統治大陸後，曾任廣東省府秘書長。

⑦ 袁任遠，湖南人，曾任紅七軍十九師政治部主任，中共統治大陸後，任湖南省副主席。

⑧ 葉季壯，廣東新興縣人，畢業於廣東法政學堂，歷任紅七軍軍法處長、軍需處長、政治部主任，紅軍供應部長等職，人民政府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對外貿易部部長。

⑨ 李天佑，廣西人，南寧教導總隊學生，一九三二年，任紅七軍特務營營長，後升團長，一九三四年升師長，中共

統治大陸後任廣西軍區司令員，曾參加韓戰，後任廣州軍區駐軍司令，現任副參謀總長。

⑩ 楊勇，湖南新寧縣人，紅七軍成立時任司書，後調任連指導員、團政委、師政委，後調軍職，解放後晉升上將，曾任貴州省府主席，韓戰時曾任志願軍司令員，現遭毛澤東整肅。

⑪ 陳漫遠，廣西人，紅七軍初期是司書，入黨後，調任連指導員、團政委、十九師政委、軍政委，解放後，曾任廣西省府主席。

第三章　革命路綫和政策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正是百色蘇維埃政府及紅七軍成立之翌日，廣西行動委員會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參加者有：陳豪人、張雲逸、佘惠、許甦魂、袁任遠、雷經天、韋拔羣、李樸、李湛和龔楚。討論主題是：右江革命工作總路綫及政策。

這次會議，是在百色縣蘇維埃政府（前清鄉督辦公署）辦公廳舉行。

下午二時開會，由行動委員會書記陳豪人報告當前左右江蘇區狀況，特別說明以下各點：

（一）中共中央最近關於廣西工作指示，及本會於二月六日會議，僅是在原則上要建立蘇維埃政府，建立紅軍，創造廣西左右江新蘇區；關於工作路綫及政策則沒有明確指示和決定。

（二）我們右江過去在國共合作時期，只有東蘭、鳳山兩縣在韋拔羣同志領導下，曾組織農會，及建立黨的組織，此外各縣尚無工作基礎。

（三）右江的民衆有：苗、瑤、侗、僮、漢五種民族聚居，而以少數民族——僮族爲

多，他們的特性以保守、强悍見稱。

（四）右江地少山多，文化落後，生活貧苦，惟右江流域沿岸地區，糧食生產較多，比較富裕，西林縣因過去曾出名人，如岑春煊父子等，文化較高，亦較富庶，但遠處滇黔桂邊，我們目前是鞭長莫及，現時無法顧及，惟有待以將來。

（五）我們現在是要根據右江的一般社會、經濟、民風等狀況，決定我們的工作路綫和政策。

最後，他要求與會的同志根據過去的革命工作經驗，提出意見，以供大家討論……

陳豪人致詞後，出席這次會議的同志，咸以我曾參加過毛澤東所領導的湘贛邊區，曾以井崗山爲軍事根據地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從事革命鬥爭，乃要我發表意見。

我首先說：井崗山是一個大山區，地跨湘、贛兩省，但在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時期）附近各縣均有黨及工農會組織，羣衆條件，地形條件均好，毛澤東同志經過了半年以上的工作，由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建立工會、農會，才由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鄉區縣蘇維埃政府。現在右江的情形，除了東蘭、鳳山外，既無黨的組織，又無衆羣組織，過去三個月來的工農會，只靠幾個知識青年支撐着，工人、農民，並沒有眞正的發動起來，流於形式主義；在軍事力量來說：我們紅七軍的力量仍不足以鞏固這一廣大地區，而現在的國內形勢，蔣桂

戰爭又起，我們不特要鞏固這一地區，而且要利用這機會將我們這一蘇區擴大到貴州、雲南兩省毗連地區，開闢滇（雲南）、黔（貴州）、桂（廣西）三省邊區割據地，進而奪取三省政權，所以紅軍的擴展，是目前革命鬥爭的主要任務；毛澤東同志曾說過：「沒有軍事的勝利，就沒有政治勝利的可能。」我們現在既有廣大地區可以發展，又有廣大羣衆可以發動，經濟條件又好，擴大紅軍絕無困難，但在右江的革命工作環境，要特別注意的是剛才陳豪人同志在報告中所指出的：右江的民衆有保守和强悍的特點，必須善爲誘導，並要切實從基層組織做起；爲此，我主張應以「溫和的革命建設」和「積極的建黨建軍」，爲右江革命工作的總路綫。請各同志研究。

我的意見發表後，獲得大家一致通過。陳豪人隨即宣佈關於政策問題，請我負責起草，三天內具體地提交下次會議討論，大家也一致通過了。於是便宣佈散會，已是下午五時三十分了。

關於右江革命政策，於二月十五日經行動委員會會議通過了我所草擬的議案如下：

（一）工人政策：右江地區沒有稍具規模的工廠，更沒有如黨所指的無產階級，只有手工業、內河船員、理髮師、店員……等。勞資糾紛極少，因此，我們的政策應提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提高工資，參加政權等口號，以發動工人，組織工會。

（二）農民政策：因土地分散，沒有大地主，以自耕農、貧農爲最多，我們的政策是：改造地主，爭取富農，（特別是注意要爭取以勤儉起家的富農。）團結中農，以貧雇農爲基礎。

（三）土地政策：沒收地主土地，以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辦法①按農民人口分田，俾能保持生產現狀，進而提高生產。對於豪紳地主，若自願耕作者，應按其人口分給土地，給予機會使能改變爲勞動農民。

（四）農村階級鬥爭政策：應本以有餘補不足之義，沒收豪紳地主之財物傢具，除留給必需的衣物、用具、農具、住宅外。其餘沒收，分給貧苦人民。

不准任意逮捕善良士紳及勤儉致富的地主，至於罪大惡極之豪紳地主，由地方人民拘捕須交縣政府審判處決，若判處死刑者，應交回原鄉執行，以平民憤。

（五）經濟政策：

甲、現金，仍照現行銀洋爲流通貨幣。

乙、整理現在稅收：

（1）保存雲南、貴州兩省出口的鴉片過境稅；

（2）徵收工商業溢利稅，並以累進稅制施行；

（3）土地稅：改收實物，按年產總額徵收百份之十五；

（4）物業稅：按年租額百份之五十徵收，並通令不得加租；

（5）入口貨物稅：按價值百份之五徵收，但民生必需品，如：布匹、鹽、油、火油等不徵稅；

（6）出口貨物稅：只收過境稅，按值百份之十徵收，本地出口貨不徵收；

（7）維護現有自由經營的工商業；

（8）維護滇、黔兩省與百色陸路交通，並維護由百色至南寧白區的水陸交通；

（9）推動全右江各縣的合作社運動，目前以消費合作社爲主，以減少中間剝削、改善民生。

（10）取銷賭捐，嚴行禁賭，及取銷一切苛捐雜稅；

（六）宗教政策：本地區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應採取信仰自由之原則，不干涉其教徒之正常活動，但要破除迷信，除加强宣傳教育，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外，並應對迷信消費品課以重稅，以減少是項消費品之消耗。

（七）軍事建設：

甲、加强民衆武裝組織；廣西之民團素有實力，我們應以工農自衞軍名義編組，初期應以村爲小隊，鄉爲中隊，區爲大隊，縣編爲團，完成這一計劃後，再行擴充。

乙、紅七軍現已有三個師，應再擴編紅九軍，並將之逐漸擴大。

（八）擴大蘇區：第一步，應鞏固果德以北之現有控制區，第二步，應控制隆安、鎮都、靖西、養利四縣，與左江蘇區連成一片。隨後赤化田西、西隆、西林各縣及向黔、滇、桂邊區發展，創造黔、滇、桂邊區割據地。

右江蘇維埃運動就是根據這一政策、計劃而施行。它的突出之點是：沒有殘酷的屠殺鬥爭，與白區保持物資交流；赤、白區商民可以自由來往，順利的由舊社會轉變爲工農執行的新社會。但可惜的是：右江革命運動正在蓬勃發展之際，因紅七軍主力奉調，離開廣西，而失敗了！

第四章　紅七軍歷次戰役

紅七軍成立之後，因爲沒有敵情顧慮，便將部隊分駐各縣，以進行發動羣衆，組織羣衆工作，當時各部駐地如下：

軍部及直屬部隊駐百色；

十九師駐田東、果德二縣，師部駐田東；

二十師駐凌雲、百色、奉議三縣，師部駐奉議；

廿一師駐東蘭、鳳山、天峨三縣，師部駐東蘭。

各師都以營爲單位，分駐各區鄉，進行發動羣衆工作。

四月初旬的一個下午，接獲駐雲南邊境剝隘之探員報告：西林民團指揮岑建英率領民團二千人經過剝隘附近有向百色進攻之企圖，該敵料於今晚可到祿豐宿營……。

當時駐百色部隊計有：軍部直屬之特務營（新兵）、炮兵營（七生五山炮四門）、工兵連、軍士教導大隊及廿師之五十八團，我們接到這一情報之後，判斷該敵必由祿豐大道進攻百色，爲了避免擾及市區，决以野戰殲滅之，部署如下：

二十師參謀長兼教導大隊長胡元率領該師五十八團（團長馮達飛）星夜開赴祿豐百色間約距百色三十里之有利陣地，先行埋伏，待敵進入陣地時，四面包圍而殲滅之；以炮兵營守城，工兵連守城外市區及河岸，監視河上船隻，特務營爲預備隊，控制城內。

我們分析岑建英的民團戰鬥力不亞於正規軍，並因岑建英是一個正式軍人，所以特別愼重。

胡元率五十八團及教導大隊即於是晚九時出發，守備部隊亦於是晚進入各個守備位置，城牆上之照明設備，由參謀處協同炮兵營長收集火油，棉花，準備完善，分配各守城部隊備用。

百色府城尚保存有古舊之城牆，但東門已拆除了一部份；其地形：西北面是較高之山地，南面是荒野之波狀地及墳塲，東面是市區及右江河流，市區中心位於城外之東南，若敵軍無炮兵，則是易守難攻的良好地形。

翌日拂曉，敵軍突從西北面山地向百色城進攻，我軍因已準備完成，從容應戰，我與張雲逸聞報，即至西北城上觀察敵情，發現敵軍已佔領西北一帶山地，並積極構築攻城據點（對城構築工事），判斷其兵力，當有二千人以上，但沒有野炮，我們決定固守，待胡元部回師，然後內外夾攻而殲滅之。至十時左右，敵軍約有五百人沿西面山脚向南面波狀地前

進，有進攻市區企圖，同時，百色河之東岸高山亦發現敵軍，隔江向市區射擊。我以市區守軍僅有工兵連及警察百人，兵力太少，情況危急，爲免被敵人侵入市區，决即反攻，並立即商得張雲逸之同意，由他負責指揮炮兵營守城，我親率特務營由小西門出擊，向西南面之敵反攻，戰鬥迅即進入衝鋒肉搏戰，敵軍狼狽潰退，我即率部轉向西門高地敵之側背攻擊，是時炮兵亦向西北門一帶高地轟擊，戰鬥至十二時，敵軍全綫潰退，我以兵力既少，且傷亡重大，佔領城外各高地後，僅以小部隊約百人分向敵軍追擊，下午二時，戰事結束。胡元部至下午四時才回師百色，敵已遠遁。

是役敵軍遺屍四十餘具，重傷兵三十餘人（我們將之救治，後來治愈後均參加紅軍），我軍傷亡八十餘人。繳獲步槍十四枝。

是役檢討會總結出以下各點：

（一）因情況判斷錯誤，引致决定和處置亦有錯誤，沒有考慮到敵軍是地方團隊，熟悉地形，不經祿豐，而從百色西北小路進攻百色，這一作戰計劃之錯誤，幾導致重大損失，責任應由龔參謀長負責。

（二）二十師參謀長胡元率部赴指定地點伏擊敵軍，拂曉後既不發現敵軍，應即注意敵情變化，且預定戰場距百色僅三十里，未能及時回師百色夾擊敵軍，致被敵軍逃

去，這是胡參謀長的重大錯誤。

（三）百色城防戰，能以少勝衆，指揮若定，及時出擊，龔參謀長身先士卒，卒將敵軍擊潰，其智勇果敢精神，令人欽佩。

（四）全體官兵作戰勇敢，特別是特務營官兵，入伍不到兩個月竟有此戰績，可爲全軍模範。

（五）百色西北高地，雖距城千碼，但可瞰射城內，過去忽視防禦設備，是一重要錯誤，軍部參謀處應立即詳擬構築防預工事計劃，派兵守備。

擊退敵軍後的第二天下午，我們舉行了一次全體官兵叙餐會，以慶祝參戰有功官兵，在餐會中，由張雲逸報告；贊揚我這次親率特務營，投入肉搏戰的英勇作戰事績。引致全場向我歡呼致敬，令我啼笑皆非！

評：我對是役作戰的觀感：

（一）是役原定作戰計劃，是運用游擊戰之埋伏戰術，於野戰中殲滅來攻敵人。對於百色城防亦有週密佈置，這一戰畧是正確的。

（二）城防戰：能適時出擊，轉移攻勢；並能於擊潰南面敵軍後立即轉向敵軍側背攻擊；且步炮協同，達到機動作戰的最高境界，戰術的運用是優越的、適切的。

五月初旬，百色來了一位不速之客，自認陳秘書到軍部求見張雲逸，當接見時，他道達來意，說是奉蔣總司令來見的代表。張雲逸立即請我會同商談，據稱：他奉命由南京經安南、雲南來百色，現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與張發奎合作反抗中央，自去冬至今春攻粵失敗後，又有進攻湖南的企圖，蔣總司令擬任李明瑞為總指揮，張雲逸為獨立二十旅旅長，俞作預為第一旅旅長，所需軍餉械彈統由中央運濟，只要宣佈易幟（改稱國民革命軍）接受中央任命，餉械即可運到……。當時我們對他說：請先將軍餉子彈運來，我軍必進攻南寧，易幟一事，以後再談。當時他住在百色河上的大花艇（水上酒店），並約我商談，他開口就是求我玉成此事，國府必不負你。我當時告訴他：我們不是一般軍閥，沒有政治立場，只求個人名利，我們的立場是不會放棄的，但進攻南寧的行動，只要你們能給我們以經濟和械彈的幫助，我可保證必行，其他的我請他不要再提。他以不得要領，便於翌日由原路，經剝隘赴昆明去了。

翌日下午召開行動委員會議，張雲逸將日來所發生的事報告，並說：易幟一事，我們絕不考慮，亦無須研究，但蔣桂戰爭爆發，是我們發展的最好機會，若南寧空虛，我以為必須進攻南寧，以擴大政治影響，關於應如何準備及進攻計劃？請龔楚同志提出意見……。他報告後，陳豪人等即請我提出意見。

我當時提供意見如下：

（一）南寧方面若兵力不超過五個團及無援軍，我軍可進攻南寧。

（二）根據參謀處最近所得情報，桂軍與張發奎軍，攻粵敗後，退回桂柳一帶整補；南寧自張發奎協助桂軍驅逐呂煥炎後即交由黃紹竑主持省政；南寧及附近各縣經常有桂軍四至五個團駐守，但蔣桂戰爭是否已經爆發？尚未接到報告，應立即派員前往南寧、武鳴、及桂林、柳州一帶偵察，務求確實明瞭敵情，方可行動。

（三）進攻南寧應與第八軍會同行動，應即報告李明瑞總指揮，請他即來右江主持軍事，並請第八軍積極準備。

（四）為了把握時機，應即令十九、二十兩師分別在奉議、田東、思林集結；廿師除留一個團守東蘭、鳳山根據地外，師部及兩個團應開來百色接防。關於沿右江東岸兵站補給站亦應迅速設置。

（五）為了確保後方安全，各縣、區、鄉之工農自衛團應即令集結，接替紅軍維持地方治安之任務。

我報告後，各人均表同意，並即飭令各主管部門分別辦理。

會後的第三天，即接獲南寧原有之情報員報告，略云：桂軍及張發奎軍，正在桂林、柳

州一帶集中，準備攻湘，現南寧及附近各縣僅有桂軍五個團，黃紹竑現仍在南寧主持省政云云。

這一個情報與陳秘書所說的是相同的。我們判斷若敵情無變化，即我七、八兩軍便可集中十二個團的兵力，進攻南寧，勝利的公算極高，因此，即決定行動計劃如下：

（一）第七軍（缺廿一師）於五月十四日在果德集中完畢，候命行動。

（二）第八軍應同日在崇左縣集中，並與七軍取得連絡。

（三）百色防務即交廿一師接替。

（四）野戰醫院隨軍部移果德。

我於五月十日由田東率五十五團趕赴果德，是日行抵距思林約十里之途中，與桂軍一個團遭遇，立即展開戰鬥，我軍以動作迅速，取得先機之利，戰鬥約一小時，即將敵軍擊潰，敵向東退卻，我軍跟蹤猛追，約於十里外將敵一部消滅，俘獲官兵三十一人，內有負傷連長一人，繳獲步槍廿四枝，我軍傷亡廿餘人，其中在追擊時因一門迫擊炮爆炸，死排長一人，士兵三人，傷九人，當時我亦在現場，站在死難排長後面，爲破片擦傷頭部。

是晚，我十九師全部在思林宿營，於訊問被俘連長及士兵中得知桂軍主力確向桂林，全州進發，南寧僅有桂軍十五軍四十五師四個團，但黃紹竑尚在南寧，該團（與我作戰之敵

軍）原駐武鳴，奉命向田東、思林游擊，搜索我軍情報。

十一日，我率本師開赴果德縣城，當我軍渡河時，果德工農羣衆約五千人在河邊列隊歡迎，並燃放爆竹，情緒極爲興奮。

十三日，軍部及二十師均到達果德。十五日，李明瑞總指揮率衛士連由龍州到達果德。是晚我們全軍高級軍政幹部在河上之大花艇歡宴李總指揮，並商討進攻南寧計劃。

當時據李總指揮報告：

（一）第八軍已編足了廿二、廿三兩個師，共六個團；現正繼續招收新兵編廿四師，現八軍已準備留一個團守龍州，軍部直屬隊有特務營、野戰炮兵營，及五個團參加會攻南寧。

（二）龍州附近五個縣已編有工農自衛團，可負防守地方之責。

（三）七軍所需之電話通訊器材已由安南購到，不久即可送來。

（四）進攻南寧計劃我亦同意，但仍須加緊搜集敵情以防變化。

是晚，我們接到情報：隆安縣城已於日前有清鄉司令李奇率兵兩個團進駐（兩團均是民團編成），並加緊構築工事，南寧情況無變化。

十六日，我軍決定行動計劃如下：

（一）紅七軍（缺廿一師）留一個團守果德，掩護後方機關，並向武鳴游擊，偵察敵情，其餘先進攻隆安，佔領隆安後，再行決定進攻南寧計劃。
（二）紅八軍應先佔領永康縣城，即與總指揮部切取連絡，候命行動。
（三）野戰醫院及各師後方暫留果德。
（四）總指揮部隨同七軍行動。

十七日，我軍向隆安進發，是晚在距隆安十五里一帶村莊宿營，十八日向隆安進攻，下達攻擊命令，要旨如下：

（一）據探報：敵軍兩個團以主力守縣城，一部佔領縣城西面約四百尺標高之山地對我方警戒。

縣城附近有防禦工事及障礙物之設備；西面山地亦構築有工事及設置有障礙物，該敵據點可瞰射縣城附近。

（二）我軍以消滅該敵，佔領隆安爲目的，決於明（十八）日拂曉進攻隆安，部署如下：

1、廿師（缺一團）附工兵一排進攻縣城。
2、十九師之五十五團附工兵一排進攻西面高地之敵陣地。

3、十九師（缺五十五團）及軍部特務營、野戰炮營、工兵連、教導大隊爲總預備隊。

4、開進時，廿師爲左翼，十九師之五十五團爲右翼。

5、總指揮部警衛連（衛士連改名）隨五十五團後前進。

6、軍部隨廿師後前進。

7、總預備隊隨軍部行進。

8、總指揮在總指揮部。

十八日拂曉，左右翼兩軍同時向敵進攻，戰鬥展開後，我和李明瑞在距兩翼約五百碼之波狀地觀察戰況，發現攻城部隊雖已接近敵軍城外副防禦陣地，但右側背受西端高地之敵射擊，情況極爲不利，當即决心迅速奪取西面高地，即以炮兵營集中火力向敵高地陣地轟擊，我五十五團於正午已奪取了三份之二的高地，惟有最高頂之敵陣地累攻不下，我五十六團一個營沿山脚死角向敵高地之後方突進，佔領了一處小高地，截斷了敵之後方連絡綫，但受城內敵軍之機槍側射及高地敵之瞰射，我方傷亡甚多，遂於黃昏後撤回。廿八團是日毀敵之障礙物一部份，及佔領其城外陣地兩處，但無法攻城，傷亡亦甚多，五十八團閻參謀長左脚重傷（閻是安徽人，出身黃埔軍校，中共黨員，因左脚折斷，後送上海療治），是晚我軍繼續

向敵進攻，但無大進展。

十九日繼續進攻，城外陣地大部份佔領，並接近北門攻城，但右面高地敵之最後據點至正午仍未攻下，且增加了敵軍一個營死守。我與李總指揮於午後一時移至西南高地指揮，正擬命教導大隊增加進攻高地，發現敵軍約有兩個團由南寧方面開來增援，陸續渡過浮橋入城，且據俘虜報稱：黃紹竑親率部隊前來指揮作戰。我軍以敵情變化，爲避免過大傷亡，決主動撤退，乃於黃昏後有計劃的退出戰場，我率五十七團佔領隆安五里之小山地掩護主力向果德轉進。敵軍不敢追擊。

廿日，全軍撤回果德休息。

是役我軍傷亡官兵二百五十餘人，內有軍部副官處長陳伯度陣亡，重傷五十人，內團參謀長閻×一人，五十五團陣亡連長劉×一人（黃埔軍校政治科畢業）敵軍傷亡不明。

廿一日，隆安之役檢討會，指出以下各點：

（一）開始攻擊時，攻勢不猛烈，進攻部隊沒有同時使用全部兵力，逐漸增加作戰，沒有速戰速決的決心。

（二）攻擊開始後，沒有派一個團以上的兵力以中央突貫戰術進出敵後，攻擊敵之高山陣地，致延誤時日，影響全局。

（三）戰畧上沒有消滅或擊潰敵軍增援部隊之計劃。

（四）能臨機主動退出戰場，保存實力，這一決心是正確的

廿二日接獲龍州俞軍長報告：該軍蒙志仁團長率全團叛變，逃回南寧，會攻南寧計劃暫難實行。

我們接到俞軍長的報告後，決定停止進攻南寧計劃，總指揮部、軍部、直屬隊、同駐百色，十九師駐果德、思林、田東。廿師奉議、凌雲、並飭令立即整理補充。

評：進攻南寧的我見：

（一）進攻南寧的決策是錯誤的，蓋南寧爲桂系的政治中心，在蔣桂戰爭初期，對於南寧的防守必有適當的措施；在紅軍方面，南寧及附近各縣沒有工農革命基礎，本身實力亦並不强大，進攻南寧在軍事上是：軍事冒險，在政治上是：有助蔣牽制桂軍之嫌。

（二）隆安戰役：紅軍既知桂軍增兵防守，在進攻計劃時，沒有估計到敵軍增援之可能及對策；在戰術上不使用强大力量用中央突貫深入敵後，截斷城外高地據點與城內連絡並從敵後進攻之戰術，致經兩日之激戰，一無所得，失去殲敵良機。

紅七軍自於隆安作戰撤回右江原防後，加緊補充整訓，並加强各方面的情報工作，廿里

一站的通訊網亦很快的建立起來了。隆安的桂軍自我軍撤退後，他們亦撤退了，僅留一個營的民團駐守隆安縣城。

當時陳豪人等主張再攻隆安，我認爲既無進攻南寧的目的，則再攻隆安實無重大意義，因以百色爲中心的右江羣衆工作尚未做好，且部隊正在整補中，目前不應分散力量。此議便暫告擱置。

六月中旬，接獲桂林、柳州探報，桂軍主力確已入湘，但桂柳一帶僅有一師以上的兵力，乃動員民團協防……。那時，因廣西被廣東封鎖，致使我們的稅收減少，七軍的高級軍政幹部都抱冒險精神，亟思向外發展，在一次會議上，李明瑞提出一個意見，他說：蔣桂戰爭正在發展，我們僻處右江，不能把握時機向外發展，現右江情形安定，以廿一師的兵力則足以維持，七軍主力應移到湘、黔、桂邊活動，較爲有利，而古州是貴州省比較富庶的地區，若佔領古州，南可以窺桂（桂林）、柳（柳州），東可出湖南；較滇、黔、桂邊之貧瘠地區更爲有利，請各位研究。陳豪人認爲很好，贊成此議。張雲逸問我有何意見？我當時說：要使左右兩江蘇區連成一片及建立以百色爲中心的滇、黔、桂蘇區是根本之圖，目前雖因蔣桂戰爭，廣東對廣西封鎖，物資交流受阻，影響我們的稅收，但維持軍費尚無重大困難；古州之行，雖無不可，但應以向外游擊之性質，對於右江之保衛不能疏忽，到時如認爲

湘、黔、桂邊可以發展，再行計擬，因此我主張以一個師向古州游擊，相機奪取古州，其餘部隊應留守右江，並迅速向向都、龍茗發展，俾與右江蘇區連成一片。當時他們都反對我的意見，認爲蔣桂戰爭，廿一師留守右江已足，主力應向外發展，此案便已通過。

一九三零年六月下旬，紅七軍（缺廿一師）以進攻古州（榕江）爲目的，取道河池、思恩、到宜北。在宜北準備了三天糧食，經色寨入貴州省境。由色寨出發到古州，尚有三日的行程，都是在萬山叢中的瑤人住區行進。第一天宿營的瑤村，因瑤人全數逃匿深山，找不到瑤人購買菜蔬，迫得通令部隊，可在民家及菜田裏收集青菜，並准許每團殺一頭豬，爲兩餐飯菜。但必須以團爲單位，負責將菜價加倍留置銀洋於菜地上及民房內，以免引起瑤民反感，維持我們鐵的軍紀。可是我們殺豬的消息，很快的傳播了瑤區，而我們留下銀洋的消息，瑤民卻還不知道。第二天行軍到達一個有百戶人家的瑤村時，即被瑤人封閉道路及村外柵閘。並集中了數百瑤人，携帶鳥槍劍戟，堆集大石，阻止我們通過。而那個瑤村是建築在大山中部的横排上，只有一條傾斜很急的羊腸小徑可走，進攻非常困難。我接到了前頭部隊的報告，立即命令部隊集結停止前進。然後我和李明瑞前往視察形勢，認定瑤民是出於自衛性質，可以談判解决。我乃獨自冒險走近第一度柵門，請瑤民派人來洽商。經過了十多分鐘時間，有一位四十多歲的農民來到，他自稱是這一個瑤區的瑤民代表，他本人卻是漢人。我

告訴他：我們是經過瑤區到古州去的軍隊，紀律很好，絕不侵犯民間一草一木。買東西給錢，公平交易，不會强買强賣；昨晚殺了人家的豬及取去蔬菜，均留下銀洋；請轉告他們不要恐懼。今天因被阻延了時間，除一個師繼續前進外，總指揮部及一個師，要在該地宿營，請他們不要誤會。那個代表去了約廿分鐘，便有瑤民下來開閘門，讓我們進入村莊。時間已是下午，烈日西斜，照射着村外，瑤民站列在樹蔭之下的奇異打扮，使人另有一種感覺！他們數百人，男女老幼，都帶着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們第廿師一隊隊的通過。他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軍隊，廿師全部通過了，隨後又有總指揮部，軍部直屬隊，十九師跟着來了。瑤民見我們廿師的官兵，沒有一個進入鄉村，而一個跟一個的跟着前進，也就相信了我所說的話了。同時作晚宿營留下銀洋的消息，他們已經知道。那位瑤民代表就帶着一位五十多歲的瑤人來見我。

原來這個瑤人便是附近二百里地區的酋長（我只好稱他爲酋長），他派了五個瑤人帶我們各單位的設營人員進入村莊內，分配營房。我見瑤民中，男的束髮，女的袒胸（她們的服裝如和尚衣，上胸外露）；短衣短裙。壯年男女的腰間，均佩有尺多長的古劍，宛似唐漢以前的古人。在我所見過的瑤人中從未見過如此古老裝束的。由於語言不通，雖不無隔閡之感；但那些瑤人的熱情洋溢，使我並不感到陌生。等到負責設營的副官出來通知我，設營就

緒，我便隨同他們進入村內。見瑤人屋宇，全是板木建築，上蓋杉皮，一座一座的不相連接；有樓有地，樓上住人，樓下住牛，每屋僅有一扇門，並開有兩個不足一尺直徑的圓形窗；門的上面掛着牛角，屋內是一個大廳，中間築有一個小小的土灶，灶旁有一張四方木枱，幾張木櫈。沒有臥室床帳設備，晚上圍繞在灶的旁邊，席地而睡。他們的生活，眞是艱苦到極點。等到佈置好了營地後，我便去訪問那位瑤人酋長。因爲要尊重他的緣故，所以他的家裏沒有駐軍。他的房子很大；一連有五間，中間的樓上和樓下的左右房屋，是飼養牲畜及放置農具。樓上的左右房間，是臥室及儲藏室，堆滿了油鹽糖酒及雜糧等物（他們的稻穀是連稻草一束一束的掛在村外的竹架上），獵具掛滿牆上。大廳的中間牆上，掛着兩對牛角；廳內的兩旁有兩張四方木枱，圍擺着近十張的木櫈；中間有一大土灶。這座房子的上下兩廳可容兩百人的集會。

當我到達時，他一家三男五女，圍坐在灶旁；酋長見我來了，立即站起，作有禮貌的歡迎我，笑着拉了一條櫈請我坐下，女人們也不廻避，跟大家坐在一起談天。兩位青年是他的兒子，身體壯健，約廿餘歲上下；五個年輕的婦女，雖然穿着瑤人的古老服裝，但她們的臉形體態，和雪白的肌膚，卻是另有一種美麗風韻（據說兩個是酋長的妻妾，兩個是媳婦，一個是女兒）。酋長因不大懂得我的話，馬上叫他的兒子去請那位漢人來。（他是專替酋長完

糧納稅及傳話兼教猺民讀書的。）從談話中知道猺人是信奉獸神的，他們的契約，還存下結草爲憑的草結，和象形時代的古文字。許多年前，猺漢民族間的仇恨很深，常發生嚴重的械鬥；漢人稱之爲「發猺瘋」。近十年來，猺王遷居於漢人居住的城市內，這種械鬥才沒有發生。但在猺民心目中，漢人都是很壞的，那些專做猺民生意的小販，常以廉價買來的藍布故衣，要換取猺民很多的穀物。獲利數倍，賣給他們的鹽，還滲入白沙。政府派來收稅的人員，又是作威作福，勒索壓搾猺民的錢財，無所不至，這些，都是最令猺民痛恨的事。我聽了這些話，便告訴他：我們是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將來中國革命成功時，歡迎猺民到大洞去居住，與漢人同等待遇。分田、教育，還有被選爲政府官吏的權利。各弱小民族，一律平等。所有的軍閥、貪官汚吏、惡霸、奸商，全要打倒！他聽了我的話，非常興奮！立即宰牛殺豬，準備歡宴我們。那三個年青婦女聽完我說的話，向酋長說了幾句話，酋長點了頭，她們便跑進房去，背了鳥槍和獸皮袋，帶了兩條狗出門去了。那時天尚未黑，但已接近黃昏，我問她們到那裏去？那漢人說：她們說你是個漢人中最好的人，要去打野獸送給你呢！我表示謝意後，便告辭出來。臨行時酋長約我今晚和幾位長官到他家裏飲酒。我只好答應晚上必到。回到營房不到一小時，正和李明瑞、張雲逸談天之際，那三位婦女便送來了一頭野豬和兩隻雉鷄。我們送了她們每人兩塊光洋，她們歡天喜地的回去。

那天晚上九時，酋長派那位漢人來請我們去飲酒，我和李明瑞同去。到酋長家裏時，樓上樓下擺着大鍋的豬肉牛肉，大罎的燒酒，聚集着男女近百人。樓上廳的中間灶邊，放着三個高約一尺六寸的大銅鼓；據酋長說這是他的家傳之寶。是漢末孔明征南蠻時遺留下來的戰鼓（或係宋時狄青南征時遺下的東西）。請我們坐在鼓上！這是表示最尊敬之意。大家圍着喝酒食肉，直至深夜二時才散！瑤民的盛意隆情，至今還不能忘懷！

第二天我們出發時，通知酋長，請他派壯丁來古州，他答應明天派來。

我們於六月下旬，進抵古州城郊。這時適値貴州省府主席王家烈，由貴陽出巡至古州。城內有步兵兩團，炮兵一營，固守頑抗。

我軍以十九師及附屬砲兵營攻城，工兵連架設都江浮橋，限當日正午完成，廿師爲總預備隊，安置於都江南岸，李總指揮及張軍長在南岸指揮。

古州城牆，約有廿尺厚，四十尺高，極爲堅固，我軍於八時佔領了西門外高地，可俯視城內，當即以砲兵營佔領該高地向地下砲擊，五十五團攻西北門，五十六團圍攻東南門，並搜集木板、竹梯爬城，戰鬥極爲激烈，正午十二時，五十五團第二營營長王震，於攻城時左脚折斷重傷（王震現任中共中央農墾部長）。午後一時，接到李總指揮命令，以堅城難下，着我撤退。我以本軍子彈消耗殆盡，若不攻下古州，無法補充，我無論如何，必在黃昏之前

攻下古州，請予核准覆之。是時，我心急如焚，乃即集中全師迫擊砲十二門，加入野戰砲兵陣地，向城內密集轟擊，掩護步兵爬城，下午三時，開始總攻，五十五團第二營代營長陳×（代王震），率領該營及師部特務連，首先從西門登城，接着五十五團何團長亦登城，向城內攻擊前進，五十六團亦攻破南門，向城內攻擊，王家烈以大勢已去，即率步砲兵開東門突圍而逃，我總預備隊五十七團立即跟蹤進擊，至十里左右之溪邊將敵軍全部包圍繳械，王家烈由其衞士背馱泅水而遁。

五時，古州全城肅清，戰事便告結束。

是役俘獲步槍五百餘枝，重機槍二挺，七五山砲二門，無綫電台一座，步槍子彈，足資補充，並俘虜七百餘人。敵軍兩個團除逃出少數外，全部覆滅，古城街道上，遍地有傷亡官兵，我軍傷亡亦有二百餘人。

佔領古州的那天晚上，來了很多瑤民，我們派員預備住所，好好的招待他們住宿和吃飯；並在古州城內搜購了很多鹽糖布匹，送給瑤民擔回家去。還告訴他們，如願意參加軍隊工作的，隨時可來入伍。於是他們都很高興的挑着東西回去。以後參紅七軍的有三十多人；均能刻苦耐勞，勇敢善戰。尤其是上高山如履平地，步行快速，非漢人所能及。後來還有幾個在紅七軍幹得很出色，做連營長。

在古州住了五天，正準備擴大佔領區，突接韋拔羣自右江來信（當時紅軍中還沒有無綫電器材設備來溝通部隊間的連繫）說：「百色已被右江民團司令岑建英攻陷，我師退守東蘭。」這個形勢的突變，使我們非常焦急。因右江是紅軍的主要根據地，百色失陷，整個右江將無法保存。於是我們又回師右江，準備收復失地。

行前，貴州省府主席王家烈送來一封信，要求李明瑞發還電台與山砲，免傷感情。並云追擊部隊，決不向紅軍攻擊。當時情勢，紅軍本身有一個砲兵營，砲彈儲備並不充足，補充更感困難。而無綫電人材，紅軍中更沒有。俘虜過來的電台技術人員，都是穿着長衫的文弱書生，他們對革命毫無認識，很難改造過來。這時王家烈所派的四個步兵團，每天都跟在紅軍後面，但不敢接近；在五里或十里外的地方宿營，雖然他們不敢與我們主力作戰，但究竟對我們的士氣有影響。於是到達福祿墟的時候，我們便將繳獲的電台及兩門山砲抛落榕江河內，並將無綫電台人員全部釋放。繼續取道天河、懷遠，回師廣西東蘭。

王家烈的部隊將電台及山砲撈回後，則不再尾隨着我們了。他這裏「有禮貌的追擊」眞是戰場上不可多見的奇蹟！

評：是役紅軍能攻陷堅城，是指揮官之堅定決心和將士用命所致，在戰術上：砲兵能充份發揮威力，步兵適時投入衝鋒，正是步砲協同，克敵致勝。

紅軍在東蘭休息了兩天，決定了反攻右江的計劃如下：

（一）二十師進攻田東，相機恢復沿江各縣。

（二）十九師附屬砲兵營進攻百色。

（三）廿一師（缺一團）及軍部直屬隊爲總預備隊，在十九師後跟進，策應兩師作戰。

（四）廿一師一個團留守東蘭後方。

各師於七月廿九日出發，分向目的地前進，十九師於卅日拂曉進抵三岔路口（距百色約十里）經過戰地偵察後發現敵軍，在百色城外西北高地構築石磚碉堡兩座，每座有敵軍約一連駐守，與城內守城部隊構成火網，封鎖攻城道路，總兵力約二千人。

我軍之攻擊部署：

（一）五十六團爲右翼，沿山路進出百色西門外地區向西門進攻。

（二）五十七團爲左翼，由三岔路通百色大道向百色東北門進攻。

（三）五十五團以一個營掩護砲兵營佔領敵軍碉堡北端之山地，先行摧毀敵軍碉堡後向城上目標延伸射擊，掩護各步兵團進攻。

（四）五十五團（缺一營）控置於砲兵陣地附近，相機策應主攻部隊作戰。

（五）我在砲兵陣地指揮。

我砲兵九時開始向敵碉堡射擊，各團之步砲亦同時向城上射擊，我野戰砲，連續發射均命中碉堡，不到十砲已將兩個碉堡摧毀，敵兵傷亡二十餘人，即潰退入城，我五十五團立即由中央向敵追擊，我左右翼兩團亦同時向城攻擊，城內敵軍見勢不可當，即向南門潰退，我右翼團迅即向南追擊，在市區外之小河邊俘虜敵軍百餘，其餘潰不成軍，四處逃散，或棄械潛匿於民居，我於十二時進入百色縣城，李總指揮、張軍長亦同時進城，當時工農商人均來密報化裝潛匿之敵，悉數被捕。

是役敵軍傷亡五十餘人，被俘二百餘人，繳獲步槍三百餘枝，我軍傷亡十三人。

二十師師長李湛率該師經過進攻民團之小戰鬥後，於八月三日前已克復田東，奉議、果德各縣。右江蘇區全部恢復。

溯自我軍於六月下旬，由百色出發，至七月下旬回師，反攻右江各縣；雖僅一個月，各縣市場已表現着冷落的氣象，尤以百色爲甚。查其原因，是由於多數外地商人對共產黨抱着懷疑與恐懼的心理，不敢再到百色來做買賣，而土貨外銷，亦受戰爭的影響，運輸交通困難，遂陷於停滯。同時有些豪紳地主，亦不滿我們的減租、停息、分田等措施；在民團進駐時，卻乘機向工農勒索賠償損失，但沒有屠殺情事發生。紅軍回來，他們恐懼中共殺害，便逃往南寧。一般工農羣衆的心理，亦因曾經受民團與豪紳地主的威迫，顧慮將來紅軍離去或

失敗時，又必然重受豪紳地主更大的迫害；因此，影響了他們的鬥爭情緒。

評：反攻百色之役，官兵用命，左右兩翼行動迅速，總預備隊亦能機動的加入戰鬥；戰術運用無可疵議；關於羣衆舉報潛匿散兵，是懼怕紅軍？抑是擁護紅軍？殊難定判；但右江地區，經過民團佔領後，市況凋零，民氣頹喪，不免有令人今非昔比之感！

紅軍派赴雲南的密探，在八月初旬送來緊急情報：「南京政府，命雲南朱曉東軍，取道龍州、百色，沿左右兩江進攻南寧。其經右江之張聰師，已到富州，將經剝隘入百色。」第二天，滇軍師長張聰來信，署云：「敝軍假道百色，沿右江南下進攻南寧，絕不侵犯貴治及騷擾軍民，幸勿誤會。」

滇軍究竟是否藉名過境而進攻紅軍？還是眞的假道百色進攻桂系軍隊？經過我們研究的結果，無論張聰師的企圖怎樣，打擊國民黨部隊壯大自己，是我們已定方針。滇軍以長途行軍的疲勞之師，乘機將其擊潰，正是紅軍擴充實力的機會。便按敵進我退原則，決定退出百色縣城，待敵疲勞時，在思林果化間之山谷殲滅滇軍，並作如下之戰署部署：

（一）總指揮部、軍部、十九師（缺五十五團）及二十師全部集結於百色以北之淩雲汾州、龍州墟一帶。準備於張聰師離開百色沿右江南下時，我軍尾敵追擊。配合思

林之五十五團，在右江左岸殲滅之。

（二）龔師長率五十五團，即移思林至馱層大路以東之山村，準備在思林自馱層之谷地，伏擊由思林至果化運動中之敵人，並配合主力追擊部隊，一舉而殲滅之。

（三）廿一師在駐地繼續整訓。

（四）百色、田東、平馬、思林各縣，沿江交通大路鄉村之糧食，全部運上深山疏散收藏，不得資敵。

（五）百色至果化沿江船隻，立即移至百色以上，勿爲敵軍所利用。但少數交通渡船，可保留維持交通，必要時予以破壞。

（六）各縣赤衛隊，須利用沿江及大路兩側山地埋伏，進行擾敵工作。特別是當敵軍宿營時，運用敵駐我擾游擊戰術，利用夜晚向敵駐地進襲，以擾亂敵人。

這個作戰計劃決定之後，我率五十五團，迅速的在思林之南之山谷，依據有利地形，將伏擊的準備工作完成之後，便隱蔽在東北面的小山村裏休息。

滇軍張聰師，在百色休息兩天，與廣西右江民團司令岑建英取得連絡，讓民團進駐百色，然後沿右江左岸南下，經田州、田東、平馬至思林。

由思林至果化的三十華里間，接近果德東岸一段十五華里沿路的兩旁，都是嶙峋的石

山，中間爲一條寬約一百至百五十公尺的谷地，部隊不易展開，眞是天造地設的良好大兵團伏擊陣地。

張師的先頭部隊一個團，全部進入了我們佈置的口袋地區時，五十五團即以猛烈的炮火，前後封鎖，全綫加以猛烈攻擊。同時組織步兵衝鋒，喊殺連天，震動山谷。混戰達二小時，滇軍先頭部隊，拚死衝出包圍，佔領果化對岸之小山，控制渡河點，掩護其後繼部隊突圍。其未進入谷道的部隊，即退回思林，改道渡河沿右岸至果化。紅軍主力部隊，因行動遲緩，僅在思林附近消滅其後衛部隊一部。

這次伏擊，雖然沒有全殲張師，但滇軍傷亡官兵七百多人，陣亡了一個團長，重傷了一個特務營長。紅軍俘獲了步槍四百多枝和其他很多軍用品，俘滇軍官兵五百多人。紅軍重傷團政治指導員楊英及官兵五十餘人。

戰鬥結束後，我們開了一次檢討會。認爲這次作戰，沒有將滇軍全部消滅，以致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殲敵機會。檢討的結論是：

缺點方面：

（一）使用於伏擊戰的兵力太少，致敵人進入伏擊地區，因火力稀薄與兵力不足，仍被其突圍而出。倘能以一師的兵力，埋伏於十五華里長的谷道內，必可將其全部殲

滅。

（二）主力跟敵尾追，行動遲緩，不能及時趕至思林，配合伏擊部隊作戰，被其後衞部隊大部逃去。

（三）擾敵工作沒有切實執行，堅壁淸野工作，也做得不夠徹底。致予敵人精神上的打擊不大，敵軍官兵的戰鬥意志，尚屬堅强。

優點方面：

（一）伏擊部隊對戰地偵察週密，伏擊部署適當。

（二）伏擊部隊動作堅決，在短兵肉搏時，沒有一人後退；雖傷亡數十人，仍戰鬥至結束而後止。

紅軍雖在伏擊滇軍時獲得勝利，而作爲紅軍根據地的百色，卻在滇軍到達時，再爲岑建英的民團所佔領。要怎樣奪回這個右江的重鎭？是我們下一次的重要作戰計劃。

由於紅軍對失去的百色，是志在必得的原故，盤據在百色的右江民團約二千人，在民團司令岑建英的指揮下，正在積極修復碉堡，構築城內外及河邊障礙工事，與作戰準備。並向凌雲、西隆、鎭邊、天保各縣徵調民團協守，準備以百色作爲打擊紅軍的核心基地。他們雖只有二千人，但戰鬥力並不弱於正規部隊。據險抵抗，使紅軍不易達到作戰目的。紅軍因彈

藥消耗過大，補充不易，迫得暫時放棄收復百色之計劃，回駐右江左岸各地調整補充。

評：是役紅軍的戰畧是：發揮游擊戰、民衆戰，配合紅軍主力的運動戰以消滅敵軍，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有以下的缺點：

(一)軍事部署：對十五華里深長之埋伏山谷，僅以一個團的兵力擔任伏擊，是太少了。

(二)啣尾追擊兵團，兵力過大，又不能緊跟敵軍行動，不能及時配合伏擊兵團作戰，致失戎機。

(三)民衆武裝的抗敵行動，紅軍沒有派軍政幹部去加强領導，以致不能起應有之作用，實爲憾事。

上述第一項，作者當時曾力爭以十九師全部擔任伏擊，但爲張雲逸及陳豪人等所反對，致失殲敵良機，殊爲可惜！

① 土地分配取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辦法；是將土地多者抽出來補給土地少的，將土地肥沃的抽出補給貧瘠土地，以求平均。

第五章　紅八軍的成立與失敗

當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廣西行動委員會，關於分配左江工作的主要領導幹部，有俞作預、徐冠英、史書元三人，以後徐冠英因公赴安南被安南政府扣留，釋放後赴香港則脫黨。左江的領導人僅有俞作預、史書元兩人，我們曾報告中共中央請加派得力軍政幹部赴龍州加强領導，但後來沒有實現。

紅八軍的基本部隊是：警備第五大隊，官兵約二千人，蒙志仁一個團，官兵約二千人，廣西國軍編遣特派員公署特務營約七百五十人，野戰炮營約八百人（有七五糎山炮四門）。

上述部隊是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隨俞作預到達龍州，同時由南寧運龍州的軍械彈藥甚多（比右江爲多），俞作預是龍州對汛督辦，他到任後，即加緊招募新兵，擴充軍隊。待至一九三零年二月間，已編了兩個師。俞作預接到右江廣西行動委員會給他關於創造左右兩江蘇區及成立紅軍七、八兩軍的指示後，他便於二月二十五日宣佈成立工農紅軍第八軍，當時他控制着龍州及附近之上金、崇善、明江、寧明、憑祥五個縣，他的幹部有：由黨中央派來的黃埔軍校出身的軍事幹部約有十餘人，其餘的是中央軍校南寧分校第一期畢業生及南寧教

導總隊未畢業的學生，但中共黨員甚少，全軍初期只有黨員同志三十多人。

俞作預是廣東西江講武堂畢業，曾在桂軍任過團長，是一個中共的忠實黨員。他的主要助手史書元，有學識而缺乏作戰經驗。因此，紅八軍的作風，仍保存着國民黨軍隊的個人領導作風。八軍部隊中的政治工作，因缺乏政治幹部，所以做得很差，但軍事訓練卻還好。這就是紅八軍編組前後的一般狀況。

左江蘇維埃運動，因左江工作同志沒有一個有經驗的，過去工農羣衆革命組織又沒有基礎，俞作預接到要建立左江蘇維埃的指示，只有和史書元商討辦法，因史是湘東瀏陽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的情形及毛澤東在井崗山建立蘇區的情形，他僅畧知一二。當時他就決定於紅八軍成立之同日（二月二十五日），同時宣佈成立左江蘇維埃政府（那時李明瑞還在龍州），將龍州對汛督辦公署改爲左江蘇維埃政府地址，並由俞作預任主席，並即委了所轄各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吸收了幾個工人農民參加政府工作，各區、鄉的蘇維埃政府及工農會組織亦由政府及少數地方黨員協助下大部份地區均已建立起來了，但因爲他們沒有經驗，宣傳組織工作又不夠深入，羣衆參加革命組織成爲被動的，所以羣衆革命鬥爭並不熱烈，左江蘇維埃運動徒具形式而已。

紅八軍的蒙志仁團，原是李、白、黃桂系軍隊中梁朝璣旅的一個團，梁朝璣是屬於黃紹

竑系統的，蒙志仁因與俞作預有私人友誼，且其善於應付環境，據俞作預說：當廣西清黨排共時，他被開除軍籍後，曾受蒙志仁之庇護，故當俞作柏、李明瑞回桂，佔領全省，整編梁朝璣旅時，蒙志仁即投向俞作預，俞遂倚爲心腹。俞李反蔣失敗時，俞作預奉命爲龍州督辦，即命該團隨同警備軍第五大隊開赴龍州，當作他的基本武力。

紅八軍成立時，該團編爲紅八軍第二十二師六十五團，並委蒙志仁爲二十二師副師長兼六十五團團長（俞作預任紅八軍軍長兼廿二師師長）。歷來相安無異，且訓練部隊極爲努力，甚得俞作預的信任，並曾於一九三零年一月間介紹他與李明瑞同時加入共產黨，舉行過正式入黨儀式（這是李明瑞對我說的）。

當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聯合張發奎反對南京中央，發動攻粵戰事的時候，梁朝璣又被任爲師長，收集舊部再編成師，並曾參加攻粵軍事。一九三零年五月間派員秘密赴龍州策動蒙志仁叛變，蒙本無革命意識，一聞舊長官見召，立即將該團政工人員屠殺，率部逃回南寧。是時正是紅八軍準備配合右江紅七軍會攻南寧之際，時間約是五月中旬，李明瑞離開龍州來右江之後。

紅七軍自古州回師右江後，即聞左江紅八軍失敗的消息，但情形如何，則未獲眞實之報告。行動委員會決定由我率一個團向左江方面游擊搜集左江情況。我即於八月十六日率領五

十五團由思林出發，十七日佔領向都縣城，當日即有紅八軍之副官一人率帶士兵十四人向我報到，據稱紅八軍已失敗，尚有走散官兵在龍茗、鎮都一帶。我據報後，即於次日派出四個步兵連，分四路向龍茗、鎮都游擊，經過五天的時間共收容八軍官兵一百二十多人，即率部於八月二十二日，回抵思林。

綜合收容人員的報告，紅八軍失敗情形如下：

自蒙志仁叛變及紅七軍進攻隆安撤退之後，廣西桂系當局，深恐紅軍進攻南寧，擾亂其後方，那時因桂軍主力已準備由桂林、柳州進攻湖南，為了確保南寧安全，減少紅軍威脅，黃紹竑即於六月間率領清鄉司令李奇的兩個團及四十五師之兩個團進攻左江。那時紅八軍因蒙志仁之叛變，已放棄崇善縣，集中兵力於上金、龍州之綫。當桂軍進攻時，曾在上金作戰一次，紅軍失利，退守龍州附近。桂軍接着向龍州進攻，紅八軍曾拚死抵抗與桂軍決戰，戰事異常慘烈，卒被桂軍擊潰，一部渡江逃向養利方面散去。俞作預率殘部退憑祥縣，桂軍仍跟蹤追擊，八軍官兵已知不能再戰，亦不願作俘虜，隨即散去。俞作預隻身逃入安南邊境。至此，紅八軍及左江蘇區全部失敗了。

俞作預以後轉赴香港，抵香港後找不到黨的連絡，不久，被廣東陳濟棠之偵探查悉其行蹤，假借中共名義，約他到廣州某地晤面，他竟信以為眞，前往廣州，於抵達約定地點時，

即被公安局人員拘捕，旋被殺害。

一個忠厚勇敢的同志，又在這一次政治鬥爭中犧牲了！

第六章　廣西紅軍奉調江西集中

一九三零年正是中共執行立三路綫的時期，他要集中紅軍力量進攻武漢，派鄧小平來廣西蘇區，傳達命令，但因沿途要經過國民黨的統治區，中共中央於六月底發出的指示，直至九月中旬才由鄧小平送到給我們。其內容大約如下：

（一）國內反動統治階級，內戰頻仍；已走向崩潰的道路！革命鬥爭形勢，由於江西蘇區、洪湖蘇區、鄂豫皖蘇區的發展，與各地紅軍的壯大；國民黨統治區內與蘇區工農鬥爭的積極化，中國革命高潮即將到來。本黨號召全國紅軍一切革命力量集中起來，向武漢進軍，建立以武漢爲中心的革命政權，進而推翻國民黨整個政權，以完成全國革命的勝利。

（二）各地紅軍立即由分散游擊，轉爲集中作戰，由游擊戰、運動戰，轉爲打硬仗攻城戰。

（三）江西蘇區紅軍，爲現階段革命戰爭之主力，廣西的紅七軍、紅八軍主力，應即調江西蘇區集中，以執行新的戰爭任務。

（四）紅七軍、紅八軍，在東調行軍途中，應選擇敵軍弱點攻打城市，以策動羣衆鬥

爭，促成國民黨政權之早日崩潰。

（五）紅七軍、紅八軍東調時，應留置一部繼續保守與發展左右兩江蘇維埃運動。

這個指示遲到了三個月，紅八軍已全部瓦解，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僅剩下紅七軍的一個軍，支持着廣西蘇區的鬥爭任務。我們接到指示後，經過了三天的會議；首先是討論關於紅七軍應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開赴江西集中的問題？當時我和李明瑞的主張，是向貴州發展，把貴州全省的政權奪取過來，以與江西蘇區相呼應。理由是貴州省主席王家烈，腐敗無能，軍事實力薄弱，加上民衆對王的不滿；我們若集中兩個師的兵力，先佔領羅斛、紫雲、安順各縣，與右江蘇區連成一片，造成黔桂邊區的廣大蘇區根據地，然後再攻貴陽，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若由右江調到江西集中，經過長途行軍作戰，難免不受損失。且七軍主力如離開右江，則右江蘇區會有不保之虞，損失更大。可是鄧小平、陳豪人等，堅持執行中央命令，以迅速開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全國革命勝利。認爲對於右江蘇區，可留一個師的兵力，連合現有赤衞隊，共有萬餘人，儘足保衞這一蘇區。對於奪取貴州一省的政權，雖然是安全的發展；但政治影響不大，對於配合全國革命的作用也很小。他們以這些理由，否决了我們的建議。他們認爲廿一師韋拔羣部，以前本是廣西的游擊部隊；對桂北地形熟悉，極適合留

在右江，以東蘭、鳳山爲基地，繼續領導革命鬥爭；總指揮部應率紅七軍（缺廿一師）取道湘粤桂邊區，前往江西蘇區集中。經過了三天的會議熱烈爭辯，當時韋拔羣、李樸都站在我們的一邊，但結果還是遵照中央的指示執行。

紅七軍主力既決定遵照中央指示東調，關於右江工作的佈置及廣西工作總結，鄧小平要我起草了一個報告，經過討論，內容大畧如下：

（一）關於右江蘇區的工作部署的決定：

（1）廿一師爲右江革命鬥爭的軍事主力。仍以李樸爲廿一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協同韋拔羣師長指揮該師及右江地方團體部隊，保衛並發展廣西蘇區的工作。

（2）黨務方面，組織右江特別委員會。以雷經天爲書記，韋拔羣、李樸等爲委員。領導右江各縣黨的工作。

（3）右江蘇維埃運動，仍由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及各委員，負責領導。

（4）紅軍廿一師，受右江特委會指揮。

這個執行中共中央命令的計劃決定後，便積極準備出發。那時季節已是秋末，天氣即將寒冷；因紅七軍近數月來，攻古州（榕江）、攻百色、伏擊滇軍，沒有時間籌購冬服；百色

又未攻下，使我們感到困擾和煩惱，只好在行軍的沿途中尋求辦法。

（二）廣西的鬥爭總結：

中共與俞作柏合作的第一階段，廣西的工作是由我領導的。後來才由廣西行動委員會領導，迨至廣西政變，我們退守左右兩江，賀昌、鄧小平均返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情況，黨務轉由陳豪人負責領導，我則專負策劃創建廣西紅軍的責任。對建立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意見，陳豪人同志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我們並沒有完全按照中央發動激烈的階段鬥爭的指示去做，而採取了溫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因爲廣西右江蘇區，有異乎其他蘇區的特點：

1、在紅軍佔領區內，除百色、東蘭、鳳山、奉議、田東、果德各縣建立蘇維埃政府之外，其他如天峨、淩雲、天保各縣，均是貧瘠的縣份，文北落後，人民守舊；爲適應當地的實際情形，並沒有成立蘇維埃政府。仍用縣長制，一切政令不受影響，仍能順利的進行。

2、在廣西蘇區內，沒有殘酷的農村階段鬥爭，也沒有普遍的實行分田。很多地區僅實行減租運動；即照地主僱農原議之租額，減少百份之五十繳納，凡有自行耕種能力者，不論地主或富農，均予分田①。因此，能相安共處，並因此吸引了很多地主豪紳的青年子弟參加革命。

3、除東蘭縣外，其他地區，只將有反革命行爲的地方惡霸予以處死外，沒有採取屠殺

地主豪紳的政策。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僅取消了地主豪紳在農村中把持鄉政的特殊地位，與重租高利的剝削。並沒有消滅地主豪紳階級敵人，或其家屬；所以右江蘇區的豪紳地主，仍能自食其力，安居樂業。他們對共產黨，沒有深切的仇恨觀念。

4、所有被俘的右江各縣政府機關的職員與各縣縣長，均未加以屠殺，且任其自由離去。其中也有少數願意參加紅軍工作者亦予收容，如養利縣長陳叔度及其兄陳伯度兄弟兩人，均參加紅七軍工作。

5、取得了苗、瑤、侗、僮各民族的合作，完全打破了民族歧視的觀念。紅七軍中也有不少的各民族官兵。我們爲了爭取各民族的團結合作，曾在平馬舉行過一次各民族聯合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除漢、苗、瑤、侗、僮五個民族外，還有回、伶、犽及安南等民族。各參加的民族，男男女女，都盛裝到會；情形異常熱鬧，在融洽的氣氛中進行。我們的政工人員，對於他們的招待，特別週到，而且熱情，使他們得到從所未有的尊榮。當時曾有一位苗族代表，感動地說：「我們苗人沒有夢想到漢人會這樣熱烈的招待我們！以前我們不僅不能見到漢人的大官，或和漢人官吏一起食飯喝酒，就是鄉長都難得見呢！」他說話的時候，竟流下淚來！我們對他們宣揚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使到會的都深受感動！

6、紅七軍沒有建立政治委員或黨代表制度，也沒有實行特務控制的辦法；僅有政治部

主任及政治指導員的設置，專負責部隊政工之推行，及發動羣衆工作。所以紅七軍的黨、政、軍、官兵之間，感情融洽，沒有發生叛變，或向敵人投降的事發生，甚至沒有逃兵。

7、蘇區與白區，有時雖因戰爭交通受阻，影響運輸；但戰爭結束後，馬上恢復交通。一切商業上的來往，物資的交流，都不曾受到阻滯。如雲南貴州的烟土，仍通過百色運往南寧出口；右江大量的牛皮、山貨，照常輸出。蘇區所需的西藥布匹和食鹽等，也沒有中斷。向安南購買軍用品如望遠鏡、西藥等軍需物資，都可平安運入。所以我們在右江一年的時間，人民並不感到困擾。

8、紅七軍的衛生設備，由於經濟較充裕，中西藥及儀器的購買都容易。因自己本身有醫藥，地方上的中西醫生，也很樂意服務，加上官兵的體格强健，營養充足，在醫藥環境上說，還沒有發生困難。

9、對宗教問題，我們始終依照既定政策，實行信教自由，在廣西蘇區內，僧侶、基督、天主等教，仍任其自由傳道。他們也常常幫助紅軍，如平馬教堂經常幫助紅軍救傷醫療工作。我們這裏與江西蘇區之絕對禁止宗教活動沒收宗教財產者，完全不同！這是值得特別提出的。

10、對於俘虜政策，除了吸鴉片烟的立即遣散外，其餘的經過宣傳教育後，由其自願去

留，去者給予旅費，留者編入隊伍，視其能力來分配工作，待遇是平等的，故紅七軍內俘虜很多。

廣西蘇區這幾個特點，是我參加黨的工作時間所認爲愉快興奮的事。而所以有這幾個特點，是因爲我們在執行政策時，抱着悲天憫人的心理，人道主義的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但這些都爲馬克斯主義所不能容忍！不過我是爲了適應地方的特殊環境而運用的鬥爭政策，並非反馬列主義原則上的錯誤，因此，我亦認爲是適當的。

可是中共中央負責人，對廣西工作的缺點和錯誤，並沒有正確的認識。廣西工作的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是：

（一）中共中央沒有把握着俞作柏在廣西執政時的機會，派遣中央大員到廣西去，協助俞作柏工作。適時的提出本黨的主張，緩和他反對南京政府的行動，積極建立起自己的實力；及派出大批黨員滲透國軍十五師與五十七師，控制這兩個師的實力。同時也未能領導廣西地下黨部，積極發展地方黨的組織，使與軍事滲透工作和建軍工作相配合。只派了我們幾個幹部到廣西去，擔當這種艱巨的任務。由於幹部缺乏，致使工作發生困難和阻延。這種錯誤的產生，是黨中央對俞作柏採取不信任的態度，而只採取一時利用的決策。且特別注意向他籌錢，甚至俞作柏失敗逃到香港，仍不斷的向他索錢！由三二千元到一百幾十元都要。但

當俞作柏提議再回左右江領導軍事鬥爭，即遭黨的拒絕，這就是黨對俞的不信任之佐證。其實當時俞作柏是誠意接受中共領導的。由於黨中央對俞的認識不夠深入，致失去一個建立實力，創造新局面的最大機會。

（二）俞作柏政權失敗，對左江工作，沒有配置相當的政治幹部，僅由沒有革命鬥爭經驗的俞作預和史書元負責領導。當時左江軍隊，除了第五大隊外，還有蒙志仁一個團；及省政府，特派員公署的直屬部隊，左江的兵力，要比右江多了一倍；因爲沒有正確的領導，以致損失了這一個第八軍的力量。

（三）右江工作，犯了保守觀念的錯誤；只注意百色及沿江幾個縣的工作，沒有積極向滇、黔及安南邊境的那些山城小邑發展；沒有積極去消滅附近縣份的反動民團勢力；只顧着沿江幾個縣的安全。倘若當時能積極肅清滇、黔及安南邊境如：西隆、西林、凌雲、鎮邊、靖西、鎮都等縣的少數反動民團勢力，向雲南、貴州兩省發展，則這一蘇區，決不致被桂軍摧毀。

（四）我們整個的忽視了民衆教育與文化運動工作。佔領右江一年的長時間，沒有訂定普通教育的教材，沒有普遍的展開成年工農的文化普及教育運動，沒有出版報刊，宣傳黨的革命理論和政策，使我們的政策沒有普遍的深入到羣衆中去；一般的宣傳工作，也不夠深

入。因此，工農羣衆只知依賴紅軍，保護他們，沒有使這一革命鬥爭成爲廣大工農羣衆本身的鬥爭。以致敵軍來時，羣衆不積極參加反抗，而讓紅軍單獨作戰。

（五）在廣西我們黨的組織，無論在白區或蘇區，都是很脆弱的。這是忽視了發展黨的組織的事實表現。因爲黨的組織薄弱，自然黨不能在廣大羣衆中起領導作用，演成紅軍單純的軍事行動。

（六）右江蘇維埃運動，因黨的領導薄弱，政府組織又不健全；所以在右江革命鬥爭中，沒有起重大的作用，也沒有引起工農羣衆的重視。

以上這些缺點和錯誤，使廣西革命的工作不能迅速廣泛的開展；是紅七軍主力在東調後的失敗主因。站在黨的立場來說，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

至於紅七軍調江西集中，黨指示沿途奪取城市，打硬仗，這更是中央的嚴重錯誤。當時桂系軍隊正在「反蔣」，絕無力量進攻右江，正是擴大廣西蘇區的好時機，同時貴州省的反動力量，是西南數省最脆弱的一環，要是積極充實紅七軍三個師的兵力，以廣西右江爲基地，向貴州擴展，進而奪取貴州全省政權，是有把握的。最低限度，亦可建立一個鞏固的黔、桂邊的廣大蘇區，以與江西蘇區相呼應。這對於當時革命運動的作用與影響是非常重大的。但中共中央竟沒有看到這一形勢的重要性，卻盲目的將紅七軍主力東調，致紅七軍遭到

重大的損失！當到達江西時僅剩下兩個團的兵力。而廣西蘇區，也因紅七軍主力東調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完全瓦解了！並且犧牲了無數的革命戰士，甚至連韋拔羣師長也殉職了！

在紅七軍離開廣西之前，我們決定沿着湘桂邊境通過。為了要明瞭沿途敵情起見，首先派出六個密探組化裝行商，前往廣西之懷遠、融縣、全縣；湖南的武岡、道縣一帶偵察敵情。

在右江成立並奮鬥了一年多的紅七軍（缺廿一師），於一九三零年十月下旬，離開右江基地東蘭，向指定的江西蘇區集中。

紅軍離桂的消息，已為桂軍所獲悉。路上不時遭到桂軍的正規部隊與民團的襲擊，但都被紅軍擊退。我們第一步經河池、思恩、天河，而至融縣之北的古龍。

由思恩到古龍行了三天，沿途都是崎嶇的山地，古木參天，沿途民居甚少；携帶的糧食因無法購買補充，已經吃光了。我們到古龍時已是下午四時，古龍的民衆全都逃往山中，這時正下着毛毛細雨，我焦急萬分，便親自跑去找民衆，結果只找到了一位年輕的教員，我說服了他，然後通知政治部各部隊的政工人員，隨同那位教員到附近山上叫民衆回家。經過政工人員努力向他們解釋之後，民衆才陸續地返回家去。

在行軍期間，我們規定是用現金購買糧食；除了著名的反動分子及大土豪，我們必須沒

收其財物之外，對於羣衆，是絕不騷擾的。因此軍紀極好，民衆回家後，我們便先以銀元給他們，動員全體農民，整夜磨穀作米，好不容易才籌得了兩天的糧食。

那天下午八時，接到密探組的報告：「長安墟內所存的被服布匹及其他物資甚多，僅有敵軍一個團駐守。」這時，正值「已涼天氣未寒時」的舊曆十月初了；我們部隊的冬服還未有解決。而在山區行軍又特別寒冷，棉衣正極需要，爲了解決這個急切的問題，唯有打下長安是個最好的辦法。就因爲這樣，我們不能不來一次軍事冒險！

長安是容江邊的一個墟場，又是桂黔兩省的交通要道；市廛櫛比，是桂北的重要商場。守軍雖只有一個團兵力，但他們深溝高壘，事前早有戒備；市區的巷戰工事，也構築得很堅固。紅軍兩師兵力，經過一日的戰鬥，僅佔領了長安市區西北部份，繼續强攻五日，也只佔領市區的一小部。那天下午三時，我正在長安東北端沙田柚園內的炮兵陣地指揮，突接密探報告：「桂軍四個團由柳州開來增援長安。其先頭部隊一個團已到達長安的對岸，現正開始從浮橋過河，進入市區；其後續部隊正源源到達中。」我即以電話報告李明瑞總指揮及張雲逸軍長。那時我軍在連日作戰中，已傷亡二百多人。李總指揮立即決定放棄原定作戰計劃，向福祿轉進。並即分派部隊打掃戰場，掩埋陣亡官兵，撤退傷患者，另由十九師派五十六團，埋伏於長安北十餘里的山地，做好伏擊準備，然後陸續撤退向福祿轉進。敵軍從長安墟

所派出的一個團追擊部隊，遭到紅軍的伏擊，倉惶退去，被紅軍俘獲五十餘人，算是這次戰役的最後收穫。此役雖不能攻下長安，達到作戰目的；但我們的攻擊精神和轉進的部署，使桂軍知所警惕；從此以後，桂軍便不敢輕舉妄動向我軍攻擊了。

評：既知敵軍有强固防禦設備，紅軍在東調途中，不應强攻；强攻不下，更不應戀戰，致遭不必要之損失；惟主動撤退時，能從容不逼，打掃戰場，且掩護部隊能運用游擊戰伏擊敵人，消滅其一部，使敵人知所警惕，堪稱退兵之楷模。

福祿在黔桂邊境，是榕江左岸的一個墟市，附近多係傜區，該墟爲傜民貿易之所。有商店百餘間，商業繁盛，是年七月間，我軍由古州回師右江時，曾經過一次，並在該墟休息過一天，做了一天宣傳工作，他們對紅軍的紀律，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次見我軍由長安撤退，回到福祿，時間雖已入夜，但全墟商民均開門提燈，燃放爆竹，歡迎紅軍。不少男女居民，幫助紅軍傷兵換衣洗脚，送茶送飯，他們那種眞誠的熱情，使我們全體官兵都爲之感動！

第二天，在福祿休息，商民替紅軍四處收購糧食（該墟存糧不多）。並集中了全市所有布匹，替紅軍趕製冬服，僅僅一天的時間，我們在這小小的市場，準備了三天的糧食，和三百多套冬服。還有三十個重傷士兵，羣衆全都替我們留下來掩護療治。在我們出發時，他們

仍熱烈的歡送。這種民心所向的表現，足以說明：軍隊紀律的嚴明與否，實爲中國內戰勝敗的決定因素。

從福祿經三江、橫嶺，進入湖南，紅軍官兵的精神體力，都已恢復。連續攻克綏寧、梅口。沿途雖有小戰鬥，都由前衞部隊十九師擊退。因此士氣又迅速提高了。不久，前鋒便進抵武岡縣境。

武岡縣城，這時有地方團隊千人駐守。環繞在武岡周圍的據點邵陽、新寧、城步都沒有國軍。我們判斷：即使國軍從衡陽馳援，以汽車運兵，也需要三天時間才能到達。如果我們能在這有利的時間內，奪得武岡，對我軍軍需的補充，有很大的幫助。由於這一鼓舞，紅軍以急行軍向武岡突擊，但固守武岡的民團，已有充份的準備，紅軍的突擊計劃，不能實現。從而重新部署圍攻縣城，希望發揮炮火威力，掩護步兵以雲梯爬城。

武岡縣在明末時，曾作爲桂王的皇城；城牆堅固，高達六丈以上；守軍又是沉着應戰，無懈可擊，致攻城戰鬥毫無進展。

到第三天晚上，我建議放棄攻城，以防敵軍增援部隊到達時，內外夾擊。但李明瑞和張雲逸都不同意。他們認爲黨中央已有沿途攻奪城市的指示，而敵人的增援部隊料非五天不能到達；我軍應在兩天內攻下縣城，再打擊其增援部隊。於是一面繼續攻城，一面派出了一個

營向寶慶之桃花坪方面游擊，偵察敵情。到第五天拂曉，游擊部隊倉惶退回，國軍部隊亦跟着由東南北三面增援，向紅軍攻擊；至此，已是前有堅城，後有强敵，只有急忙向南撤退。這一次，損失甚大。第十九師五十五團團長何子礽陣亡，官兵傷亡者有三百餘人；還有兩營在撤退時失了連絡。以後在全縣時，才有二百人歸隊。

評：是役以戀戰之故遭受重大損失足爲後戒。

武岡失敗，對於紅軍的士氣影響極大；從後跟蹤的湘軍，威脅着紅軍的安全。爲了避免再打硬仗，脫離國軍的追擊，乃經大雲山出廣西。攻克全縣。那時桂系軍隊，已攻湘失敗，受了重大損失，退回柳州一帶。而攻桂之滇軍，仍在圍攻南寧。粵軍已深入貴縣、賓陽一帶，截斷了柳州與南寧的聯系；李、白正在積極向圍攻南寧的滇軍進攻。桂林沒有大軍，我們也就安心在全縣休息了三天。又添置了五百套冬服，然後由永安關入湖南，佔領道縣。像這樣今天湖南，明天廣西，後天又回到湖南的迂迴曲折的轉來轉去，完全爲了避免戰鬥的行動。

湘、粵、桂三省毗連的地區，都是連綿不斷的崇山峻嶺；這一帶的縣城，也都很偏僻、貧瘠，無法一次可以補足兩個師的冬服，如以流寇式的强擄手段就地徵集，則沿途經過十餘個縣城和市鎮，早可設法補足，但這樣對羣衆的印象太壞，而且會引致軍紀廢弛，無法收

拾！

季節已進入深冬，風雪載途，使我們無法行軍。士兵們在宿營或中途休息，及警戒哨所，都燒着柴火取暖，那種瑟縮的情狀，不忍卒睹！在道縣休息了兩天，因爲有敵情顧慮，不得已冒着雨雪前進，途中積雪數寸，遍野皆白！由道縣到江華士兵在進行途中，凍死了三十多人，凍病了的爲數更多！

爲了激勵士氣，我們在江華，動員了全體官佐，將自己多餘的冬服和被褥，分配給士兵。更有些從身上脫下來，送給患病而衣薄的人，高級幹部也是如此。這一來官兵間的界限完全打破，官兵間的感情更加融洽；這一種甘苦與共的做法，使全軍的人上下一心，堅决的向江西蘇區前進！

同時爲了二百多個重傷兵的伕力無法解决，我們決定一改當時部隊中「只重物質不重人」的觀念，將多餘的步槍和整個野戰炮營的四門山炮及所有炮彈，均埋藏在一個荒山雪野中；令該營運輸兵抬運傷兵。那些睡在擔架床上的傷兵，看到紅軍首長們這樣對他們的關懷，大多數都感動得哭起來了！他們聲言傷愈後，誓將生命獻給革命戰爭。故紅七軍在流竄的途中，雖然痛苦，但官兵間的感情，終始打成一片，絕沒有逃亡和背叛的事件發生。

由於雨雪所阻，在江華休息了四天；迨雨雪停止，天氣放晴，才繼續行進，越過廣西之

桂嶺，轉入廣東之連山。到達連縣的東陂，探悉連縣僅有民團駐守，爲了急切解决冬服問題，便於次日進攻連縣。僅有微小戰鬥，即佔領城外市區，但連縣的地方團隊早有準備，頑强地固守縣城；並將城外毗連城牆的房屋，噴射火油燒燬，使我們無法接近城邊，此時我五十五團團長李顯受重傷（何子祁死後接替）。在這種情況下，只得放棄攻城計劃，再向北沿着粤湘邊境，向江西前進。

因爲我們和江西蘇區做法不同，不反對宗教，更沒摧殘宗教；連縣城外基督醫院，收容了我們二百多個重傷的官兵。這是偉大無私的宗教傳道者們，給予我們傷兵以極好的照顧，主持醫院的院長，答應將紅軍治療至痊癒爲止；並負責運送赴香港，並向我們保證，在治療期間的安全，絕不容許國軍將他們屠殺。這樣，我們才放心地將傷兵留下，向粤湘邊區的梅花進發。

紅七軍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到達梅花鎮，因長期行軍與作戰，傷亡損失極重。爲便於指揮，適合作戰要求，在梅花鎮休息時，特將兩個師縮編爲兩個團。十九師編爲五十五團，由我兼任團長，陳漫遠任政治指導員。以馮達飛任第一營營長，張翼任第二營營長，黃子榮任第三營營長，李天佑當時是連長。二十師全部合編爲五十八團，以李明瑞總揮指兼任團長，袁任遠任政治指導員，原廿師師長李湛兼第一營營長，黃冕昌任第二營營長，章健任

第三營營長。部署已畢，擬經樂昌出仁化，然後沿湘贛邊境入贛南。

整編了的紅七軍，正在梅花鎮準備出發的早上，忽然湖南國軍的一個旅，廣東國軍的一個團（團長鄧揮），從東北兩面向紅七軍包圍攻擊。我五十五團很快的佔領了梅花東面山地，五十八團佔領了村外碉堡及村緣，與敵對峙，於是激烈的戰鬥，便在梅花鎮附近展開了。這一仗，帶給我以無邊的痛苦與辛酸！是我在生命史上畢生難忘的一役。

從清晨到午後二時，戰鬥激烈地進行着，衝鋒接連着衝鋒，肉搏連續着肉搏；在反覆衝殺中，雙方的傷亡都很大。五十八團第一營營長李湛（原廿師師長）由左翼出擊敵軍時，不幸陣亡！第三營營長章健亦跟着犧牲了！軍心大受影響，迫得退回原陣地固守。爲了扭轉戰塲形勢，我率五十五團由右翼出擊。在衝鋒時，敵人陣地上一陣密集的機槍響了，我左腿已中彈，倒在地上；幸而搶救得快，迅速脫離了敵人火網。

「哎呀！師長帶花了！」這震動而沉痛的消息，迅速傳遍戰地。李湛、章健的犧牲和我的重傷，頓使軍心動搖！無法再戰。李明瑞迅即將部隊脫離戰塲，向南撤退，至大坪楊家集結。晚上，李明瑞、張雲逸來到我床前慰問，並商討今後的行動。我仍主張按照我原先擬定的計劃，先到黃坪集結；於拂曉前在樂昌南十五里之長垑村，渡過武江，經仁化直趨江西，途中不致有多大困難。因爲那裏是我的故鄉，與當地的人民有深厚的關係，只要說是我的部

隊，人民必踴躍協助徵集船隻渡河。他兩人都同意我的見解和主張。

但我這時左脚重傷，流血過多，不能隨軍行動，只好設法隱蔽身分，療治槍傷。恰好這時參加湘南革命鬥爭的農民廿多人，接我到大山休養，安全問題，無須顧慮。次日，我被幾位湘南農民抬着，隨軍行至胡洞的岔路口；李明瑞、張雲逸及各高級幹部，均趨前與我道別！大家都含着眼淚，爲革命鬥爭的勝利前途和各人的安全而祝福！

紅七軍是我創建的革命部隊，今竟在中途離開戰友，脫離隊伍，我的內心比肉體更爲痛苦！我還能再和他們在一起嗎？不斷的在我的思潮中反覆的疑問着！

我離開紅七軍後，李明瑞、張雲逸率部於是晚到達預定目的地——黃坪洞，這裏有八十戶人家，是一個高山的大山村，地形險要，位於樂昌之西南，距樂昌縣城廿里，距我的家鄉——長垓村亦廿里。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和朱德脫離范石生軍後，亦曾經此入湘，羣衆基礎極好，紅七軍到達時，村民聞是我的部隊，均自動送米送菜，供應紅軍。按行軍計劃，原擬是在拂曉由長垓前武江西岸渡過武水東進，但他們因官兵過度疲勞，延至上午九時才抵達長垓西岸，當先頭部隊（五十五團第一營）到達時，即聲稱：是我的軍隊，當地船民男女五十餘人，全體出動，駕舟運儎紅軍渡江，但因先頭部隊渡江後，沒有將電話綫截斷，致被當地鄉公所電告樂昌縣長，又適有兩個團粵軍駐防於縣城，便立即用汽車運送軍隊至長垓北

面，截擊紅軍，當時紅軍僅有李明瑞率領之五十五團已渡過武江，遂與敵展開激戰，張雲逸率五十八團見戰鬥激烈，乃停止渡河，退回黃坪洞。李明瑞見戰況不利，且五十八團已撤回西岸，即以第一營掩護退卻，照原定計劃東進，是晚在仁化縣之石塘村宿營，以後經仁化縣城、扶溪墟、長江墟（仁化縣北部），越過大庾山脈，進入江西之崇義縣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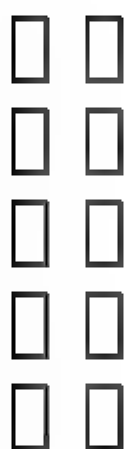
張雲逸率領之五十八團，回抵黃坪洞後，即由農民帶路，經樂昌北面九十里之羅家渡，渡過武江，沿粵湘邊境，越羅霄山脈進入江西之上猶縣屬地區。不久，紅七軍兩個團又再在崇義縣城會合。以後經大庾、信豐。於一九三一年三月間，安全到達閩贛蘇區與朱毛會合

紅七軍由百色出發時全部官兵有二萬餘人，到達閩贛邊蘇區時僅有六千人了 而且損失了很多優秀的軍事幹部，至爲可惜！

廣西蘇區自紅七軍主力東調後，韋拔羣之廿一師以東蘭爲根據地的右江蘇區，於一九三一年一月，桂軍即開始大舉進攻，紅軍苦戰了半年，卒以衆寡懸殊，被桂軍攻陷，除少數幹部逃出外，韋拔羣以下官兵全部犧牲了！在此，廣西右江蘇區整個瓦解了。

① 土地分配取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辦法；是將土地多者抽出來補給土地少的，將土地肥沃的抽出補給貧瘠土地，以求平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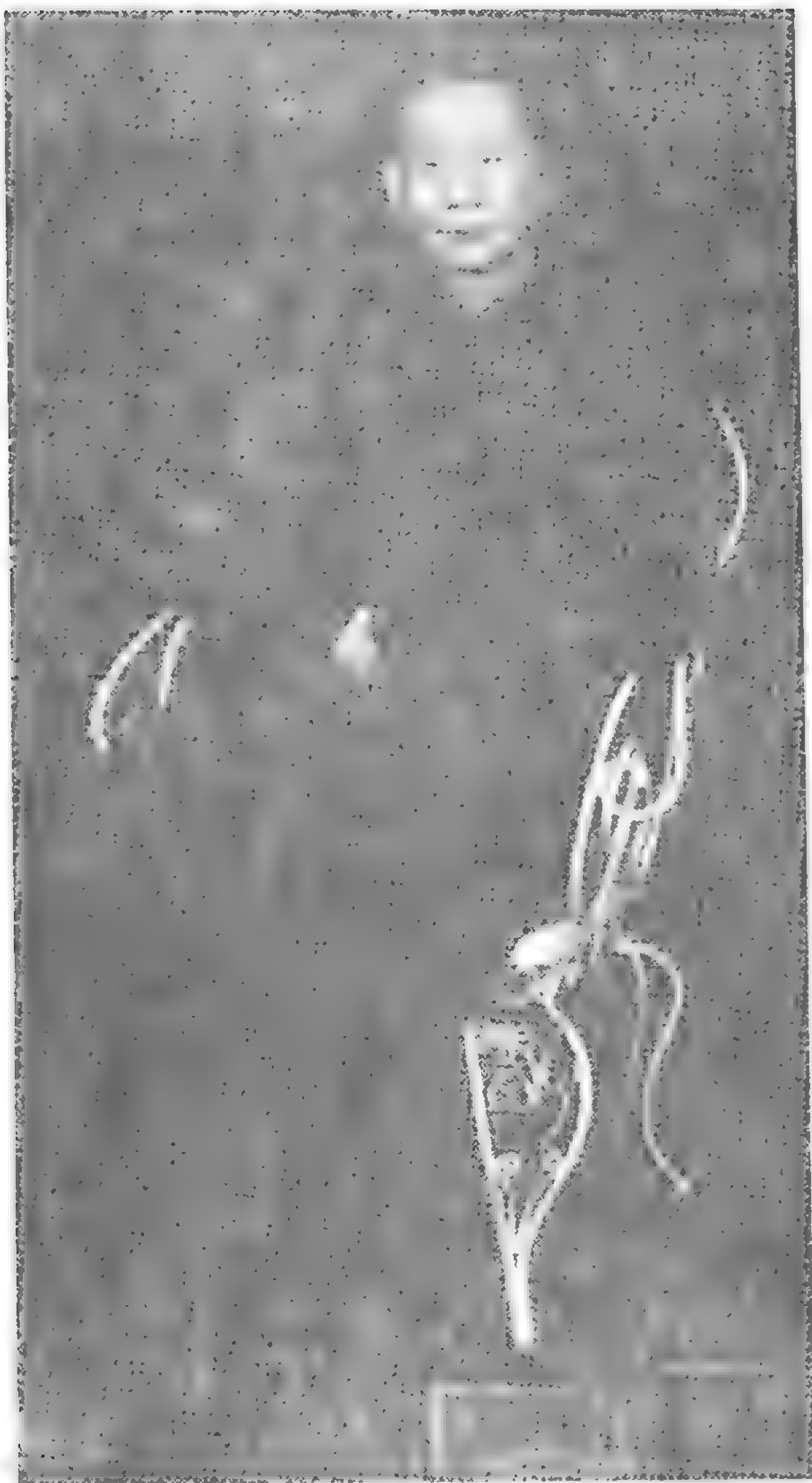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327
SS□=10917912
□□□□=1978



龔楚將軍回憶錄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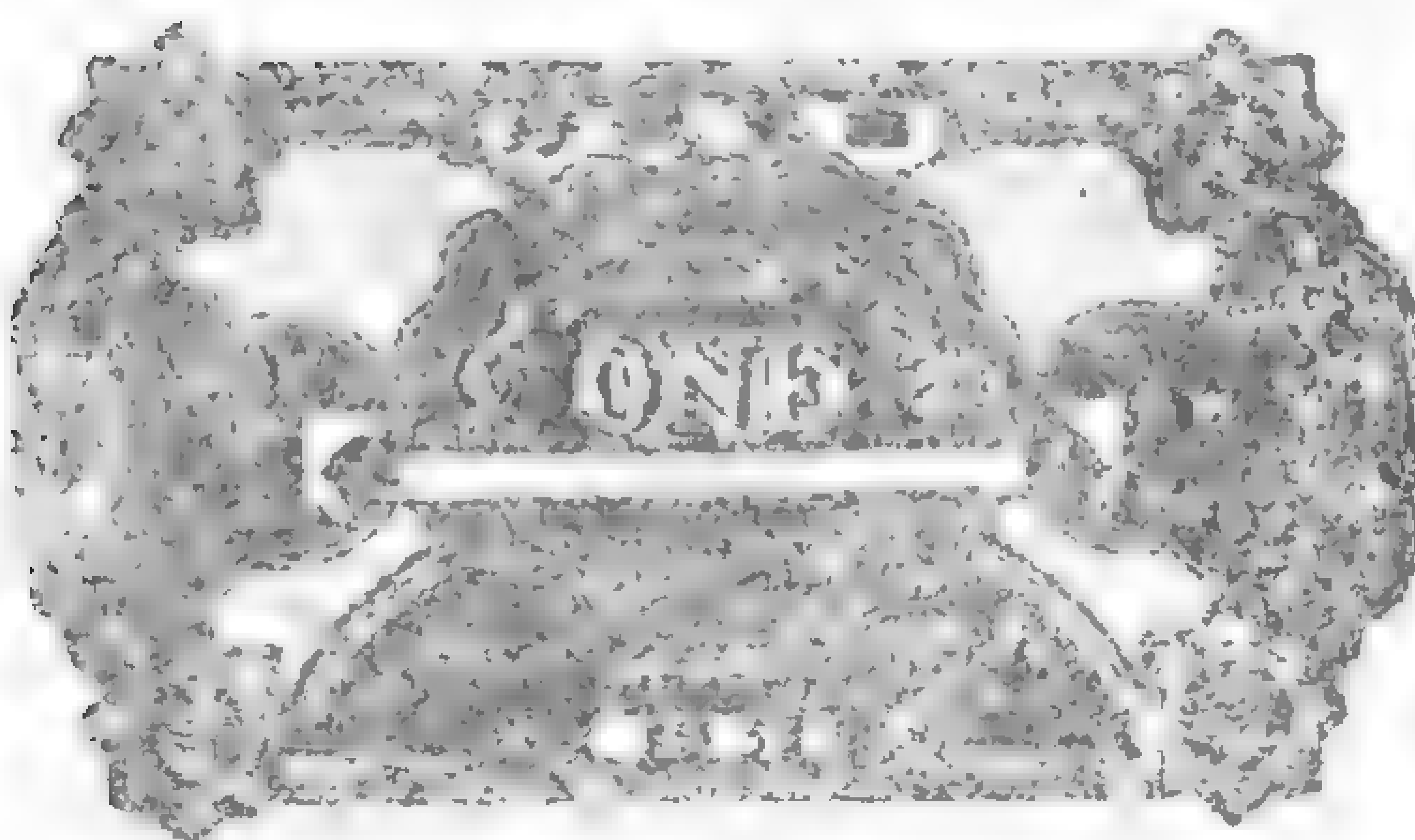


太虛近照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與朱德在陝北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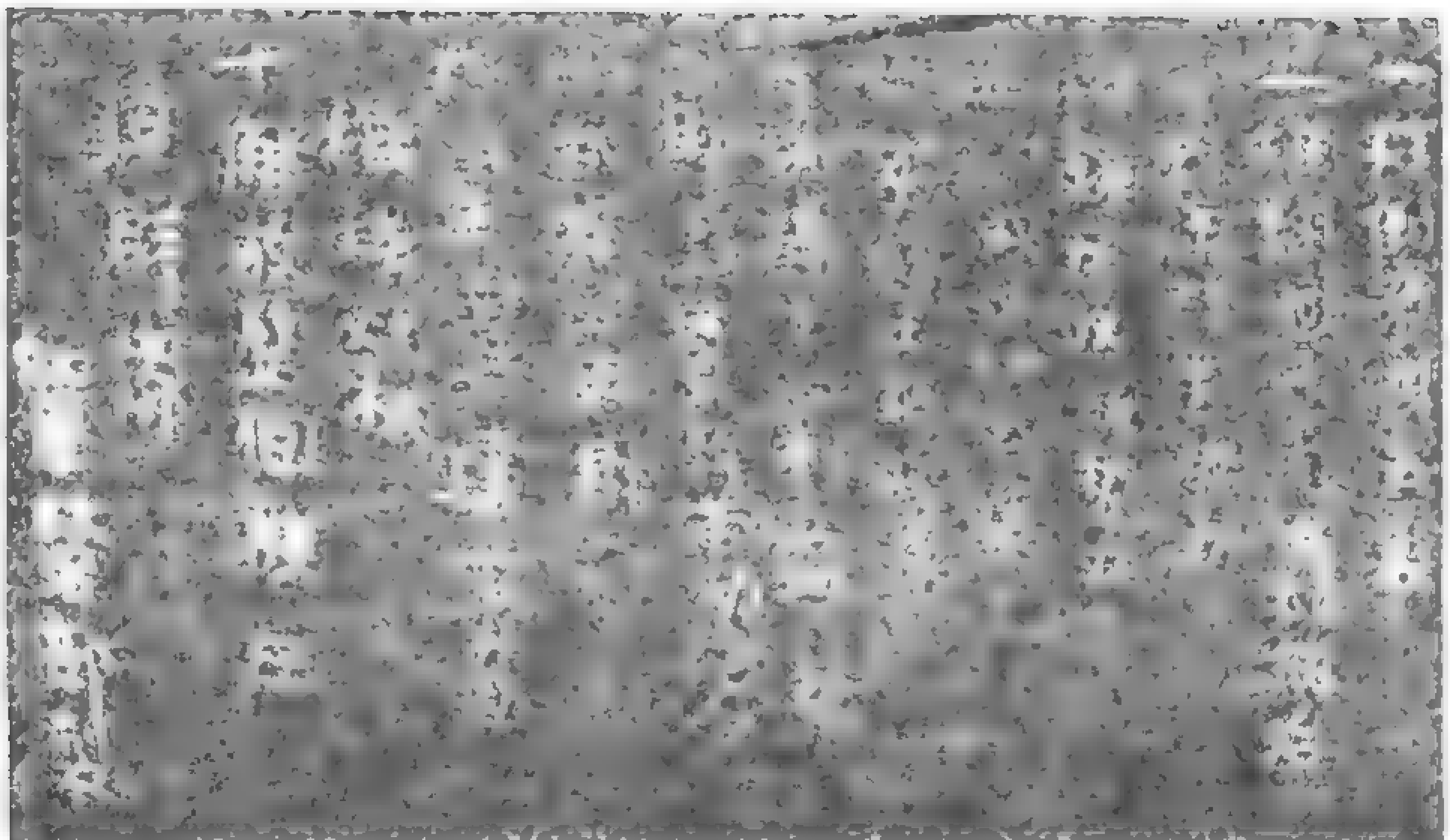
上圖為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所發行的紙幣，上有列寧像。下圖為一元面額的背面。



出身武漢工人，曾留學莫斯科多年，後來在中央黨機關工作的伍修權。



參謀長葉劍英



紅軍在長征途中所遺留下的標語（石刻）



在晉察的紅軍根據地，一部份由不同種族組成的民支隊，正在接受訓練。



早年的紅軍，利用青年的力量，把青年們組織起來，領導他們作戰。

A调 2/4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 2.3 5 5 | 3.5 3.1 2 0 | 6 3 6 3 | 2.3 2.6 1 0 |

①革命軍人 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 八項注意

| 2 2.5 3.2 1 | 2.1 2.3 6.2 7.6 | 5.7 6.5 6 | 2.1 2.3 2 0 ||

第一 一切行动听指挥 步调一致 才能得胜利

②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
③三大紀律我們要做到，八項注意切莫忘記了，
第一說話態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驕傲；
④第二買賣價錢要公平，公買公賣不許逞霸道，
第三借人東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遺失掉；
⑤第四若把東西損坏了，照价賠償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准打人和罵人，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
⑥第六爱护群众的莊稼，行軍作戰处々注意到，
第七不要調戏婦女們，流氓習气堅決要除掉；
⑦第八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准搜腰包，
倘若把这規矩破坏了，革命紀律处罰決不饒；
⑧革命紀律自覺遵守到，互相監督切莫違犯了。
全國人民拥护又欢迎，革命胜利很快就来到。

紅軍倡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口號，並且譜成歌謠，幽為廣為宣傳的歌曲。

第一章　上海的見聞與體驗

我忍着淚離開部隊，湘南暴動時的老同志劉耀文指揮幾位農民同志抬我到樂昌乳源邊界的高山上。隨行的還有十九師軍醫處長吳子玉和四個衛士。

這些純樸的農民們，在湘南暴動失敗後，逃到這十多里無人烟的深山中，靠燒賣木炭過着最困苦的生活。爲着我的安全，他們特別選擇了極隱蔽的叢林內，他們七手八脚的蓋搭了一間小木屋安置我。並用他們的床板，爲我舖床；派人到胡洞替我買了五十斤白米，送了兩隻鷄，一大堆青菜，好好地安頓了我們，靜心療養。他們這種難得的友誼，十足的表現了中國農民的純樸的熱情！

我在山上醫治了四十多天的時間還不能起床，忽從胡洞的小村上，傳來國軍搜山的消息，風聲鶴唳，時起恐慌。我的衛士及吳醫生，只有三枝駁壳手槍和兩挺手提機槍，隨時準備和敵人拼命。我的枕畔經常都放着自己的防身武器左輪手槍，必要時用作自殺。漸漸的我已能在床上坐起，但風聲一天比一天緊，我要吳醫生和四名衛士先離去，免作無謂犧牲，但他們都不肯離去，經過我的一番解釋，告訴他們要以革命前途爲重，不要只顧及個人的情感

而忽視了更重要的革命任務之後，吳醫生和另三名衞士，才答允先走。尚有一名衞士白從根，寧死也要跟着我，我也只好把他留下來了。於是我將所存的八百餘元，提出三百元，給他們四人使用；叫他們去追趕部隊，或潛伏各地，繼續做革命工作。然後，他們才揮淚分手。

一天，我的舅父又從樂昌帶來兩份上海的申報，國內新聞版上，報導梅花剿共戰役的戰績。說紅七軍二十師師長被擊斃，十九師師長龔楚也重傷斃命。我看了心中暗暗高興。恰好腿傷新愈，已能扶杖步行；已到了可以化裝出走的時機。乃通知我的母親，由我的大姊派一艘漁船到我住的山下，由幾位農民同志抬我上船，順着武江南下，離開了那位劉耀文老同志，和一羣愛護我的農民朋友，結束了荒山療治的生活。

船過樂昌長垶，在僻靜的地方停留下來，我的母親也親到船上來看我。這時母親已六十五歲，家中經歷次的搜查和洗刦，生活已成問題。我從剩下的四百元中，給了一百五十元與母親作贍養費。談到深夜，才請她老人家回家，臨別時她再三叮囑我多寄信回家，省得她時常掛念。偉大的母親，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誰料這一次的分別，卻成了我們母子的永訣！到了一九三四年的時候，她便與世長辭了。而我那時正在江西蘇區，無法回家奔喪，回想起來，眞有無限的悲愴和哀悼。

乘着我大姊所僱的漁艇，通過國軍地區的檢查站，安抵烏石車站。由衞士白從根購備了兩張車票，候至火車將到時，我才離開漁艇，趕赴車站，乘南下火車抵達廣州，旋赴香港，下榻於彌敦酒店。

由於我曾在香港領導過黨的工作，雖時隔兩年，還有綫索可尋。我首先找到了一位工人同志，轉而找到了廣東省委的連絡員，將我的情形，通知廣東省委書記，由廣東省委派了一位女同志宋維靜①與我連絡。於是我和黨又有了訊息。這時，我知道了國軍正發動對江西蘇區的圍剿，使我非常擔心在轉進中的紅七軍的命運，同時傷病累人，更不禁附髀興感。而我的新愈腿傷，因連日奔走勞動，又發炎了。本擬在香港療治，突然廣州的報紙又發出消息，報導紅軍十九師師長龔楚，已傷癒赴港。這則新聞的發佈，對於我的安全又有了問題，只好又再轉移另一個地方療傷。

吳子玉醫生離開樂乳邊境的荒山後，便在厦門海軍醫院工作。他與我取得連絡後，便通知我到厦門去繼續治療。我爲安全計，將我的衞士白從根託交廣東省委照顧，單身赴厦。冒充廣西民團的軍官，因剿匪受傷。在國軍海軍醫院診斷，經過七日的療治及檢驗。結果，醫生認爲腿內有碎骨沒有取出，該院無X光設備，應轉赴上海療治。於是我又離開厦門，和吳子玉醫生同往上海。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偕吳子玉醫生到達上海。按照廣東省委給我的中共中央通訊處，寫了一封長信報告中央。這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由周恩來代理（周由蘇聯回國不久），見我抵滬，即派聶榮臻②到旅店與我連絡，介紹我到福民醫院療治，經施過手術，將腿內碎骨取出，僅七天便已痊癒。但腿部神經痲木，須繼續電療。

當我出院時，聶榮臻告訴我，本年二、三月間，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黨內叛徒向國民黨特務告密，捕去殺了。惲代英同志因犯了錯誤遭處分，派去某紗廠任支部書記，也被國民黨特務抓去殺害了。去年夏天，彭湃同志在廈門，冬天，羅綺園、楊匏安兩同志在上海，均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捕去殺了。你現在這裏療養，中央為了你的安全，特派黃×同志經常和你連絡，你亦須特別謹愼行藏為要。我驚聞噩耗，登時悲憤交集。以責備的語氣對他說：中央負責同志對惲代英同志的處理太殘忍，以他那副文弱書生風度和容貌，一見即知不是工人，怎能派他到工廠去工作？這不是等於送他去死嗎？你回去告訴周恩來同志，他應該負點責任。

後來周恩來親到旅館來看我，我亦以同樣的語氣對他說過，他當時無詞以對，竟顧左右而言他，只是說：現在上海環境極壞，你要特別小心。這是他一貫逃避責任的慣技。使我為之不勝太息！

出了醫院後我住在河南路一家小旅館內，第二天，紅七軍負傷在滬療傷的幹部，都找到了我。王震在古州作戰時打斷左脚，來到上海才醫治好。他有妻又有孩子，因爲地位不高，中共中央每天只給他生活費二元，住旅館和食飯都包括在內。又二十師五十八團閻參謀長，在隆安作戰也打斷了左脚，亦來上海剛醫好，生活十分困難。我對他們抱着無限的同情，常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還有何畏、李顯兩人，他們都是負了重傷，到上海來治療的。因爲中央的照顧並不週到，生活非常困苦。尤其是楊英，他的身體本不很好，而且槍傷肺部，因爲生活費太少，住在一間公寓，欠下房租伙食錢很多，急得幾乎要自殺，見到我便哭起來。我見他境況可憐，便爲他清結房租伙食，要他與我同住到旅店共同生活。於是我的負擔更加重了。

一九三一年五月，有一天，上海某小報刊出一節新聞，畧云：「共軍十九師師長龔楚因傷抵滬療養，中央政府已派邵力子來滬，勸導龔氏入京。」中共中央閱報後，立即派黃某來協助我遷居，一天之內搬了三間旅館，最後才遷入老把子路一家白俄人開設的公寓內的二樓一個騎樓大房間去住，並着我暫時隱避，不要外出。這時，七軍在滬幹部，已陸續被派去各地蘇區。當時有：何畏派去鄂、豫、皖蘇區，李顯、吳子玉派去閩贛邊區，仍回七軍工作。剩下我和王震、楊英、閻某等，皆因身體尚未康復，仍留滬休養。王、閻兩人左脚已斷，雖

然駁好，王、闊的左脚都短了寸許，行路極爲不便，他們要穿上特製皮鞋，行動才可自如，我亦是傷左脚，但沒有縮短，步行如常，算是我的幸運。

在這期間，還有兩件事值得畧述，一是陳豪人（廣西行動委員會書記），他在東調江西途中，在連縣即以赴上海和中央接洽爲詞，離開紅七軍經廣州、香港轉赴上海，中共中央以他擅自脫離隊伍，予他嚴重警告處分。他不服，與中央爭論，中央置之不理，經我調解後，中央已答應給他返回蘇區工作，但他又以中央給他的信稱他爲先生而不稱同志，堅不接受，我雖盡力勸導，亦未能消除雙方意見，陳豪人便由此脫離了黨。

另一件事是，我在上海因避免各方特工人員的耳目，行動極感不便，後由闊參謀長介紹一位時雨金先生和我認識，他是安徽人，與闊是同鄉，年約三十餘歲，是上海一家皖商公商號的老闆。據闊說：他是上海青幫中有地位的人物，他和我見過面後，很熱心維護我，因爲國民黨的特務和租界內的「包打聽」③都有他的人，消息非常靈通，凡有關對付中共人員的行動，他都能很快的通知我，而且每逢夜間必須外出時，他派人或親身陪同我去，我在上海幾個月的期間，他並沒有受過一點禮物，反而常常要請我吃飯。他爲我所花的錢，以我的估計還要多過中共中央，他那種俠義行爲，正是義薄雲天，至今還未能忘懷。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時，身上尚存有大洋二百元，住醫院期間，所有費用是由中共中央支

付的，出院後，每天給我的生活費三元，包括旅館開支在內，另每日電療費二元，那時的生活，在極其節省的情形下，尚可維持，但天氣漸熱，我和吳子玉均須添置衣服，同時要幫助七軍在滬療養的幹部，我自己的存欵很快的便用光了，而我的妻子因得聞我在滬療傷，特由廣州趕來上海探視，我和她在廣西結婚後僅一個月，因政局變化，她便回廣州娘家居住，離別了兩年，異地重逢，自然是感到快慰！但生活費的增加，黨中央並沒有為我解決。我曾經為此向中央報告，但中央始終沒有增加我的生活費用，迫不得已將電療的次數減少，以維持日常必需開支。有時我想起我在廣西工作時，為黨籌措了五萬元港幣，毫無保留地貢獻給黨為活動經費，另外支持香港日報亦用過一萬多元。我拋棄家庭温暖，為革命流血，現在必需的醫療費和生活費都無法維持，未免太刻薄。幸好我的妻子尚能深明事理，生活雖苦亦無怨言，且精神亦很愉快，使我稍為安慰。

那時我在上海的環境，生活固然是十分困窘，而安全問題又隨時受到威脅，遇有什麼風吹草動，又得迅速遷移住址，當時若非有時雨金這位朋友的俠義幫助，眞不知如何是好。我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和妻子及楊英同志正在一家影院看電影，中共的特工人員突然通知我，要我馬上離去，他們預先準備了一部的士，我一出門外即上車離去，車行轉彎抹角，兜了很多圈子，才送我到一家旅店暫住，過了一天才將我們的行李送來，後來我就遷入哈德路一個

弄堂內，住在一家樓上，但仍是不敢常出，天天携着幾本書，一束報紙，跑去兆豐公園閱讀，消磨這些苦悶的日子。

七、八月間，正是國軍向閩贛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時期，每天的報紙都報導圍剿蘇區的消息，我素來自命是一個革命戰士，雖知健康未復，仍須休養，但總覺得逃避遠地，不免有慚愧之感。於是我決定再回前綫去，免得悶居上海。我將這個意思告訴聶榮臻，他聽了非常高興，他說：「紅七軍早已到了江西蘇區，江西蘇區中央分局來了好幾次信，請你早日回去。但我們因你沒有完全康復，所以沒有告訴你。現在你要去，實在好極了。待我報告中央負責同志，解決一切交通費和進入蘇區的路綫，再通知你。」

五天後，聶榮臻到我的旅店中見面，要我先到香港，由香港派交通員送我入蘇區。同時託我的妻子帶一位三歲女孩到香港，交給她的爸爸，並謂：有一個小孩作掩護，路上比較安全；最後他交給我一筆旅費，然後說道：「你是黨的重要幹部，曾經爲革命付出重大的犧牲；所以應該買一張西餐房的船票，以免被敵發覺。你的嫂子對革命沒有貢獻，只能住三等艙，以免浪費。給你的錢便是依照這個原則預購的。」我聽了很不高興，覺得他們太不近情理，太不體諒爲革命犧牲者的心情。

那是一九三一年的八月，我身體健康雖未恢復，負了重傷的左脚，行路仍很吃力，但爲

了減少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痛苦，當我拿到了這筆旅費時，我就決定冒着危險，將兩張票錢合併，改買兩張唐餐房票，乘太古公司港滬輪船，離開了上海。

① 宋維靜：曾任中共廣東省人民政府工業廳副廳長。

② 聶榮臻：四川人，曾代理中共總參謀長，現任科技委員會主任。

③ 包打聽：上海租界的特工人員，有拘捕殺人之權。

第二章　初到閩贛蘇區的觀感

從上海到香港，住在老地方九龍彌敦酒店，隨伴的有我的妻子。這是我參加中共革命以來最愉快的一次旅行。但是溫馨的家庭生活，我卻無法久享。在第五天的早上，我在酒店裏便脫去西裝，換上便服，帶着簡單行李，先到香港擺花街某號四樓的廣東省委交通機關。由他們派出一位連絡員，偕同我乘船去汕頭。

爲了追求革命的理想，我不得不拋棄了自己的幸福，踏上征途。妻子只好要她再回娘家去住。她是一個富有中國舊道德的女子，她有信賴丈夫和尊重丈夫的美德，但結婚了兩年的夫婦，實際共同生活的日子僅三個月。臨別時不免有無限的依戀！

兩天的旅程，由香港經汕頭到潮安，正準備搭船赴大埔，不料在搭船時竟和交通員失了連絡，而在碼頭上偏又遭到扒手的光顧，身邊的錢都被竊去，這時我身上不名一文，焦急萬分。怎樣辦？迫不得已，將自來水筆和手錶賣去，在潮安一間小旅館住了一宵，第二天的下午才再乘船回香港。廣東省委又送我廿元港幣作旅費，另派一位交通員同行，仍取原路經汕頭、潮安到大埔。第二天步行至國軍封鎖綫邊的小鎮青溪，住在一家小客棧中。這客棧是中

共的交通機關。交通員都是地方人，熟悉道路，精明幹練。國軍的駐地、人數，那座山有哨兵、那條路有哨崗，他們都很清楚。我由他們派人帶路，在黑茫茫的夜裏，步行了三十多里崎嶇的山徑，通過了國軍的三道封鎖綫，才進入福建永定縣內的中共游擊區。

摸索了一個整夜，東方已露出了曙光，帶路的把我送到一個小山村的交通站，在那兒休息了二小時。因爲此地是緩衝區，並不十分安全。吃了早飯後，便由這個交通站，改派一位農民交通員，送我到三十里外游擊區的另一交通站去。

我由上一個交通站，抵達永定縣屬的蘇區，走進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山村，頓感興奮和喜悅。喜悅的是我又重新回到革命鬥爭的土地上來了！興奮的是這些人家都打掃得清潔整齊，村莊外有持着梭標鳥槍的農民在守望；他們都精神抖擻，比較白區，確另有一番氣象！

到了交通站，馬上有一位女同志迎接我，親切的叫着：「龔同志！辛苦了。」接着送來一盆熱水，給我洗面洗脚，泡了一壺很好的山茶，又送來一碟鄉村米餅。並要我脫去內衣給她洗濯，這種殷勤招待體貼之情，使疲勞已極的我，得到無限温暖。

我安適地午睡了三小時，醒來已是夕陽啣山的時候了。我步出大門，坐在桂花樹下的石櫈上，欣賞附近的山色，覺得鄉村生活，非常安寧而恬靜，花香鳥語，令人心曠神怡！

我正癡癡的遊覽這些大自然景色，交通女同志帶來了四個農民來見我，她介紹我相識，

其中一個是赤衛隊長，另一個是少先隊隊長，其餘兩個是農村幹部，她對他們說：「這位龔同志是紅七軍的師長。」我問她：「你怎樣知道這麽清楚？」她笑對我說：「前幾天有一位交通員通知我們，要我們好好的招待你；因爲你是紅軍將領，而且曾爲革命負重傷。」聽了她的話，我不得不暗自讚嘆，蘇區的羣衆工作做得的確不錯！

回到屋裏，桌上已點上一盞小油燈，那位女同志爲我送上飯菜，兩個煎鴨蛋，一碟魚乾煑辣椒，一碗酸菜湯，這些都合我口味，吃了兩碗飯。又來了一位三十多歲的農民來見我，他自我介紹，是黨的支部書記，剛從城裏回家沒有休息便趕來看我。他告訴我當地赤衛隊的情形和分田的情形，談了很久才告辭走了。

晚上我睡得很舒服，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早飯後，在屋前的樹蔭下和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農夫聊天。一個搖着小鼓販賣洋什貨的小販，從我們的面前經過；村中很多婦女小孩都圍上去購買。我發現他們所使用的都是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所發行的紙幣，我便問小販：「這種紙幣通行嗎？」他說：「這種蘇幣①，不僅在蘇區內通行，在靠近蘇區的白區，也受歡迎呢！」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後來我才知道，蘇幣的準備金是糧食和土產。在蘇區一切交易都用蘇幣，白區商人需要到蘇區購買糧食和土產，不能不用蘇幣，所以附近蘇區的白區商人也樂得使用蘇幣了。

中午時分，由大埔交通站帶來了一位姓劉的同志（梅縣人），他是個曾經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決心到蘇區去工作的，他和我談得很投機。下午，地方赤衛隊同志送來了兩隻鷄，二十個鷄蛋，一罐糯米酒，這是他們對我表示最尊敬的禮物。我便邀集當地的工作同志共進晚餐，吃喝得很高興。席間，那位少先隊隊長自動請求做我的衛士，並說已經得當地負責人和父母的同意。這個孩子名叫阮成，年僅十五歲，剛好我的大腿傷癒行動仍不大方便，正需一個人幫忙做些瑣屑的事，便答應了他的要求。他喜極了！連忙回去告訴父母，並向當地共青團取了介紹信來給我，他的父母也跑來感謝我提帶他們的孩子。我眞想不到中共游擊區有如此現象，這是不能抹煞朱、毛經三年來的成績。但我想起了我手創的廣西蘇區和紅七軍的事時，又不禁大爲惆悵了！

第三天，我們離開了這個可愛的山村，向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長汀——進發。沿途都有交通站接待，一站一站的輪換交通員引路，所經過的地方，雖然都有點荒凉，但都整潔有致。赤衛隊、少先隊都拿着步槍或梭標，佈滿交通要道，檢查行人，沒有蘇維埃政府證明，無法通過。蘇區內的青年婦女多數剪短了頭髮，態度大方，沒有畏羞之態。我們每到一交通站休息，便有女同志來慰問，並將我們的衣服拿去浣洗。晚上還唱山歌給我們聽，減少了我們的旅途寂寞。

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五日，我到達長汀，那天正是中秋節的前一天，街上雖然有月餅出售，但比起一九二七年中秋節的熱鬧情形，已冷落得多了。當年我參加南昌暴動後，曾經長汀入粵時，也正值中秋佳節。那時長汀市面繁盛，想不到四年之後，竟然如此？這正反映出蘇區的農村經濟已開始衰退了，而人民的生活也日趨艱苦了。

但在旅途中，各地同志紛紛傳報新近挫敗了國軍第三次大圍剿的捷報，羣衆興高采烈！又見到蘇區在日漸擴展，革命的前途美景，便又給我以無上的鼓舞！

由香港到永定游擊區，直到長汀河田，這一段長長的水陸路程，是中共通過白區進入蘇區最主要的交通綫，我在香港起程前的想像，這一段路程必定是很艱險的，可是事實並非如此，除了白區的青溪至游擊區的一個站約三十里須要夜間通過國軍的封鎖綫外，以後的行程都是白天行動，他們佈置週密，無懈可擊；所有人員來往及軍用物資，如無綫電器材、電話器材、藥品、炸藥和銀洋鈔票等等，均經由這一條路綫運入蘇區。沿途如汕頭、潮安、大埔而至永定、上杭直到長汀的河田，均開設有藥房、電器、運輸、旅館等商店，他們只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關係。鄉村的交通站只知前後兩站的位置。他們工作聯繫，完全由交通員負責。交通員亦分兩種，一種是專責帶人員來往的，一種是負責運輸的，這些交通員，亦互不認識。全條交通綫，最重要的是大埔縣起至永定游擊區而至河田這段路程。其中要經過白區

國軍或民團的重重嚴密封鎖綫；有碉樓、碉堡、哨崗等等。通過這段路時，即取道罕無人跡的山道或山坑，攀藤附葛的行進。運輸物資通過封鎖綫時，即利用婦女偽裝割草或農民偽裝挑肥下田，將物資埋藏在草中或肥料之內偷運出去。一段接一段，一站接一站，使國軍無法截查。

這一條交通運輸綫，自一九二九年夏，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擊潰了國軍郭鳳鳴師，佔領長汀、上杭、永定起，直至一九三四年中央蘇區紅軍西竄止，其中雖曾發生過一時的困難，但始終未被破獲。這種週密的佈置，和善於運用羣衆力量，與連絡運輸的技巧，是值得稱道的。

長汀（汀洲）是福建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中共福建省委會亦設於此。我在香港時已知省委書記盧永次（廣東人），是一九二八年冬在香港工作時的老同志。他是香港工人出身，那時他任廣東省委會組織部長，爲人誠實，富情感。他的太太是一個純潔而大方且很喜客的家庭主婦，在香港時，我們大家都稱她爲二嫂。

這時，他兩夫婦都是三十多歲左右，都在長汀，因此，我到達長汀，馬上就去找他。省委會是設在一間舊時政府的小機關內，房子很大，我進入大廳，向一位負責收發的同志說明我的姓名及來意後，他立即通傳入去。

盧永次聞我來到，很快的便出來見我，緊握着我的手，很高興的對我說：「我上星期就知道你要來了，但聞你失去連絡，想不到你那麽快便到了，請到裏面坐，再詳細談談。」我隨他入一小廳內，廳內陳設簡單，只有一張四方枱和幾張竹椅，我們坐下時，他的太太已端上茶來，她見到我，非常高興的對我說：「龔同志！你瘦了！你來了我們又多了一個廣東老同志，沒有那麽無聊了，今晚就在這裏食飯，我去弄菜來。」看她的情形，似有人地生疏，不大習慣之感。

我問他關於蘇區政府及蘇區的社會民生等情形，盧永次告訴我：「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是農民出身，曾讀過高等小學，是個老黨員。政府委員中，有工人、農民、軍人；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也是委員之一。他們都很負責。農民分了田，生活本當比較好，但他們因爲缺乏資本，缺乏肥料，且因人力不足，生產上不免要受影響。農民們是要踴躍繳納政府地稅，及勞軍捐輸等等。由是他們的生活，就自然比較困難了。至於豪紳地主，他們失去了土地和債權，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屋宇；他們的生活，當然是很痛苦。商業方面，因敵人的封鎖，物資出入極困難；且人民的購買力弱，亦自然不及往昔的繁榮。惟有獨門的西藥商，因政府特許他們自由賣買，算是一枝獨秀；其中有少數人，賺了許多錢。工人爲數不多，但亦多數無工可做，所以都回鄉分田去了。」

我接着問他，朱德和毛澤東的情形。他說：「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我們很少見到，更少有談話的機會，不過，一般同志對朱德的印象很好；至於毛澤東嘛——。」他沉思了一會才再說：「他的資格及他的聰明才智，當然是現在閩贛蘇區的唯一領導者，但他的作風過於嚴厲，所以畏之者多，眞正愛之者很少，這是我的見解，你曾和他兩人在井崗山共同工作，應當比我對他們的認識更深刻，我們份屬老同志，我得告訴你，在蘇區切勿多言，將來你自會明白的。」我想深入的和他談下去，因見他有不願多言之意，我便不再多問朱毛之事了。我轉問他紅七軍到了對蘇區後的情形。他說：「聞七軍有改組派②，已整肅了幾個幹部，詳情我亦不明，你回去七軍後，自會知道的，不必急急問我。」我聽他這麼說，大爲震驚。但見他不欲盡言，我亦不便追問。

晚餐之後，他安置我在汀洲最好的教會醫院一間雅靜房間裏休息，並介紹我認識了該醫院的院長傅連璋，接着十二軍軍長羅炳輝偕同卅五師師長張宗遜來訪。羅軍長是雲南人，他原是雲南國軍的團長，一九三〇年率部參加紅軍，體格魁梧，性情爽直坦白，我們雖是初次見面，但談得很投機，大有一見如故之感。張宗遜原是紅四軍時的老同志，他與林彪是同時期當營、連長的軍事幹部，他對我當然更加親切，我們直談至午夜，才各自休息。但我因盧永次對蘇區情形不敢盡言。尤其是聞紅七軍幹部有被整肅的事，使我終夜不安。

健康未復，又經過幾天的長途跋涉，精神感到疲憊，羅軍長及張宗遜走後，即上床休息，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急欲起床又覺頭暈目眩，便倒在床上休息，我知道自己病了。阮成見我有病，即去通知傅院長，他親自爲我診治，據說是因身體虛弱，感冒風寒所致，體溫達一〇三度，要我休息幾天，不可外出。

午後，羅炳輝、張宗遜等均來看我，囑我好好的休養，並說代我報告朱、毛。這樣我便安心的住在醫院。五天後，病已痊癒，盧永次夫婦來看我時，通知我：毛澤東、朱德已派你暫任十二軍卅四師師長，不必到瑞金去了。當時我很不高興，因我原擬回七軍工作的，但朱、毛既已決定，只好服從，將來再行打算。

羅炳輝爲了表示歡迎，於是晚設宴招待，席上我與十二軍的高級幹部見面。軍政委譚震林（他雖是井崗山時期的同志，但未見過面）在這裏見面了。參謀長林野是前紅四軍的參謀，湘南時的老同志。三十五師師長張宗遜是紅四軍的同志，三十四師政委黃甦，曾參加北江工農運動，更是多年的老同志，久別重逢，大家都很高興。但我還是懷念着七軍的戰友！特別是李明瑞和張雲逸。

坐着羅炳輝送給我的馬，我和黃甦帶着兩個特務員（衞士稱特務員），第二天早上到河田去，接任第三十四師師長（原師長游某，亦紅四軍的老同志）。

這裏蘇區的軍隊，和我所創建廣西紅軍編制不同，每師有三個團，每團轄三個步兵連，一個機關槍連，（沒有營的編制）師直屬隊，有特務連、步炮連、通訊隊、衛生隊、全師指戰員（官稱指揮員、兵稱戰鬥員，簡稱爲指戰員）有三千人。是由閩西地方武裝編成，過去因未經嚴格訓練，軍風紀不好，戰鬥力與軍力均脆弱。三個團中僅有楊遇春一團較好③。我接任後，即針對該師情形，定下了訓練計劃。特別注意精神教育，並利用部隊訓練空暇的時間，親自訓練各指揮員；經過了三個月的時間，全師的學科術科，均有顯著的進步。

我在三十四師這一期間，發生了兩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體味到共產黨中派系鬥爭，傾軋和迫害的醜劇；也看到了他們那柄鋒利的屠刀，不斷的指向黨內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師時，曾接到李明瑞和張雲逸的信，他們都盼我早日重回紅七軍工作。李明瑞函內有「如兄不回來，七軍前途大有問題」之句；張雲逸信中也說：「別後情形，屢經驚險；相見非遙，容作長夜之談。」從這字裏行間，我敏感到七軍裏面，可能醞釀了極不尋常的暗潮。時間不久，又聽到李明瑞被殺的消息，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經過多方探問，我才知道紅七軍初到江西時，毛澤東曾欲調整七軍幹部，但爲全軍同志所反對，他們就指七軍內有改組派的反動組織，要在七軍內進行「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起初殺了二十多個幹部，其中有兩個是高級幹部，嗣後情形漸趨嚴重。總指揮李明瑞眼見情勢不好，絞繩快要套

到他的頭上了，在反第三次圍剿勝利後，駐軍於雲都會昌之間的一個小墟場，他準備率特務連向白區逃走。當他集合特務連宣佈脫離蘇區走向白區的時候，跟他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竟是一個受過訓練奉命監視他的特務人員，受連指導員龍騰雲的指揮，立即拔槍把他殺死。我聽了這一血腥的事實，對李明瑞的死於非命，內心深深的痛悼！因爲七軍官兵向來都很團結，雖在極困難的環境中，對革命的信心，從沒有絲毫的動搖。在黨的領導下，並沒有小圈子集團，更沒有改組派的組織；所謂「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不知從何說起？

雖然在廣西俞作柏執政時，汪精衞曾派了幾個幹部與俞連絡，但汪的幹部，從沒有鑽進過紅七軍來，也沒有可能鑽進來。他們既沒有參加七軍工作，而且與紅七軍的黨員同志是積不相容的死對頭。現在黨硬將「改組派」的罪名加諸七軍同志頭上，眞是無中生有，寃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這種惡劣形勢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裏，試想這是何等殘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發生於十月的下旬。有一天晚上，師政委黃甦通知我：「現接軍政委譚震林的通知，本師有『社會民主黨』分子五十二人，應即捕殺；已由軍部派特務人員直接執行。」

我聽了不禁爲之感傷！因爲即使本師發現有「社會民主黨」分子，也應秘密通知我和政

委，愼密偵査，才不至發生有錯誤與寃枉。今竟在直接執行之後，才通知我；像這樣越權處理的作風，實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來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着我的心頭。

翌日，我親自到各團巡視，知道已被捕去排長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於昨夜由特務人員押到附近山上秘密處决了！這次秘密捕殺事件，使全師官兵情緒非常低落，每到一處，他們都怔怔的望住我，這種乞憐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難過！

在恐怖的氣氛籠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禍福難料！我可以救援他們嗎？我有這個力量嗎？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來！

午後，黃政委說已集合全師的指戰員，要我去宣佈昨晚肅清全師「社會民主黨」份子的經過；說明這些反動份子，是受福建「社會民主黨」傅伯華所利用，潛入本師工作，現已全部被破獲，並將他們處决了。希望全體指戰員安心工作共爲革命而努力。部隊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導演下，走上講台，面對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嚨哽住，隱痛難言！但又不能不說話，祗吶吶地簡單的說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昨晚上級派員來肅清本師『社會民主黨』分子，這是本師一件不幸的事。我們要自己檢討，自問良心，有沒有反革命的企圖與行動？如果沒有，自然不必驚慌。關於本師肅反詳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瞭，請黃政委向各

位報告。」隨後，便由黃甦作了一個說明，這一幕悲劇才算結束。可是，部隊中指戰員的情緒，仍是非常不安；陸續的逃了二十多個戰鬥員，兩個排級的指揮員。

不幸的事情連續發生，使我對中央蘇區的措施，甚感困擾和懷疑？整肅的刧運雖沒有臨到我的頭上，至少也有點不安的心理。我爲了要明瞭更多的問題，特別到長汀去找福建省委書記盧永次，和他商談，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不會出賣他，所以就赤裸裸的告訴我。綜合他的談話，關於屠殺AB團分子的肅反運動，概述如下：

AB團④，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國民黨右派高級人士在南昌發起組織，大約半年後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內，尚有少數AB團分子，自動自發的活動。朱、毛紅軍到達贛南，展開了蘇維埃運動，建立了閩贛蘇區時，這些少數的AB團分子，早已逃出蘇區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〇年秋，國軍準備進剿江西朱、毛軍紅時，AB團分子又準備進行活動，以配合國軍進剿行動。十月間，朱、毛佔領吉安縣城，曾搜獲一些AB團活動的資料，其中有AB團分子派人送信給李文林父親所簽的收條，因爲當時李文林是贛南特委書記，又是東固地方革命領導人物；朱、毛對他並不懷疑，對他父親也未採取行動。十月中旬，毛澤東以進攻南昌、長沙的失敗，是李立三路綫的錯誤，且鑒於當時國軍準備圍剿形勢的緊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會議，他提出反對李立三進攻大城市路綫，主張紅軍回蘇區打

游擊，當時受到參加會議的多數軍政幹部所反對，如第三軍軍長黃公略，第二十軍軍長劉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領導同志所反對，但最後還是同意了撤回贛江東岸蘇區的主張。紅二十軍原是東固工農武裝所編成，亦遵命退回東固、富田一帶擔任對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駐瑞金。當紅軍全部退回蘇區後，毛澤東以李文林家裏是東固的大地主，過去領導東固革命鬥爭既不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採取了階級妥協的改良主義；現在又積極支持李立三，反對他的主張，非常憤怒，便以AB團的名義，加諸他的身上，進行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造成富田、黃陂大屠殺的悲慘事件。在進行肅反運動的執行工作時，將逮捕的同志，嚴刑拷打迫供，被審訊的，初雖不認是AB團分子，在嚴刑之下，無法忍受，只得胡亂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復迫供，牽連甚大。所謂AB團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殺了近萬的幹部和戰士，當時江西省委級的同志，除曾山、陳正人外，其餘的多被屠殺，紅廿軍全部消滅了。

當我瞭解了全部肅反運動的秘密時，才恍然知道，所謂肅反運動，原來是毛澤東對付異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盧永次堅持要我在他家裏吃飯。並告訴我：「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準備送她到大埔附近，你買不買東西？我可以替你帶回來。」我問他：「二嫂！是不是再回

來？」他說：「不一定再回來，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個星期，將需要買的東西購妥後，我才回來。」當時我提出：「紅軍正需要購西藥，可託她在香港購買。我自己即要買一枝墨水筆和一個手錶，並要帶五十元給我妻子作零用。」他聽了滿口答應。

我爲此特和羅炳輝軍長商量，在軍部、師部的經理處及福建省黨部，凑集了一百兩黃金，請盧永次的太太購買西藥；另外給她二百元，作爲購物之用。

誰知身爲福建省委書記的盧永次，就這樣堂堂皇皇的以送眷爲名，竟一去不返，脫離了中共。但我託他買的墨水筆和手錶，卻寄到給我，看來他對我總算夠交情了，我很感謝他。

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和王明（陳紹禹），都是中國留俄中山大學的優秀學生，於一九三零年冬回國，那時立三路綫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已遭到嚴重的失敗，第三國際派中山大學校長兼中國部長的米夫來中國，代表第三國際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因爲他們在中山大學時是支持米夫的國際派，甚得米夫的信任。中共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四中全會時，王明以一個非中共中央委員而破例的提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洛甫爲宣傳部長，趙雲（康生）爲組織部長，博古爲少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是個船員出身的工人階級，能力薄弱，自任總書記以來即爲宣傳部長李立三所操縱，致發生了錯誤的立三路綫。李立三赴俄後，中央原尚有一位精明圓滑而又是老資格的周恩來幫助他，但通權達變的

周恩來，深恐開罪米夫，不肯負起責任，致實權落在王明之手，而王明於四中全會後，二月以中共駐俄代表資格，隨同米夫赴莫斯科，中央實權即由博古、洛甫把持。自向忠發被國民黨捕殺後，中共中央總書記雖由周恩來代理，但實權仍由國際派掌握。至是年九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改組中央委員會，國際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均被補爲中央委員，以王明爲總書記，而實際上仍是博古主持，故中共中央由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前）這一階段，被稱爲王明路綫，其實是由博古主持的。博古、洛甫於中共中央遷入閩贛蘇區時（大約是十月下旬）到汀洲那天，我也適在汀洲。是晚，福建省委招待晚餐，我亦被邀參加，這就是我和他們初次晤面。那天晚上，我和他們都是住在汀洲醫院的客房，當我回到客房時，洛甫即邀我到他們的房間談話，他們兩人都穿着深灰色布質的唐裝，博古臉色青黃，態度沉默，一見令人有陰森之感，洛甫則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有書生的氣質。首先是博古對我說：「龔同志，你過去的鬥爭歷史，我們畧知一二，現同在蘇區工作，今晚時間尚早，乘此機會和你談談，你疲倦嗎？」我說：「我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和你們兩位領導同志談談，是我最高興的事，請不要客氣。」我們便由晚上十時談到午夜，乃分別休息。那晚談話的主要部份有以下各點：

（一）問：（是博古、洛甫，下同）你在井崗山根據地時期，曾與朱、毛共同領導軍事

鬥爭，你對朱、毛的觀感如何？你因何離開紅四軍？

答：（我，下同）朱德同志，是個純樸勇敢而又能克苦耐勞的軍人，對黨很忠實，軍事學術經驗，都很豐富，可稱是一位好的指揮官；他對人和靄可親，平易近人，四軍官兵對他都很擁戴。毛澤東同志，有領導政治鬥爭的才智；對軍事戰畧的決策，亦常有卓越的見解，但戰場指揮及戰術的運用，因他不是軍人，當然非其所長。關於我離開紅四軍，是中央調我去長沙領導黨的工作，因中途被敵軍襲擊，失去連絡地址，迫得轉赴香港與黨連絡。

（二）**問**：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及方式如何？軍人是否都擁護他？亟望你忠實坦白的告訴我們。

答：毛澤東同志的才智非我們所能及，領導方式不免有唯我獨尊的獨裁作風，軍人的個性，一般來說是喜歡坦白、誠實、而又勇於負責的長官，以我所知，過去廿八團的最大多數及廿九團的幹部，對他是有敬而遠之之感。

（三）**問**：聞說，你領導廣西工作，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給中央的報告，又有責備中央忽視廣西工作之意，實情如何？

答：廣西工作，初期是我領導，並有賀昌、鄧小平兩同志協助；後來，賀、鄧兩同志返回上海後，中央則派陳豪人同志來領導，我負責軍事；關於廣西工作路綫和政策，確是有改

良主義的性質；採取這種路綫和政策，我是同意的，因爲地方情形特殊，主觀力量又薄弱，若採取急進政策，恐不易爲當地工農所接受，故有此錯誤的決策；對中共中央提出批評，亦是事實，這個報告是我起草的，我認爲若中央在開展廣西工作時，即派高級領導同志去負責，當可創造一個更大的局面；則使以後不調來江西集中，紅七軍也可以創造一個滇、黔、桂邊的廣大蘇區；紅七軍的實力原已有三萬人，有一萬八千枝槍；當時我正在計劃澈底消滅右江各縣民團及擊潰貴州省王家烈的國軍主力；若這一計劃實現，紅軍很快可擴充到三個軍；但因奉調而喪失了這一個機會，至今我仍感到遺憾！

（四）問：你對閩贛蘇區過去黨的整肅運動有何意見？

答：我亦剛到蘇區不久，不過我知道兩件事是有疑問的，第一件是關於七軍整肅改組派的，我認爲七軍內絕無改組派的組織或個人，但如何會發生如此不幸的誤會事件，我實在不明白；第二件事是：日前整肅三十四師的社會民主黨，我雖然接三十四師僅有廿餘天，但發生事件後，我曾深入調查，該師雖是早在一九二九年由閩西地方武裝編成，初時曾有社會民主黨份子在內，但自傅柏萃公開叛黨後即已逃去，或被地方同志查出開除，現在全是工農份子的革命同志，這件事的發生，亦不知怎樣誤會的。根據上面兩件整肅案，我對於江西過去整肅「反布爾塞維克」（即AB團），亦甚懷疑。我希望中央遷來後，正視這個問題，必須

詳密調查，以免再殘殺自己的同志，消除蘇區幹部人人自危的不安情緒。

（五）問：你原是七軍的軍、政的主要領導人，此次回來，爲何不回七軍工作？

答：我原擬返回七軍工作的，但朱、毛兩同志命我暫留福建任三十四師師長，原因不明。

博古對我說：「你今晚的談話，我很滿意，中央領導同志對你，都稱讚你是個好同志，你在廣西工作給中央的報告，我雖沒有看到原文，但據說寫得很坦白，我們認爲你確是犯了右傾的錯誤，希望你以後自我檢討，切實糾正；關於你今後的工作，我仍主張你回七軍去，因爲蘇區紅軍主力是：四、五、七三個軍，必須加强領導……

我們的談話，便在愉快的情緒中結束了。那時已是秋末，天氣清涼，是夜又値月明如晝，午夜之後，更覺清澈可愛，我獨自欣賞了一回月色，精神爲之一振！想起剛才的談話，深感並不平凡，遂命特務員阮成，泡了一壺好茶，一面品茗，一面忖測。當時我有以下的感覺：

（一）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對毛澤東不敢信任，而且還擔心毛澤東控制紅軍以對抗中央，因此，他們到蘇區後，即爭取軍人的擁護。

（二）他們和我談話的目的，是要瞭解我是否爲親毛分子。

（三）中央對閩贛蘇區的肅反運動已有懷疑，他要明瞭我對肅反運動的態度。

（四）他們了解我不是親毛分子，而且不滿毛的作風之後，他們就拉攏我，以達到他們爭取軍人擁護之目的。

（五）他們主張我回紅七軍工作，是有意利用我領導七軍，並使我忠於他們。

（六）他們指出我在廣西工作的錯誤，是違背國際路綫的，要我糾正，忠實執行國際路綫。

我這些忖測，果然不出所料，兩個月後我就調回紅七軍，而且以後其他問題亦陸續表現出來了！

① 蘇幣：當時中共蘇維埃控制區所發行的貨幣，稱爲蘇幣。

② 改組派：是汪精衛所領導，以改組國民黨中央爲號召的反蔣組織，俞作柏曾接受汪的領導，就任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因而失敗，但紅七軍內絕無改組派份子，那是毛澤東藉以整肅反抗他的份子，俾能控制紅七軍。

③ 楊遇春：瑞金武陽圍人。曾充任紅軍獨立師師長，因家庭是小地主，叔父曾被中共清算殺掉，在憤怒之餘，後在浙贛邊投降國軍，曾任江西省保安副處長，抗日戰爭時，曾充任江西保安團指揮官。

④ AB團：（Anti Bolshevik）「反布爾塞維克」，是國民黨內右派的反共中堅份子所組織。開始於一九二六年，北伐軍佔領南昌時，由顧孟餘、陳果夫、丁維汾等所發起。但因沒有嚴密組織，不到半年便瓦解，成爲中國黨爭歷史上一個名詞而已，毛澤東借AB團名詞來打擊親李立三份子。

第三章　國軍圍剿閩贛蘇區

一九三零年，國民黨內部，曾發生了黨權之爭，由春至秋，南方爆發了蔣、桂戰爭；北方也爆發了蔣、馮戰爭，給予了紅軍一個攻城掠地的機會。更助長了李立三盲動主義路綫的發展。這年，彭德懷的第三軍團曾於七月廿九日攻陷長沙，八月三日退出；朱、毛率第一軍八月一日攻南昌，二日撤退，至贛西北與彭德懷的部隊會合。是時，鄂、豫、皖的四軍團，湘鄂西的二軍團亦迫近武漢。九月初旬，一、三兩軍團再攻長沙，因傷亡慘重，至十三日黃昏又撤退。朱、毛紅軍於十月四日攻陷吉安，大肆屠殺。

九月間國民黨內戰已結束，南京政府見湘、鄂、贛各省告急文書如雪片飛來，知道共禍蔓延，形勢可慮，即決定先行進攻紅四軍團，解除武漢威脅，再進攻閩贛蘇區的朱、毛軍，以除後患。

朱、毛在吉安得到這一個國軍準備進攻的情報；即將所有俘獲之物資運送入興國、寧都一帶蘇區根據地，紅軍亦於十月十八日退出吉安，渡過贛江東岸至東固、龍岡、寧都、興國一帶整訓，並加緊動員羣眾備戰工作。

此時江西省黨、團的領導同志及廿軍的軍政幹部，因不滿毛澤東反立三路綫，產生了反毛傾向，而發生內鬨。毛澤東卻利用整肅反布爾塞維克的「AB團」名義，在黨內進行了一次大屠殺，整個紅廿軍在富田被消滅了。他們的整肅風潮剛告一段落，國軍對閩贛蘇區朱、毛紅軍的大規模進剿已經開始。

十二月中旬，朱、毛接到上海中共中央的指示，及福建、江西各地方黨的情報，已獲悉國軍進攻計劃如下：

國民政府設行營於南昌，以江西省府主席魯滌平爲行營主任，指揮剿匪軍事，分路向東固、龍岡爲中心的朱毛紅軍主力進攻，一舉而殲滅之。

（一）左縱隊：第六路軍總指揮朱紹良，轄：第八師毛炳文、廿四師許克祥、四十九師張貞、五十六師劉和鼎，共約三萬五千人。

（二）中央縱隊：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兼，以張輝瓚爲前敵總指揮，轄：十八師張輝瓚、廿八師公秉藩、五十師譚道源、七十七師羅霖，共約四萬五千人。

（三）右縱隊：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轄：六十師蔡廷楷、六十一師戴戟、獨立三十二旅劉夷、獨立廿四旅馬昆，共約三萬人。

十二月廿七日以前各路國軍已進入下述位置：

（一）左縱隊：

1、毛炳文、許克祥師已進佔廣昌、寧都間之頭陂、洛口、東韶之綫。

2、劉和鼎師仍屯駐於建寧（福建）。

3、張貞師屯駐於連城縣（福建）。

（二）中央縱隊：

1、譚道源師進佔源頭。

2、張輝瓚師進佔龍岡。

3、公秉藩師進佔東固、富田。

4、羅霖師駐守吉安。

（三）右縱隊：十九路軍進佔蓮塘、興國、高興墟一帶地區。

朱、毛面對三倍於我的優勢國軍進攻，應如何進行反圍剿，經過了詳密的研究、判斷：中央縱隊國軍為進剿軍的主力，他的前敵指揮官張輝瓚是個反共最積極的分子，紅軍要粉碎國軍圍剿，必須先行消滅這一個主力，其餘左右兩縱隊便可不攻自退，當時決定反圍剿計劃如下：

（一）採取誘敵深入，集結紅軍主力，各個擊破敵軍之戰畧。

（二）施行軍事總動員：所有紅軍集中小佈附近地區待命。地方赤衛隊必須運用游擊戰術，積極擾亂敵軍，牽制敵軍，襲擊敵軍運輸隊，以配合紅軍主力作戰。

（三）施行政治總動員：各地方黨組織及蘇維埃政府必須發動及領導全體羣衆，將所有糧食、牲口及一切物資，悉數搬運上山收藏，不得資敵，實行堅壁清野，除男女壯丁參加運輸隊協助紅軍運輸外，老幼男女必須疏散藏匿深山，不爲敵軍所利用。

廿七日晚，朱毛已獲悉國軍進勦部隊已進駐蘇區上列位置，決消滅張輝瓚師後，即由西向東繼續掃蕩國軍之右縱隊，並於廿八日上午八時下達進攻命令，大畧如下：

（一）紅軍決對國軍之圍勦，實行中央突破，廿九日拂曉開始進攻，先行消滅龍岡之張輝瓚師後，即由西向東掃蕩源頭之五十師及其右縱隊。

（二）第一軍團即進入龍岡東南之山岳地區之進攻準備位置，部署陣地。

（三）第三軍團即進入龍岡東北之山岳地區之進攻準備位置，部署陣地。

（四）各軍團於廿九日拂曉各派一部，向龍岡之敵佯攻，引誘國軍至我預定作戰陣地之內，一舉而殲滅之。

（五）興國獨立師於廿九日拂曉進入富田、龍岡之中間地區，阻滯富田、東固向龍岡之

增援部隊，掩護紅軍主力作戰。

（六）總司令部指揮所在龍岡正東約四里之山上。另有注意事項：

1、攻擊開始時注意佔領敵軍之無綫電台，並生俘其人員及器材。

2、俘獲之敵軍之無綫電台及器材須妥爲保存，對技術人員須妥爲保護。

3、對敵軍之一切物資糧食均不得破壞。

4、對俘虜官兵不得虐待，統送本部處理。

5、作戰時各部隊須緊密連繫，互通情報。

廿九日拂曉，第四軍之林彪部（第十師）第三軍之一部同時向龍岡佯攻，張輝瓚即率部出擊，紅軍稍事戰鬥後，即向預備陣地，且戰且退；張輝瓚見紅軍狼狽敗退，以爲這些土匪不堪一擊，當即全部向東南山岳地區攻擊；紅軍在預定陣地堅强抵抗，黃公畧軍即以一部偷襲龍岡墟，國軍之無綫電台及全部人員與器材均被紅軍俘獲。是時下着滂沱大雨，更增加國軍進攻之困難。激戰至十一時，紅軍見時機已到，立即全綫反攻；國軍傷亡千餘人，並因紅軍黃公畧軍已截斷龍岡西南面通東固的道路，被圍苦戰，至正午十二時，紅軍對國軍呼叫：「不要窮人打窮人」、「優待國軍官兵」的口號下，國軍士兵大部份自動投降，張輝瓚在紅軍包圍下，無法逃脫，卒被紅軍俘虜，全體官兵無一漏網。

在龍岡戰鬥時，張輝瓚指揮部之無綫電台器材及人員早被紅軍俘去，其與各師之連絡遂告中斷，各師既不明情況，又被地方赤衛隊日夜襲擊、騷擾，故不敢離開駐地，致不能增援龍岡作戰。

龍岡戰鬥結束後，朱德即命張輝瓚押來問話，當時張輝瓚尚身穿整齊的卡嘰軍服，脚穿長筒皮靴，身佩軍章，精神雖頹喪，但態度頗鎮定，當被押至朱德面前時，見朱德衣不稱身，又極殘舊，不像軍官，故甚覺詫異！

據朱德說，當時他訊問張輝瓚，主要的有以下三點：

（一）朱德問：你既被俘，願意生？還是願死？張輝瓚卻反問：我當然希望生！但不知你們要多少錢才肯放我？

（二）朱德說：我們不是土匪，你想錯了，我們不是要你的錢，我們想辦一間紅軍軍事學院，你是否願意擔任教授，爲我們造就人材？

張輝瓚答：願意。

（三）朱德問：以你的意見，我們下一步行動應進攻那一個師？

張輝瓚說：進攻十九路軍爲最上策。並將十九路軍的一切情形，如番號、兵力、駐地、主官姓名、各師旅的戰鬥力……等詳細述明。

朱德知道他說的十九路軍情形，都是實情，但他爲什麼要以進攻十九路軍爲上策？朱德也知道其意，是想保存他指揮的十八師及五十師，並有機會配合十九路軍將紅軍殲滅。

訊問結束後，朱德即着張輝瓚住在司令部，派專責人員將他監視。朱德這種處理，一方面表示他對俘虜的優待，使所有俘虜的軍官敢於暴露身份，俾易清查，同時因張輝瓚爲紅軍官兵所最痛恨，防止未經公審便被殺害。

是日下午紅軍即向東固進攻，公秉藩之廿八師，一經接觸，即向吉安逃竄。三十日紅軍全部由西向東挺進，進攻源頭之譚道源五十師，譚師聞張輝瓚失敗，全師覆滅，立即向北撤退，紅軍跟蹤追擊。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追至東韶消滅譚師之一半。其餘各進佔蘇區的國軍，亦聞風逃回白區。紅軍即佔領廣昌、寧都一帶，休息整訓。

是役紅軍俘獲國軍官兵萬人，步槍九千餘枝，小山炮、迫擊炮、輕重機槍、彈藥、軍用品、糧食甚多，現金有三個師軍餉的銀洋。最重要的是俘獲無綫電台全部人員及器材，台長王錚後來爲紅軍訓練無綫電技術人材，建立紅軍無綫電訊系統，及建立無綫電情報組織，成爲紅軍的重要情報高級人員之一。

作戰期間，蘇區羣衆是全體動員了，當紅軍作戰時，搶救、搬運傷兵、輸送糧食；戰事結束時，搬運俘獲物資，掩埋陣亡之敵我官兵，打掃戰場等一切工作，均由羣衆負責，而且

做得很好，這是紅軍政治動員工作的成功。

張輝瓚被俘後約二十天，紅軍舉行一次軍民大會，公審張輝瓚，他受盡了鞭撻之苦，還要受「點天燈」等等肉刑折磨後，才將他殺頭，並將他的頭顱用木盒盛着，放在河裏，順水流出白區，藉此以警告國軍。事後不久，朱、毛接到中共中央來信，畧云：國民黨已派員來接洽，願以現金二十萬元，及釋放在押的所有政治犯，以爲交換張輝瓚之條件云云。但張已被殺，事成過去，朱、毛則失了一個好機會，大家都感到可惜！

國民黨因紅軍殺了張輝瓚，便採取報復手段，將很多在押的政治犯殺害了，並在全國各大城市逮捕了很多左傾學生，這是國軍第一次圍剿蘇區的餘波。

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獲得了械彈及三千俘虜士兵的補充，部隊更爲充實，工農羣衆與紅軍的合作更緊密；便動員各縣亦衞隊擴編爲兩個軍（廿二軍和廿六軍），廿二軍以陳毅爲軍長，廿六軍以楊岳斌爲軍長。

四月間，紅七軍又到達寧都與朱、毛紅軍會合，使紅軍戰鬥力更加强大，朱、毛、項英（項英是一月間到蘇區，他是閩贛蘇區中央分局書記）等，正在喜氣洋溢，整軍經武之際，一天下午，南豐縣地方黨特派了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民到廣昌紅軍司令部找朱德，神色極爲緊張，朱德心知有異，立即招待他坐下，並着特務員倒茶給他，他喝過茶後，即將一個小紙包

交與朱德。

這個小紙包原來是一份情報，內云：南豐國軍傳出消息，即將大舉向蘇區進攻，現南豐城內有國軍第八路軍朱紹良部兩個師，第八師毛炳文、廿四師許克祥，正嚴密封鎖通往蘇區道路，對來往商民嚴密檢查……。

那時，毛澤東、項英均在寧都，朱德立即將情報通知毛澤東。

同時毛澤東亦接到了永豐、吉安、萬安各縣黨委報告，證實該項情報可靠，乃立即通知朱德命令新編之廿二軍及廿六軍留駐廣昌阻滯國軍右翼進攻部隊，其餘各軍到寧都以西之青塘集結。是時朱德又得國軍孫連仲部派人送來有關國軍的情報，詳述國軍第二次圍剿的整個計劃，並云：二十六路軍及第五路軍情形，請詢問來人，並請將來人留用，切勿遣回，以免誤事……。情報簽署的是「老同志」三個字。朱德詢問來人，據稱是參謀長派來的，並着我不要回去。朱德心知這是滲入國軍內部的黨中同志所作，再詢問有關五路及廿六路軍情形，據稱：所有北方官兵多患水土不服，且不慣山地作戰，士氣低落……。

朱德立即分令廿二軍及廿六軍由陳毅指揮，留駐廣昌，監視東面之敵軍，掩護蘇區，其餘各軍即開到青塘集結，他亦帶同總部幕僚人員趕到青塘。

當時綜合各方情報，國軍之第二次圍剿計劃如下：

國軍調動了二十萬大軍，對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並採取步步爲營，逐漸推進，將紅軍包圍於寧都、青塘地區而殲滅之戰畧，其部署大畧如下：

（一）派何應欽爲剿匪總司令，總司令部設於南昌。

（二）第五路軍王金鈺部（轄四十七師王金鈺部、三十四師郭宗華部、五十四師郝夢麟部、二十八師公秉藩部，共四個師）在吉安以東永豐以南地區集結。

（三）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轄兩個師）在宜黃集結。

（四）第八路軍朱紹良部（轄第八師毛炳文、二十四師許克祥等師）在南豐集結。

（五）五十三師劉和鼎部在建寧集結。

（六）十九路軍蔣光鼐部（轄六十師蔡廷楷、六十一師戴戟）在泰和東岸地區集結。

各路軍均於五月初旬集結完畢，中旬開始向蘇區逐步推進。

當時紅軍在青塘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各軍長、軍政委、軍參謀長均出席參加，首先由朱德報告國軍第二次圍剿的計劃，並分析此次圍剿軍以國軍右翼軍第五路軍王金鈺部爲最脆弱；十九路軍戰鬥力最强，但他們抗日意志甚堅，不願與紅軍作戰，我軍應先行進攻最脆弱之一翼，消滅王金鈺後，由西向東各個擊破之，這樣，既可免我軍有被壓迫於贛江邊遭聚殲之危，又可於戰事結束後，在閩贛邊之黎川、建寧、泰寧等地區擴大根據地，動員更多的人

力物力，準備下一次會戰。與會人員均贊同朱德的意見。毛澤東亦提出了動員赤衛隊、動員羣衆參戰，及實行堅壁清野計劃，亦一致通過。

作戰計劃決定後，紅軍主力即由青塘出發，經古龍岡至良村集結。由五月初旬至中旬紅軍曾派出小部隊與國軍進行游擊戰，五月十六日開始以迅速、堅決之行動，向已佔領富田之王金鈺、公秉藩兩個師（共十一個團）突擊，很快的便將王、公兩個師擊潰，且大部份被消滅。當紅軍進攻富田時，富田之西北四十華里有國軍之蔡廷楷師，富田以東有郭宗華師，紅軍之左右側背均受威脅，國軍雖知富田被紅軍攻擊中，但因情況不明，及指揮不統一，致不能及時增援作戰。

富田戰鬥結束後，紅軍立即進攻郭宗華師，也很快的消滅其大部，其餘潰不成軍，向北逃竄，郝夢麟師聞郭師被消滅，星夜退回永豐縣城。紅軍因有民衆幫助，清掃戰場，抬運傷兵，看管俘虜，搬運戰利品，輸送糧食，以至偵察敵情，封鎖消息，都由地方蘇維埃政府指揮赤衛隊運輸隊負責，紅軍於戰鬥結束後又立即向東出擊，連續擊潰了孫連仲部、朱紹良部、劉和鼎部，計由五月十五日起至三十日止，僅十五天的時間，紅軍由西至東，經過了七百里的行軍作戰，五次慘烈的戰鬥，將國軍的第二次圍剿整個粉碎了，繳獲的步槍一萬餘枝，彈藥軍用品無數。國軍的殘餘部隊，退回吉安、永豐、宜黃、南豐、泰寧各地。

紅軍在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後，僅休息了三天，便按照預定計劃，將各軍分駐在建寧、黎川、廣昌等地區，進行擴大蘇區的赤化工作，籌糧籌餉以應軍需，並將剩餘步槍五千枝分發各縣赤衛隊，地方民衆武力亦由此大大的加强了。

紅軍正在黎川、廣昌、建寧展開工作的時期，六月下旬，忽接南豐城內送來的情報，國軍又準備對蘇區作第三次的圍剿，其情形如下：

（一）蔣中正氏親任剿匪總司令，駐節南昌。

（二）進剿軍分三路，中路總司令何應欽，駐南昌。右路總司令陳銘樞，駐吉安。左路總司令朱紹良，駐南豐。

（三）進剿軍之主力：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五個師；其次是：蔣光鼐、蔡廷楷、韓德勤等三個師，其餘尚有孫仲連、朱紹良、上官雲相等各軍師，總兵力約三十萬人。

（四）進剿軍的戰畧是：各路軍向蘇區長驅直入，壓迫紅軍於贛江邊一舉而殲滅之。

那時紅軍因經過第二次反圍剿的艱苦戰鬥，官兵傷亡不少，且未經休息補充，紅軍兵力，除第十二軍須留駐福建，對該方面敵軍警戒，並進行游擊外，其餘第三、四、五、七共四個軍的紅軍主力，約三萬六千人。朱、毛接到這一情報，大爲吃驚。經過了一次討論後，

立即命令各軍開赴興國集中。經過十多天的行軍，繞道迂迴，步行千里，到達興國時，敵軍已分路前進，迫近興國，乃決定避敵主力，打擊其弱點，並擬定作戰方針，大畧如下：

（一）由興國先行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向東，從敵之後方連絡綫上横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蘇區，而置於無用之地，此爲作戰第一階段。

（二）待敵回頭北向，兵力疲勞之時，便乘隙攻其弱點，爲作戰第二階段。

時間和敵情逼迫着紅軍，再無從容準備的機會，乃即集結兵力向富田前進，可是在紅軍行動之後，被敵偵悉紅軍行動企圖，陳誠、羅卓英兩個師立即趕至富田。形勢又對紅軍不利，乃被迫改變計劃，撤回興國城西之高興墟集結，斯時僅有這一個小墟塲及附近鄉村未被敵佔領。紅軍集中了一天後，乃決向興國東部之蓮塘及永豐南面之良村、寧都縣北之黃陂方面突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和蔣、蔡、韓各師間之四十華里空隙地帶而到達蓮塘。第二天和上官雲相之前哨開始戰鬥（上官指揮他自己一師、及郝夢麟師）。第三天擊潰上官師爲第一仗。第四天擊潰郝夢麟師爲第二仗。這兩次戰鬥結束後，立即繼續東進，經過三天的行軍，到達黃陂將毛炳文師擊潰爲第三仗。紅軍連戰皆捷，繳槍萬餘。此時國軍已發現紅軍主力所在，正在向南向西前進之國軍主力，立即轉移向東，以黃陂爲目標，以大包圍的態勢，分路併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

當國軍主力迫近紅軍時，紅軍又從蔣、蔡、韓和陳、羅軍之間一個二十華里間隙的大山中間偷越出去。回到興國集中。國軍進抵黃陂，已不見紅軍的蹤影，經過多方的偵察始知紅軍已回竄興國，待國軍再向西進，追尋紅軍時，紅軍已休息了半個月，精神飽滿，士氣旺盛，準備着迎接新的戰鬥。可是國軍呢？因蘇區民衆遷移上山，所有可供敵軍利用的物資，尤其是糧食都已匿藏山中，後方的交通運輸又常被赤衛隊襲擊、破壞，以致補給困難，糧食接濟經常中斷，且在蘇區境內，晚上常遭民衆武裝赤衛隊騷擾，食既不飽，睡亦不寧，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磨折，官兵多已精神頹喪，已無戰鬥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國軍被迫開始退卻了。紅軍偵知國軍退卻的消息，立即向敵追擊，先行消滅了蔣鼎文的一個旅，接着消滅韓德勤全師，最後在高興墟和蔣光鼐、蔡廷楷兩個師，發生了激烈的攻防戰鬥；紅軍用「集團梯次隊形」向敵軍陣地衝鋒，（以後稱爲人海戰術，即發明於此。）但在國軍優勢的火網之下傷亡慘重，使紅軍攻擊頓挫，蔣、蔡兩師乃得從容撤退。毛澤東說：「這次戰鬥打成對峙，讓他逃去了。」

這次圍剿，自七月初旬起至九月中旬始告結束。是役紅軍繳獲步槍、機槍、迫擊炮等二萬枝，俘虜敵軍萬餘人，紅軍傷亡有二千餘人，第三軍軍長黃公略在高興墟之役陣亡，爲三次反圍剿以來傷亡最大的一次。但蘇區的形勢更爲穩固，士氣、民氣亦更爲旺盛。

第六編

中央蘇區的初期

第一章　閩贛蘇區成爲中央蘇區

中共中央委員會自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以來，即由陳獨秀任書記，並秘密在上海辦公，至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後，遷往武漢辦公，嗣因國民黨以汪精衛爲首的左派與中共關係由惡化而至决裂，陳獨秀被黨內外及第三國際指爲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而消極。是年的「八七」緊急會議，他未出席，推選瞿秋白繼任。瞿秋白任總書記後，抱着左好過右的心理，堅决執行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統治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革命路綫。因此，他在上海盲目的發動工人的暴力行動，及策動了廣東省的廣州暴動，陝西的渭南華陰暴動，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動。這一連串的暴動皆先後失敗了，使到暴動地區各業、各階層的人士，都遭到重大的損失和犧牲，尤其是工農羣衆所遭到的犧牲更爲重大，使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走向低潮。他於一九二八年春調回莫斯科檢討。接着於七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以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被撤職，而改以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繼任總書記，周恩來爲組織部長，李立三爲宣傳部長。但因向忠發能力薄弱，周恩來是個圓滑的人，不願負起領導的責任，中共中央大權便爲李立三所操縱。

在李立三領導的初期，他認爲中國革命高潮尚未到來，審愼的根據六全大會決議的精神，領導中國革命。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給湘贛邊區毛澤東的指示，被毛澤東四月五日給中央的報告，斥爲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計太悲觀了，同時毛澤東認爲一年可奪取江西。李立三是個好大喜功，而又易於衝動的人，他的革命鬥爭路綫，便由此開始轉變，眼見閩贛蘇區朱毛紅軍的發展，緊接着鄂、豫、皖區，湘、鄂西區的紅軍之發展，及一九三零年國民黨內部發生蔣桂戰爭、蔣馮戰爭，這時他認爲中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產生了要奪取一省或數省的政權以至全國政權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綫。一九三零年，命令朱毛紅軍奪取南昌、長沙，配合鄂、豫、皖以及湘、鄂西紅軍進攻武漢；及將廣西左右江蘇區的紅七軍、紅八軍調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等。那時，立三路綫發展到最高峯。由於他的革命鬥爭路綫的錯誤，致使革命組織及紅軍實力受到了重大的損失。他因此於是年十月被第三國際調赴莫斯科受到嚴重處分。他走後不久，中共中央黨的領導權又被缺乏經驗的國際派的留俄學生陳紹禹、秦邦憲等所操縱。當時一方面是：在上海中央的領導同志，很多被國民黨特務捕殺，中央領導同志在上海的處境甚危；另一方面：各地蘇區的發展和紅軍已日益壯大，他們認爲在閩、贛蘇區建立全國蘇維埃政府以加強全國蘇維埃運動，以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早日來臨，必須加强黨在蘇區的領導。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會時便有將中共中央遷入閩贛

蘇區之議，四中全會結束後，張國燾於一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回抵上海，隨即派赴鄂豫皖區，以加强該區黨、政、軍的領導，待至向忠發、惲代英先後被捕殺後，便更積極的準備遷往閩贛蘇區工作。周恩來那時是代中共中央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他於八月間即離開上海赴閩贛蘇區（那時我尚在上海，約十天後才離滬）。九月，陳紹禹、秦邦憲等在第三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改組中央，將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國際派列爲中央委員，而以陳紹禹爲書記，並即决定全部遷入蘇區辦公，但陳紹禹决暫留上海，而以秦邦憲代理書記。於是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及其他高級人員，亦即於十月及十一月先後進入閩贛蘇區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即在閩贛蘇區正式開始領導中共全國革命的鬥爭。十二月初旬，第三國際派來了一位軍事顧問李特，他化裝爲神父，由中國留俄學生伍修權陪同經香港來到蘇區，協助中共領導同志，以加强蘇區的軍事領導，當他們到蘇區時，我在福建之河田接待他們，相談甚歡。

李特是德國人，身形高壯，沉默寡言，年紀已有四十左右，倒似一個有修養的軍人。他在俄國時，是任第三國際軍事委員會的幹事，此次與他同時準備來蘇區者，共有三人，其中一個是第三國際軍事委員會委員，但到香港後，因無法隱蔽身份，致中途折返，所以僅有李特一人來到蘇區。

伍修權是武漢工人，學徒出身，留學莫斯科多年，他的俄文很好，中文僅讀過小學，說話很有條理，爲人亦坦白、忠誠、無機心，後來我任模範團長時，曾一度任我的政治委員，相處很融洽，以後我調任粵贛軍區司令時，他即調回中央黨機關工作，我們都有依依不捨之感。

中國的「蘇維埃政府」是個不折不扣的蘇聯產品！這名詞的第一次出現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五日，在漢口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準備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決議。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時，也有「實行土地革命，發動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議案。但這時「蘇維埃政府」還不過是一個徒託空言的名詞，在南昌暴動時，也沒有成立蘇維埃政府。

中共在潮汕失敗之後，彭湃領導廣東海陸豐兩縣農民武裝暴動，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成立「海陸豐兩縣蘇維埃政府」開始，中國才第一次有了蘇維埃政府的出現。接着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時，又成立了「廣東蘇維埃政府」，高崗、劉志丹在陝西華陰、渭南暴動時，也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但是這三個蘇維埃政府都只有三天或半個月的壽命，可稱是最短命的嬰孩。

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領導湘南暴動，成立了湘南各縣蘇維埃政府，規模較前三次爲

大，壽命也較長些。但在紅四軍退出湘南後，也無形瓦解了。井崗山朱毛會合，建立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也告失敗。因國軍攻陷井崗山。朱毛率紅四軍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離開井崗山轉移到閩贛邊區，擊潰了國軍郭鳳鳴師。開闢了新的根據地；佔領了福建長汀的全縣和上杭、永定、連城、龍岩的一部。江西的廣昌、寧都、石城、雩都、興國、瑞金、會昌六縣的全部。另贛縣、潯鄔等縣的一部，在這些地方都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此外，還有鄂、豫、皖蘇區，洪湖蘇區、廣西右江蘇區。中共中央為了廣泛地開展蘇維埃政府運動，擴大蘇維埃運動的政治影響，於一九三一年，積極籌備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並在瑞金城西北約五華里之沙洲壩，建築中央政府大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舉行了六天會議，選出（實際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中央政府委員及正副主席各會局首長。毛澤東被指定為主席，張國燾、項英為副主席，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項英為勞動人民委員，張鼎丞為土地人民委員，周一粟為內務人民委員，王稼祥為外交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鄧子恢為財務人民委員，張國燾兼司法人民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查委員，鄧發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便於十一月七日正式宣佈成立，山僻小縣的瑞金選為蘇維埃政權的「國都」，在蘇區裏的同志竟稱瑞金為瑞京，閩贛蘇區便成為中央蘇區。

自中共中央委員會遷到瑞金蘇區後，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的閩贛蘇區中央分局撤銷了，原任中央分局書記的項英，改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接替周恩來），中央蘇區的黨政軍一切大權盡落在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及李特等幾個人手上，而以李特爲馬首是瞻。

秦邦憲和張聞天既缺乏工作經驗，又因回國不久，初來蘇區，對於蘇區內的黨政軍上級幹部都不熟悉，他們只有借重周恩來這位老資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來協助工作。

周恩來是一個最會看風駛𢬵，通權達變的人，且手段圓滑，他雖然失了代總書記和軍委會主席之職，但眼看到國際派的權高勢大，他也不能不遵從秦、張的領導，特別是對李特這位「太上皇」誠惶誠恐，事事請示，唯命是從，恭維備至，連他的起居飲食，香烟洋酒均供應不輟，甚至還物色一位讀過小學的女同志送給李特爲臨時太太，這種巴結奉承，令李特對他言聽計從。因此他又成爲一個中央上下溝通的中心人物，比他稍爲低級的同志，他即擺出其領導人物的架子，頤指氣使！

朱德，是有鬥爭歷史的紅軍領袖，爲人忠厚，紅軍中除了一兩個有野心的高級將領對他陽奉陰違之外，無不對他擁戴；中共中央新的領導同志，對他亦很尊重，而且還積極去籠絡他，爭取他合作；周恩來是朱德入黨的介紹人，又是南昌暴動時少數領導者之一，他往日及初到蘇區時對朱德常以黨的領導者自居，每與朱德商討問題時，常作肯定的口吻，但在中央

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他就一改常態，對朱德即客氣起來了。

李特是個初到中國的外國人，他不明蘇區的人事關係，因朱德是紅軍總司令，所以他對朱德也很客氣。

朱德處在備受各領導同志尊重的環境下，是喜歡極了！他也知道自己責任之重，事事小心，更與各領導同志衷誠合作。

劉伯誠，因在南昌暴動時和暴動後都擔任參謀長，南昌暴動後的軍事失敗，他要負相當責任的，所以他再不敢以諸葛亮自居，而且身體健康不大好，那時他任紅軍學校校長，只是盡他的本份責任，對於其他的事，他都不敢過問，因他有謙虛精神，各領導同志都對他好感。紅軍幹部均承認他是一個有學術經驗的軍事長才，大家見到他時都很尊重，並請教他，所以他在蘇區時，精神也感愉快。

項英是個心地坦白、平易近人的人物，他無權位思想，上下級同志均能融洽相處，在蘇區內很多同志都喜歡和他接近，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他有太太在身邊，我每到瑞金，都到他家裏聊天、食飯，他和太太都很喜客，故無寂寞之感。

至於毛澤東，他就不同了！在中共中央未遷到蘇區時，所有黨、政、軍的一切決策，均以他個人意見而定，中央的指示若與他的見解不同，他就置之不理，甚至予以駁斥，中央對

他的處罰，他亦一笑置之，抱着你罰你的，我作我的態度；但自中央遷到蘇區後，他的權力喪失了！因黨、政、軍人員都不敢違背黨中央的指示。那時他不特不能任意指揮軍事及黨務，甚至身爲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凡重要的措施和建設，必須要請示黨中央決定，然後纔能執行，而且還要他自我檢討過去領導的錯誤，特別是批評他土地革命的富農路綫，給他很嚴重的處分；這種滋味，使他非常難堪！他那時除了參加會議之外，只有寫點文章；蘇區的經濟建設計劃，就是在這個時候寫出來的。可是，黨中央領導同志一樣不同意他的經建計劃，認爲當時的蘇區談不上經濟建設。以毛澤東那種不可一日無權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遭到這樣的冷落，其內心的苦悶，是可以想像的。

在當時來說，我同意毛澤東的富農路綫，也很讚賞他的經濟計劃。他過去的錯誤，只是在肅反問題上，而中央領導同志竟抹煞了他過去的鬥爭成績，給他太難堪的處分，我覺得很不公平。

第二章　調長紅七軍

紅十二軍的三十四師，是福建人民武裝編成的，時間已有兩年，但因過去管理教育鬆弛，行軍、作戰力很脆弱，精神散漫，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整理訓練，才比較像個軍隊，我正在進一步的提高官兵學術訓練時，因十二軍參謀長林野調紅軍學校任教育長，我又奉命調接該軍參謀長；我到職僅七天，又奉命調任紅七軍軍長兼政委。

羅炳輝軍長於接到命令時。很鄭重的對我說：「龔楚同志。你的調職。我既爲你歡喜，又爲我自己可惜！因爲由此可以發揮你的才智，爲革命事業而奮鬥，這是應該爲你高興的，但我卻失去了一個如師如友的參謀長，這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嗎？」他說話時，既肅穆而帶有三分笑容，充份流露他人性眞情，使我內心有點難過。

我對這一次調職，是歡喜的，但不是爲了升官而歡喜，升官對一般軍事幹部來說，是不感興趣的，因爲升官只是加重個人對革命的責任，並無任何好處；責任越重就犯錯誤的機會越多。我所以歡喜是爲了能和同艱共苦的七軍同志又聚在一起，這三個月來，七軍同志來信，均盼望我回去領導，我亦很信任他們。在這個艱苦的鬥爭中，官兵間的互相信任，是極

爲重要的。

那時七軍駐在會昌，因此我就決定於三天之內起程。第二天中午，十九師的政委陳漫遠來到長汀找我，我見他到來，有不勝之喜，立即和他到大街上的一家飯館裏食飯，坐下後，他對我說：「七軍同志已知道你調回七軍，張雲逸軍長及以下的指戰員皆大歡喜！李師長（十九師師長）主張我來接你，張軍長亦同意，所以我特地由會昌跑來接你，不知你何日動身？」我對他說：「我亦很想念七軍同志，兩天後就可起程了。」他聽了很高興。即將七軍到江西後的一切情形告訴我，如：交換幹部、整肅改組派、李明瑞被殺經過及張雲逸雖重任軍長，但常感憂懼，指戰員情緒憂鬱，七軍在反二次、三次圍剿中的戰績等等。我聽後不免爲之唏噓嘆息！

我們飲了幾杯酒，食完飯後，他又對我說：「你既不日動身，我不如先行回去，以免各人懸望。」我同意了他的意見，他便趕着起程回去了。

那天晚上，羅軍長備了一席很豐盛的酒菜，邀同軍政委譚震林，廿五師師長張宗遜等爲我餞行，席間各人都流露着惜別之情，這種設宴送別的情形，在閩贛蘇區內是很少有的現象，這亦表示了羅炳輝尚有溫情，我的內心亦感到安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帶着羅炳輝送給我的一匹棗紅色雄馬，及特務員阮成，於

晨光曦微時即由汀州起程，羅軍長及張師長（廿五師駐在汀州）也趕來送行，大家互祝爲革命珍重，在依依不捨中，一聲再見，我們便分別了。

從汀州到瑞金有一百二十里，我和阮成都急着趕路，那天天氣晴朗，步行得很靈活，我因腿部不便，步行廿里即騎馬，騎了一段路又步行，中途除了餵過一次馬料之行，沒有休息，午後五時便到了瑞金，我急於要見朱德，一直找到總司令部，我和他有三年多未見面，他見我到來，大喜！忙請我到他住的一間小樓上談話。剛好他的太太康克清在外工作未返，我們便在燒着柴頭的火爐旁邊相對坐下，他便滔滔不絕的談起來了。

「你的情形我從七軍同志中，知道很詳細。每個同志都說你好，張雲逸同志也說你是一個軍事政治兩方面都有卓越見解的人才。我老早就想調你回來主持紅七軍。但毛同志不同意，認爲多年不見，要考查一下？因爲聽說你在廣西工作時政治立場不堅定，走的是改良主義路綫。直到最近秦邦憲、張聞天兩同志，才提起你，他們說在長汀和你談了一整夜，廣泛的討論過有關中國革命問題；認爲你的見識很卓越，思想很正確，主張調你回來主持第七軍。這時毛同志才表示同意，並且說：『到底是我們井崗山同志不錯！』他這個人倒很聰明的。」

然後他又問我的負傷經過和療治情形，以及在十二軍三十四師的觀感，我一五一十的告

訴了他。

已經是吃飯的時候了。特務員送上酒菜，是一罐糯米酒，一盆大蒜炒臘肉，一盆雞肉生菜火鍋，這些都是他預先吩咐特務員安排的，朱德笑對我說：「龔同志！你還記得四年前我在長埈村你家中吃飯的情形嗎？你老太太做的臘肉不錯呢？她老人家現在還健康嗎？」我便將負傷期間，我母親如何愛護我的一切情形告訴他，彼此唏噓了一番。朱德又說：「四年前我在上堡鵝形一帶打游擊；四年後的今天，情形不同了！現在革命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壯大了。」這幾句話，是他的感慨，也可以說是表示得意。飯後，我準備告辭，他忙拉着我的手說：「我還有很要緊的話跟你談，我的老婆，今天不回來了，你就住在我這裏吧！」這時室外天氣很冷，屋子裏燒了一盆熊熊的柴炭火，而且吃了好幾杯酒，我們的精神都很興奮。朱德便將我離開紅四軍後的一切變化都說出來。

「你離開紅四軍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不幸事件，這些都是你所關心的。如陳東日、胡世健都是我們湘南革命的老同志，能力很好，對革命也很熱誠而努力。但在幾次清黨肅反的黨內鬥爭中，都先後被犧牲了！這個幕後主使人，相信你會知道的（意思是毛澤東），由井崗山轉移到閩、贛邊區時，我們紅四軍中曾鬧過『擁朱反毛，擁毛反朱』的笑話。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這個傢伙，他竟公開反對我？我當時以最大的忍耐，才沒有使局面破裂。段

AB團引起的富田事變，也是完全老毛一手弄出來的。許多同志全給自家人殺害了！」說到這裏，他似有無限的傷感。接着，又幸災樂禍的說：「現在好了，中央遷到蘇區來了，一切由黨來解決，不能由一個人來決定。」他頓一頓又說：「現在紅軍有四個軍，而實際上戰鬥力較强的是四、五、七軍。我兼四軍、你擔任七軍，彭德懷的五軍，也馬馬虎虎，只要這三個軍弄好，我們就有辦法了。」跟着又將三次粉碎國軍圍剿的經過，及積極擴軍備戰的計劃，詳細的告訴我，並告訴我：準備增加七軍一個師，要我努力訓練，好好的領導等語。

十一月二十日起床後，到總司令部拜訪參謀長葉劍英，我和他是初次見面，但我們都聞名已久，一見如故，他身材修長，服裝整潔，儀表俊秀，神情開朗，談吐簡潔，相與叙談，如坐春風。他是廣東梅縣人，當時蘇區內廣東人甚少，他對於紅七軍亦特別關懷，談到七軍整肅改組派情形，深恐影響人心，要我好好的振作士氣。李明瑞之死，他表示惋惜。關於七軍改隸三軍團指揮一事，他認爲彭德懷雖是毛澤東的愛將，不過目前黨中央在蘇區領導，不會有因私人喜惡來决定是非的事件發生，但仍勸我以忍讓爲好，對彭德懷須凡事小心。我見他對我這般親切，便問他：「我初到汀州時，爲什麽不讓我回七軍工作？」他稍加考慮後才說：「這是主席的主張，其中原因，當與整肅紅七軍改組派有關，朱總司令對我談過你的事，他對你極讚許，現在事成過去，你不必介意。」

我們談到上午十時，和他食了早飯後，他將有關軍隊訓練的資料送給我，於是我向他告辭，是時已是正午十二時了，便帶同特務員起程赴會昌，當天到達武陽圍住了一晚，廿一日正午到達會昌。

駐在會昌的紅七軍指戰員，聽到我即將到來的消息，歡欣若狂，正籌備盛大的歡迎儀式。我帶着特務員阮成，剛到會昌城外，張雲逸率紅七軍各師、團長政委、及軍部參謀人員、政治部高級幹部等，在城外河岸的草坪上，列隊歡迎。我內心交織着悲痛與喜悅的情緒和他們一一握手。因爲自己雖回到了手創的紅七軍，但過去一同奮鬥的高級幹部，現在，死的死了，調的調走了，俯仰今昔，感慨萬千！

晚上軍部的歡宴，團長以上的幹部都參加。他們都很關心我的腿傷和健康，並問我分別後的經過。我簡單的告訴了他們。第二天早晨，集合了全軍指戰員，由張雲逸佈達了我接任紅七軍軍長兼政委的命令。午後，我與張雲逸到各部隊巡視，指戰員情緒都很興奮。我便決定將軍部剩下的公積金（是到達江西前存下的）發給全體指戰員每人一元作敘餐費。在城外已收割的稻田上，聚集全軍指戰員，大碗酒大塊肉，歡天喜地的同進晚餐。各人都感到紅七軍前途，大有希望。

張雲逸是我的老戰友，他對紅七軍的愛護，和我一樣，幹部對他，也非常愛戴；我們交

換過去的經驗，暢談今後的發展。流連了三天的時間，還和高級幹部歡叙了好幾次，他才悵然分手，到紅軍總部工作。

紅七軍過去只有十九、二十兩個師，我接長紅七軍不久，朱德將紅三軍的一部，和其他軍事機關的特務營之類，新編成一個師，補充紅七軍，編為紅七軍第廿一師。師長龍雲（湖南人，約二十多歲），由彭德懷所保薦。這樣一來紅七軍的實力，更加强了。當時紅軍的編組情形如下：

紅軍總司令：朱　德
政 治 委 員：周恩來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第一軍團總指揮：朱德（兼）轄第四、第十二兩軍。
政治委員：周恩來（兼）。
第四軍軍長：朱德（兼）轄第十、十一、十二，共三個師。
政治委員：周恩來（兼）。
第十二軍軍長：羅炳輝，轄卅四、卅五，兩個師。
政治委員：譚震林。

第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轄第五、第七兩軍。
政治委員：滕代遠。
第五軍軍長：鄧平，轄第一、第二、第三，三個師。
政治委員：滕代遠（兼）。
第七軍軍長：龔楚，轄十九、二十、廿一，三個師。
政治委員：龔楚（兼）。
軍部直屬隊有：一個特務團、一個通訊連、一個工兵連。
師轄三個步兵團、師直屬隊：一個步砲連、一個特務連、一個衛生隊、一個擔架隊。
步兵團轄三個步兵連、一個重機連、一個通訊排。
步兵連轄一個特務排、三個步兵排。每排轄三個步槍班、二個機槍排，有因輕機槍不足者暫缺。班有戰鬥員十二至十六人。（班長一、副班長一、觀察員二、特等射手二，其餘係步槍手。）
紅三軍軍長黃公略，在第三次反圍剿時陣亡，該軍損失甚大，其部隊分編入紅五軍與紅七軍。
中共的軍事組織體系，在中央蘇區時期，黨中央下有軍事委員會，蘇維埃中央政府有軍

事人民委員，紅軍組織有：紅軍總司令部、方面軍總司令部、軍團總指揮部，軍、師、團、連、排、班之系統。

中共最高軍事領導機構是：中央軍事委員會，它是黨領導軍事鬥爭的，負責有關軍事建設、決策、及紅軍人員考核、升遷等工作；一切軍事計劃，均透過黨的組織，交到軍事機關去執行；蘇維埃中央政府軍事人民委員，亦受軍事委員會領導去執行軍事行政上的職權。

在中央蘇區時期的軍事會議，除了重要的決策由中央政治局議決外，多由軍事委員會召集舉行，並以軍事委員會之主席爲軍事會議的主席。

紅軍總司令部，是奉中共中央的指示組成的。它是全國紅軍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它根據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決策，及中央政府行政上的命令，領導全國紅軍的軍事建設和作戰指揮。但因交通通訊的困難，除中央蘇區湘贛邊蘇區，可直接領導指揮外，其餘各遠地蘇區如：鄂、豫、皖區，湘鄂西區，廣西右江蘇區等，均由各該地區的中共中央分局或行動委員會負責領導，故權力只能及於中央蘇區及湘贛邊區。其他地區則是鞭長莫及了。

方面軍總司令部，是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才創設的，以中央蘇區紅軍編爲第一方面軍，湘、鄂西蘇區紅軍編爲第二方面軍，鄂、豫、皖蘇區紅軍編爲第四方面軍。當時成立方面軍的原因：是因鄂、豫、皖蘇區紅軍發展甚快，按照當時紅軍編制，非一個軍團所能容

納，且其他地區的紅軍亦有繼續增加之勢，同時，還有擴大政治影響的作用包含在內

第一方面軍的總司令部，並未另行設立，其一切業務統由紅軍總司令部辦理，實際上只是加多一個名稱而已。

軍團總指揮部，是一個作戰指揮機構，對隸屬各軍僅有作戰指揮之權。各軍的人事、訓練、補給、醫療等，均直接由紅軍總司令部負責。

「軍」是紅軍建制的最高單位，對所屬兵團負有軍事組織、作戰、人事、補給、醫療上的一切責任。

參謀長的制度：中央蘇區時期的紅軍編制沒有副指揮員的設置。參謀長就是指揮員的第一個代理人，這是仿效蘇聯紅軍的制度。師以上軍事機構的編制，均設有參謀長。團設團副，連設連副，以輔助指揮員。如遇指揮員臨時出缺，或因故離職與作戰陣亡時，不須待上級命令之指派，各級參謀長及團連副，立即行使指揮員的職權。參謀長對本軍軍事單位作戰、情報、教育、補給、通訊等一切業務，均須負責研究，並經常提供具體意見，以輔助指揮員；指揮員對於參謀長所提供的意見，必須予以尊重和愼密的考慮。但最後的決定，仍取決於指揮員，參謀長不應固執己見，以動搖指揮員的決心。指揮員的一切決心和處置的實施，由參謀長負責領導各參謀幕僚人員，分別擬具各項實施計劃，及命令、訓令、電報、通

報、報告等，經由指揮員及政治委員簽署後實施，並有監督下級貫徹實施的責任。下級指揮員須接受上級參謀長之指導。所以紅軍中參謀長的地位，是很崇高的；紅軍對於參謀長的遴選，亦特別嚴格；他的條件，不僅是要有優良的軍事學識和作戰經驗，最重要的是他為中共的忠實黨員。

中共黨內最高的軍事領導機關——軍事委員會，當時亦認識到現代戰爭已不是指揮戰鬥的時代，而是組織戰鬥的時代。對於紅軍各級指揮機構的組織，曾經不斷的研究和改進，但因人才的缺乏，亦認為始終還沒有達到理想。當時紅軍各級指揮機構的編成如下：

一、紅軍總司令部：設有作戰、情報、教育、軍醫四個局（後改設六個局）一個事務室及紅軍經理部（後改稱供應部）。

二、軍團總指揮部：僅有參謀處之設置，內分作戰、情報兩科，另有管理員兩人，辦理其他事務。

三、軍部：設有參謀處，辦理作戰、情報、教育、通訊等業務；軍醫處，辦理衛生行政、醫療、救傷等業務，作戰時期改為臨時野戰醫院；經理處，辦理軍需器械之補給供應，及前運後送等運輸事宜。管理室，辦理其他事務。

四、師司令部：設有參謀長一人，參謀室（參謀二人），軍需室（軍需一人，助理軍需

一人）；管理室（管理員一人，書記一人）分辦各項業務。初期有經理處之設置，後已撤銷。

紅軍的經理制度是獨立的，軍司令部的經理處對上直屬於總司令部經理部，對下直接指揮到連一級的軍事單位之軍需人員。各級指揮員對經理處或軍需人員，只在行動上及所屬部隊之位置、任務、時間、以及所需之糧食彈藥數量方面，命令他們執行；對於現金收支，糧食出納，預算決算事項，均不須指揮員負責，指揮員亦無權過問。因此紅軍指揮員之調動，沒有經理部門的同時交替。

如上所述，當時紅軍指揮機構的編成，是不健全的。但因幕僚人員有高度的工作精神，和精密的分工，以及紅軍中的公文簡便，在辦理各種業務時均能迅速而確實執行。且在大家的不斷研究中，日趨進步。

關於軍事行動之決策研究，凡有決定性者，指揮員均須邀集政委、參謀長、政治主任，四個人在塲；參謀長須提出軍事情報及軍事行動意見；政治部主任，須提供政治情報（包括敵我軍官兵的政治情緒）及在政治上配合有關的問題。

決策既定後，參謀長負責主辦軍事工作實施部份，政治委員負責主辦政治工作實施部份。參謀長與政治部主任，須互相連繫，以保證軍事、政治工作之相互配合。

關於紅軍幹部任、免、升、遷問題：

紅軍初至井崗山時期，人事制度沒有建立，軍隊中的軍政幹部任、免、升、遷，均由朱德提出，會同陳毅、王爾琢及我商討決定；待與毛澤東會合後，即由前敵委員會決定。當時的原則，是根據：黨性（包括黨齡、思想）、能力、資歷、功績而取決的。中共蘇區時期，團長以下幹部由軍長、政委提出軍黨委決定，即可實行；師長以上之幹部由紅軍總司令部提交黨中央領導同志決定（如得中共中央書記、軍事委員會主席等少數領導人之同意便可），但師長之任免，則軍長及軍政委有權提出意見，報告總司令及總政委提交黨中央領導決定。

對於任、免幹部，無論任何職級，均是以一紙便條通知，並沒有正式任命狀及免職令；亦無官階之指明。

（附：紅軍編制指揮系統表見後。）

我接長紅七軍兼政委後，首先必須明瞭的是政治委員的職權，和政治部的工作問題。當時紅七軍的政治部主任是袁任遠（湖南人，曾任中共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到政治部去跟他談話，並查考上級發下關於紅軍中黨的工作指示，政治委員應注意的事項，及紅軍中政治工作實施綱領等文件後，才有了深切的認識。

政治委員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公開代表，他的職權是：監視軍事指揮員及所屬部

隊，執行上級給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規定的任務，以鞏固黨對紅軍的控制，並領導所屬軍隊裏面黨的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實施。爲要保障政治委員在紅軍中的職權能夠施行，硬性的規定各軍事指揮員（指揮員就是軍事主官，如軍長、師長……等）所發佈的命令、訓令，及對上級報告，均須由政治委員副署（簽名或蓋章於指揮員姓名之左邊），方能生效。有關行動的口頭命令，除了在戰場上執行已定的作戰計劃、戰鬥行動外，均須得政治委員的證明，方能生效。否則，上不承認，下級亦不執行。但如遇有特別情形，或受時間限制，又非違背革命利益者，下級得一面執行，一面設法報告政委。政委和同級指揮員，無論平時或戰時，是相處在一起的。在這種制度下，紅軍的指揮員，是有責任而無權力的。但是共產黨爲了要發揮軍事指揮員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以及保持指揮員對下級的威信，俾其命令能夠貫澈實現起見，在政委工作規定下有：爲了要發揮指揮員的軍事天才，舉凡軍隊的作戰、行動、教育、各種計劃和決心，不違背上級意旨和黨的決策者，政委必須尊重指揮員的意見，不應妄加干涉。同時，在各種場合，必須注意保持指揮員的威信，下級政治委員對上級指揮員，必須以長官看待；上級政委及指揮員，對下級指揮員如有錯誤，須予以指責或教育者，除錯誤嚴重須予撤職者外，不得當着他的下級部屬（指揮員之部屬）面前指責之，以免損及其威信。除非有萬不得已之情形，否則損害了同級指揮員威信之政委，須受到黨內和行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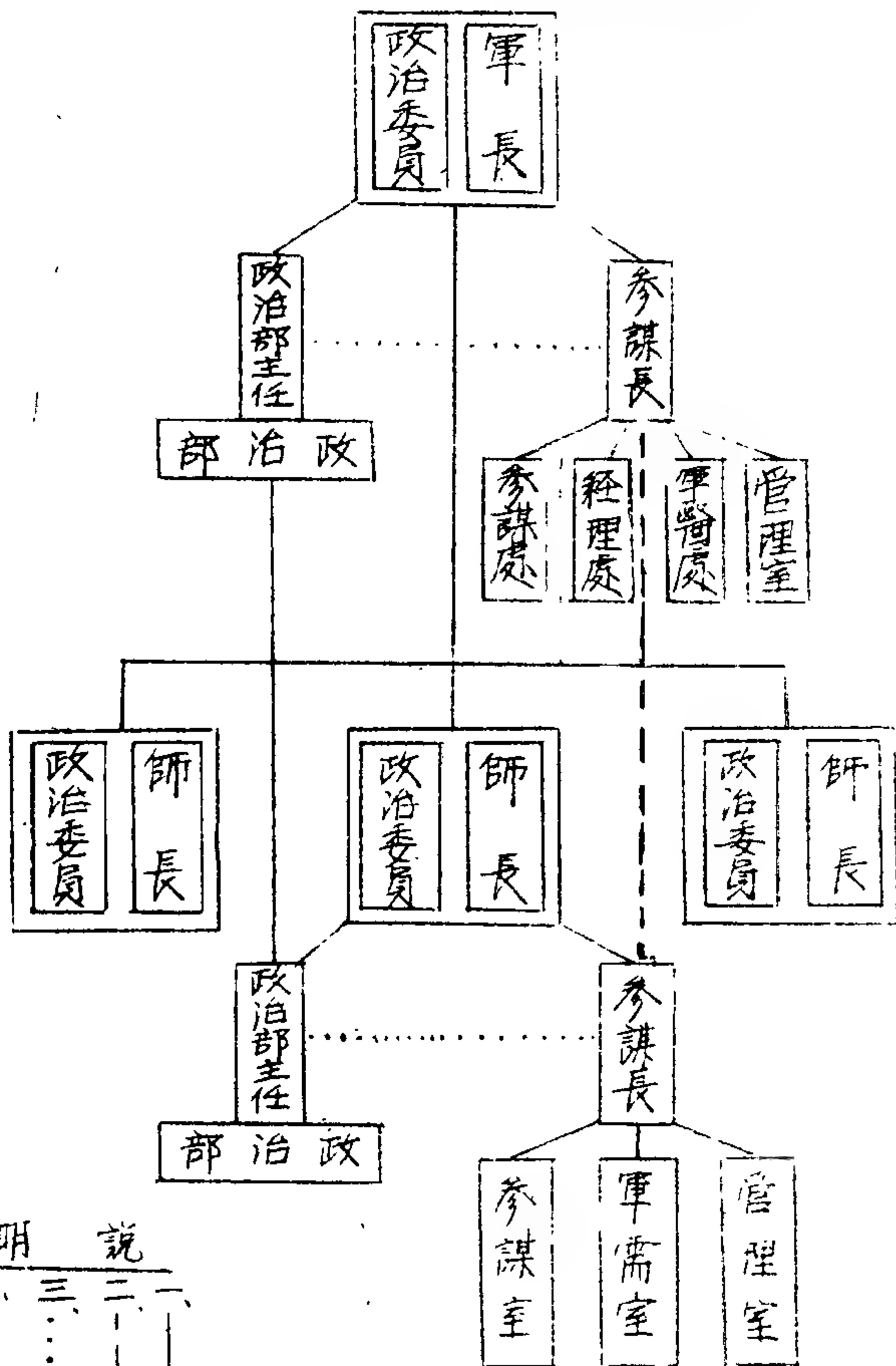
的處分。

但如同級指揮員有背叛革命行動時，政委有將之逮捕之權，甚至因情況緊急，不及逮捕時得指令特務員槍殺指揮員之權，甚至下級政委對上級指揮員亦有權指令特務人員捕殺之，李明瑞之被殺事件，便爲一例。

紅軍的組織中，師以上的軍事機構，均設有政治部。團、連有列寧室。政治部設有主任，受上級政治部的指揮及同級政委的領導及指揮，負責紅軍中黨的工作及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又是同級政委的第一個代理人；如遇政委因故離職或作戰傷亡時，毋待上級命令，即代理政委的職權。團之列寧室，由政委兼主任，另設幹事兩人，連之列寧室不設主任，由連政治指導員負責（連是指導員）；他領導該連內的政治戰士以及全體指戰員，進行教育、訓育、文化、黨務、及對民衆、對敵軍的政治工作。

黨在紅軍中的組織，是軍、師、團各級均有委員會之組織。黨書記，師以上通常是由政治部主任兼任，亦有由政治委員兼任的。團、連黨書記概由政委政治指導員兼任。一般來說，紅軍中黨的組織和黨員，對非黨員是秘密的。各級政治部列寧室，就是黨的辦公廳。連一級設有黨的支部，支部書記通常由政治指導員兼任，但亦有連長或排長兼任的；支部下設有黨的小組，通常每班一個小組；但黨員少者，即以排爲單位，編成小組。

紅軍編制指揮系統表



說明

一、——指揮線
二、— — —指導線
三、……連絡線
四、軍以上及師以下同

紅軍的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保障與協助軍隊完成其所負的軍事任務；政治部主任與同級參謀長，是經常保持着密切連繫的。政治部主任參加軍隊中的軍事會議，及重要情況判斷，政治部主任只提供政治情報資料，及聽取軍事情報和指揮官最後所下的決定與措施，以便策定政治部的工作計劃。參謀長則擬定各種作戰、行動、教育計劃時，須於下達前通知政治部主任，以便政治部主任根據這些計劃，擬訂政治工作計劃；同時下達政治工作命令，或頒佈政治工作的實施步驟的。

以上是中央蘇區時期紅軍政治領導的概況。關於紅軍政工制度的發展，可分爲三個時期：

（一）第一個時期：是南昌暴動至失敗，朱德所部之編入范石生部，亦屬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是政治指導員制，政治指導員在軍隊中的地位低於指揮官，但高於下一級的軍官，他的任務是：

（1）負責軍隊黨的組織和宣傳工作（他兼黨的書記）。協助指揮官達成戰鬥、訓育、管理、給養等任務。一切工作以爭取軍事勝利爲主。（有人稱指導員等於軍事主官的姨太太，這是因爲有些指導員不負責任，專事奉承主官所招來的。）

（2）平時對軍隊工作，在早晚點名時要作政治性的訓話，每日定時上政治課，組織和領導士兵的文娛活動，維持軍風紀。

（3）戰時則鼓勵士氣，向士兵講解作戰意義和目的，提出適當的口號，鼓勵官兵，慰問傷員，教育俘虜；發動戰地羣衆協助軍隊，對敵軍作戰地宣傳……等；在必要時還與指揮官分工合作，擔任指揮一部軍隊作戰。

（4）行軍時若無敵情，政工人員先行出發，發動沿途民衆準備茶水，供應部隊；到達宿營地時，發動羣衆準備出賣糧食，供應軍隊。

若有敵情則隨軍行動，維持行軍備戰紀律和精神。

這一時期，指揮官和指導員關係是融洽的，原因是政工人員能幫助指揮員的一切軍隊工作，而且以指揮官的意見爲主。

（二）第二時期：是一九二八年紅四軍成立起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古田會議止，是黨代表制度。黨代表地位與同級指揮官相等，但有代表黨監督指揮官之權，他的任務：

（1）領導黨的工作（他們多數是兼黨書記）。

（2）與指揮官共同負責軍隊的領導指揮，但軍事方面須尊重指揮官意見，政治工作則負完全責任。

這一時期，指揮官與黨代表的關係是：地位平等，互相合作，但有時亦經常因不同的意見而發生爭執，有些指揮官覺得他們妨礙工作進行。他們的合作程度，遠不如指導員時期的融洽。

（三）第三時期：古田會議後改爲政治委員制度。

政治委員制度時期，因政委的職權高於指揮員，故常引起指揮員不滿，在紅四、五軍中均曾發生過提出取銷政委制度的意見，彭德懷也是其中之一，但爲黨所拒絕，並且引起一次糾正反政委制度傾向的鬥爭。

朱德本人，在指導員及黨代表制度時期，均與政工人員相處得很好，他自己亦經常參加政治工作。他對軍隊的一切決策均召集軍政人員共同商討，政工人員對他亦很尊重。但對毛澤東則常有不滿表示，他常對政工人員說：一切爲了軍事勝利，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同一目標，這可見得他對政工的重視。

中共的情報工作，一向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國共分家以後，便處心積慮的保留了很多中共黨組織在國民黨的軍事機關及軍隊中工作。同時還密令地方青年學生黨員，投考國民黨所辦的軍校，畢業後滲入國軍中去。這些中共黨員，是以反共爲外表的中共工作者。他們希望由初級軍官逐漸升上去，備爲將來中共之用。這是中共佈置於國軍中情報工作步驟之

一。在這工作中所收的效果，如：國軍營長黃公畧，是因通報敵情於中共，被其上級軍官懷疑，準備解决他的；他就在湘東特委的安排下與彭德懷聯絡叛變。又如廿六路軍孫連仲部的高級軍官——趙博生、董振堂等，利用官兵不滿國民黨中央的情緒，而策動了大規模的「起義」，皆是顯著的例子。

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各地的中共黨組織及每一個中共黨員，都是中共的情報工作者。在接近蘇區的地方，他們運用工農及婦女黨員，僞裝上山割草、砍柴，或拿着食物盒等等各種方法遞送情報外，還利用回娘家的婦女，或挑着大糞出田工作的農民，以通過國軍的警戒綫，內中多藏着重要的情報遞送給紅軍。這些情報傳遞的方法，雖曾在南城及萍鄉，均被國軍破獲過；但他們所破獲的，還不及萬分之一，這就是紅軍的情報來源的一項。

但收效最大而最迅速的便是電訊的偵察與破譯。它的主要辦法是：竊收國民黨最高軍事機關與各總司令部、軍部、師部的來往無綫電報，將這些電報設法譯出，對國軍的一切動態與計劃，瞭如指掌，故國軍未行動前，其部署作戰的計劃，便被紅軍所獲悉。這一支無形的赤色第五縱隊直接伸入了國軍最高統帥的指揮部。

這支無形的赤色第五縱隊的組織，分爲四個部門：

一、偵察組：有電報機三座，負責偵察國軍電台方向位置，來判定國軍的位置與動向。

二、收報組：有收報機四部，日夜不停的竊收國軍高級指揮機構所發出以及各軍部師來往的電報，如係新密碼，即送猜報組研究，若係舊密碼即交譯報組翻譯。

三、猜報組：以王錚爲領導，有若干專門研究密碼學的高級技術人材（其中有由蘇聯受訓回來的），長年累月的研究國軍所使用的最新密碼。儘管國民黨最高統帥部經常更換新的密碼，但紅軍的密碼專家，運用他們卓越的密碼技術，在無綫電報偵察中竊取了三至八個電報後，便能將國軍所使用的密碼全部破譯出來，仿照國軍的密碼方式，製成密碼本交譯報組翻譯。

四、譯報組：使用猜報組交下的仿製國軍密碼本，將收報組送來之電報，翻譯成文，送情報機關研究。

中共對這些高級情報技術部門的人員，特別優待，尤其是注意他們的營養與保護他們的康樂。儘管在瑞金最艱苦的時候，他們的待遇要比紅軍總指揮還要好幾倍，使他們安心的從事最有代價的情報工作。同時對於他們安全與居處，也特別保守秘密，經常給他們以最週密的戒備。紅軍中不僅中下級幹部都不知道這個機構的存在，連紅軍總指揮、軍長之流，也無法清楚其內部，後來我任紅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時，掌握了最高的機密；而且常與這些工作人員相處在一起，給我的印象很深。

以上是僅就搜集情報而言，其防止情報外洩的方法，同樣周密。紅軍部隊中，佈滿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特務人員，及中共黨的組織人員；重重的監視着每一個官兵。他們爲了要防止洩漏軍事秘密，在作戰撤退時及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收容隊隨着後衞警戒部隊同行，對於落伍的官兵如無法抬運時，便毫不留情地將落伍者槍斃。在戰場撤退時，對於負傷不能行動，又無法搬運時，只要被紅軍打掃戰場的隊伍看到，必將之殺死。所以在作戰時，國軍想俘虜傷兵亦是難事。除了在沒有打掃戰場的時候，纔有例外。那些擔任收容隊及打掃戰場的部隊，是派有政治幹部率領的。

中央蘇區，是個貧瘠地區，經濟最落後的農業社會，在這個包括十多個縣份的蘇區內，要供應十萬以上的紅軍及十萬以上的地方民衆武裝（赤衛軍、獨立師、獨立團）和政府工作人員的生活消費及戰爭的消耗。而且從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三四年冬止，支持到六年的時間，這奇蹟是外人所不能了解的。我重回紅七軍的時候，亦爲了軍需補給供應問題萬分顧慮。經過了查詢，全部明瞭了蘇區中的措施之後，才知道他們是不惜人民的犧牲，來進行革命戰爭的。這種毅力和勇氣，我當時亦覺得佩服；但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來說，就覺得是太殘忍而不合理了。

中央蘇區的紅軍待遇：紅軍指戰員的待遇是平等的，他們採取了實物供給制度，每人每

日發給糙米一斤四両，青菜半斤，植物油四錢，鹽三錢；另外，每人每月發給零用錢二元（後改爲一元，到最後兩年是很少發給了）。服裝每年夏季發粗布軍服一套，冬季發棉衣一件，夾褲一條，這些衣褲的布料，是很粗劣的。內衣內褲，原定是每年兩套，其實是只有一套。棉被呢，在新兵入伍時，發一張夾布被。天天在行軍作戰中過活的士兵，那一年一套的粗布衣當然是破爛不堪的了。襪是從來沒有的，鞋是依靠着蘇區的婦女們製造送來的慰勞品，或可一年分到一對，主要的是靠自己拿着稻草和爛布條來打草鞋，否則就只有赤着兩脚，爬山越嶺，行軍作戰了。可是紅軍官兵，誰也是肉體做的，而不是鋼筋鐵骨，吃的不足維持身體所需的營養，穿的不能保持身體所需的體溫，天天在挨飢受寒，而又天天做着超過體力和精神所能負擔的工作；他們的身體，也就只有一天一天的衰弱，走上疾病和死亡的道路。就算身體强壯，在艱苦戰鬥，營養不良之下，脚部都會生瘡爛疼，患者爲數甚多。在一九三三年的統計中，士兵爛脚的佔百份之二十以上。因此紅軍的死亡率極大！這完全是由於待遇惡劣，才使官兵受到這種痛苦與死亡的威脅。

怎樣去籌集供應這麽龐大的紅軍糧食？說穿了——紅軍糧食的主要來源，無非是取諸蘇區內的人民。中共除了在蘇區徵收土地稅外，並運用統制人民的糧食，廉價收買糧食的辦法。在蘇區內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穀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約有米八両，其餘的就是餘

糧，統由政府定價收購。還要運用勞軍、獻金、獻糧各種手段，來搜刮人民全部所有，這是紅軍在蘇區內解決軍糧的主要方法。

他們還不斷的深入到國府統治區內籌糧、籌欵、就食；所以紅軍沒有作戰時，便開到「白區」去打游擊。這是紅軍官兵們最喜歡的工作。因爲到「白區」去打游擊，就有土豪打。不僅是可以有充足的糧食，而且可以吃一頓豬牛肉下酒。他們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負責調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後，再由經理機關派出征發隊，由政治人員率領，協同紅軍部隊到土豪的家裏，將其家所有盡數沒收。在屋內牆壁裏及地下埋藏的金銀首飾，也要搜刮淨盡。要是土豪家中還有人留在家裏，無論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搾罰欵，甚至槍斃處死。而他們打土豪的收穫，是食物交由經理機關及政治部統一分配；金錢財物，就全數歸公家所有，以充軍餉；這也是紅軍的糧餉來源之一。中共就是這樣的維持了它龐大的軍費政費的開支，及長期戰爭的消耗。

紅軍的彈械補充，主要的來源是從國軍手中奪取過來。每當彈藥缺乏的時候，官兵都希望打仗來補充自己。紅軍的編組中，每個步槍班，有兩名以梭標大刀爲武器，及携帶四個手榴彈的士兵，在作戰時，紅軍傷亡士兵的步槍，或當時繳獲的敵人槍彈，立即交給他們使用。所以紅軍作戰，不論是戰勝或戰敗，只有增加槍械，很少損失槍械的。另外蘇區內設有

修械廠、翻製子彈及製造手榴彈廠。紅軍作戰時，非常珍惜子彈；就是子彈殼，他們都能盡力保管，以便帶回交給經理機關，轉交製彈廠翻製子彈。製彈廠所用的火藥，有黃色藥和黑色藥兩種；黑色藥是用鹽硝和以硫磺炭末製造。黃色藥是用枯木製成的黃色塵灰，和以硫磺炭末製成的。子彈用黑色藥、手榴彈用黃色藥製成。其爆炸力雖不甚强，但尚可用；這就是蘇區唯一的軍事工業。

這些少量的彈藥生產，當然不能供應長期戰爭的消耗；因此，彈藥補充是紅軍最感困難的事。

蘇區內沒有適合運輸的河流，又沒有汽車。糧食、彈藥、傷兵的前運後送，均要依靠人力。他們動員蘇區內的人民，男的、女的，編成運輸傷兵的擔架隊，及運輸糧食軍用品的運輸隊。共產黨就是這樣不惜人民的生命，來克服自己這些困難。

我在回到紅七軍的第五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接到總司令部的寢午電：

「限即到會昌龔軍長。某密、該軍即開赴瑞金縣城北面村莊集結待命，並限於感午前到達，勿延朱德周恩來寢午參作。」

我看了這一個電報，立即以電話命令所屬部隊，準備於本日午後八時，按軍部直屬隊十九師、二十師之序列出發（廿一師正在瑞金整編中）。各師大小行李在各師後頭行進，並即

補發了一個出發命令，着各師派連絡參謀一人，於八時前到軍部隨同軍部行進。我便於八時率領軍部出發。是晚天氣寒冷，開始出發時，寒風襲人，官兵都有瑟縮之狀；但行動後，便將寒冷克服了。那天晚上，星月無光，行走在高低不平迂迴曲折的道路上，非常吃力。直至第二天（廿七日）午前十時，我和先頭部隊才到達目的地。立即命通訊連接通總司令部的電話綫，乃由電話與朱德總司令連絡，報告本軍到達目的地的時間。他答覆我是：「七軍部隊，可入附近村莊宿營，請即來總部一談。」那時各師部隊已陸續到達，我告訴參謀處長唐濬（那時七軍沒有參謀長）分配各師及直屬隊的宿營地，並着各部隊迅速吃飯後休息，準備接受新的任務。我便帶了一位林參謀，兩個傳達，赴相距五華里的總司令部。不到三十分鐘便到了，朱德總司令正在作戰室內和參謀長葉劍英，看牆上掛着的五萬份一軍用圖。看到我來，朱德即和我握手，並問我：

「昨夜行軍辛苦嗎？士兵沒有掉隊的？現在都到齊了吧？」

「並不見得辛苦！士兵行軍力很强，該不會有掉隊的。我來的時候，十九師已到齊，廿師也開始陸續到達。」我答。

「我們大家坐下來談談吧！」他說。

於是朱德、葉劍英和我三個人便圍坐在日字形的大辦公枱側。朱首先對我說：

「我告訴你一件事：駐宜黃的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原是馮玉祥的部隊。在去年（一九三零）秋天『反蔣』失敗，孫連仲部投降後，於今夏調到宜黃來進攻蘇區，曾參加國民黨對蘇區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圍剿失敗後，該軍未受到大的損失，但和我們作過戰，退守宜黃不敢出來。他們的官兵都是華北人，初到南方又值天氣炎熱，官兵水土不服，患病死亡的很多。現在南京又積極佈置第四次圍攻，由於不慣山地戰，他們便不免發生恐懼。同時南京對該軍完全以雜牌軍看待，從來沒有補充該軍的槍彈；軍餉和糧食運濟數量上固不及南京的嫡系軍隊之中央軍；時間上又常拖延時日。同屬國民黨軍隊，而待遇不公平，致該軍官兵發生極大的反感。該軍參謀長和一位旅長，是我們的同志。本月中旬曾派一位代表吉某來廣昌，跟我們連絡；準備伺機起義。我們已督促他迅速行動，並允許他編爲一個軍團。最近該軍總指揮孫連仲，已前往南京，要過年後才能回來。他們（廿六路軍的中共黨員）準備在過新年的時候，乘機起義。前幾天又派代表李某來連絡，據稱已得到一位非黨內同志的旅長贊成參加，要求我們派兵策應。一切問題，都已商定。本擬派七軍開赴寧都，協同策應。所以調七軍先開來瑞金，再轉赴寧都。但昨晚接到四軍由廣昌發來的電報，據云已派一個師，開赴寧都，準備於三十日開始向宜黃推進，卅一晚到宜黃附近，並已與宜黃城內國軍同志取得密切連絡，無庸七軍協助。我剛才正和劍英同志研究，七軍趕赴寧都，廿九日可到達，時間尚足；

但到寧都後，又馬上要向宜黃推進，不免過於疲勞。現宜黃策反工作既已成熟，且有兩個旅爲基礎；四軍又願意單獨負責完成這一個任務，使全軍迫近宜黃策應，則兵力儘已足用，七軍可不必再赴寧都。但仍應在瑞金附近集中，以備必要時調動。」

葉劍英接着說：「我也認爲四軍全部，已足擔任這一個任務，七軍可不必再出發，就在此間整訓。廿一師已編組完成，可即乘此期間命歸還七軍建制。龔同志應特別注意該師的整訓工作。」

談話至此，他們見我有點疲勞，且知我夜來行軍未得休息，便就讓我回部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的早上，朱總司令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語氣非常興奮：「廿六路軍起義，已順利的成功了。四軍昨天已進出宜黃東北地區，掩護起義軍隊整理，並準備於今天開始南下，移駐寧都；宜黃縣城，暫由四軍接駐。今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對該軍處置問題，另有通知給你，晚上便知詳細情形了。」是日午後二時我接到通知：「本日下午八時，在中央政治局開會，請按時出席。」中央政治局辦公室，距我駐地不遠，我於晚餐後前往出席。會議廳是在一間民房的樓上，長方形的大廳，四張方枱連接的擺在廳的中央。枱面鋪上一塊白布，周圍擺着日字形的木櫈；廳之一端，擺了一張日字枱，放置着茶具，另一端掛了一幅中國地圖；廳中的會議枱上面，吊着一個大的洋油燈，照耀着全屋，雖不十分

光亮，但比我們軍部掛了一隻馬燈要明亮得多，這就是一個重要會議廳的佈置。我走到樓上時，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正坐在會議廳的旁邊談話；我先向他們敬了禮，他們都站起來；毛澤東笑容滿面的走前來和我握手。我到中央蘇區以來，這是第一次和他會面。我注意到他的臉色，隔了三年多的毛澤東，嘴角的笑容掩不住他的悴憔！這可能是三年來的艱苦鬥爭生活，給予他的影響，同時，黨中央遷來蘇區，對他的權力抑制，也使他很不愉快吧。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很熱情的說道：「你健康好嗎？」我說：「我好！祝你健康。」他接着說：「多年不見了，我們革命同志，經過了幾年的鬥爭，今天尚能再見，眞是不容易的事呢！哈哈。」他又面向張聞天說：「龔同志是我們井崗山鬥爭的老同志呢！」張聞天接着說：「我早知道了。我和龔楚同志談過了一個通宵。」這時，周恩來已上來，他只向大家點點頭，那副冷酷的臉孔，可比較平常溫和。毛澤東斜視他一下，又望望我，好像有點不自然的情形。接着項英、朱德、彭德懷、林彪、鄧發等，都先後來到。朱德隨即介紹我和彭德懷見面：「這是彭德懷同志，這是龔楚同志。」我和彭德懷互相握手，林彪很有禮貌的走過來和我握手，我說：「你好嗎？你還是往年那麽年青！」他很興奮地說：「祝你好！」我觀察他的態度，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沉默（那時他任紅四軍第十師師長）。忽聽得周恩來叫道：「請大家坐下，開會了。」各人便紛紛入座。周恩來坐在主席位上，張聞天在左，毛澤東在

右，朱德、彭德懷、我、鄧發等，連坐在一起，先由周恩來站起來報告，畧云：「駐宜黃的廿六路軍的孫連仲部，由本黨同志該軍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的策動，說服了警衛旅長季振同，於一月一日晚上起義，其經過情形是：先由趙同志借春茗之名，請全軍團長以上的官佐飲酒，乘機將全體軍官拘留。同時由董振堂同志及季振同旅長，集合全軍官兵，監視着全軍的部隊，宣佈參加紅軍革命。如不願共同行動者，無論官或兵，均可放下武器，自由離去。當時除少數官佐離去外，百份之九十五官兵，均願意參加紅軍。被拘留之高級軍官，亦任其自由離去。現起義官兵共有二萬餘人，械彈甚多，已由第四軍掩護該軍開來寧都整理，這是該軍起義的情形。關於該軍的初期處置，已令改編爲紅軍第五軍團，以季振同爲總指揮，趙博生爲參謀長。但要如何保障這個勝利的果實，是我們今天要決定的問題，請各位提供意見。」

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站起來說：「關於該軍的編組、人事、和整理問題，軍委會曾經研究，並提出以下的意見：

一、依照紅軍現行編制整編，按照現有人事，分編爲十三、十五兩個軍，成立第五軍團，以季振同爲軍團總指揮，趙博生爲參謀長。

二、以趙博生同志兼第十三軍軍長，董振堂爲十五軍軍長，確實掌握部隊。其餘各級軍

事幹部，目前仍由該軍舊部遴選充任，以後再繼續調整。

三、派蕭勁光同志爲該軍團政治委員，劉伯堅同志爲軍團政治部主任。其他各級政治委員與政治部主任，由現有紅軍中遴選優秀政治幹部調任，迅速展開該軍團的政治工作。

四、對該軍團之動搖份子，應迅速調整，由蕭勁光、劉伯堅，會同趙博生、董振堂負責辦理。

項英報告完畢，並交出書面提案。周恩來對於蕭勁光爲政委的問題，曾再三考慮，且問張聞天對蕭勁光的印象如何？張聞天表示同意，並說：「不過小資產階級意識稍强一點。」毛澤東接着贊成這一建議，並說明該軍是國民黨部隊，若不派一位有相當學識能力的幹部，去負領導責任，恐怕不能取得該軍官兵的信任，關於以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甚爲適當。劉同志過去曾任馮玉祥總政治部主任，與該軍有歷史關係。毛澤東說完，大家並無異議。周恩來提出，關於其餘各級政治工作人選問題，請總政治部迅速從四、五、七軍政治部同志中，立即遴選派去；俾能加强黨在該軍的政治領導。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當即要求我們各軍負責人回去後，立即辦理，兩天內將名單送交總政治部。

我當時提出關於人事調整工作，不要操之過急，以免引起該軍官兵的不安心理；並應注

意到如何從精神上和物質上，鼓舞該軍士氣。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並決定先以三萬元犒賞官兵。林彪提議：爲了保障這一勝利果實，對於該軍政治控制工作，應馬上展開。請國家政治保衞局迅速計劃，並展開工作。毛澤東聽了之後，即對周恩來說：「林彪同志很進步呢？是不是？」周恩來微笑點頭。以後王稼祥提出兩個提案：

一、立即發動蘇區各地勞軍運動，並在寧都舉行歡迎大會，以鼓勵該軍士氣，擴大政治影響。

二、由黨政軍高級幹部在瑞金開會，歡迎季振同參加革命，並通知各地政府在其經過之地，均舉行歡迎會，以堅定其意志。

這兩案全體同意，並請總政治部會同蘇維埃政府立即發動。

會議經過了三小時才結束。我走的時候，毛澤東拉着我說：「龔楚同志，你在這三年多來，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負了重傷，我想找一個時間和你談談，好嗎？」我說：「請主席約定時間，在我未出發前，隨時我都可以來。」他聽了後，說：「好！我會通知你。」

會議後的第三天，第五軍團後方辦事處便在瑞金成立，剩餘的各種械彈軍品，動員了很多人員由寧都搬運到瑞金來，蘇區黨政軍人員，皆大歡喜！

不久，蘇區黨政軍高級人員在中央政府禮堂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會，歡迎起義來歸的

高級將領；季振同、趙博生、董振堂都感到無限的快慰！

會後，朱德在紅軍總司令部設筵歡宴他們，使他們更加興奮！

這便是國軍廿六路軍起義，投入中共的一幕。由於廿六路軍起義，不僅壯大了紅軍的實力，也提高了紅軍的士氣，和蘇區人民的革命情緒，而且破壞了國軍對蘇區的包圍圈，沉重地打擊了國軍的士氣，延緩了國軍積極籌劃的第四次圍剿計劃。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我軍（七軍）奉命改隸於第三軍團指揮，移駐會昌西北地區整訓。十一日全軍三個師（十九、二十、廿一）均駐在會昌西北十里附近鄉村；第三軍團總指揮部及第五軍駐會昌縣城西北郊區，總指揮部與我七軍軍部距離約十里，因爲初轄第三軍團之故，我於各師營地佈置好後，即於十三日準備到總指揮部拜會彭德懷，我先打了一個電話徵求他的同意，他很高興。並約我於午後二時到達總指揮部。我依時到達總指揮部村外時，他的參謀處長張翼，便在村前接我，他前是七軍十九師的團長，我們相處極好，隔別一年，在此重逢，心裏有無限感慨！他簡單的告訴我：「彭德懷曾向他詳詢我在紅七軍的情形，七軍官兵對我的觀感及我爲人作風如何？」他曾一一的告訴他，「他表示很希望我和他合作。」關於彭德懷的爲人，他說：「是一個勤儉克苦耐勞的人，但有權力慾，對毛澤東很佩服，對朱德則有不大尊重的言論。」

我們來到總指揮部，剛踏入門，即見彭德懷走出來，我向他行了舉手禮，他答禮後，立即和我握手，他開口就問我：「部隊還好嗎？」我說：「還好。」他隨即介紹他的參謀長舒適給我認識，然後請我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內。這個辦公室，又是他的臥室，床前是辦公枱，光綫很暗，枱的右側，燒着一爐炭火，他坐在床上，另一端是一條長木櫈，我和他在火爐邊對面坐着，他對我說：「我已經請求朱毛調你爲第三軍團副總指揮，但還未獲答覆，你的意見怎樣？」我說：「我的精神體力不如往日，現任軍長已感吃力，我感謝你的好意，但我必盡力領導七軍，追隨你爲革命奮鬥。」他聽後，面露愉悅之色。

我們的談話直到下午五時，晚餐已備，他親自煑紅燒豬肉，並備了一瓶白酒，就在火爐旁放置一張小矮枱，一同用膳。那天氣候寒冷，坐在火爐邊，飲了幾杯酒，全身感到溫暖，他的談興更濃，談到軍事，自命最有辦法，目空一切；談到政治，他覺得只要有軍隊實力，便自然有辦法；談到黨務，他有無限感慨！認爲女人，是不夠革命的，政治委員制度是對指揮員的不信任，你（指我）兼任政委是最好的事，亦證明黨對你的信任……等等，一直談到下午八時，我才起程回軍部。

我自和他經過這一次深談後，對他的印象是一個豪邁自負，野心勃勃的軍人，並對我有拉攏的自私企圖。那天談話，因我很少發言，事後他對張翼說：「龔楚軍長太沉默，要他多

和我連絡。」張翼告訴了我。我們都以爲他的頭腦太簡單，不難相處，凡事以正常同志的態度對之，豈知因此而招致他的妒忌，以致後來發生不愉快的事件。

第三章　戰略和戰術的轉變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由軍事委員會主持，召開一次連續兩天的軍事會議，開會地點是總司令部前座左側的一間會議廳，這是一座土磚建築的舊平房，面積約爲十五尺乘廿五尺，中間擺着連接五張四方木枱，每張約有二尺六寸乘二尺六寸，上面鋪上一張白布，上首及靠近之兩側，擺有幾張竹椅；此外是圍擺着木櫈，共設有二十多個座位，枱上放置三碟土製紙烟、火柴、及鉛筆、小刀、土拍紙簿等，廳的一角小枱上，放置了兩個瓦質的大茶壺和磁質的茶杯，壁上懸掛着一幅全國大地圖及五萬分一的軍用地圖，天花板上吊有兩盞火水油燈，此外並無他物。

我和彭德懷、滕代遠、鄧平等一起到瑞金總司令部，時間已是下午三時，那時項英亦在總部，晚餐後，項英約我到瑞金近郊他的住家，時已黃昏，賀昌已先到達，候我回來，我們見面後，他又拉我到瑞金街上一家小飯館小酌聊天，談論有關七軍的情形，因他參加總政治部工作，我提出了健全政治部工作問題，應調葉季壯回紅七軍，接替袁任遠的政治部主任，因袁任遠雖是七軍的老同志，但他不會講粵語，能力亦不及葉季壯，故有此擬，他很同意，

（葉季壯是廣東人，七軍調換幹部被調總政治部工作）晚上十時，我才回到他的家裏。

第二天早上，我和項英同到總司令部共進早餐，九時準備開會，到會者計有：李特、秦邦憲、張聞天、項英、朱德、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葉劍英、劉伯承、陳毅、彭德懷、滕代遠、李振同、董振堂、鄧平、羅炳輝、譚震林、林彪（他新升任四軍軍長，時廿五歲）及我等，共有二十多人。

項英坐在上首的主席位上，左李特、周恩來，右朱德、毛澤東，其他的首要們均分坐在會議桌的兩旁，此外各人自由選擇座位坐下。

項英宣佈開會，畧云：今次會議，預定兩天，今天上午由秦邦憲同志作政治報告，下午由周恩來同志作軍事報告，明天討論我們紅軍的戰畧戰術問題，現在先請李特同志講話。

李特的講話，畧云：中國的蘇維埃中央政府已經正式在閩贛蘇區成立，這個地區，是代表全中國工農兵利益的國土；過去的蘇區可以隨時放棄，和隨時收回，現在是全國人民所瞻，不能讓敵人踏入一步，因此，游擊戰爭的時代已成過去，鞏固國土，擴大蘇區，繼續完成中國革命，是中國工農紅軍的當前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在戰畧和戰術上必須要有適應戰爭需要的重大轉變，希望各到會同志虛心檢討……。最後他說：我爲了工作關係，要先行退席，下午再見。

秦邦憲接着作政治報告：第一部份是國際形勢，他說：「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積極爭奪殖民地和新市場，以挽救他們即將崩潰的經濟危機，因此，帝國主義之間又醞釀着爭奪殖民地的新戰爭；同時，因爲無產階級祖國——蘇聯的日益强大，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各兄弟黨在第三國際領導下的大團結，日益鞏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日益發展，震撼了帝國主義者；他們又在企圖聯合的向蘇聯進攻，以消滅世界革命運動，根據上述的形勢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必將很快的來臨；但大戰性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帝國主義者聯合反對蘇聯，消滅世界革命的戰爭；第二種是：帝國主義者之間爲爭奪殖民地的戰爭。蘇聯爲了保衞世界革命運動，正在積極備戰，隨時應付新的戰爭威脅，並號召全世界共產主義組織，領導全世界無產階級，準備爲保衞無產階級祖國——蘇聯而奮鬥；同時要爭取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之成爲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性質的戰爭而奮鬥。

國內政治形勢——由於去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瀋陽，侵佔我國東三省，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現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工人、革命軍人，以及一切愛國份子，正在進行有組織的抗日鬥爭；這是最有利於中國革命的政治形勢。

關於本黨現時的政策路綫是：本着六全大會議案精神，實行土地革命，擴大蘇區，充實紅軍，團結工農階級及全國民族抗日力量，以實現抗日救國，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全國蘇

維埃政權而奮鬥。

他的報告完後，已至下午十二時廿分，項英宣佈休息，並進午餐。

下午一時三十分，繼續開會，由周恩來作軍事報告，要點如下：

（一）紅軍自成立以至成長，都運用游擊戰的戰畧和戰術，粉碎了國民黨軍對井崗山及閩贛蘇區的圍剿，並壯大了紅軍，這種戰畧和戰術，過去是成功的，是值得讚揚的，但我們不能認爲是：在任何戰爭環境，任何情況之下都是適用的；我們的戰畧和戰術是要因應戰爭環境，作戰目的，而擬定的；譬如我們現在要固守蘇區的土地，不讓寸土給人，就不能再運用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畧；我們要消滅敵人的大兵團，就不是依靠襲擊、埋伏、截擊等游擊戰術所能達到戰爭目的的了。我們紅軍今後要守土，就要進行防禦戰；要擴大蘇區，就要進行攻城戰、陣地戰；這是說明了，我們的戰畧是要根據這些戰爭目的去擬定的。

至於戰術上：我們要在作戰時包圍敵軍，消滅敵軍的有生力量，逐漸轉變敵我的優劣形勢，以完成我們的作戰任務。

（二）過去紅軍官兵作戰，因爲敵進我退的戰術原則，在防守時缺乏堅靭性；因爲速戰速決的戰鬥原則，進攻時缺乏持久性；這種缺點不僅要在學術上要從新研究，在思想上尤須要徹底轉變。

（三）游擊主義，對於紅軍官兵的作戰心理和生活影響，亦極爲重大，過去官兵散漫，就是游擊主義的表現；故今後紅軍官兵，必要養成軍人嚴肅的生活習慣，提高軍人紀律，是爲培養軍人新學術、新思想的主要條件。

（四）關於軍隊的訓練問題，術科方面：過去有日式、有德式、又有蘇俄式，各由各主官所學的自行教練，無法統一，今後應由紅軍學校重新擬訂步兵操典，以資統一。學科方面，應以蘇聯新戰術爲主體，方能統一學術思想，便利作戰指揮。

他這個報告歷時三小時，而且在修辭上相當精采，我們一班軍人當時都覺得周恩來不是軍人，而能夠作出這個報告，出乎意料之外。但關於反對游擊戰，進行正規防禦戰仍多抱有懷疑的心理。

散會後，你問我，我問他，三五成羣的談論，特別是毛澤東，表現不滿意，他問彭德懷：「你同意嗎？」彭笑着搖搖頭。

晚餐後，我仍隨項英到他家裏，賀昌、毛澤東都跑來了，我們圍着小圓枱，坐在小矮櫈，談論會議的情形。我對項英說：周恩來確有兩手，不愧做了幾年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瞇着眼，仰着頭，哈哈的笑着說：你太天眞了，你以爲是他自己的創作嗎？這是李特、朱德、我和老周四個人，研究了兩天，才列出了這個報告的原則，他不過加鹽加醋，把它

整理成文罷了。賀昌聽了，立即說：「你是現時的軍委會主席，爲什麽不擔任報告？」項英說：「他要爭着做，我樂得少點麻煩呢。」

第二天的會議，亦是上午九時開始，項英宣佈上午討論事項：

（一）檢討游擊戰術對今後戰爭的影響和作用。

（二）肅清游擊主義思想和行動。

（三）樹立紅軍的紀律性，健全紅軍軍人生活。

以上三個問題可同時發言。

毛澤東是第一個發言者，他認爲：紅軍現時的力量，尚未達到能與國軍進行陣地戰或攻城戰的程度，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敵人，還是現時戰勝敵人主要戰畧原則，他不反對要從戰鬥中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但不是一次、兩次，而是無數次逐漸消滅敵人，否則就是軍事冒險；同時他認爲誘敵深入，不是懼怕敵人，放棄蘇區，而是更好的消滅敵人，保衞蘇區的作戰方法；我們能夠戰勝優勢的國軍，不應該單獨倚靠紅軍力量，而是要充份發揮革命羣衆力量，以配合紅軍作戰；這是我們所獨有的優越條件，亦爲敵人所沒有的條件，現在要捨長取短，實非上策……。

彭德懷接着發言，他說：「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見，我們過去若在沒有羣衆基礎的地區作

戰，無不失敗，但在有羣衆基礎的地區作戰，即使戰敗了尚能保存實力，不至一敗塗地。至於軍隊要有紀律，是應該的，我素來都很注重，今後希望大家都應注重。」

接着有許多人發言，大意都是反對完全放棄游擊戰；關於戰畧戰術之決定，應根據：敵情、地形及自己的兵力來決定；對於反對游擊主義，增加戰爭的堅韌性，軍人生活紀律化等都表同意。

下午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後，有以下之决議：

（一）在紅軍中展開反游擊主義的思想鬥爭。

（二）樹立紅軍軍人的紀律生活。

（三）展開研究和學習攻防戰的戰畧戰術。

（四）軍隊訓練：術科方面由紅軍學校校長劉伯承負責組織一個步兵操典研究組，由劉伯承爲組長，各軍軍長爲組員，並指定左權負責翻譯蘇聯陸軍步兵操典第一冊，以資研究；迅速訂定中國紅軍步兵操典，以統一術科教練。關於戰術之研究，以蘇聯陸軍步兵操典第二冊爲主。並參考其他軍事書籍；紅軍學校應起戰術研究的領導作用。

這次會議便結束了。

軍事會議結束後，紅軍總司令部，只下了一道訓令，飭全體紅軍幹部研究攻防戰的戰畧

和戰術，並由紅軍學校印了一部「蘇聯步兵操典」第二部的中文譯本，分發給連以上軍政幹部研究，但沒有研究計劃頒發。那時紅軍是在整訓期間，但因隨時要準備行軍作戰。我採取重點教育的方法，擬定實習計劃：分三期進行，第一期是：研究部隊作戰的戰術基本原則；第二期是：諸兵種聯合作戰指揮；第三期是：戰略原理。

那時我的軍部既由我自己兼政委，又沒有參謀長，參謀處長唐濬雖然懂得參謀業務，但思想遲鈍，作業甚緩；政治部主任袁任遠，因不懂粵語，在政治工作督導上，不免鬆弛，但工作計劃尚可應付，我只好將政治工作部份責任由他負責，我自己專心進行訓練教育工作，我將訓練計劃草擬後，即召集政治部主任袁任遠、參謀處長唐濬共同研究，並由參謀處頒佈實施。

七軍初期戰術研究實施計劃大畧如下：

（一）宗旨：以快速養成幹部之攻防戰術學識和運用爲目的。

（二）科目：戰術基本原則，內分進攻部署和防禦配備。

（1）進攻部署——內容有：軍隊區分（拑制隊、突擊隊），攻擊重點選擇要領，戰場警戒、進攻隊形、接敵運動、戰鬥展開、戰鬥前進、衝鋒準備、衝鋒實施、陣地內戰鬥、陣地內追擊、進攻最後到達綫、陣地外追擊等。

（2）防禦部署：陣地配備、火網構成、側防射擊設備、陣地警戒、射擊時機、近距離火戰、反突擊、局部出擊、全綫反攻等。

（三）編組：分編甲級研究班、乙級研究班：

（1）全軍之連長以上軍政幹部爲甲級班，由軍長主持。

（2）以團爲單位，優秀之排長、連副、編爲乙級班、由團長主持。

（四）訓練方式：甲級班以講解及討論方式進行；乙級班，以講解及現地作業方式進行。

（五）時間：每日一次，每次兩小時，甲級班，下午四時至六時（休息時間）；乙級班，上午六時至八時（晨操時間）實施。

（六）進度：根據快速完成初期計劃之原則，另訂進度表。

我這個計劃訂定後，立即頒佈全軍實施，幹部對此次訓練計劃非常高興，學習精神比較政治訓練要高得多，討論時亦很熱烈。乙級班，有很多戰鬥員要求參加，但因人數太多無法容納，後來爲了滿足指戰員的要求，改以連爲單位進行，成績亦很好。

當七軍研究工作展開後，五軍還未開始，彭德懷通知我，將七軍的研究計劃給他，他並帶同張翼（他的參謀處長）親來參觀研究情形。他對我說：「你的計劃極好，五軍要學你們

的。」這是我見到他最虛心的一次。

在這個計劃開始時，政治部提出了：提高學習精神，完成戰術研究計劃的口號；並規定每晚八時至九時以連爲單位召開學習檢討會議；—發動指戰員寫壁報，鼓勵成績優良的幹部，交換學習經驗等等，以配合軍事訓練工作。

第四章　政治攻勢與軍事攻勢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日軍進攻上海，與駐上海的國軍十九路軍激戰，全國人民抗日情緒的情形，空前高漲！中央蘇區於二月四日已接到了中共上海辦事處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開了一次會議，我於六日接到中央政治局通知，七日趕赴瑞金出席，時間大約是八日晚上（是農曆新年第三天），地點是瑞金北端，上次政治局開會之小木樓。出席者有：李特、陳紹禹、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鄧發、劉伯承、趙博生、彭德懷、我及林彪等共有十多個人，會場的設備與上次一樣，僅增加了一個洋油大吊燈。樓小燈多（有二盞燈），頓覺光朗，但洋油燈的烟臭氣味，瀰漫全樓，又因天氣寒冷，窗戶不能全部打開，空氣混濁，很不好受。會議在下午八時開始，由秦邦憲主持，會場氣氛肅穆，他簡畧的報告了日軍侵滬，十九路軍抗日，全國人民抗日情緒極高的情形後，並對時局作了分析，及本黨政策的報告，畧云：日軍侵滬的情形，對於中國政局的影響，有兩個可能：

一、國民黨可能進行全國團結，領導抗日戰爭。若如此，我們紅軍必須爭取合作抗日條件，以求在抗日戰爭中擴大自已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在抗日過程中奪取抗日領導權。

二、國民黨政府可能向日本政府屈服投降，簽署賣國和平條約，及反共協定，全力進攻蘇區，實現其所謂安內攘外的騙人政策。若如此，本黨即必須揭露其投降面目和陰謀，發動全國軍民與紅軍合作，實行抗日戰爭；迫使國民黨放棄其進攻蘇區，消滅紅軍的企圖。

他報告完後，周恩來接着發言，畧云：現在的國內形勢最有利於本黨軍事和政治的發展，我們必須把握這一個時機，爭取在全國範圍內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在政畧上，我很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見，對於軍事建設上，我主張立即利用抗日之名，首先動員全蘇區的壯丁參加紅軍，以擴大紅軍實力。戰畧上應先奪取贛州，使贛江西岸至湘贛蘇區之廣大地區與中央蘇區連成一片；然後藉北上抗日之名，攻打大城市，以擴大蘇區，使軍事與政治相配合的發展。

當其報告時，睜眉碌眼，緊握拳頭，意氣激昂，大有氣吞牛斗之勢！

毛澤東的態度很沉默，又很安詳，毫無興奮表情，待周恩來說完話後，他才緩緩的右手挽左手的站起來，並左顧右盼一番，然後才慢條斯理地說道：「剛才，秦、周兩位同志的報告，原則上我很同意，但據我個人的觀察和想法，我不敢過於樂觀；我認爲國民黨不會立即和日本進行大規模的戰爭，上海十九路軍的抗戰行動，照情形來判斷，乃是自發的，不能當爲國民黨當局有計劃有準備的戰爭行動，他必定在加强局部戰爭中，換取談和的代價，因

此，我們在政界上儘管提出全國聯合抗日的口號，以爭取全國廣大人民和各階層如：作家、新聞界、學生、工人、農民等抗日民族組織或個人的同情與合作，藉此破壞國民黨在全國人民面前的信譽，我們能夠收效多少，對本黨總是有利的；若我們估計得過高，則很易鬆弛了我們的鬥爭意志，和招致失敗的情緒。

關於軍事方面，他仍以爲戰畧持久戰，戰術速決戰是紅軍軍事行動的最高原則，沒勝利把握的仗，以不打爲宜；攻贛州的提議，他同意，但必須要集中五倍至十倍於敵人的兵力，徹底、乾淨的消滅敵人，才是上策；切勿分散兵力，致遭失敗；五軍團應該乘此機會使用，以鞏固和提高他們的革命情緒。

彭德懷接着站起來了，他的面色鐵青，但聲綫很低，而且很不自然，似是極力抑制情緒似的，說道：「各位同志對政治的見解我很同意，軍事方面，我主張立即行動，我敢擔保一個星期打下贛州，請中央同意將這個任務交給我。」

朱德在會議中表示：政治上同意秦邦憲同志的政策，軍事上亦同意攻打贛州。

項英、劉伯承、趙博生、林彪等均先後發言，大意都是：擴大抗日宣傳，嚴防國民黨妥協賣國；紅軍要藉抗日救國之名，積極向外發展；本黨要呼籲全國軍民不分黨派團結起來，一致抗日……等。

我是最後發言的一個，我首先說明：對政治局勢的分析，我同意毛澤東的見解；我們不應該過於樂觀，但不是取消主義，而是要積極的去推動這一局勢的發展，積極去爭取廣大人民的支持，使本黨的願望得以實現；關於進攻贛州的軍事行動，我亦同意，但我認爲除準備軍事進攻之外，還要對贛州城的國軍，展開政治攻勢；我們是要利用抗日的名義，呼籲守城官兵及抗日民衆，和我們團結抗日；在我們軍事進攻之前，要先進行政治戰、精神戰，以瓦解其戰志，是可能收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的。

關於軍事準備方面，我認爲本非今日會議的討論範圍，但因行動時間緊迫，不能再召開軍事會議，特在此提出，以供大家討論；贛州城高牆厚，且有兩團守軍，我軍又缺乏重武器裝備，難作攻堅之戰，必非旦夕所能攻下，我們對於現有的炮兵（包括迫擊炮在內）都要集中使用，先行給予城內守軍以重大的火力威脅，以配合步兵的進攻；對於爆破器材，坑道作業器材等亦須事前充分準備，俾免臨時遭遇困難，這是軍事學上多謀必勝之意。

當我說完話後，彭德懷急忙站起來，大聲說：「贛州城算什麽？長沙我都打下了，襲楚同志太沒勇氣，還談什麽革命。」

秦邦憲忙制止他再說下去，並說：

「我雖非軍人，但我覺得龔楚同志的意見是深謀遠慮的，果使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又有何不好？而且即使不能收預期的效果，亦與我們無損，政治的進攻和說服工作，是應該與軍事相配合雙管齊下的。」

朱德又接着說：

「贛州守城國軍是馬昆的獨立旅，並非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馬昆與羅炳輝軍長都是雲南人，且是雲南講武堂同班同學，不妨着羅炳輝寫信去勸他和我們合作，事情不是絕無希望的；我們儘管做就是了。」

李特最後講話：由伍修權翻譯，大意是：今晚的會議很成功，政略及戰略均有正確的意見，綜合起來是：政治採取廣泛而强大的攻勢，軍事亦採取攻勢，先攻贛州的戰略，很有意義；若能完成這政治軍事兩大任務，即對國際的影響極爲重大……。

繼由張聞天綜合各人的意見，提出了政治、軍事議案各三條，無人反對，一致通過。

（一）政治決議案內容：

1、本黨堅持抗日救國主張，號召全國人民聯合抗日，促成國民黨的抗日行動，以解除國軍對蘇區繼續圍剿的威脅。

2、把握抗日時機，爭取合法地位，和公開活動。在抗日過程中，壯大自己。

3、立即通令全國各地組織，利用各階層人民，特別是工人與學生的反日情緒，在全國各城市組織人民抗日救國會，督促國民黨政府，擴大抗日戰爭，本黨對這種民衆組織，必須取得領導地位，以實現本黨的抗日主張。

（二）軍事決議內容：

1、以抗日爲號召，發動蘇區工農參軍，首先充實紅軍。將現有的組織充實，繼續擴大紅軍組織。

2、蘇區紅軍應立即集中行動，提出「打通抗日之路」的口號，攻打大城市。

3、江西蘇區紅軍，應首先攻下贛州，使贛江西岸蘇區與東岸蘇區連成一片。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三日接到總司令部二月十一日的命令，大意如下：

1、三軍團爲主攻兵團，進攻贛州縣城。

2、一軍團之第四軍，以主力進佔南康新城（贛州至大庾交通要點），截斷粵軍援贛通路，並打擊援贛之廣東部隊（此時林彪已任四軍軍長）。

3、第四軍派一個團，進出贛州縣北之沙地，對吉安南昌方面警戒，並阻滯該方面向贛州增援之敵。

4、五軍團為總預備兵團，控置於贛州附近之贛江東岸。

5、第十二軍仍駐長汀，相機奪取連城、上杭兩縣。

我立即打電話報告彭德懷，他答覆我是：總指揮部亦同時接到命令，你準備明天先行出發，我率五軍跟進，明（十四日）到達新陂墟宿營，十五日至大田市渡過贛江上游之桃江水宿營，於十六日拂曉進攻贛州縣城，命令稍遲即可發下，這次進攻贛州意義重大，請你鼓勵全體指戰員，奮勇以赴，務期於一個星期內攻下贛州，如有作戰不力指戰員必予嚴厲處分等語。

我立即召政治部主任袁任遠及參謀處長唐濬前來，將總司令部命令及總指揮以電話通知明（十四日）出發的情形告訴他們，着參謀處長即擬定明天行軍計劃及給予各師以命令，並先行以電話通知各師今晚完成一切行軍作戰準備；政治部應即擬定行軍作戰的政治工作計劃，頒發各師實施。是晚九時才接到總指揮部向贛州進軍的命令，他的作戰計劃大意是：七軍於十六日拂曉進佔贛州東門至小南門之綫，向贛州東南門進攻；並掩護第五軍向西門至小南門連接之綫，向贛州進攻。

我當晚即派遣探員一組（三人）按行軍路綫沿途偵查敵情，並下達命令大畧如下：

一、據確報：贛州城內駐國軍為獨立廿四旅馬昆部二個團。

二、本軍奉命以進攻贛州城爲目的，決於明（十四日）上午六時集合出發，到達新陂墟宿營，十五日經大田市渡過桃江水宿營，準備十六日拂曉進攻贛州。

三、行軍序列：

（1）十九師附工兵連爲前衛，按行軍計劃路綫向贛州偵察前進。

（2）軍部直屬隊、廿師、廿一師（缺一團）爲本隊，在前衛後跟進。

（3）廿一師之一個團爲後衛，掩護本軍大小行李在本隊後跟進。

四、行軍時余在前衛師之本隊行進。

注意事項：

（1）全軍大小行李，行軍時由軍部管理員指揮。

（2）各師派連絡參謀一人，傳達兩人隨余行進。

（3）駐軍警戒由前衛師擔任。

（4）抵達大田市時，前衛師立即渡過桃江水對贛州方面警戒，掩護工兵連架設輕便橋，協助後續部隊渡江。

十四日我軍按照命令出發，十五日按照預定計劃渡過桃江水宿營，總指揮部第五軍在大田市宿營。是晚接獲之情報，敵情無變化，但贛州城門檢查出入人民極嚴，已準備守城。

我於是晚下達進攻命令，大意如下：

（一）敵情無變化，但有固守待援企圖。

（二）友軍情況：

1、第四軍明（十六日）進出南康、大庾間新城之綫，截擊向贛州增援之粵軍。

2、第四軍之一個團，進出贛州北面之沙地對北面警戒，掩護我軍攻城。

3、第五軍團控置於贛州之東、贛江東岸，爲總預備隊。

（三）軍團之進攻部署：

1、第五軍進攻贛州西門亘小南門相連之綫；

2、本軍進攻贛州城小南門亘東門相連之綫；

3、戰鬥分界綫：小南門至南門外高地之綫，綫上屬第五軍。

（四）我軍之攻擊部署：

1、十九師爲主攻兵團，進攻東門外街道及東城門亘贛江右岸之綫。

2、第廿師一個團爲箝制隊，進攻小南門亘東門大街屋後之綫。

3、其餘爲預備隊，控置於東門街道外南端村莊。

4、廿師（缺一團）以一個團爲戰塲警戒部隊，佔領預備隊村莊西南面之山地，

對西南方问嚴密配置警戒。

（五）我軍之野戰醫院設於大田市。

（六）軍部隨主攻兵團行動，余在軍部。

十六日拂曉，我主攻部隊迅速掃蕩了東門城外之國軍，佔領東門街道兩側之商店，並迫近城門設備巷戰工事。國軍兩個團固守城內城牆，城牆厚約三十尺，東南門外有與贛江相連的護城溝，水深三尺以上。紅軍沒有攻堅武器，無法破壞城牆。南門外是一條正對城門的直街，在城上火力瞰射下，不能接近城邊，因此，我們的攻擊部隊，乃沿着街道兩旁商店，穿牆前進，直抵城下。我親自縝密偵察，决定由東門外右側水溝內水面之上，開挖坑道，爆炸城牆，並從城外電燈廠，拆來大鐵板，遮蓋溝面，進行坑道作業，惟因坑道底須與溝水之平面平行；過低即有水滲出之顧慮。坑道內之上層，不足五尺，須以杉木支撑，提防崩潰。且因坑道內之高度，不足四尺，搬運泥土杉木，往返不便，作業亦感困難，致工程進展極慢。經過六晝夜作業，坑道內端達到深入城牆約五尺，僅及城牆的厚度五分一。

這時，彭德懷命令於翌晨六時，施行爆炸，乘機攻城。當時我曾提供意見，必須待坑道深入城牆過半，爆炸方能收效，要求再以兩天時間進行作業。但彭德懷好大喜功，堅持己見，拒絕我的建議。我也只好在已挖好的坑道内裝置炸藥，準備按時爆炸。並令十九師備好

竹梯，趁爆炸之瞬刻爬牆。可是爆炸的結果，僅將城牆外層炸崩約五十尺寬的面積，守城國軍即以沙包在城上構築側防工事，經過二小時的衝鋒戰鬥，我軍無法搶登城牆。且傷亡過百。第五軍攻西南門，亦無進展。於是又從新尋找新坑道口，再行坑道作業。可是，同樣未完成作業，彭德懷又命爆炸，復歸失敗。而五軍方面，亦毫無成就。

當第一次爆炸攻城未能成功之後，由總政治部負責的政治策反工作開始。印了很多招降小傳單，用弓箭束縛射進城上，呼籲國軍官兵與紅軍合作抗日。晚間組織宣傳隊，在城邊高聲呼叫，進行對敵宣傳。並電請十二軍軍長羅炳輝，親來贛州城邊致書守城旅長馬昆，勸其來降，並約他來城上面談。當時城內官兵，都極動搖，紳商聞此消息，深恐守軍投降，影響到他們的生命財產，乃以紳商經常隨從馬昆，勸其堅强抵抗；另由紳商輪流上城督戰；這一政治攻勢，依然歸於失敗。

紅軍兩次炸城失敗，朱德偕參謀長葉劍英，親到贛州前綫視察。我帶着他們視察各爆炸口及巷戰設備，並將經過情形面報；他們也認爲過去若能多以兩天時間，延長坑道，必可成功無疑。功虧一簣，至爲可惜。現在應繼續偵察新坑道口，再進行坑道作業。

當時，葉劍英問我：「三軍團攻城部署的缺點，在什麽地方？敵人增援部隊到達時，可能出擊的地區在那個方向？」我告訴他：五、七兩軍接合部之小南門外高地，兵力配備薄

弱，且無防禦工事設備。國軍若從城內挖坑道通出城外，攻佔我軍陣地，即可截斷五軍的退路。但該地區在五軍戰鬥境地之內，我已通知彭德懷總指揮注意；可是仍不見其改善。現七軍重點置於左翼，也就是注意該地區的變化。

葉劍英認爲我的意見很對，要我特別注意。朱德偕葉劍英離開了前綫第二天，偵察員即來報告：「贛州北門昨夜已架設浮橋，由吉安南下增援部隊，爲陳誠十八軍之十一師、十四師，該兩師已在今晨過橋入城。」同日午後六時，又接贛州北面沙地擔任對南昌方面警戒之第四軍一個團的報告：「國軍兩師，昨晚已通過沙地，向贛州增援，我軍因兵力薄弱，無法阻止，已向塘江撤退。」等語。

守城的國軍已得增援，我們的總指揮部還沒有新處置，我只得密切注視着情況的變化。

第二天（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天還未亮，西南門一帶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國軍發動的攻勢展開了。雖然本軍的陣地並沒有發生戰鬥，但我急速將指揮所，移到小南門附近小高地，令廿師特別注意戒備。拂曉時，國軍兩個團，由坑道進出小南門窪地，向五軍陣地猛攻，旋即佔領，並向五軍退卻部隊追擊。我即將集結的廿師及廿一師共五個團兵力，向國軍側背攻擊，將國軍擊退，恢復第五軍已失的陣地。這時，彭德懷偕第五軍軍部已向南退卻。我乃按第廿一師、廿師的次序，陸續向南退卻。我親自指揮十九師作掩護部隊，擊退了國軍

的兩次攻擊，從容脫離戰場，撤至桃江水東岸之大田市附近一帶休息。

是役，是紅軍反國軍三次圍剿以來，最大的一次失敗！攻擊了十九天的時間，不但沒有攻克贛州，反而遭受了損失。紅七軍傷亡指戰員百餘人，紅五軍傷亡最重，超過五百人以上，且被國軍俘去師長一員，及指戰員二百餘人。紅四軍在新城擊退了粵軍獨立第二旅，傷亡極少，紅五軍團沒有參加戰鬥，撤回江口塘休息。

總司令部在長洛墟召開軍事檢討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均親自趕來主持。參加者有：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滕代遠、龔楚、鄧平、趙博生等；首先檢討攻贛州戰役失敗的原因。

彭德懷首先指出：「龔楚同志領導第七軍，坑道作業不力，不能依照預定時間完成，兩次爆炸均未成功；致延誤了時間，而遭受失敗。」我即席批評這是他的主觀判斷，並將彭德懷的錯誤，和戰役經過情形，作了一個詳實的報告。同時又申明紅七軍未能依照預定時間，完成坑道作業，我自己應負責任，個人決不推諉。

朱德站起來說明兩點：「（一）我曾親到贛州前綫視察，發覺七軍之坑道作業工程浩大；且在敵軍火力控制之下，自較其他地區爲困難。彭同志如能親到七軍前綫視察，那麽，我相信必不致在坑道作業未完成前，實施爆炸，致兩次爆炸均告失敗。因此，這次失敗責任，不能單獨由龔楚同志擔負。（二）五軍西南方的坑道作業，施工較易，爲什麽不能將城

牆炸垮？這責任是應該追究的。」

葉劍英繼續指出：「五軍攻城部署有很多缺點，各攻擊據點，沒有構築堅固工事；尤其是夜間警戒太過疏忽，致敵軍出擊時，攻入師部才發覺，連師長也被俘去，這還成什麼話？」

彭德懷和鄧平在這樣的指責下，無法狡辯，兩人急得臉都變了色，態度非常不安！作爲會議主席的周恩來，見會議快要鬧成僵局，不想使彭德懷太難堪，便站起來作總結報告，指出：「這一次攻城戰的血的教訓，各軍須分別召開幹部會議，詳細檢討，俾能徹底糾正錯誤。」至於彭德懷和筆者所負的失敗責任卻不提起，輕輕的一筆抹煞；向以冷酷無情著稱的周恩來；今天卻使這次會議的氣氛逐漸緩和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攻贛州失敗後）軍事委員會在瑞金紅軍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俄顧問李特，中共中央領導人員，及總司令部參謀長等均出席，彭德懷和我因路途遙遠，時間急迫，沒有參加。會後，軍事委員會以極機密之通知書，將會議決策通知我，其要點如下：

（一）攻贛州失敗之檢討：由參謀長葉劍英報告攻贛州軍事計劃及戰役經過之詳情。綜合檢討意見，總結如次：

1、攻贛州之決策是正確的。
2、組織戰役計劃有以下之缺點：
A、沒有集中炮兵參加作戰；
B、對贛州北面，沒有使用適當兵力利用野戰消滅敵人之增援隊；
C、總預備隊控置於贛江東岸，致不能參加對贛州增援隊反攻之作戰。
3、攻贛州之戰塲指揮員，沒有周密之攻城計劃，且犯了輕舉妄動之嚴重錯誤，致失去破城良機；攻城指揮員彭德懷應予嚴重警告之處分。
4、政治進攻的工作：準備不周，沒有在軍事進攻前深入城內散發宣傳品，製造謠言等，致不能達到預期之效果。這一錯誤，紅軍總政治部應負責任，以後須特別注意。

（二）今後的戰畧以及作戰方針：
1、戰畧：以兩個拳頭打人，紅軍主力同時向福建及贛江之西岸進攻，以擴大蘇區。
2、第一軍團進攻福建，以佔領厦門、福州海口為作戰的目標。
3、第三軍團進攻贛江西岸，以控制面、孤立點，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畧，截斷贛州城對外之一切連絡，伺機奪取贛州縣城。

4、第五軍團留駐蘇區，負責對南北兩面之警戒，以確保蘇區之安全。

這次會議，我雖沒有參加，但後來據項英說：討論戰略問題時，毛澤東反對兩個拳頭打人，過度分散兵力的決策，他說（指毛澤東）打贛江西岸，打福建，我都同意，但須集中兵力打一處，五軍團亦須參加作戰，若能集中三個軍團的兵力，攻打一面，即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若分散兵力，恐怕無一可達到目的；至於蘇區的防守，現在的地方部隊，北面有蕭克的獨立第九師，閩浙贛邊有第十軍；南面有楊岳斌的二十二軍，及現有之獨立團，儘可負此責任，毋須將五軍團置於無用之地等語。當時爭辯甚爲劇烈，但結果還是遭否決了。

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的軍事決策，沒有接納他的主張，認爲是大錯特錯，他後來在鄴都時曾對我談過這事件，並說：「攻福建沒有成功。阻礙了革命力量的發展，他們這班書生（指秦邦憲、張聞天等）要負完全責任。事隔兩年猶有餘憾，可見他當時的奮激了。

我收到會議決策後，第三天便接到彭德懷的出發命令。第三軍團於三月下旬，從贛州北面之良口渡過贛江，經南嶺坳，進入遂川、上猷間之寺下墟，七軍繼續進至上猷縣之營前。

贛州縣城由粵軍第一軍余漢謀之第一師駐守。

總指揮部因見這一地區，民窮財盡，給養困難，彭德懷的作戰計劃，並未遵照中央赤化贛州外圍，截斷贛州城對外連系，伺機奪贛州之決策，而以五軍及七軍之廿一師（歸總指揮

部直接指揮）配合湘贛邊區之游擊隊向粵湘邊區發展，連下湘南之鄢縣、桂東、汝城、及廣東仁化縣屬之長江、城口等地。七軍（缺廿一）以上猶、崇義兩縣地區爲根據地，向贛州南北兩面游擊。

七軍奉命後，首先進攻遂川縣屬之集龍墟，擊潰國軍一團，繳獲步槍五十餘枝，解除北面國軍之威脅，立即轉移到上猶、崇義縣，以十九師進佔南康以北之鍾村，向贛州以西之塘江、及西南之潭口游擊，斷截贛州與南康之交通，曾與粵軍約一個營之出擊隊遭遇，我十九師五十六團，以迅速堅決之動作將其擊潰，擄敵排長一人，士兵三十六人，繳獲輕機一挺，步槍三十四枝，但七軍軍部管理員一人於採購糧食時被粵軍俘去，並傷亡十餘人，待贛州粵軍大隊增援時，我軍按敵進我退之游擊戰術，迅即退回鍾村集結。

五月中旬，進襲湘粵邊之三軍團總指揮部及五軍之主力因受湘、粵軍之壓迫，陸續退回上猶、崇義地區；七軍之廿一師亦退回歸還建制。是時總指揮部駐於崇義縣屬之恩順，七軍軍部駐於鱗潭，相距很近。粵軍獨三旅范德星及獨二旅陳章旅，另第一師兩個團分由聶都、大庾、贛州向崇義七軍進攻，我軍均以敵進我退，敵退我追之戰術與敵週旋；除官田之役我五十八團略有損失外，在多次的突襲戰鬥中，我軍均有斬獲，且迫使粵軍退出崇義地區；六月中旬，湘軍王東原師四個團我與二十師之六十團在上堡遭遇，我軍迅速脫離戰場，國軍進

駐上堡，次日拂曉，我集結十九、二十、兩個師，向上堡進攻，激戰六小時，將其擊潰，敵向沙田敗退，遺屍五十餘具，繳獲步槍百餘枝。自此，崇義縣屬地區，已無國軍，我軍即轉移至楊眉寺、鍾村一帶向贛州游擊。

朱德親率第一軍團於三月下旬在汀州集中，連下龍岩、漳州兩城，國軍張貞的四十九師退守泉州、廈門，嗣因粵軍第三軍進佔武平、上杭，配合四十九師反攻，因而撤回汀州，轉向信豐南進。這兩個拳頭打入的决策，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無一可達到目的。

我們佔領了贛江西岸之上猶、崇義、贛州各縣地區，以至湘粵邊區，工作了有三個月，七月五日，七軍由鍾村開到楊眉寺，準備展開羣衆工作，是晚突接到總指揮部送來的命令，大畧是：「（一）我軍以消滅大庾、南雄之敵爲目的，一軍團已佔領信豐，向南推進；五軍團由王母渡向梅關急進，截斷大庾、南雄交通；三軍團應在南康附近，消滅贛州南調敵軍之後，立即進攻大庾縣城。（二）七軍即由楊眉寺進出南康，截斷贛州南下之敵，五軍由崇義進出池江，爾後五、七兩軍均向大庾推進。」

六日拂曉我率領紅七軍向南康前進，廿師擔任前衛，接近南康時，僅發生小接觸，即順利佔領南康，知道贛州的粵軍已全部通過南康，向大庾急進；七日，我即率部向大庾前進，在池江附近追上國軍之後衛部隊，消滅其一部，總指揮部及第五軍隨即到新城會合。

七軍指戰員在一日之間步行百里，經過一次小戰鬥，指戰員均疲憊不堪！僅休息了兩小時又接到命令向黃龍墟急進，攻畧大庾。指戰員們立即整頓行裝，向大庾前進。午後十時前已迫近大庾縣城邊。紅軍第五軍團已佔領梅關，粵軍被迫固守大庾。

是時新月將殘，星光照耀，遠望大庾城上，戒備森嚴；城外西北端有碉堡兩處，亦有軍隊駐守，且守軍是粵軍第一軍軍部及第一師，是粵軍中較强的一個師，約有一萬三千人，兵力充足。我當即派三個連分三個搜索隊，向城之東北門及碉堡進行威力搜索，守軍沉着應戰，八日拂曉後，乃開始總攻，經過一晝夜的戰鬥，仍未攻下。七軍又奉命繞道遊仙墟，轉出鄧坊，增援紅四軍在南雄水口墟與粵軍第二師及獨立第三師之戰鬥。本軍到達水口墟附近時，即以十九、二十、兩個師從右翼加入戰鬥，以廿一師爲預備隊，戰鬥約兩小時，即將粵軍獨立第三師擊潰，向南雄逃竄，但繳獲甚少，我軍僅傷二人。戰鬥結束後，奉命在新田墟待命（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是晚總司令部在鄔逕宿營，接獲贛州情報：「國軍於粵軍由贛州撤退大庾時，已進駐贛州縣城；現有向信豐及池江前進，攻擊紅軍側背企圖」。總司令部决將各軍撤回信豐，鄠都之綫。七軍奉命撤回信豐以南之鐵石墟、安息墟一帶組訓民衆，經過了七天的時間，於七月廿日又奉命調興國縣城，集中整訓。

這一階段的戰畧，一時南進，一時北進，擧棋不定，使紅軍遭受了許多不必要的損失。

而紅七軍在這一舉棋不定的戰畧運動中，因彭德懷的過份自私，使紅七軍疲於奔命，指戰員對他這種作風都表不滿；肉體與精神大受刺激！幸全軍上下融洽，士氣尚無影響。總政治部爲加强七軍的政治工作，特派葉季壯同志調任七軍政治部主任。葉季壯是七軍的老同志，各部情形都很明瞭，與各指揮員有深厚的感情，他重返紅七軍，對我的幫助很大。

第五章　國軍第四次圍剿

「一二八」日軍進攻上海所爆發的中日戰爭，國民政府採取了妥協政策，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和日本簽訂「淞滬協定」，上海中日戰爭，因以和平解決，於是又積極進行第四次圍剿蘇區的準備。他們體察過去三次失敗的教訓：（一）忽視了政治配合，使蘇區人民不為國軍所用。（二）蘇區內及環繞蘇區地帶，交通不便，國軍深入後，補給運輸困難，影響進剿軍事不能持久。（三）各路進剿軍的行動，不能協同一致，被共軍各個擊破。（四）中共雖缺乏重武器，不能攻堅，但其攻擊精神旺盛，利於野戰。

根據這幾項見解，他們便定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政略；及「步步為營，碉堡進攻，分區清剿」的戰略；實行對全國各地蘇區進行全面的進攻。這就是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的方略，其計劃大略如下：

（甲）政治部署

一、組織隨軍政治工作隊，隨進剿軍行動，負宣傳、情報、策反、及組織鄉村保甲四大任務。

六、散發招降傳單，勸告蘇區的人民及紅軍自新。

七、禁止屠殺蘇區人民及焚燒屋宇，並策動人民協助國軍，對紅軍作戰。

四、進攻蘇區的各主要據點，須建築公路，並隨軍事進展，繼續伸延，以利交通運輸。

五、對蘇區實行嚴密封鎖，以斷絕紅軍的物資來源。

（乙）軍事部署

一、以何應欽爲閩粵贛三省剿匪總司令。劉崎、王均、何成濬，分任前敵總指揮。

二、以廣東陳濟棠之第一軍余漢謀部，第三軍李揚敬部，由西南面進攻，先行鞏固贛州、信豐、安遠、尋鄔、武平各縣相連之綫各據點。

三、中央軍由東北兩面進攻。先行鞏固福建之建寧、寧化、清流、連城各縣相連之綫各據點；及江西之黎川、南城、宜黃、永豐、吉安、泰和、萬安各縣相連之綫各據點。

四、以衛立煌爲鄂豫皖區剿匪總司令。

五、以徐源泉爲洪湖區剿匪總司令。

這份最機密的作戰部署命令，是由南京軍事委員會用無綫電所發出的。這最機密的作戰計劃，同樣由紅軍總司令部偵察電台竊取了一份，經過紅軍中精明的密碼專家迅速的偵譯，全部機密便完全被紅軍獲悉了。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自獲得國軍第四次進攻蘇區的計劃後，七月下旬，在瑞金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反圍剿戰略問題。是時紅七軍正在興國訓練補充，我以距瑞金太遠，沒有出席。三軍團只有彭德懷一人參加會議。

會議結束後，彭德懷帶回會議議案。並將會議經過情形轉達我們。據說：朱德在會議上作了軍事報告，他的報告分兩部份：

（一）關於紅軍組織，由今年一月至今，擴大了一培以上，現在除已補充了原有的第一、三、五等三個軍團外，並另已編成及充實了的紅軍計有第三、第八、第廿二等軍及獨立第九師、中央警衛團等。

（二）關於國軍此次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共約四十師，分九路向我中央蘇區及附近之湘贛、閩浙贛、鄂贛等蘇區進攻，從表面數字看來，是相當强大的兵力，但根據他的判斷：

1、南面：一路余漢謀，三路李揚敬，是廣東軍；廣東陳濟棠現在正與桂系聯合準備反蔣；這兩路軍僅是採取防堵政策，必不會深入蘇區進攻。

2、第四路蔡廷楷，是「一二八」上海抗日作戰的主力，此次調來福建，剿共非其所願意的，這一路軍亦不會積極向蘇區進攻。

3、其餘的第六、七、九、三路軍，迭次遭我紅軍打敗；官兵皆有懼怕紅軍的心理，戰

鬥意志薄弱，不堪一擊；只有第二路陳誠的七個師，及第八路趙觀濤的六個師及一個獨立旅，爲這次進攻的主力。至於第五路白崇禧，亦屬防堵性質，不須顧慮。

根據上述的敵情判斷，我軍應集中兵力對抗北面敵人，並應乘其向蘇區分進時，把握野戰時機，主動出擊，各個消滅之，必能粉碎敵人四次圍剿等語。

各出席會議的領導同志，初時聞得國軍動員四十師以上的兵力向蘇區進剿，都有恐慌及緊張的心情，後來聽了朱德的報告和分析敵情後，各人的憂慮便如烟消雲散，表露出輕鬆的神情了。

伍修權將朱德的報告翻譯給李特後，李特立即告訴伍修權，我們的戰畧是「主動出擊」。

大家聽了這四個字便一致通過紅軍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畧——「主動出擊」。當時大家還在哈哈大笑！

我聽了彭德懷傳達會議情形後，便認爲紅軍主動出擊，以打破國軍「步步爲營」、「碉堡進攻」的戰畧是對的；但對抗國軍的政治進攻沒有提及應採的對策，同時我覺得我們紅軍的兵力與北面國軍兵力比對，仍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而且我無攻堅武器，攻打碉堡不易，必須把握敵軍運動中的時機，集中優勢的兵力，於運動戰中殲滅之。我曾將這一個意見寫了

一封信給項英，並要他警惕軍政同志，切勿驕怠，否則很易招致失敗。他不久便覆了我的信，對我的建議表示十分同意，並要求我以後凡有所見，即通知他，以便注意等語。

（附四次圍剿時紅軍兵力及指揮系統表。）

紅軍反四次圍剿是從一九三二年八月中旬起至一九三三年四月止。會戰過程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紅軍的作戰計劃是：集中第一、三、五軍團於北面作戰，企圖突破宜黃、南城之綫，進出金谿、撫州（臨川）地區，從國軍對蘇區包圍圈之外綫，以運動戰，各個消滅敵軍。

八月中旬，一、三、五軍團集中於廣昌、寧都間地區。一軍團即攻陷南豐，三軍團攻陷樂安、宜黃，向北挺進，至龍骨渡爲國軍所阻，退回宜黃。八月下旬一度集中一、三、五軍團擬强攻南城，卒以被南城之碉堡工事所嚇倒而放棄這一計劃。

九月初旬國軍向宜黃、樂安、南豐進攻，紅軍未堅强抵抗而主動放棄。一、三、五軍團全部轉移至廣昌、寧都地區，休息，待機。這一階段，敵我雙方僅是試探性的小戰鬥。

紅軍第二階段的作戰計劃，是集中紅軍主力掃蕩北面閩贛邊區之國軍，進出資溪，金谿之綫，相機攻畧撫州。

中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時的組織系統表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

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總司令 朱德

- 第一軍團 林彪
  - 第[illegible]軍 [illegible]
    - 第七師 [illegible]
    - 第八師 [illegible]
    - 第九師 [illegible]
  - 第[illegible]軍 [illegible]
    - 第十師 周昆
    - 第十一師 陳光
    - 第十二師 [illegible]海雲
    - 特務團
  - [illegible]
- 第三軍團 [illegible]
  - 第[illegible]軍 [illegible]
    - 第一師 彭紹輝
    - 第二師 郭[illegible]清
    - 第三師 彭遨
    - 特務隊
  - 第[illegible]軍 [illegible]
    - 第十九師 [illegible]
    - 第二十師 [illegible]
    - 第二十一師 [illegible]
    - 特務[illegible]
  - [illegible]
- 第五軍團 董振堂
  - 第十三軍 [illegible]
    - 第三十七師
    - 第三十八師
    - 第三十九師
    - 特務團
  - 第十五軍 [illegible]
    - 第四十三師
    - 第四十四師
    - 第四十五師
    - 特務團
  - [illegible]
- 第十二軍 羅炳輝
  - 第三十四師
  - 第三十五師
  - 第三十六師
  - 特務團
- [illegible] 楊[illegible]
- 獨立第九師 [illegible]
- [illegible] 獨立第八師 [illegible]
- [illegible] 第二十二師 [illegible]
- 湘贛軍區 [illegible] 第八軍 李天柱、獨立第八師、獨立第十二師
- [illegible] 第八軍、第十軍 周建平
- 湘鄂贛 [illegible] 第十六軍 [illegible]

這一階段由十月中旬起，一軍團之一部攻陷福建之邵武，主力攻陷資溪、金谿。五軍團攻下福建之泰寧、建寧。三軍團攻陷黎川，並北進佔領硝石。控制閩贛邊區北面之計劃，即告完成。紅軍主力即集結於黎川附近地區待機作戰。

十一月，七軍駐於黎川城外西北十餘里之鍾村，中旬的一個正午，我正在軍部召開軍事學術研究會，全軍連長以上幹部均參加，適於散會之際，國軍飛機飛臨上空，盤旋掃射，投彈轟炸，軍部前座被中一彈，幸彈小力弱，房屋未塌，僅傷連長一人；敵機剛去，即接總指揮部電話：着我即赴總指揮部，面商軍事機宜；我到達時，彭德懷面露笑容對我說：殲敵機會又到了，請你來共同研究作戰計劃，即命其代參謀長張翼將總司令部之作戰命令給我看，（他的參謀長舒適於初到黎川時出走向國軍投誠），總司令部之作戰命令要旨如下：

（一）敵情：

撫州地區之國軍：第八師毛炳文，廿三師李雲杰，廿四師許克祥各部，均奉命開赴南城集中，並限於本（十一）月廿一日到達；孫連仲軍，同日進駐滸灣。

判斷：撫州南下國軍，於廿一日午前必經李西趙附近向南城前進；孫連仲軍士氣不振，戰鬥力弱；撫州城空虛，我軍有可乘之機。

（二）策畧：

本軍以消滅孫連仲軍，攻略撫州；同時消滅撫州南下國軍，相機奪取南城之目的，決分路向敵進攻。

（三）兵團區分及任務如下：

第一、第五軍團，由總司令指揮，進攻滸灣，消滅孫連仲軍後，相機進攻撫州。

第三軍團，乘撫州南下國軍運動中，在李西趙附近野戰消滅之，爾後相機奪取南城。

我看了總司令部作戰命令後，彭德懷即和我研究李西趙附近地圖，討論軍團作戰計劃，以李西趙附近通撫州大路兩側均為山地，其東北地區山深林密，適於埋伏；且敵我兵力對比，敵軍數量佔絕大優勢，我軍必須攻其無備，方能克敵致勝；至於地方民衆，過去雖有組織，但基礎薄弱，不能全為我用；我們就是根據上述情敵、地形、民衆條件及我軍的任務，擬定作戰計劃大畧如下：

（一）作戰方針：

軍團採一面埋伏戰術，以主力埋伏於李西趙通南城大路之東側山林地帶，待敵軍大隊通過時，以迅速堅强之突擊，殲滅運動中當面之敵軍，並繼續進攻其後續增援隊，務期於野戰殲滅之。爾後相機奪取南城。

（二）兵團部署：

1、第七軍爲右翼突擊兵團，埋伏於李西趙東北地區，待機出擊。

2、第五軍之一個師，爲左翼突擊兵團，集結於李西趙東面攻擊準備位置，待機向進入李西趙村莊之敵進攻。

3、第五軍（缺一師）爲總預備隊，控置於總指揮所附近山地。

4、硝石通李西趙大路，爲左右，兩兵團戰鬥分界綫，綫上屬左兵團。

5、作戰時，總指揮戰地指揮所，在李西趙東約千碼之路側高地。

（三）行軍計劃：

1、十九日午後四時，由現駐地出發，利用夜間行軍，第一天，在哨石西北地區鄉村宿營，第二天於下午十時前到達距李西趙十至十五里之村莊宿營。

2、行軍序列：按七軍、總指揮部、第五軍之次序行進。

3、警戒：行軍及駐軍均由七軍派出警戒部隊，搜索敵情及封鎖消息，以確保軍團行動的秘密和安全。

4、各部携帶糧食三天，以備不時之需。

5、通信連絡：總指揮部與各軍之連絡，行軍時由參謀人員傳達，駐軍時由各軍通訊連向總指揮部架設電話綫。

6、行軍時，總指揮在七軍軍部行進。

二十日下午九時，我軍已到達距李西趙十華里之小山村。這個山村位於狹長的小山谷之內，谷之出口甚狹，兩側高山，警戒極易。該地是紅軍游擊區，有共黨地下工作。我立即由地方黨同志找到五名農民爲嚮導，以爲帶路之用，對於預定埋伏地區之地形，在地方同志的詳述後瞭如指掌。當即召集參謀處長、政治部主任、各師長、政治委員、特務團長、政委等等（彭德懷亦適來參加）。我將國軍動態，軍團作戰計劃，本軍任務，及根據地圖指示埋伏地區之地形和各師任務等，詳加闡述。並下達作戰命令要旨，大畧如下：

（一）敵情如通報。

（二）軍團以一面埋伏戰術，利用野戰消滅由撫州南下運動中敵軍之目的，決於明（廿一）日拂曉前進入陣地，待機決戰。

（三）本軍奉命爲突擊隊，部署如下：

1、第二十師爲本軍左翼突擊兵團，埋伏於李西趙東北山林地帶，候命向當面敵軍突擊，左與第五軍連繫並與總指揮部戰鬥指揮所密取聯絡。

2、第十九師爲中央突擊兵團，左與二十師啣接，展開埋伏於山林地帶，待命向當地運動中之敵軍突擊。

3、第廿一師，爲右翼突擊兵團，左與十九師啣接，除以一團佔領該師埋伏地區右側陣地，準備阻擊敵軍之後續增援隊，掩護主力決戰外，展開埋伏於山林地帶，候命突擊。

4、特務團爲總預備隊，控置於中央突擊隊之後，相機策應各師之戰。

5、通訊連，於本軍進入陣地時溝通與總指揮部戰地指揮所之電話通信，並協助各師通訊排溝通與各師之通訊網。

6、軍醫處，設傷兵收容所於現駐地，並與各師衛生隊密切聯絡。

（四）本軍與第五軍之戰鬥地境：硝石通李西趙大路之綫，綫上屬第五軍。

（五）攻擊開始之時機：於敵軍進至李西趙村莊時，以總指揮部戰鬥指揮所發出之信號槍聲爲全軍開始突擊之命令。

（六）總指揮部戰鬥指揮所，位於李西趙東端大路右側之高地

（七）本部戰鬥指揮所，在中央突擊隊十九師師部位置。

廿一日上午三時，我軍按：二十師、軍部、特務團、十九師、廿一師之次序開始出發，是時東方天空已有下弦月升起，微弱的月光和星光照耀下，尚能辨認地物，雖行走在崎嶇不平、山陰樹影、野草叢叢的小路上，亦不十分困難。拂曉時，全軍已進入埋伏的陣地，並繼

續完成一切突擊準備。埋伏陣地正面約廣達十華里。距國軍必經之路約三百至五百碼；前面是波狀地及乾涸的禾田，進出極爲便利。電話通訊網於九時架設完成。全體官兵在緊張的期待心情下，靜候突擊的時機。

正午十二時，右翼的觀察員，已發現國軍大隊，以一路縱隊沿着大路行進，其先頭搜索隊，曾接近我軍埋伏地區的前面小高地，搜索、偵察，但因山深林密未被發現。下午一時十五分，敵軍先頭部隊已進入李西趙村莊，後續部隊源源不斷的緊跟着前來。正在官兵情緒極爲緊張的時候，總指揮部戰鬥指揮所的信號槍響了，我軍立即從廣大正面向行動中的國軍突擊，一時炮聲隆隆，機關槍聲達達，叫殺之聲，衝鋒號音，響徹雲霄。國軍的隊伍有向西南面大山跑者，有就地抵抗者，有棄槍投降者，一時散亂，失去了指揮。在極短促的戰鬥中，國軍傷亡甚多，約被我軍消滅一團以上之兵力。國軍後續部隊，被我右側掩護部隊狙擊後，立即佔領大路西面之山地抵抗，企圖與我軍決戰，我軍各師稍事集結後即繼續向敵軍陣地猛攻，戰鬥異常激烈，我十九師師長李顯，即在是時腰部中彈重傷，我正在一起，立即飭衛生隊人員救護送往醫院（不治斃命），並即直接指揮該師各團作戰，我當時以失去了一個親密戰友而悲憤，一面督飭各師强烈進攻，一面請彭德懷派兵增援。至下午四時，五軍一個師乃向李西趙北面山地攻擊，吸引了當面敵軍之一部，我乃令各師迅速在陣地集結部隊，從新

部署進攻。是時，國軍廿四師殘部及廿三師已佔領李西趙西南方面之高山據點，構成連綿的抵抗綫。同時發現其陣地北面仍有整齊之國軍大隊約一團以上之兵力，由北向南沿山脊前進。判斷是第八師毛炳文部。我當時决心乘敵軍陣地未固以前將其突破，乃以廿一師及十九師之五十六團，向最北之敵軍第一據點進攻；我率十九師（缺一團），及特務團向敵第二個高山據點進攻；廿師向第三個高山據點進攻。並即將當面敵情，及我之攻擊計劃報告彭德懷，請他令五軍向李西趙村北面之敵軍第四個高山據點攻擊，協同作戰。我軍攻勢發動後，很快的投入肉搏戰。敵軍狼狽潰散，我即佔領第一及第二敵軍據點，當即以廿一師向北面敵之增援隊約一個團攻擊；我率十九師繼續增援廿師，將第三個敵軍據點攻下；敵軍第四個據點正在構築工事，第五軍僅以小部由南面攻擊，毫無進展，我乃立即率十九、二十兩師向敵第四據點進攻，戰鬥至下午六時又將該據點佔領。連續攻下敵軍四個高山據點，俘獲甚多，敵軍傷亡慘重，遍山屍體，目不忍睹；我軍亦傷亡近百人。時間已是黃昏，敵軍之第五高山據點相距約五百碼，正在構築工事，隱約可見。我即命廿師師長黃子榮率領該師及十九師五十五團向敵軍最後之高山據點進攻，務期將敵徹底殲滅。那時接到廿一師師長龍雲報告：北面敵之增援部隊已全部被我軍擊潰，俘獲第八師之官兵三十餘人，現仍追擊中。我即命該師停止追擊，迅速集結，在現地警戒待命。廿師之攻擊，曾一度被敵約一團

向我右翼反攻，被我五十五團陳團長發覺後立即將其擊潰；戰鬥至八時四十分後已成膠着狀態，戰況較爲沉寂。九時與總指揮部之電話已恢復連絡（下午四時至九時曾因我的指揮所不斷推進而中斷），彭德懷即以電話詢問前方戰況，我將當前情形報告。他再問我：「敵軍最後據點，經過猛烈攻擊，仍死守不退，是否固守待援？據俘虜口供，與我作戰敵軍，確是三個師，其先頭部隊是廿四師，接着的是廿三師，最後增援的是第八師；估計三個師的敵軍，被我消滅了五份之二，但南城之國軍可能增援，時間當在明晨，你的意見怎麼樣？」我答覆他：（一）當面敵人是否固守待援，現在我還不知，要待偵察之後才能判斷；（二）敵軍增援的可能性很少，但我軍如不撤退，應在今晚解決當面之敵；（三）我軍除一部繼續攻擊外，正在連絡集結中，最好請派一個師參加攻擊，收效較易。彭德懷遲疑了一會答覆我：爲了保持這一勝利，今晚應撤回昨晚駐地，若至午夜未能攻下敵最後據點，請即撤退。我說：請你補個命令給我。他答道：電話就是命令，何必多此一舉。電話停止後，我再增派五十七團參加進攻，那時星月無光，山地運動倍覺困難，戰鬥仍在激烈的進行。時間很快的過去，午夜十二時，國軍的最後據點仍未攻下，我便遵照彭德懷的命令停止攻擊，分令各部轉移至昨晚宿營地休息。五十八團當時集結在李西趙村通南城的路口，向南城警戒，我即令其監視國軍據點之動態，掩護本軍轉移。我軍主力撤退後國軍亦即放棄據點，乘夜向南城撤退。我

五十八團曾經展追擊，但因黑夜，恐遭伏擊，於中途撤退。

是役我軍獲得輝煌戰果，俘獲國軍一千五百餘人，俘獲步機槍甚多。但我軍亦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指戰員傷亡一百四十餘人，師長李顯重傷不治。第五軍僅派了一個師作戰，繳獲甚少。我軍在這小山村休息一天，奉令調回硝石、黎川間整訓。

朱德率領的兩個軍團，於十一月中旬北上後，連續攻陷資溪、金谿兩縣，向撫州進迫，在滸灣戰鬥中，擊潰了孫連仲軍，消滅其一部。但撫州已有國軍增兵固守，知難而退，放棄了進攻撫州計劃。全軍於十一月下旬回駐黎川、南豐地區整訓。

國軍方面：因第六路軍許克祥、毛炳文、李雲杰等師，在李西趙之役傷亡慘重，不能繼續作戰，前敵指揮官陳誠據實報告上級，建議暫停進攻，從新調整部署。又給予紅軍一個休息整補的時間。紅軍反第四次圍剿的第二階段至此告一段落。

一九三三年一月，林彪升任第一軍團總指揮，周昆升任第四軍軍長。

由一月至四月爲圍剿作戰之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紅軍的作戰計劃是集中主力，捕捉國軍向蘇區推進之時機，在野戰中消滅之。一月上旬，國軍周渾元；周至柔兩師向南城推進時，被紅軍三、五兩軍團在黃獅渡截擊，激戰兩日，雙方傷亡慘重，國軍旅長周士達被紅軍所俘，紅軍第五軍團參謀長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陣亡。

第一軍團進出金谿，進攻滸灣將孫連仲軍擊潰，傷亡慘重，紅軍佔領滸灣。

二月下旬，紅四、五、七軍，與國軍五十二師戰於樂安之蛟湖，國軍師長李明自殺身亡，全師覆滅。同時紅軍五軍團及十二軍與國軍五十九師戰於霍源，國軍兩旅長陣亡，傷亡慘重，大部被紅軍俘虜。三月下旬，紅軍十二、十五及第四、五軍與國軍十一師、九十二師戰於東陂之霹靂山，國軍傷亡殆盡，師長陳世驥被紅軍所俘。同時第七軍在建寧擊潰區壽年之七十八師，並乘勝追擊，再佔領泰寧、寧化、清流、永安、連城等縣。至此，國軍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便告結束了。

第七編

中央蘇區的中期

第一章　紅軍的幹部訓練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旬，紅軍總司令部在黎川附近召開了一次軍事檢討會議，主要是檢討滸灣和李西趙戰役的優點和過失，出席的有：俄顧問李特、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龔楚、林彪、趙博生、董振堂、鄧平等。

首先由朱德報告滸灣戰鬥經過：「第四軍各部隊在攻擊時，開展迅速，並能同時使用優勢兵力，將敵擊潰；五軍團增援作戰，動作迅速，且能機動地攻擊敵人側背，收到了很好的戰果。」

接着由彭德懷報告李西趙戰役經過情形：「李西趙戰役，使用了第七軍全部，和五軍一個師；敵軍是李雲杰、毛炳文、許克祥三個師。七軍在最初攻擊時，動作很迅速，戰鬥剛開始，便解決敵軍一個團。但敵軍佔領陣地後，不能乘敵陣地未固，即行强烈攻擊，致敵軍有構築臨時工事的時間；且因攻擊不力，以致到午前還沒有將最後一個陣地攻下。龔楚同志是最前綫的指揮員，報告敵情不實，影響指揮官對敵情判斷錯誤，致沒有將敵人全部殲滅，給他們乘夜逃去。還有就是五十八團在戰鬥中動作遲緩，也是一項必須追究的過失。」

彭德懷這一席話，完全是針對我而發的，他將沒有全部殲滅敵人和自己判斷錯誤的責任，加在我的身上，想藉這機會給我一個打擊。出席會議的人聽了他的話，都集中視綫到我的身上，等我答辯。朱德望了我一眼：「情形到底怎麽樣？龔同志，你自己詳細說吧！」他這句話和這個眼色，似在爲我聲援，意思是「不要怕得罪人，我並不相信彭德懷的話呢！」

於是我站起來，將戰役的經過情形詳細說明，並且指出：「整個戰鬥過程中，全軍團兵力沒有同時作戰，是這次沒有全殲敵人的最大原因。假如要追究責任的話，這責任要向誰追究呢？七軍在戰鬥時，犧牲了十九師師長李顯，和一百四十多個指戰員，還生俘了一千五百多敵人和很多彈械，試問五軍的戰績又如何？至於五十八團戰鬥行動遲緩，這是事實，該團團長黃冕昌和我都應該負責；但是，當時由於軍部進展過速，電話綫路沒有構成，致該團脫離了掌握，不過該團的位置就是在總指揮部之下，彭總指揮已有所見，爲什麽不直接指揮？」這兩個反問，問得彭德懷漲紅了臉，瞠目不言！

李特問我：「五十八團所派任務是什麽？」我告訴他：「戰鬥初期，該團是本軍伏擊部署最左翼的伏擊隊，當敵軍後續隊佔領寒婆嶺一帶連接的山地，構成了抵抗陣地後，敵軍的兵力和地形，均比我佔優勢，我軍因經過一次廣大正面的激烈衝鋒戰鬥，且須立即清理戰場，處置俘虜，運送傷兵，搬運勝利品等工作；致建制紛亂，不能不重新調整部署。因敵陣

地正面是廣闊的田洞，從正面攻擊，不易接近。而我的攻擊部署，是以五十八團爲箝制隊，向敵正面進攻；全軍主力迂迴至敵軍陣地左側，向敵包圍攻擊。軍的指揮所，亦移向主攻方面，以致該團一時脫離掌握，而指揮不靈。」他聽了我的詳細叙述，點頭認爲滿意。

至是全塲靜默，大家都不作聲。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來做結論：（一）李西趙戰役，在敵我兵力對比上，敵軍佔極大優勢，我軍不能同時使用所有兵力，給敵人有佔領陣地起而抵抗的時間，是一個最大的錯誤。這一錯誤，彭龔兩同志都要負責。（二）關於龔同志報告不實一點，這是彭同志誤會所致，不會有不實之處。（三）五十八團戰鬥動作不積極，龔同志及該師師長黃子榮要負責任；因爲戰塲指揮員必須切實掌握部屬，才能適時合宜的運用。」一切彭龔之爭的僵局，就因爲周恩來用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輕易地結束了。不過，從此彭德懷對我是更加懷恨與不滿。

散會後已是深夜十二時。我和林彪同住在一間房裏，林對我說：「革命隊伍裏，想不到仍有賞罰不明，功罪不分的事情，眞是奇怪。今晚周恩來的結論，分明是袒護老彭，我不明白，他是黨的最高領導者，贛州作戰檢討會，和今晚的檢討會，都顧全老彭的面子，眞是豈有此理！」他爲我發出不平之鳴！

會議過了數天，十二月中旬，我的調職命令來了。朱德召我到硝石總司令部去，他向我

懇切的解釋：「你不應該與彭德懷鬧意見，因爲彭德懷和毛澤東是同一鼻孔出氣的。這次黨中央對你並無處分，而且連黃冕昌也不加處分，都是爲了平息七軍指戰員的不平之氣。既然這樣，你無法繼續在第三軍團工作，只好調你到上級幹部訓練隊去當副隊長，藉此休息一個短時間。同時可以學習學習，使理論與經驗融合起來。你看好不好？」我便告訴他：「我正希望有一個機會多學習些革命理論，和軍事學識；當了副隊長便阻礙了學習時間，我願意當一個學員。」他馬上答應，即提筆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紅軍中的重要人事調動和部署，並不一定經過參謀擬稿，書記繕寫、校對，監印和收發這一連串手續的；大都由指揮員和政委寫一字條便行了。有時一張極粗劣的紙上便是一個最重要的計劃，或是人事調動的命令），這樣，我便立即離開了紅七軍，到瑞金的紅軍學校裏去，開始接受紅軍幹部訓練的學習生活。

紅軍是在不斷的戰鬥中長成的，擴大的；軍事政治幹部的缺乏自一九二八年紅四軍成立之日起，即成爲一個重要，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初期的紅軍，只能辦軍士教導隊，以訓練初級幹部；對於中上級幹部的補充，祗在戰爭生活中吸取實際經驗和教訓，來提高軍事學術技能。故初期紅軍幹部，除了過去是國民黨軍校的畢業生外，一般的初級幹部的能力都是薄弱的。我在紅七軍時期，就運用了各式各樣的軍事學術講演會、討論會、研究會、戰鬥檢討、

戰役檢討……等，去提高幹部的能力。但成績仍趕不上對幹部的需要。

閩贛蘇區，自一九三一年起正式開辦紅軍學校，以訓練初級幹部，一九三二年九月又成立「上級幹部訓練隊」。由此，紅軍的上級幹部才開始有培育的機會。

我是在離開紅七軍後到上級幹部訓練隊的，那時距結業之期已不到一個月了，爲時甚短，但該隊的學習生活亦有一談的價值。

在上級幹部隊裏面，有共產黨支部組織，隸屬於紅軍學校的共黨委員會。支部之下，分編九個小組，教官與學員混合編組。每月開支部黨員大會一次，主要的包括國際形勢，國內形勢，本黨的政策，紅軍的任務……等內容的政治報告。每星期有一次小組會議，除了討論上級發下的政治文件外，更注重各個人的學習生活之檢討與批評。因爲全體學員都是黨員，且在訓練期間過着一定的學習生活，沒有對外做羣衆工作，黨的生活表現得鬆弛和枯燥無味，反比不上在紅軍中那樣的積極和緊張。但討論問題時，發言辯論的精神卻很積極；往往超過開會時間，這是因爲所有的黨員，除少數什役同志外，最大多數都是高級幹部之故。

我們的軍事學科教材，是蘇聯步兵操典第二部，以講授、圖上作業、野外現地作業的方式實施。

政治教育，是用討論方式，由紅軍學校發下研究資料，交與學員分組討論，每組臨時推

定組長作結論，總結研究所得。這種自發式的互相切磋，容易引起研究者的興趣，故收效很大。

每天早晨六點鐘的時候，我們便起床了。經過一小時的早操後，便是每日八小時的學習時間的開始。晚上還要召開學習生活檢討會，時事討論會……每一週的晚上，又有晚會（紅軍學校全體），有各種的歌唱、演奏、幻術等遊藝節目。隊內起居清潔，營房整頓，統由學員自己處理。與紅校各隊之間，並有內務比賽——包括清潔、衞生、武器保管等，每星期日員生共同組織檢查隊檢查，經過評議給分。

每週末，出一期壁報，由學員中推選出來的壁報委員會負責主持，廣泛的發動學員投稿，每一個學員都能利用這一個園地，自由地發抒對黨的理論的創見，學習心得，教育的意見，生活的建議等；這個園地，成爲同志間經驗與意見交流的場所。

我們的給養，比較紅軍的指揮員及黨政機關都要好些。每週有一次肉食，每日雖全是青菜、豆芽、豆腐之類，但植物油充足，故亦足夠營養；在國軍地方團隊的重重封鎖下的蘇區，一般紅軍及人民的生活，均陷於極端艱苦的情形下，有這樣的生活，大家都很滿足了。

生活、教育，完全採取自發式，發動學員自動遵守紀律的精神，並以生活檢討爲輔助。我當時感到這樣自動維持紀律的辦法，非常進步；自然而然地養成了學員遵守紀律，約束自

己的生活習慣。

我從上海到蘇區一年多來，每天過着緊張的戰鬥生活，一旦擺脫了職責與任務，與同學們過着輕鬆的學習生活，彷彿覺得自己年青了許多，精神非常愉快。

在我們結業的時候，中共便決定將上級訓練隊，由第二期起，專門訓練軍事幹部，成爲以後紅軍大學學員總隊的前身。

紅軍的政治幹部，是在工作中鍛練出來的，但因爲紅軍的迅速擴大，需要政治幹部更多，以致幹部的進步，趕不上形勢的需要。當軍事上級幹部訓練隊第一期結業時，中共中央當局，即決定成立政治營，成爲培養上級政治幹部的教育機關。當時我被任爲政治營營長，對該營的訓育生活，亦感頗有足取之處。它樹立了以後中共軍事政治幹部教育的生活作風。

政治營的學員，是從紅軍中現職的連政委、團政委、各級政治部科長、幹事、及地方黨務機關的中級幹部遴選調來入學的，第一期共有學員三百六十八人，分編爲三個連。

教育的目的，完全在造就政治工作人才，故軍事學科僅佔全部教程的百分之三十。主要的課程爲軍隊黨務，軍隊政治工作的實施，對官兵政治教育，對民衆政治工作，對敵軍政治工作，對俘虜政治工作……等。

因爲學生中大都是沒有受過嚴格軍事教育的知識分子，和工農出身的優秀幹部，爲了養

成他們軍隊生活的習慣，採取了軍事管理。但仍以自發自動的遵守紀律為原則，而以開展生活批評為執行紀律的主要方法。教育方式避免枯燥的課室教授，減少課堂講授時間，大多採用作業、討論、問答等方法實施。

「做禮拜六」是中共仿效蘇聯的辦法。每逢星期六下午，所有黨政機關各級工作人員及紅軍指戰員，都替人民做兩小時無代價的勞動工作。這種制度稱為「做禮拜六」。這一時期「做禮拜六」的制度正在蘇區開展。開始發動的時候，蘇區內的工作人員無不踴躍參加，我們政治營的員生，當然不能例外。為響應中共的號召，全營員生分編為四十個小組，於星期六下午，由各組長率領到農村中去，直接找到人民家裏，幫助羣衆做工。所做的事情，大致是砍柴、割草、扒松毛、挑水、舂米、種田……等，不受人民任何的招待和代價。初時人民見我們是官長和學生，不敢給工作我們做，經過了解釋後，才給我們做點輕工，如搬柴草、清潔地方等；我們做完了工，就集體回去。等到逐漸習慣後，人民就不再客氣了。

因為蘇區的人力實十分缺乏，所以我們到達時，各家各戶的男女老幼都搶着帶我們去做工。我曾做過整菜地、扒松毛、舂米、修路等工作。做工的時候，大家都有說有笑，歡天喜地。我們也利用了這種機會，來進行羣衆宣傳工作，使教育與羣衆工作聯繫起來。我並利用這一機會調查蘇區農村情形和人民對中共、對蘇維埃政府的觀感。因為人民和我們已沒有隔

閡，他們和她們心裏的事情，往往無保留地坦白說出來。一般的說，對蘇維埃政府全不瞭解，他們所知道的是：共產黨的政府就是「毛主席」的政府。他們時時顧慮「白鬼子」（指國軍）來，因圍剿時要殺人燒房子。他們又感覺負擔不起各種慰勞的捐欵捐食物，且不滿意共產黨限制糧食數量及收購的辦法；更有很多人不滿意蘇維埃政府的地方幹部那種兇狠行爲，如嚴禁無故不許過村探親留宿的辦法。其中一個人告訴我，政府要她做兩對布鞋勞軍，既沒有布，又沒有錢，迫得回到娘家去借布借錢，適天黑又下傾盆大雨，便在娘家住了一宵，因此被政府扣留了兩日，說時還不斷的流下淚來。在這一短期的調查訪問中，使我對蘇區的人民生活和人民對共產黨革命的觀感，有了更清楚的瞭解。

紅軍學校在這一期間，發動了各種比賽運動。計有：成績、生活、紀律、演講、壁報、射擊、衛生等各項節目，並分爲團體與個人兩項。這一比賽制度的建立，是教育中的一種進步的措施。

我主持政治營期間，除負起全營的教育實施與管理的責任外，還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輪流去參加學生的各項小組會議。因此，不特能深刻了解每一個學生的思想、能力、學習進步的情形，並且從學生那裏得到很多寶貴的工作經驗，所以時間雖只兩個月，但學生與我個人，在理論與經驗上均有很大的進步。值得提出的便是軍隊政治工作實施時最切實的方法，

便是在戰鬥緊張時，提出適當的政治鼓動口號：如「這是生死關頭，只有硬打是我們的生路，被敵軍俘去必被慘殺！」及「敵人就快敗了！這是我們勝利的最後五分鐘！」……等，可以穩定軍心，提高士氣，使局勢轉危爲安，轉敗爲勝。對士兵的政治和識字教育，最好是利用行軍、作戰的作業時間，運用巧妙的方法去進行教育，比較在課室操場裏教育還易深入。對於動搖敵軍軍心的政治工作，如：「火綫喊口號」、「與國軍士兵相約不打槍」、「火綫上和敵軍士兵談話，進行瓦解敵軍宣傳」、「投擲香烟慰勞敵軍士兵」……等，也在小組的交流經驗中，得到很多良好的意見。這種打破師生界限的教育方式，不是我去教育學生，而是學生自己在教育自己。第一期政治營的學生，不久便遍佈在紅軍和蘇區黨政機關中，成爲日後中共政治人才的主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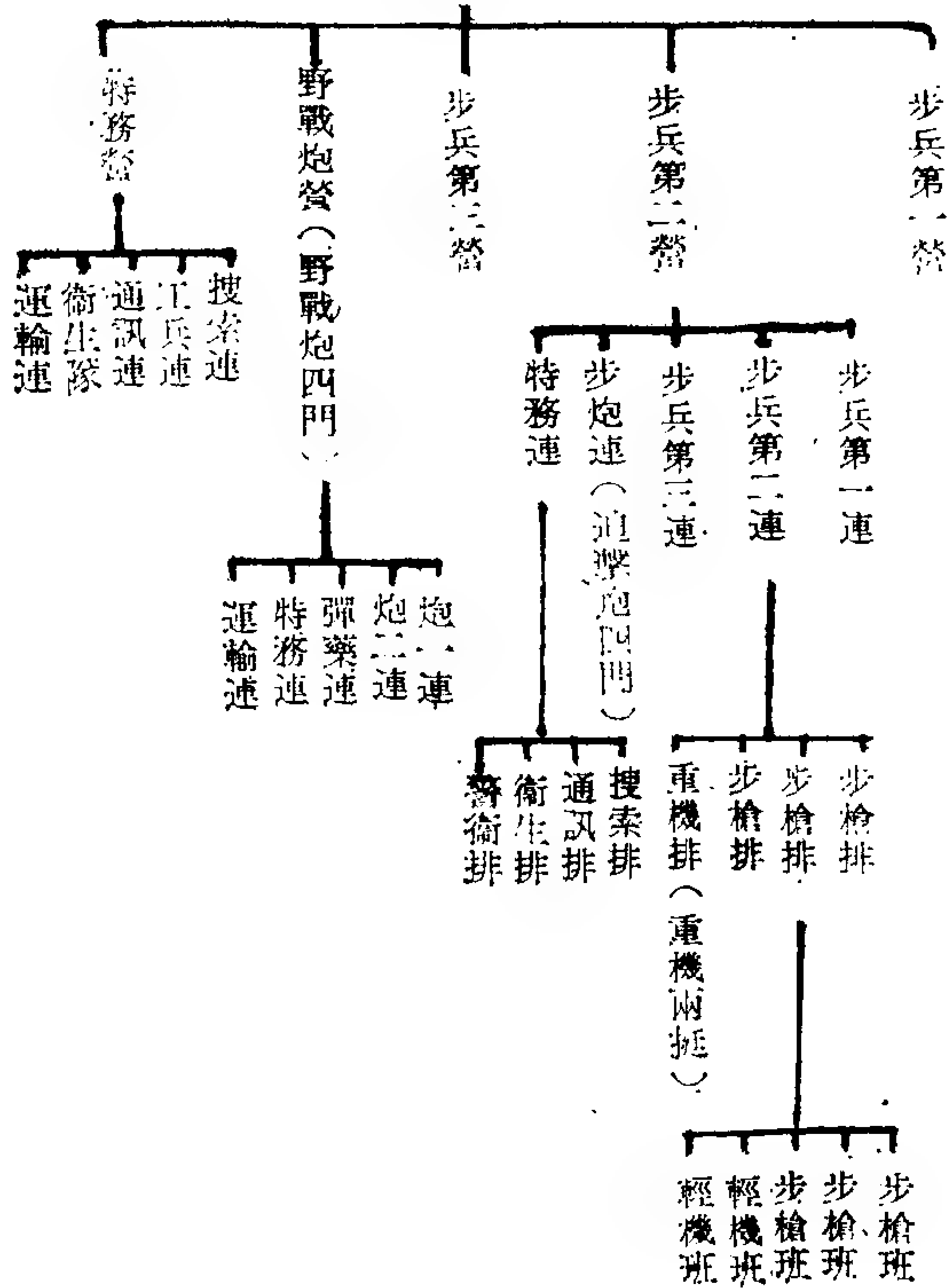
中央蘇區紅軍在進行反國軍第四次圍剿的後期，曾接到第三國際關於建設正規紅軍二十萬的指示。待反四次圍剿戰役勝利結束後，即開始研究紅軍的編組問題，我那時正主持政治營，突接到軍事委員會項英的電話，要我立即到紅軍學校，那時紅軍學校校長葉劍英（劉伯承已調任紅軍總參謀長），當我到達時，項英已比我先到了。

第二章　模範團與東路軍

當時他對我說：自「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東三省後，蘇聯對我們中國革命特別重視，現在第三國際指示我們，爲了早日完成中國蘇維埃運動的革命任務，要中國建設優秀紅軍二十萬。紅軍的裝備，只要我們能佔領一個海口，蘇聯即以大量武器及飛機供應，關於將來正規紅軍的編制問題，黨中央交給你和葉劍英同志負責，立即研究擬訂計劃，並即按照新編制，組織一個紅軍模範團，由你任團長，負責加緊訓練各級指揮員和戰鬥員，將來正規紅軍即根據模範團的編制整編等語。葉劍英笑對我說：「這個責任非你不可，請你按照現用俄國紅軍戰術，及針對國民黨軍隊編制情形，如何便於作戰等原則擬定；關於裝備方面，如野炮、步炮、重機、輕機等，當可增加……」我以政治營剛開始訓練，關於草擬新編制，應請葉校長負責爲辭，但項英和葉劍英均一致要我擬辦，我祇得免爲其難，經過了三天的研究，擬具好紅軍新編制草案，送交軍委會。這個新編制，是以師爲最大建制單位。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旬，即接到軍事委員會通知，按照我所擬的紅軍新編制，立即成立一個模範團，並派我任團長，伍修權爲政委，黃子榮（原七軍廿師師長）爲參謀長，並指定在

模範團編制表



註：步槍班每班十二人，輕機班每班六人

會昌縣屬之武陽圍開辦。模範團所有士兵均限令中央蘇區各縣遴選優秀青年工人，於二月二十日以前到武陽圍模範團團部報到。所需械彈統由紅軍學校撥交。

那時我主辦的政治營正在訓練中，模範團又要開辦，我與項、葉商討辦法，決定由模範團政委伍修權、參謀長黃子榮先到武陽圍籌辦；政治營提前於二月十五日結業，俾我能致力於模範團之訓練。

政治營結業後，我即到武陽圍模範團。

二月底模範團已編組完成。這個團編制的作用，是以輕機爲排的火力骨幹，重機爲連的火力骨幹，步炮爲營的火力骨幹，野炮爲團的火力骨幹。根據火力的組織，團可單獨作戰，而成爲戰略單位，營、連爲戰術單位；排、班爲戰鬥單位。在作戰時，一個團可對抗國軍一個旅。而且山地作戰，以團爲戰略單位，行動較爲敏捷，可以制敵機先。這是新編的用意。

福建是中央蘇區的東面，福建方面的國軍素來是最弱的一環，自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第一次國軍圍剿蘇區起，至一九三二年四次圍剿止，中共對該方面，都是以地方部隊擔任警戒，最多亦只以羅炳輝的第十二軍，擔任該方面的守勢作戰。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次圍剿初期，第十九路軍由上海調來福建後，中共軍事當局，以十九路軍不是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必不會積極進攻蘇區，仍不十分重視。待至一九三二年二月，紅七軍向進駐泰寧、建寧之十九路軍

七十八師（區壽年師）進攻，將該師擊敗，連下建寧、泰寧、寧化、清流、連城、永安六個縣後，便引起了十九路軍的敵視心理。當紅七軍轉移回建寧、廣昌蘇區後，十九路軍即以重兵進駐泰寧、寧化、清流、連城、新泉、上杭之綫。有進窺長汀、瑞金之形勢。

那時紅軍總司令部尚在黎川，南面軍事由軍事委員會直接處理，中共爲了確保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首都——瑞金的安全，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初旬，由軍事委員會決定組織東路軍，以紅軍學校校長葉劍英兼任東路總指揮，其戰鬥序列如下：

第一縱隊司令員龔楚　轄：

紅軍模範團（五千人）駐會昌之武陽圍。

中央警備團（二千五百人）駐瑞金。

第二縱隊司令員李××　轄：

紅軍學校軍事上級幹部訓練隊（二百人）駐瑞金。

紅軍學校學生總隊（一千二百人）駐瑞金。

紅軍學校特種兵大隊（三百六十八人）駐瑞金。

第三縱隊司令員××　轄：

第九軍（五千人）駐朋口。

閩西獨立團（五百人）駐朱溪。
長汀獨立團（五百人）駐長汀、連城間。
東路軍成立後的作戰方針：以清流為第一作戰目標，佔領清流後，即南向進攻連城、新泉、上杭各重要敵軍據點，擴大及鞏固閩西蘇區外圍，以確保中央蘇區的安全。
東路軍根據這一作戰方針，策安進攻清流之部署大畧如下：
（一）第三縱隊，在現駐地監視當面之敵，並封鎖蘇區消息，掩護本路軍主力作戰。
（二）第二縱隊之上級幹部訓練隊，進出寧化、清流間主要交通綫上游擊，監視寧化敵軍之動態，並阻滯其向清流增援，以掩護主力作戰。
（三）第一縱隊為突擊隊，由我之右翼以奪取清流為目的，向清流縣城及其附近碉堡綫進攻。
（四）第二縱隊（缺上級訓練隊）為箝制隊，佔領清流西南之楊村附近山地，準備配合突擊隊由左翼向清流攻擊前進。
東路軍於四月廿日拂曉向清流展開進攻，突擊隊於下午二時前已連續攻佔清流東南門外沿河岸之碉堡三座，但城外地形開闊，碉堡林立，未能立奏全功。葉總指揮以逐個碉堡進攻非一二日所能攻下，且有寧化、連城敵軍增援之顧慮，遂於下午四時下令停止進攻，並於廿

二日撤回長汀（汀州）休息。於是，東路軍成立之後的第一次作戰，未能完成作戰目的便停止了。

東路軍退回長汀之翌日，即接到軍事委員會電報，大署：（一）着葉劍英率紅軍學校之各隊員生回瑞金訓練，並解除東路軍總指揮職。（二）東路軍總指揮由龔楚接任。（三）東路軍總指揮部暫設長汀。

我們接到軍委會電令後，葉劍英即將東路總指揮部的文件、及少數人員、無綫電台等，移交給我，他便率紅校員生回瑞金。我即按當時閩西環境，擬定作戰計劃如下：

（一）以第三縱隊（第九軍、及兩個獨立團）改爲守備軍，在現守備地區加築防禦工事，構成縱深的防禦陣地，據險固守。

（二）第二縱隊（模範團及警衛團）爲野戰突擊軍，控置於長汀，策應閩西地區之作戰。

我的作戰計劃剛剛訂定，即接到第九軍游軍長報告：駐新泉之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三個團有向我新泉以西之南陽地區進攻企圖，我除堅决固守外，請即馳援等語。我據報後，除電軍委會外，並即率突擊軍星夜趕赴上杭縣屬之舊縣，於翌日（四月廿七日）下午六時到達，並即與第九軍游軍長取得連絡，據稱：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一個團由昨日拂曉開始向我南陽東面

警戒陣地攻擊，當即被其佔領；今日午後約有兩個團兵力向我朱坑以北至南陽之綫主陣地進攻，我軍正利用這蔭蔽山區地帶的既設陣地，堅强抵抗，迄今仍能固守主陣地等語。我當即命令他固守現陣地，我突擊隊於明日拂曉由朱坑向敵軍左側背攻擊，務期一舉而殲滅之。

廿八日拂曉前，我模範團佔領朱坑東北一帶高地為第一突擊梯隊，警衛團為第二突擊梯隊，控置於朱坑。拂曉後，發現敵軍約三個團正在右前方約千碼之山腹向我九軍守備陣地攻擊，我模範團先行發揮機炮火力射擊敵軍之側背，步兵三個營迅速接近敵軍向其側背進攻，當即消滅其兩個營（一部份俘虜），戰鬥僅一小時國軍即全綫潰退，模範團及警衛團立即跟蹤追擊，佔領新泉墟，將其後衛掩護部隊一個營包圍，全部繳械。

國軍六十一師向龍岩潰退。放棄經年的新泉蘇區又被我東路軍克復了。

東路軍是役繳獲步槍四百餘枝，輕、重機槍八挺，俘擄敵軍官兵三百餘人。模範團經過這二次戰鬥（朱坑戰鬥及新泉戰鬥）的考驗，證明其編制優良，若能善於運用，可與三三制的國軍一師作戰。

閩西方面自此以後，安定下來。中央蘇區的東綫已無戰事，十九路軍也再沒有和紅軍作戰了。

第三章 粵贛軍區

福建方面，自東路軍新泉戰役擊潰十九路軍六十一師後，中央領導同志均認爲中央蘇區東面的威脅已告解除，但南面廣東國軍，常向蘇區進擾，亟應早爲預防。五月一日軍事委員會拍給我一封電報，大畧如下：

（一）東路軍總指揮部撤銷。

（二）龔楚調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三）模範團擴編爲紅軍二十二師，仍由龔楚兼師長，並兼政委。模範團其餘職員仍調任二十二師原職。

（四）龔楚兼任江西省政府軍事廳長（省府設在會昌）。

（五）中央警衛團調回瑞金，歸還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

（六）原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張雲逸，調任紅軍總司令部作戰部長。

（七）閩西之軍事，移交由福建軍區司令部指揮。

（八）新泉防務由九軍接替。

我在福建新泉墟接到這個電令，立即將新泉防務交與第九軍，於五月二日率部經長汀、瑞金、轉赴會昌之筠門嶺接受新任務，並將模範團整編爲二十二師。

粵贛軍區成立於一九三三年二月，第一任司令員兼政委張雲逸，是和我創建紅七軍的老同志，我們之間，除了有革命同志的關係外，還保留有人性與生俱來的純潔情感！過去紅七軍軍長是由他移交給我的，現粵贛軍區司令也是由他移交給我。他見我到來，高興萬分，他以三天的時間，告訴我有關粵贛軍區的一切情形，大致可分以下各項：

（一）軍事的任務：

1、推動並協助地方政府，編組及訓練民衆武裝。如少年先鋒隊、赤衛軍、獨立團、獨立師等。

2、指揮本地區之紅軍及地方武裝以保衛蘇區領土。並有向外游擊擴大蘇區之任務。

（二）粵贛軍區的轄區：

東由福建之武平起，經廣東之平遠、江西之潯鄔、安遠、信豐、南康，迄贛州止之贛江東岸地區及會昌、雩都各縣。

（三）本區現有之兵力及位置：

1、第一獨立團五百人現駐茅店，及桃江水東岸；大田市、長洛墟、小坌一帶，對贛

州、南康、信豐方面警戒。

2、第六獨立團六百人，團部駐龍布，活動於武山、金沙等山區，對信豐及重石堡方面進行警戒。

3、第四獨立團六百人，駐於青溪，活動於天心、新橋地區，對重石堡及潯鄔方面警戒。

4、第五獨立團六百人駐於盆古隘，活動於山貝、羅塘地區，對潯鄔、安遠、武平方面警戒。

5、另外尚有前綫地方赤衛軍約一千五百人，負責各本地區之警衛，並配合各獨立團作戰。

（四）南方敵軍態勢：

1、武平、平遠、潯鄔三縣有粵軍第三軍之黃質文第七師、黃延禎第八師兩個師，每師有四個團；其最前綫：小項里、古潭墟。

2、潯鄔、安遠兩縣有粵軍第二軍之第四師，其最前綫是：潯鄔之龍岡、及安遠之大竹園。

3、信豐、南康、贛縣，有粵軍第一軍三個師，其最前綫：安遠之重石堡、贛縣之王

富。

4、大庾、南雄地區尚有粵軍之獨立第二旅、第三旅等。

5、前綫之粵軍常派出以團或營爲單位之挺進部隊向蘇區襲擊，以保持戰爭狀態。

（五）本區之兵要地理：

1、東南面依托九連山區；山深、林密，地形複雜，易守難攻。

2、西面依托桃江水，敵軍不易深入。

3、南面中部地區，有梅林江及其支流大長河、唐村水，爲天然防禦綫，且盡屬山岳地區，設防亦易。

此外，他對我說：「中央軍事委員會爲了確保蘇區的安全，本軍區敵我對峙四百餘里之正面，須構築一百個以上的碉堡，以資防守。關於碉堡之選定及構築計劃，本部參謀處已擬有具體方案，但尚未開始施工，請你（指我）嚴格督導地方黨、政、軍同志迅速進行，免被中央責難……」

我聽了他上述的一切，深深的感覺到今後任務的艱巨！但既已奉命前來，唯有努力以赴，成功失敗，均非我所能計及的了。

在粵贛軍區任內，我的作戰任務是：對抗十倍於我的粵軍，以保衛中央蘇區的南面。要

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我的戰畧應採取守勢進攻，以抗拒粵軍的攻勢防禦。根據這個戰畧原則，我的作戰計劃：

（一）以原有之獨立團、赤衞軍爲守備軍，依照既定堡壘防禦綫計劃，固守陣地，並加緊動員人民迅速完成碉堡構築計劃，以利防守。

（二）二十二師爲突擊軍，以青溪爲基地，經常進出潯鄔，安遠地區，積極襲擊敵人，及打擊敵人之挺進出擊部隊。

（三）加緊充實及調整各獨立團，分區守備各據點。

我主持的粵贛軍區，就是根據上述計劃施行，由五月至七月末，經過的戰鬥如下：

（一）重石堡戰鬥：守軍是粵軍第一師之一營，五月中旬，我二十二師以三十個便衣官兵携帶短槍，乘墟期混入重石墟內，外攻內應將重石堡攻陷，粵軍突圍而走，傷亡五十餘人，被俘二十一人，繳獲步槍二十三枝。

（二）龍岡戰鬥：守軍是粵軍第二軍第四師教導團一個團，我二十二師於五月下旬夜襲，攻入龍岡，巷戰一小時，粵軍愴惶突圍向潯鄔縣城逃去，斃敵十八人，繳獲步槍十五枝。

（三）澄江伏擊戰：粵軍第三軍之一部於我軍夜襲龍岡後，希圖對紅軍報復，由潯鄔向

盆古隘進攻，我二十二師適在澄江游擊，偵悉粵軍動態後，當即埋伏於澄江以北山地，待敵接近時，突然向行進中之粵軍突擊，戰鬥達兩小時，斃敵軍官兵約五十餘人，繳獲步槍四十餘枝，輕機兩挺。時間是六月上旬。

（四）青溪戰鬥：粵軍第三軍兩個團向青溪我二十二師搜剿，遭我軍伏擊，倉忙逃去，傷亡約有百人，遺屍三十餘具，我軍繳獲重機兩挺，步槍三十餘枝。

（五）龍布戰鬥：七月間粵軍第一師之第三團（彭林生團），乘龍布墟期，師紅軍攻重石堡故智，以一部化裝潛入龍布墟，對我獨立第六團突襲，我獨立團損失步槍五十餘枝，被俘去二十餘人。

上述五次戰鬥中，僅有七月間龍布墟之獨立第六團被粵軍突襲，遭受損失；其餘四次均獲勝利。可是，這一次的挫折，便成爲我以後被撤職處分的罪狀之一，可見中共對幹部的刻薄了。

第四章　土地革命與農民政策

二十世紀的上半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是以「土地革命」爲其主要內容；而以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爲革命隊伍的主力軍。這是自一九二七年以來一直到中共統治了大陸所經過的事實所證明了的。

關於這個中國革命問題中的主要問題——土地革命和農民問題，看得最重要，認識得最清楚的就是毛澤東。我們可從他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及以後來革命鬥爭的實踐過程可以看出來。我們可以說：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爲這一革命階段的領袖及所以能夠奪取中國政權，也就是能夠把握着這個主要問題所致，絕非僥倖成功的。

毛澤東在土地革命實踐時，他的政策大體來說有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井崗山時期，他是採取沒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給農民的政策；這個時期的農民政策，對於富農是與中農、貧農，僱農平均分配田地的。

他認爲由勤儉起家的富農是値得讚許的。

第二個時期：（大約是一九二九年古田會議後開始至一九三二年）是採取抽多補少，抽

肥補瘦的辦法來分配土地給農民，這個時期的富農，同樣是受到與中、貧、僱農平等待遇的。甚至有些奸猾的富農還在數量和質量上隱瞞了一些田地。

毛澤東當時爲什麽維護富農利益？以我的見解認爲：他是出身於農村，對農村經濟情形及生產狀況，是很明瞭的；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是依靠着富農和中農；若取締富農，有使農村生產萎縮之虞。而且富農亦是農民，若能善爲誘導亦可成爲革命的力量。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由滬遷來江西後，於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清算毛澤東的富農路綫。並由是年冬起實行查田運動，但是由於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以前這半年來，查田運動的工作並沒有積極的開展。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間又在寧都召開了一次會議，嚴厲的批判了毛澤東的富農路綫，重新訂定土地政策和農民政策；重新分富農的土地。在分田時，富農只能得到一定數量和質量較壞的土地，並主張剝奪富農和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否認毛澤東主張的中間階級在現階段民主革命運動的存在性，（因鄉村富農及城市手工業主、小販……等是中間階級，在民主革命運動中，他們可以站在革命的一邊，又可以參加反革命的一邊。）

五月下旬在瑞金中央政府內召開了一次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我是出席者之一。討論土地政策和農民政策。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博古、洛甫未出席），他報告農民政策是：「消滅地主，反對富農，中立中農，聯合貧農，以僱農爲基礎。」

並即席說明：「地主階級的實質是反革命的。若保留這階級份子存在蘇區，一旦革命受到挫折時，他們必會起來勾結並聯合反動勢力，破壞革命。爲了鎭壓蘇區內反動階級的死灰復燃，必須毫不姑息的斬草除根，將地主階級徹底消滅。這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所說的：『對反革命份子的姑息，便是對革命同志的殘忍。』

其次是對富農政策太過於放縱，他們利用着優越經濟力量，仍可以在農民身上進行剝削；或從土地生產中取得更多的利益，逐漸再成爲農村的資本家，這是有害革命的前途的，故應進一步沒收富農的財產，以徹底剝奪其經濟的優越條件。

中農是農民中的革命與反革命的中間份子，但他們有很快便成爲富農的條件。他們的革命性是極度薄弱的，應防止其走向反革命的集團。

貧農在土地革命中是熱心的。但要注意他們的自私自利的觀念、保守觀念、温情主義和封建思想。

從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只有僱農是基本的革命農民。所以我們要以僱農爲基礎，進一步扶助他們，團結他們，養成他們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堅强意志與信心。」

周恩來的農民政策報告完畢，全場靜寂下來。大家都在考慮有沒有修正的意見。會議桌上的時鐘滴答滴答的響着——時間過去了將近十分鐘，還沒有人發表意見。

我不是無產階級出身，我的家庭是個小量土地擁有者兼營商業的中產階級。按中共的定義應該列爲富農。但我並不以爲我是富農而反對這一個農民政策，因爲我在農村中生活很久，我深深地了解農民的痛苦，不獨是僱農、貧農苦，甚至富農和地主一樣苦。由於農村經濟的貧乏，農村的土地分散，大地主極少。我和一般農民一樣，厭惡並憤恨一般苛索農民的土豪惡霸；因之，我參加中共的革命鬥爭，希望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良好社會，尤其是使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我未到過蘇聯，沒有實地考察蘇聯在大革命時的農村情形；但是，從留俄歸國的中共黨員中，我獲悉了帝俄時代的農村情形，與中國現狀不同；俄國的地主所佔的土地動輒以萬畝計；俄國的富農都是經營有廣大的農場。他們多是農村的資本家；俄國的貧僱農特別多，他們多數是農奴轉變爲貧農，或者受僱於農場爲僱農，他們可以說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

中共在南昌暴動時宣佈沒收二百畝以上土地，也可以說是對二百畝以下的土地不加沒收。但土地革命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到一九三三年時，地主富農的定義都規定得非常苛刻與不合理了。凡有土地十畝，甚至不足十畝，只要其生活來源主要是收租，或部份收租部份自

耕者，皆名之爲地主。農民中凡自耕自給，或僱用一二農民助耕的即名之爲富農。如果照周恩來這個說法，那麽農村中要殺的人實在太多了。我想：中共現階段的革命，如果是爲了被壓迫的人民謀解放，爲了要使廣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那麽就不應站在階級仇恨的立場，把稍有田地的人，一概加以屠殺。同時我認爲：地主剝削制度是中國數千年來遺留下來的社會制度，决不是這個時代的地主的個人犯罪行爲。以革命手段來消滅其制度是合理的，但毁滅其生命，不僅是違反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大傷國家的元氣！而且中國革命的主力是農民，若得不到廣大農民的同情和擁護，革命是沒有前途的。我經過這樣的考慮，便打好了一個腹案，在大家沉默中站起來，說明我對這個政策的意見：

一、本黨土地政策，照現在的地主定義，要消滅的地主實在極多，犧牲人民生命過大，有損國家元氣。

二、因反富農，很容易發生執行政策時的偏差，致演變爲任意屠殺。

三、因反對富農，必動搖中農，並因而影響貧農的革命情緒。

四、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薄弱，中國革命必須爭取廣大農民的積極參加和擁護，若採取這一農民政策，必斷送廣大的農民羣衆。

五、中國農村生產，主要的是建築在小地主、富農、與中農階層，若摧毁了小地主與富

農，必造成生產萎縮的現象，影響國家經濟。

因此，我們的農民政策，應修正爲「反對地主，消滅地主階級剝削制度」「中立富農，以穩定農村生產」「以中農、貧農、僱農爲基礎，充實與鞏固人民陣綫」。

我這個意見，得到許多同志的贊成。接着起來講話的是賀昌，他說明中國現階段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是現階段革命的重要力量，本黨不能忽視了小資產階級與廣大農民的利益。龔楚同志的修正案，我很同意。繼續還有幾位同志發言，他們踴躍地發表與我相同的意見，更充實了這一建議的內容。在這個激辯的過程中，會場情緒顯得很緊張。

可是，中央的負責人，固執地務必要貫徹他們的主張。並不因多數同志的反對而加以修改。周恩來提出說明：「這個政策是根據第三國際給我們的指示而决定的，過去中國革命的不斷受到挫折，都是黨的負責同志不能徹底執行國際路綫的結果，我們鑒於過去的失敗，今後再不能對國際路綫有所懷疑。今天只有討論如何去深刻的了解，及如何去執行這一政策，而不是研究修正的時候。」這個執行國際路綫的大帽子，鎮壓了全場反對者的意見，各項實施細則，也就如議的通過了。

會後，我到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家裏，跟他和他的小脚太太三人共進晚餐。他很沉重的

對我說：「龔楚同志，你今天的見解雖然有充份理由，但太過激了。」說到這裏，中共的高級幹部賀昌也跑來了，他急忙問道：「老項！你同意他們的政策嗎？你看事情還有什麼發展？」項英笑道：「我看事情不會那麼簡單，龔同志要當心一點！」項英的太太雖然是個舊式女子，但社會經驗非常豐富，她勸我道：「龔同志你這麼口直心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本來是很好的，但以後還是含蓄一點好。」我聽了很受感動。但我仍覺得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基於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討論黨的政策，我是有權說話的。尤其是這一個關係到人民生存與黨的前途的重大政策問題，我更不能不說，惟事情已經過去，只有靜待事件的發展。第二天，我便起程回筠門嶺去了。

滿天陰霾，暴風雨終究是要來的。八月下旬，我接到命令調回軍事委員會，粵贛軍區司令員一職由何長工接任，其餘的職務，也分別有人接任。交卸手續完畢後，我便回到瑞金軍事委員會。

第二天，項英偕我到俄顧問李特自己個人的辦公處，這也是他的住宅。周恩來和朱德已先到，圍坐在一張長方形的會議桌上。李特指着五萬分一的軍用地圖，問我南面前綫的情況（有翻譯員傳話），我詳細的告訴他。他再問我：「（一）前綫的碉堡綫構築，為什麼將近三個月還沒完成？（二）龍布墟獨立第六團被襲擊，為什麼事前沒有準備？」我告訴他：

「前綫的堡壘百餘座，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因正在早稻收割的農忙時期，動員民工比較困難，我可以說，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龍布墟獨立第六團被敵軍襲擊事，該地與我司令部相隔百里，並無電話網架設，全靠徒步通訊，事前我曾到該團巡視，事後也曾親往處置，粵軍係先以武裝便衣化裝小販，潛入龍布墟，然後內外夾攻，致該團處於混亂狀態，損失步槍五十餘枝。這次事件固然是該團警戒疏忽，但在敵我雙方對峙中，相互的軍事襲擊，亦是常事。」李特聽了我的答覆，點點頭，似乎表示滿意。

但坐在一傍的周恩來，立即站起來以嚴肅的口吻向我說：「龔楚同志！你階級意識一向模糊，在此革命鬥爭到了短兵相接的時期，一切個人利益要服從革命戰爭的需要。農民要收成，趕着收稻、種稻，自然很忙；但任何工作都沒有構築這條堡壘綫的重要。你只顧及單純的農民利益，忽視了整個革命的利益，是你的錯誤之一。守龍布墟的獨立第六團被襲擊，是由於階級警覺性不夠，事前疏於防範，致被敵人化裝潛入，內外夾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損失，這是你的錯誤之二。你以前在廣西工作時，沒有堅定的政治立場，走進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道路；現在又對農民政策沒有徹底的認識，保持着狹隘的農民保守觀念，動搖了同志們的意志，這是你的階級意識薄弱所致，這是你的錯誤之三；根據你上述的三個錯誤，黨中央已決定開除你的黨籍一年，並給你一個學習機會，希望你能徹底轉變。」

他說完之後，大家不說話，木然的望着我。五分鐘過去，李特才打破僵局，帶着笑容對我嘰哩咕嚕說了一通。翻譯員告訴我：「李顧問說你是黨的老同志，知道你過去很努力，將來對革命貢獻時間正長，特請你在這裏吃頓午飯。」

不久，特務員端上兩大盤白麵饅頭和四大盤魚及青菜。大家圍攏着歡歡喜喜的吃着談着，彷彿剛才的事像一個噩夢似的過去了。這個場合我本是非常尷尬的；這些黨的高級同志，只知坐在家裏及上層機關中談革命，只知盲目地聽從蘇聯的命令，沒有了解中國農村經濟情形，將來不僅要危害中國人民的生命，而且要斷送中國革命，我心裏不覺隱伏着無限的憤怒！所以表面上反而沒有尷尬的表情。

晚上朱德約我在他家裏吃飯。他要我提高階級覺悟，並好好的到紅軍大學去學習，特別是：不要寫信回家，因爲政治部已截留了由白區家裏寄來的信，應在蘇區另外找一個思想前進的女同志作老婆，以免給人以攻擊的口實。我聽了，默不作聲，餐後，便回到軍委會去了。

中共中央，像是鄭重其事的來轉變我的思想；在一個黑暗的晚上，在紅軍總部會場召開一個規模甚大的思想鬥爭會，同時被鬥爭的，還有被撤了職的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瑞金的黨政軍上級幹部近百人也全來參加，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我知道，這一次思想鬥爭會的作

用，一方面是在向我們兩個人進行思想鬥爭，希望轉變我們的思想，同時也在教育其他的高級幹部，然而，這給予我們的傷害實在太深了，他所得到的恰恰是一個相反的作用。

會議開始時，由周恩來宣佈：「龔楚、孔荷寵兩同志，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是革命的老幹部。黨爲了要教育他們，特向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使他的錯誤屈服在全體同志的猛烈鬥爭火力之下，再成爲一個黨的優秀幹部；現在先由龔楚同志坦白反省自己的錯誤。」他說完話時，整個會場靜寂下來。我在這場合中，既不願昧着良心，對自己的靈魂作殘酷的凌辱，承認自己確有着一些內心並不同意的「錯誤」；同時，又顧慮到環境的惡化，如果太倔强，便有招致犧牲生命的危險。這時內心異常痛苦！如何突破這一個難關？我考慮之後作了一個簡單的報告，大意是：

「一、我在廣西右江工作，沒有徹底執行黨的政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點，我是承認的。我犯這一個錯誤的原因，是由於我遷就當地社會環境，以致執行黨的政策發生錯誤！

二、我在粵贛軍區司令員任內，我認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因防綫遼闊，兵力單薄，且所指揮的多數是地方部隊，百密一疎，在所不免。第六團的被襲擊，遭受損失，我自然應負其咎。對於堡壘綫未能如期完成，是我顧慮到農民的生活和不影響農村生產所致，黨對我的

批評確是事實，但我認爲我們不能完全忽視了羣衆困難的實際問題。關於農民政策，我的意見已在幹部會議上詳細陳述，至今我仍認爲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我要申明的是：我的出發點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前途着想，絕無半點自私觀念存在其間。黨開除了我的黨籍，這是在我革命過程中的最大恥辱。但是我的錯誤絕不是背叛革命的行爲，而是對中國革命現階段政策見解上的稍有不同而已。」我說完後，便坐下來等候同志們的「批評」。

在靜靜的角落裏，一個人站了起來，他便是黃甦，三十四師的政治委員。

「我和龔楚同志認識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我知道龔楚同志是小資產階級出身，過去生活腐化，在廣西工作時，曾以千元代價娶一個妻子，這一點龔同志沒有坦白的。」黃甦這段話的最後一段，完全是無中生有，使我聽了忍無可忍。因爲我與我的妻子結婚，是在廣西南寧國民政府下工作的時候。當時得到黨內同志如賀昌和鄧小平的協助，他們還參加了我的婚禮。這一千元代價娶老婆的話眞是從何說起？於是，我立即據實提出答辯。中共高級同志賀昌亦即席提出證明，總算是渡過這一難關。

孔荷寵是個無產階級出身。但他在湘東紅十六軍軍長任內，平日好買點肉食，且有時打痲雀牌爲戲。中共即認爲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職調來江西蘇區。在會議中遭受了許多同志的嚴厲批評，使他啼笑皆非，情形非常尷尬！最後由周恩來作總結，指出：「龔楚同志，對

他的錯誤仍沒有深刻的認識，我們希望他能進一步的去自我檢討；孔荷寵同志，頭腦頑固，更須他自己切實的去糾正。」

孔荷寵在這次鬥爭會中，給他的精神打擊極大，嗣後他在紅軍大學結業後，被派到興國縣做羣衆工作時，乘機逃出蘇區，向泰和的國民黨軍隊投降，脫離了中共的牢籠。

鬥爭會後，我與黃甦又在項英家裏碰面，恰巧鄧小平也在座。我便質問黃甦：「我在廣西工作時，你並沒有參加，爲什麽說我一千元買老婆？」他搭訕地說：「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志還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他這番話眞令我太寒心了！原來他爲了爭取黨對他的信任，表現他有無產階級不徇情的優良品質，不惜以道德途說之詞來鬥爭我！假如沒有黨中央强有力的同志聲援，我在鬥爭會上怎樣下台？如此老同志！如此無產階級優秀幹部！眞使我有無限的感慨！

紅軍大學是訓練上級軍事幹部的最高學府，開辦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位置在瑞金縣西十華里的松林內，依着小岡用木板建成了十餘座課堂、宿舍和校本部。闢有兩個廣闊的操塲，並有一座可容千人的大禮堂。

學員區分爲上級幹部訓練隊，高級軍事研究班，及參謀人員訓練班三個部門。上級幹部訓練隊有四百八十個學員，由紅軍中曾任連長以上的青年軍事幹部抽調受訓。並將紅軍學校上級幹部訓練隊併入紅軍大學：共分編爲四個中隊。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正規紅軍團長以上的軍事幹部，提高紅軍的戰術修養，與諸兵種聯合作戰的指揮。」高級研究班是抽調紅軍中師長以上的軍事幹部及適合擔任軍事指揮員的政治幹部，以研究戰術戰略和大兵團作戰指揮，培養高級軍事指揮人才爲目的，全班只有十二人。參謀班就是紅軍中的中級幹部，遴選其文化水準稍高者調訓，全班共有四十五人。

紅大校長周昆，過去曾任紅四軍的師長，後升軍長，在反第四次圍剿末期作戰負傷，治愈後調來高級班當學員，被選爲校長，但仍參加高級班上課學習。校內行政由事務人員負責。這種只重學習不重人事行政的作風，是紅軍大學的特點。

高級研究班主任何迪周，是國軍工兵營營長。參加對蘇區四次圍剿時在黃陂作戰被俘。他的學識很好，他雖然在國軍中地位低微，紅軍反而將他重用。這一來，他很樂意將他全部的學識教授出來。教官有陳時驥（國軍師長）及另一國軍郭旅長，俄顧問李特亦爲教官之一，擔任兵團戰術及研究戰略的指導。

高級班的教育內容主要是：兵團戰術、諸兵種聯合戰鬥指揮、戰畧研究、戰史研究、築

城學、兵器學、參謀業務……等。教育的實施方法，是盡量採用現地戰術作業，與圖上作業。每天除了清晨運動外，有六小時正課，其餘的時間是閱讀軍事政治書籍，自我學習。每星期六在大禮堂開晚會，有紅軍總政治部劇社演出話劇及各種娛樂節目表演。朱德及所有高級黨政軍幹部，常來參加。

我們的給養很好，每星期有一次肉食，每人有四両豬肉或六両魚肉。平日的菜蔬也很豐富，比較紅軍士兵要好上幾倍。我們於入校後，每人發一套灰斜列寧裝軍衣，兩套白布內衣，尚有蔴草鞋和布襪，這些，都是紅軍士兵所沒有的。高級班學員中，有孔荷寵、彭雪楓和我三人，每月能領十元大洋的營養補養費。因爲我們過去曾爲革命流過多次血，身體健康受很大的影響，所以有這個特殊待遇。這個特殊待遇，在我到蘇區以後就開始按月發給，其他高級幹部如彭德懷等，因爲沒有負過傷，也就沒有這個特殊待遇了。

在紅大受訓兩個月後的一天晚上，本班黨支部書記彭雪楓通知我：「奉到黨中央的通知，你已經恢復了黨籍。請你今晚參加黨支部會議。」我聽了非常駭異！我不是被公開宣佈開除黨籍一年嗎？現在僅只兩個月，又是在學習期間，並無工作表現，爲什麽這麽快便恢復了黨籍？孔荷寵同志在我之前開除黨籍一年，期間已經過去了，而他的黨籍還沒有恢復，這又是什麽原因？我爲警惕與喜悅的心情所包圍，警惕的是：「今後的工作更加繁重，更難應

付，必須有更好的工作表現，才能得到黨的信任和滿意。」喜悅的是：「在開除黨籍階段，隨時有殺頭的危險，黨籍既恢復，生命暫時有了保障，心情逐漸安定下來。」

後來，我從一個中央高級同志那兒，得到關於我恢復黨籍的原因。原來我被開除黨籍，完全是周恩來所主張的，當時情勢頗爲緊張，且有殺頭的危險。時值中共中央總書記秦邦憲及組織部長張聞天，因赴寧都調整第五軍團人事未返（第五軍團政委蕭勁光在那次被撤職開除黨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亦被撤職處分），沒有參加那次會議。待秦邦憲、張聞天回來，知道了開除我的黨籍，認爲周恩來處置失當，不能因爲這種小事而開除一個有長遠鬥爭歷史的高級同志。但事情已經發表，不好朝令夕改，只好過了一個短時期，再在中央會議提出討論，恢復了我的黨籍。這種業經開除黨籍一年，而能在兩個月內恢復的事情，在共產黨中是很少有的。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爲了工作的需要，我們高級研究班便提前畢業。在紅軍大學大禮堂舉行了一個盛大的畢業典禮。所有高級幹部都到場觀禮。毛澤東、朱德均致訓詞。高級班同學推舉我致答詞，由校長周昆同志發給我們一白布（三平方寸）的畢業文憑（他自己也領了一份），會後叙餐，情形頗爲熱烈。

畢業後的第二天，周恩來召集高級班學員，到總司令部訓話。大意是：「在此革命鬥爭

的嚴重環境中，各位能得到幾個月的學習時間，這是極可寶貴的事，在這一學習階段中，據我所知，多數同志均能努力學習，在軍事的修養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其中仍有個別的同志，游擊思想仍極濃厚，政治的覺悟還不夠。希望你們自加警惕，迅速轉變，否則革命的紀律是不能放鬆的。現在，各位既已畢業，即要分配各位的工作崗位，今後務須加倍努力，庶不負黨對各位的期望……」他那副冷酷的面孔，和刻薄的語調，使我們一班同學都感到不安！

第五章　政治攻勢的發展

中共中央的領導者們，對於國軍向蘇區的圍剿形勢，一次比一次的嚴重，使他們甚感不安和憂懼！

一九三二年四次圍剿的初期，鄂、豫、皖區的紅四方面軍已被迫放棄蘇區西竄四川。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會戰，至一九三三年一月中旬以前，雖已有過初期的勝利，但嚴重的形勢仍未解除。而國民黨中央又將牽制國軍抗日的罪名加於紅軍，並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可以證明國民黨的剿共決心。今後即使順利的粉碎了國軍的第四次圍剿，但接連的更大規模的圍剿，又會到來。爲了要解除這種圍剿的威脅，唯一的辦法就是實現他們一九三二年二月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政治攻勢方針，藉聯合抗日之名，以求得與國民黨暫時的妥協，以保存實力，徐圖發展。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宣言：願意在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衆民主利益，武裝民衆三個條件下，和任何軍隊訂立抗日作戰協定。

這個宣言，他們不僅在蘇區散播宣傳，而且在全國各地大城市，均由地下的中共黨組織到處散發，以擴大其影響。

可是國民黨並未因中共這個宣言，改變了進攻蘇區的既定政策。第四次圍剿雖然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後因軍事的失利暫告結束。但仍積極的籌備第五次更大規模的向蘇區進攻，這就是國民黨給予中共所發表「願意和任何軍隊簽訂抗日協定」宣言，最有力的答覆。

中共自發表了上述宣言之後，更積極的去推動反蔣抗日活動。一九三三年五月，馮玉祥在蘇聯和中共的策動及幫助之下，在張家口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宣佈對日作戰，登時號召了察哈爾及其鄰省的雜牌軍和地方武裝參加者達十餘萬人。馮玉祥以有機會可乘，立即揮軍向察東日軍佔領各縣，大舉進攻，很快的克服了察東各縣。

馮玉祥自興兵抗日以來，軍事上雖然節節勝利，但蘇聯軍品經濟援助並沒有到來，使他無法繼續下去，此時他才知道上了蘇聯和中共的大當。同時國民黨政府方面除增調大軍北上集中於河北省外，並派員勸導馮玉祥臨崖勒馬，勿以抗日為兒戲，抗日大計應候中央政府決定，請馮與中央合作。馮亦感到現狀實處於不利地位，乃於收復察東各縣後立即宣佈停止作戰，準備將察哈爾軍政大權交還中央，他自己便再度下野（那是一九三三年九月的事）。

中共參加抗日同盟軍的高級人員楊曉初、劉少文、張慕陶、楊子康、吉鴻昌等，見馮玉

祥又變了，他們便聯絡可能爭取的軍官，集中已能領導的軍隊，仍用抗日同盟軍的招牌，藉抗日爲名，準備與國民黨展開軍事鬥爭。以配合蘇區的紅軍行動，當時推定方振武爲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以吉鴻昌爲總指揮，率部約六萬人向北平前進，聲勢仍相當浩大，但這些軍隊官兵是爲抗日而來，現改向國軍作戰，違背初衷，多不願意，且軍費無着，生活困苦，中途逃去者甚多。迨行軍至古北口時，因前有國軍防堵，便俘的俘，逃的逃，全軍便被消滅了。吉鴻昌本人於失敗後逃赴天津，潛居於租界內，卒被國民黨偵察人員刺傷被捕，以後解赴北平槍斃了。

此次抗日同盟軍的行動，其結果雖是失敗了，但在抗日方面而言：曾收復了察東各縣失地，給予日僞軍以重大打擊，表現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力量。在中共方面來說：雖然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希望，但卻延阻了國軍對蘇區的五次圍剿，給予中共蘇區及各地蘇區紅軍以相當時間休息整編的機會。在馮玉祥個人言，表現了他個人的號召力量，並藉此與國民政府當局取得了諒解，終出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國軍十九路軍蔡廷鍇部，在「一二八」上海抗日戰爭時，曾得到上海人民的熱烈擁戴和全國人民的歌頌，但另一方面卻受到當時國民政府的非難，因爲中央以抗日的時機尚未成熟，主張對日暫時妥協政策，避免軍事衝突；十九路軍官兵，都非常怨憤！戰爭結束後，又

奉調福建擔任圍剿蘇區的工作。那時他們在意識上對中央已經有了很大的距離，所以對蘇區並無採取積極行動的決心，可是，因爲既擔任了圍剿的任務，也不能不參加作戰，不過，在紅軍反第四次圍剿的戰役中，第一次被紅三軍團的紅七軍給予他們一個重創；接着第二次又由我所領導的東路紅軍給予他們一個打擊，他們鑒於這兩次敗仗，認識了紅軍的戰鬥力，於是改進攻爲防守，只有深溝高壘，監視着蘇區紅軍的活動。後來由於李濟琛、陳銘樞的積極煽動，他們便醞釀着反抗國民政府的運動。

他們早已看到了中共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呼籲聯合抗日的宣言，和組織抗日聯合戰綫這一套動人的主張。他們自己認爲是抗日的部隊，人人以抗日英雄自豪，在抗日的口號下，當然可與紅軍合作。乃派徐名鴻爲代表，携了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四人聯名給朱毛的信，由福州經連城至長汀，先與紅十二軍接洽。然後由紅十二軍引導至瑞金，與中央接洽。信的大意是：「國民黨中央當局，不惜以辱國條件與日本妥協，而集中全力進攻蘇區，提出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不僅要消滅紅軍，而且要打垮一切抗日力量。因此，抗日革命力量必須要團結在一起。現在準備組織福建人民政府，領導福建人民，實行抗日主張；並願意和紅軍徹底合作，併肩作戰。並希望蘇維埃中央政府，派全權代表到福州，商討具體的合作辦法。」

那時國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已於十月開始，中共領導階層人物正在徬徨之中，突接到這個天上飛來的佳音，朱德、毛澤東等，及所有同志均歡喜若狂，一面欵待來使，一面立即召開會議，討論應付辦法。當時在會議中發生了兩個不同的意見：一個是左傾路綫的教條主義者的國際派，對福建人民政府缺乏信心，主張派一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州和李濟琛等先進行試探式的會商；另一個是以毛澤東爲首的老紅軍幹部派，主張立即派大員到福州舉行正式談判，並希望能夠拉緊福建人民政府，使它能跟着中共的政策走，以粉碎國軍的五次圍剿。最後是決定派潘漢年、張雲逸爲代表，隨同來使赴福州，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簽訂了抗日作戰協定，其內容如左：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雙方面爲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反對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之陰謀，並實現蘇維埃政府及紅軍每次宣言，準備進行反日的軍事同盟，因此，訂立初步協定條件如下：

一、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綫（如附件），在該綫不得駐紮主力軍隊。同時十九路軍必須運用各種方式，排除或消滅存在福建與蘇區接壤地區間妨礙貫徹該協定之一切障礙勢力。

二、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並採取互助合作原則。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各民族抗日反帝團體及革命民衆一切武裝組織，並允許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罷工之自由）。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監獄中的政治犯……。（錄自救國時報，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國人民政府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在福州宣佈成立。以李濟琛任中國人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以陳銘樞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蔣光鼐任經濟委員會主席。黃琪翔任參謀團團長。蔡廷鍇任十九路軍總司令。並將福建省所轄地區劃分四個省，派出各省政府主席，並派全權代表一人駐瑞金，與蘇維埃中央政府聯絡。中共當時雖然採取了愼重的合作政策，但如何去鞏固人民政府的陣營，倒是十分注意的；他們特請福建人民政府整肅十九路軍內部的不穩份子，以鞏固內部組織。同時，急電蘇聯迅速運大量陸軍裝備及飛機來厦門補充紅軍。蘇聯對於援助中共奪取中國政權，是樂意的，特別是在日本正企圖併吞中國的時候，過去因爲沒有一個海口，所以無法運送。現在既打通了福建，當然非常方便。於是，立刻答充，準備先運步槍三萬枝，輕重機槍四千挺，各種大炮二百門，飛機十架，及各種彈藥通訊器材等，此種器材，已陸續集中海參威，裝船候運。另由上海先運送中國大洋劵一百萬元爲紅軍軍費（大部爲中國銀行及實業銀行所發行之一百元劵）。這一百萬元的經援，以後便成

爲紅軍突圍內竄的軍費。

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因爲內部意見複雜，矛盾叢生。中共對福建人民政府，始終是存着利用和觀望的態度，並沒有眞誠合作的積極措施。當國民政府積極調動在贛、閩兩省勦共的第九師李延年部、十八軍羅卓英部、六十四軍劉和鼎部，以蔣鼎文爲總指揮，準備對閩用軍事解決的時候，人民政府曾迭電中共請派遣紅軍入閩配合作戰，以阻遏國軍的攻勢；這個正是紅軍配合十九路軍先行消滅這一部國軍的大好機會，但是中共的大軍，卻遲遲不發，再三拖延時間。卒爲國軍主力由浦城進攻建甌，繼以中央突破，佔領延平，十九路軍便告瓦解，福建人民政府亦即於一九三四年一月杪整個崩潰了。中共援閩的一、三兩軍團只好中途折回，而蘇聯集中海參威準備援助中共的軍械和飛機，也無法運送，徒成了中共的黃粱一夢！

〔作者按：本編所紀中共兩派對福建人民政府的意見，與我前著「我與紅軍」所載不同。是因當時記憶錯誤所致，特在此更正。〕

中共的高級領導同志，與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簽訂聯合抗日協定時期，儘管意見不同，主張有異，但自十九路軍失敗後，中央蘇區又受到國軍五次圍剿的更大壓力，纔認識過去錯誤，失去了一個政治攻勢的良好機會。但事成過去，後悔是無濟於事的，他們只有繼續

的努力去開展政治攻勢的策畧。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告全國民衆書，提出了反帝統一戰綫的綱領：

一、堅決反對……投降出賣政策，拋棄對國聯和美國的任何幻想，只有工人農民和一切勞動者的團結與統一，才是中國民族對帝國主義的抵抗力量及其勝利的保證。

二、全國民衆必須起來爲保衛中國領土與獨立而作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

三、號召民衆，參加抗日戰爭與游擊戰爭，積極援助羣衆，抵制日貨的行動與宣傳募捐援助義勇軍。

四、用軍器庫及入口武器來武裝民衆，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財產和一切賣國賊漢奸的財產，作爲抗日費用。

五、完全脫離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和賣國賊的影響，取消一切對債務和借欵利息的支付，設施累進稅以應用度。

六、中國必須完全對日絕交，動員整個海陸空軍對日作戰，立即停止進攻蘇區及軍閥戰爭。

七、反對……出賣東北、華北和中國的「塘沽協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

民衆們！這就是我們的鬥爭綱領。每個勞動者，一切眞正反對帝國主義分子應擁護這個

綱領。

中共這個文告發表後，得到了宋慶齡等幾千民族愛國人士的反應，他們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廿日公佈了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他們這個綱領包含了下列條欵：

一、全體武裝總動員——一切海陸空軍立刻開赴前綫對日作戰，立刻停止屠殺中國同胞的戰爭。

二、全體人民總動員——各界同胞動員起來，去參加抗日救國的神聖戰爭的前綫和後方工作。

三、全體人民總武裝。

四、採下列辦法籌措抗日戰費——

（甲）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一切財產，同時停付日本一切債欵。

（乙）沒收一切賣國賊的財產。

（丙）國庫一切收入，都用作對日作戰的經費。

（丁）實行徵收財產累進所得稅。

（戊）在國內人民和國外華僑，以及一切同情中國人民的人士當中，進行廣大的募捐運動。

五、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衞委員會，同時設立地方分會和下層組織。

六、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日本的勞動民衆、高麗人、台灣人等等）作友軍；同時，與一切對中國人民武裝抗日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國家和民族，建立友誼關係。

中共這次政治攻勢雖然未能得到實際上的援助，但在政治上的影響是收到了相當的效果的，以後一九三五年的西安事變，以及由此造成的國軍停止進攻蘇區延安，容納朱毛紅軍參加抗日等措施，都是中共政治攻勢繼續發展的結果。

第八編

中央蘇區的末期

第一章　國軍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紅軍的編制，一九二八年湘南成立紅四軍時，按軍、師、團、營、連、排、班的三四制。十二人爲一班，三班爲一排，三排爲一連。三個步槍連、一個重機連爲一營，三個步兵營及一個步炮連爲一團。團以上是師，但因兵力不足，不編師，由軍直接指揮團，這是權宜之計，無可厚非的。但朱毛到了閩贛邊區以後，卻將營級取消，改爲軍、師、團、連、排、班的制度，其用意不過是虛張聲勢，以壯聲威，但在作戰時的兵力使用上，是極其不便的。至一九三三年反四次圍剿結束後，因彈械獲得不少，紅軍又積極動員蘇區壯丁參軍，以擴大紅軍組織，同時因紅軍積極研究蘇聯陸軍的戰畧戰術，爲了便於運用，紅軍的編制決定從新擬訂。當時我就奉中央軍事委員會之命負責這一擬訂紅軍新編制的工作，並按所擬新編制組織了一個模範團，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編組成立，五月間即參加東路軍福建之清流及新泉、朱坑各次戰鬥，成績尚好。紅軍總司令部便於七月間開始整編紅軍，整編的辦法如下：

（一）取消軍、以師爲紅軍建制最大單位。

（二）按照師、團、營、連、排、班之系統編成之。

（三）先將軍改爲師，師改爲團，團改爲營，連排照舊。

（四）按照現在武器數量，先建全排、連、營之編制，然後再充實團和師。

（五）排、連、營之編制，照模範團之編制編成，這一整編工作之進行，在九月份大體已完成，其番號及兵力如下：

（一）中央軍事委員會直屬兵團：

1、中央警衛師（由原有警衛團及國家政治保衛局之警衛隊合編而成，兵力約八千人）。

（二）紅軍總司令部直屬隊：

1、特務團　（約一千五百人）

2、野戰炮兵團　（內轄山炮營、迫擊炮營、特務營，共約一千五百人。）

3、通訊大隊　（包括無綫電總台、電話總機等）

（三）第一軍團　總指揮：林彪

1、直屬特務團　（一千五百人）

2、第一師　（第三軍改編）

3、第二師　（第四軍改編）

（四）第三軍團　總指揮：彭德懷

1、直屬特務團　（原總指揮部警衛連及七軍特務團改編）

2、第四師　（第五軍改編）

3、第五師　（第七軍改編）

4、第六師　（獨立師改編）

（五）第五軍團　總指揮：董振堂

1、特務團　（原有特務團擴編，有一千五百人。）

2、第十三師　（十三軍改編）

3、第十四師　（獨立團改編）

4、第十五師　（十五軍改編）

（六）第九軍團　總指揮：羅炳輝（稍後成立）

1、特務團　（長汀獨立團改編）

2、第三師　（十二軍改編）

3、第廿五師　（第九軍改編）

以上一、三、五、九、四個軍團是紅軍主力，總共兵力約有十萬人，此外尚有已經整編

之軍區部隊：

（一）粵贛軍區　何長工

第廿二師　五千人

（二）江西軍區　陳毅

第廿一師　三千人

第廿三師　三千人

（三）贛東北軍區　方志敏

第十九師　（第十軍改編，五千人。）

（四）閩贛邊軍區　邵式平

第二十四師　（第廿二軍政編，六千人。）

（五）湘贛軍區　張啓龍

第十六師　高詠生（第八軍改編，五千人。）

第十七師　蕭克（獨九師改編，於一九三二年由中央蘇區調湘贛區，六千人。）

第十八師　閻圖閣（獨立師改編，有四千人。）

以上五個軍區的紅軍已正式整編完成，且能配合紅軍作戰。

尚有福建軍區，當時仍在整編中，它早已成立獨立師，已編入第九軍團。另外尚有贛東地區之三十四師在整編中。

湘、鄂、贛區原有十六軍由孔荷寵指揮，孔犯錯誤後調中央蘇區紅大高級班受訓，結業後逃出蘇區投國民黨，該區黨政軍領導另派員負責，情況不詳。

國軍對蘇區的圍剿，經過四次挫折後，國民黨當局已認識到：不能再以嘯聚山林的土匪，烏合之衆，來比擬紅軍了；同時也認識了過去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略是失敗了。爲了組織第五次的圍剿，蔣介石將軍在廬山舉行了一連串的剿匪軍事檢討會議、决策會議，以及舉辦軍事幹部訓練班，以研究剿匪的山林戰、碉堡戰等戰術和技術。費了半年以上的時間，才完成準備工作。

當時中共對國民黨廬山會議及訓練班的情形，因爲國軍內有中共潛伏的黨員參加訓練班，及事前佈置了廬山諜報工作；國民黨的一切活動，中共情報工作者，很快的便送到蘇區，故蘇區對廬山會議的情形，亦瞭如指掌。

關於剿匪檢討會議，對紅軍的優點和缺點，大畧有以下各點：

（一）紅軍的優點：

1、紅軍作戰的突擊力極强，而且行動迅速，動作靈活。其機動作戰的性能，常

出國軍意表。

2、紅軍的情報工作極好，國軍的一切行動，均能事前偵知；因此，應戰應退，均取得主動。

3、在蘇區作戰，紅軍地形熟悉，且有民衆掩護和幫助，其行動秘密飄忽，國軍無法捉摸其作戰主力。

4、紅軍通訊敏捷而靈活，故於各地區作戰均能互相策應和互相配合，使國軍作戰處處受到牽制。

5、紅軍在其佔領區內，對於人民生殺自由，不受法律束縛，致蘇區人民不敢反抗紅軍，而蘇區的壯丁，隨時可補充紅軍，甚至老幼男女均納入其各種民衆組織之內，以支援紅軍作戰，故紅軍作戰傷亡後，很快就可補充，而恢復其戰鬥力。

（二）紅軍的缺點：

1、紅軍的裝備太差，戰鬥的火力弱，不能攻堅。

2、紅軍的士兵及初級軍官，多未經過較好的訓練，戰鬥技術極差，他們作戰全憑一鼓勇氣。故他們講求速戰速決；戰鬥時間不能太持久。

3、蘇區除了人力外，別無戰爭資源，物力和財力均極度貧乏；他們的械彈補充，專靠向國軍搶掠而來。因此，戰爭的時間亦不能持久。

4、蘇區人民生活極端困苦，他們幫助紅軍，不是感其德，而是畏其威；只要國軍能夠保護人民，人民必反對共黨及紅軍。

國民黨根據上述紅軍作戰的優缺點，策定圍剿蘇區的作戰方畧，大致如下：

（一）軍事方面：

1、戰畧：採外綫作戰，對以瑞金爲中心的蘇區大包圍，構築碉堡包圍圈；逐步推進，逐步緊縮碉堡的包圍綫；以持久戰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及物質，縮小蘇區，將紅軍壓集於蘇區中心地區之內，而徹底將之殲滅。

2、戰術：步步爲營，在碉堡火力掩護之下方逐步踏進，每次躍進應在十里距離之內，使紅軍無法獲得乘國軍運動中而突擊之機會。也就是避免與紅軍作運動戰，而迫使他們和國軍作陣地戰、攻堅戰。

（二）政治方面：

1、組織政治工作隊，在國軍控制地區內，恢復一切行政組織，辦理保甲，切實保護人民，嚴禁屠殺人民之行爲。

2、對蘇區政府，共黨及紅軍的投誠人員，妥為保護和優待。

（三）經濟方面：

實行經濟封鎖：包圍蘇區的碉堡綫，嚴禁人民及物資流通，使蘇區經濟物資陷於絕境，以困斃之。

上述國軍第五次圍剿蘇區紅軍的作戰方畧，是針對了紅軍的弱點，和避開了紅軍的優點而訂定的。從一般的軍事觀點來說是正確的，其勝利只是要能在持久的時間上，緩緩的不變來取得。

一九三三年九月間，中央蘇區紅軍方面，已完全瞭解了國軍即將開始向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的新作戰方畧。當時紅軍亦已擴充整編完竣。總共兵力達十四萬人，除了中央警衛師擔任中央機關之警衛及保密工作，及各軍區指揮之各師各有地方任務，不能集中作戰外，其餘有十個師（十萬人）可集中作戰。此外蘇區各縣仍在積極編組模範師、獨立師、獨立團等，以負責地方警衛任務策應紅軍作戰。

中共中央當局以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為主體，在俄顧問李特的領導下，眞實的負起決策責任。他們召集了一次會議，研究反第五次圍剿的作戰方畧。那時我正當被開除黨籍在紅軍大學學習期間，高級人員，每星期能來和我叙晤一次的只有葉劍英一人，我們每次晤面

多是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由他來訪我，我們通常是到鄉村的小菜館食一頓晚飯。那次會議，他是出席的一個，他於會後告訴我：

會議開始時，秦邦憲的政治報告說明：

（一）國民黨統治階級因對日本侵畧的屈服，受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其黨內派系又引起更大的分裂。各省軍人對中央的反抗，亦日形嚴重，他們實際上沒有多大的力量來對付我們蘇區。

（二）中國革命發展的形勢，亦因全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以及全國工人、農民、學生、民族資產階級，抗日情緒的高漲，全國抗日運動發展的趨勢均有利於中國革命的發展。

（三）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就是國民黨政權和蘇維埃政權的決戰。

（四）反第五次圍剿戰爭的勝利，是實現一省或數省革命首先勝利，以至全國勝利的重要關鍵。

根據上述形勢，我們中央蘇區紅軍必須動員一切力量，不惜一切犧牲去爭取這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我們紅軍的實力，現在可集中作戰的有十萬人以上；此外尚有地方部隊，我們在任何地區都有地方武裝配合作戰。因此，我們對反五次圍剿的作戰方畧：是以堡壘對付國民黨軍隊的堡壘，以堅强的防禦戰，對付敵人的進攻。我們要反對游擊性的運動戰，不能讓

寸土給人。在戰術上，我們要用短促突擊，殲滅脫離碉堡向我進攻的敵人有生力量，以促使戰爭優劣形勢的轉變，而爭取戰爭的最後勝利。

我當時問他（葉劍英），會議時有沒有人反對？你是否同意這種戰畧和戰術？他告訴我：當時毛主席曾提出反對的意見，他堅决主張集中優勢的兵力，以運動戰消滅進攻的敵人，他說明：敵人雖然是以碉堡政策，步步爲營的向蘇區包圍進攻，但運動的機會仍然是有的，只要我們有忍耐性去捕捉機會，並要積極的想辦法去爭取機會，製造機會。可是當時遭到了秦邦憲等及李特的反對。葉劍英說他自己亦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以我們紅軍現時的裝備要和國軍進行陣地戰，硬碰是沒有把握的。他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當時答覆他是：我們紅軍現在無論質量和數量，均處在絕對劣勢的地位，若照中央領導同志所提出的戰畧原則，和國軍進行陣地戰，正是國軍求之不得的機會。我們應該珍惜艱苦創造的蘇區和紅軍，請你和朱老總及項英同志研究，緩緩的說服中央領導同志。他對我說：我亦有意在將來遇到挫折時乘機提出修正這一個方案，不過現時是無法轉變李特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意向和决心的。他說話時的態度，流露出憂疑的神情！

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於反國軍第四次圍剿戰役結束後，即以備戰的姿態，集結於中央蘇區之北面，加緊擴充、整訓，其駐地如下：

（一）第一軍團：南豐及黎川以南地區。
（二）第三軍團：福建之泰寧、建寧地區。
（三）第五軍團：寧都、廣昌地區。
（四）第九軍團：福建之長汀、清流、寧化地區。
（清流、寧化之十九路軍於八月間已撤退，即由羅炳輝之十二軍進駐。）
各軍區負守備任務，其區分如下：
（一）東面：由福建軍區司令部負責，以汀州爲中心，指揮該地區之獨立第七師及獨立團對福建方面敵軍警戒。
（二）南面：由粵贛軍區司令部負責，以筠門嶺爲中心，指揮廿二師及各獨立團對南面由福建之武平起，經廣東之平遠、江西之潯鄔、安遠、信豐、南康、暨贛州之綫警戒。
（三）西面：由江西軍區司令部負責，以龍岡爲中心，指揮廿一師、廿三師對萬安、泰安、吉安、永豐、樂安、暨宜黃之綫警戒。
由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九月，是紅軍主力整訓時期，七個月的時間，紅軍主力沒有作戰，整訓擴充計劃亦已完成，指戰員們都從上級指揮員及政治委員的講話中，知道國民黨廬山會議，準備以碉堡圍剿蘇區的作戰方畧；他們（紅軍）要從戰畧、戰術、技術及政治覺悟上去

充份準備戰勝敵人，保衛蘇區。這種精神、思想、技術的準備，已經有了幾個月的時間。

暴風雨終於來了；十月初旬，蘇區北面，撫州、金谿、資溪、南城的國民黨軍隊突然佔領了硝石及黎川縣城，很迅速的構築碉堡工事，包圍蘇區北面。紅軍主力為了消滅運動中的國軍，一、三、兩軍團亦很迅速的運動到黎川東北地區，以雷霆萬鈞的壓倒之勢，在洵口地區，突擊正在南進中的國軍一個師，戰鬥不到三小時，便已將國軍全師解決。這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紅軍反第五次圍剿的第一戰，得到了完全勝利。

洵口戰役勝利之後，中共中央的領導者，對於黎川縣城的失去，大感震驚！認為是被國民黨打開了北面蘇區的門戶，必須要反攻收回；他們命令紅五軍團由南豐進攻硝石（黎川南城間），截斷黎川國軍退路，然後消滅黎川之國軍。

十月十四日，紅五軍團向硝石四個師的國軍碉堡强攻，結果傷亡慘重而退至資溪墟。廿二日又奉命進攻資溪橋，戰鬥了兩天，至廿四日向黎川東南地區撤退。

由此以後，紅軍輾轉向北面黎川附近之敵軍碉堡進攻，如：羅家山、雲蓋山、大雄關、團村、德勝關、東山、黃土關諸役，紅軍無不因缺乏攻堅武器，裝備拙劣，而遭失敗。

中共中央又命令紅軍分兵駐守，以碉堡對碉堡與國軍進行陣地戰，阻止國軍南進；以集中對集中與國軍進行大決戰。他們這種戰略方針，不特不能收阻敵之效，而且將紅軍的機動

性束縛住，將紅軍兵力分散，而無法把握運動戰的時機，進行有利的主動的進攻戰鬥。特別是在一九三三年末至一九三四年初，福建人民政府與紅軍簽訂協定反蔣抗日時期，當北面國軍轉移兵力向福建人民政府進攻之時機，紅軍不特沒有集中兵力配合十九路軍夾攻國軍，反將主力一部西向，進攻永豐以南地區之國軍碉堡綫。而失去了一個最好的殲滅國軍，粉碎國軍五次圍剿的機會。卒因紅軍不能及時增援十九路軍作戰，致使十九路軍遭到徹底的失敗。

十九路軍失敗之後，國軍就從東北兩面向蘇區進攻，紅軍西自樂安南之招携，經南豐南之三溪墟、廣昌、康都至福建建寧之綫與國軍相持四個月之久。紅軍的傷亡極大，戰爭形勢已日趨惡劣。第五次圍剿會戰，已露出了失敗的端倪。中共的領導者已有徬徨之感了。

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四月中旬結業後，朱德即派人來請我到總司令部，他告訴我：「總部參謀長劉伯承同志，因患嚴重的貧血症，已赴汀州醫院休養，現在戰爭緊急時期，不能一日無人負責，昨晚黨中央會議，咸認爲只有你能勝任此職，决定派你代理參謀長，請你即搬來總部開始辦公。」等語。

我以受過黨的嚴重處分之後，又要負此重大責任，心裏有點着急，我因與朱德素來無所不談，我立即對他說：我受過嚴重處分，現在即負此重責，恐不爲領導同志所信任，將來我的意見若不受尊重，則有負我的職守，何不調葉劍英同志任參謀長，以駕輕就熟。朱德對

我說：這個問題是昨晚中央領導同志一致的意見，而且秦邦憲同志還說，過去對你的處分失當，周恩來同志亦贊成調你任參謀長之議，他還說：作戰計劃和作戰指導，你比劍英同志强。你來絕不會有困難的。如此，我便於當晚遷入總司令部，開始負擔這個繁重的工作。

我的辦公廳是在地下與朱德爲毗隣，樓上是周恩來和李特的辦公廳，我的辦公廳內除了我自己外，還有年輕的參謀四人，他們是協助我處理各部送來的文件之收發、登記、呈閱及人事登記等工作。

總司令部內分爲五部：

（一）作戰部部長張雲逸，有參謀五人，分辦業務。

（二）情報部部長王錚，除有參謀六人分辦蒐集、整理、研究情報等工作外，還有無綫電情報組。

（三）軍事教育部部長唐濬，有參謀四人分辦業務。

（四）供應部部長葉季壯，該部兼辦黨、政、軍的供應業務，它名義上是屬於總司令部，實際上是受黨中央指揮。

（五）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兼任），負責紅軍及地方政治工作，組織龐大，部內的職員有一百二十餘人；尚有新聞報紙、政治工作隊、印刷機

關等附屬組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很少參加總司令部的情報、作戰等研究工作。總司令部的一切行動決定及命令，由參謀長分送一份給他便是，他也很少和參謀長聯絡，這是與紅軍政治工作體制不符合的，但周恩來雖是政治委員，他對王稼祥非常客氣，不特不去指導政治部工作，相反的有時王稼祥還要指導政治委員的工作。朱德和我當然樂得不理。

關於紅軍總司令部公文的處理，是很簡便的，各部的工作由各部主辦，擬定辦法或文稿後，送來參謀長室，經參謀長研究，如有修改時立即修改，普通文件由參謀長自行處理，但如作戰、情報、人事等重要文件則送總司令作最後核定，或立即由總司令通知政委和參謀長共同研究，決定後，交給參謀長辦理，參謀長在研究作戰、情報問題時，通常須提出具體意見俾總司令有所抉擇。

我接代總參謀長時，正值廣昌縣城防禦戰及福建、建寧陣地戰的緊張階段，我和朱總司令、周恩來、李特，每天早上九時，晚上十時必同在一起研究情況，若遇有特別事故即由我隨時提出和他們研究。整天由早上六時至午夜十二時均在辦公廳工作。

廣昌失守後（四月末），五月中旬，以一、三、五軍團組織了一次廣昌以南之高虎腦戰鬥，及萬年亭戰役，集中兵力，採取積極的陣地防禦戰，希圖挽回北綫戰場的頹勢，結果雖殺傷國軍極多（國軍損失兩師以上），但紅軍的傷亡亦重，元氣大傷。

五月份福建方面之建寧江安廟戰鬥、及建寧縣城戰鬥、永安戰鬥、連城戰鬥均失利，六月，紅軍又從新調整陣綫。福建方面：守寧化、清流至長汀以東之綫。江西方面：守寧都、石城之綫，又暫時成了膠着狀態。

第二章　突圍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旬（大約是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一、三、五、九軍團的高級幹部均由前綫召回來參加會議，地點是總司令部會議廳。

到會的有：李特、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項英、王稼祥、鄧發、葉劍英、瞿秋白、彭德懷、林彪、董振堂、羅炳輝、陳毅、龔楚……等，在當日下午二時開會。

會議由秦邦憲主持，他宣佈開會理由，畧云：反五次圍勦的戰爭形勢已日形緊張，我軍現處在內綫作戰的不利形勢下，必須要避免敵軍的合擊，今後應如何進行作戰，請各位軍事同志多提意見，針對敵軍狀況，定出一個適合戰爭環境的作戰方畧，以爭取戰爭的勝利……等語。

周恩來接着宣佈：請各軍團總指揮扼要的報告八個月來的作戰經驗及應採取的對策。

林彪報告：反五次圍勦開始，洵口戰役得到一次大勝利，這次勝利是乘敵人向無碉堡憑藉，我軍即以堅决迅速的機動消滅敵人，我軍若能依靠着這次勝利的精神，忍耐的捕捉時

機，乘敵軍推進即向敵人突擊，是可以取得勝利的，但我們這幾個月來從事陣地戰束縛了自己的行動，失去了不少運動戰的機會，這是今後作戰指導應該特別注意的。

彭德懷發言：我們紅軍不能及時援助十九路軍，配合消滅國軍，是一個最大的損失，否則五次圍剿早就粉碎了。

董振堂發言：陣地戰、碉堡戰在我們五軍團來說，是慣熟的正常的作戰方法，但我們的裝備實在遠不及國軍，沒有火力去摧毀敵軍的工事和碉堡，只靠血肉之軀去硬碰，犧牲實在太大，今後仍應改變戰畧方針，避免陣地戰，力求爭取運動戰，方能改變戰爭的形勢。

羅炳輝發言：軍事是最危險的東西，必須愼重從事，否則隨時有覆滅的危險，過去的作戰指導，或有失當的地方，但已成過去，似不必追究，未來的决策是要請中央領導同志多多考慮，我們是軍人，只知服從，只知切實去執行我們的戰鬥任務，其他的我們管不來。

至此，會議的氣氛非常嚴肅，當各軍團總指揮報告的時候，李特及秦邦憲等的臉色凝重，而且表露出很不高興。待羅炳輝報告完後，李特即向秦邦憲講了有十分鐘左右的話，秦邦憲隨即起來答話：大意是：根據各位的報告；都認爲過去的戰畧方針有决定性的錯誤，但李特同志認爲：這不是作戰方畧的錯誤，而是各位不善於運用陣地戰，攻防戰及短促突擊戰術的錯誤而致，但今次會議是研究以後如何轉變戰爭形勢的問題，各位發言沒有提出具體的

意見，今晚八時仍繼續開會，請各位精密的研究，準備到時提出意見，現在已六時，即休息晚餐。

散會後，李特、秦邦憲邀我到樓上共進晚餐，周恩來、朱德、張聞天亦同在一起。大家坐下不久，秦邦憲即提出三個問題問我：

（一）應採什麽戰畧和戰術？

（二）這次會議尚有沒有辦法轉變形勢？

（三）倘若形勢再趨向不利有何對策？

我答覆他是：

（一）目前我們處在內綫作戰的環境，內綫作戰利在能集中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而各個擊破之，以我們十萬的兵力集中對一路的國軍，勝利的公算是極大的。戰術上，是要在敵軍運動之時，以堅强迅速的突擊而殲滅之爲上策。

（二）內綫作戰的戰區形勢，利害的分野是在敵軍尚未超越利害變換綫之時，則是尚未形成合擊的形勢，我們還有戰勝機會。現在這個戰區，是以瑞金爲中心，按敵軍五十萬兵力計算，必須到達東面的長汀，南面的會昌，西面的雩都，北面的博生（寧都）石城才是利害的變換綫，才形成了合擊的形勢，也就是說：敵軍沒有進到上述位置相連之綫時，我軍仍有

集中兵力選擇敵軍向蘇區分進兵團各個擊破的時機。

（三）倘形勢再趨不利，我們惟有於尚能突圍之時轉移到敵軍包圍圈之外翼作戰，仍採取集中兵力以速戰速决的運動戰各個消滅敵人。

我答覆完後，秦邦憲即以俄語翻譯給李特，李特聽得連連點頭，當時表現得很興奮，他對大家說：龔同志的意見極之正確，我的意見亦是如此。今晚會議就根據這個意見提出來討論，但為了要阻滯國軍向蘇區推進，對北面國軍仍須要構成防禦綫，以適當的兵力固守之，主力應隨時準備集中出擊。

周恩來提出：利害變換綫應在長汀、會昌、興國、勝利、廣昌（那時廣昌已失）之綫。

朱德提出：加緊動員工農參軍以補充紅軍，對突圍之準備亦須進行……

李特對這些提議，亦很同意。

我們這次談話，被其他的同志知道了，他們稱之為：「大會議中的小會議」。

晚上八時，繼續開會，由秦邦憲提出以下兩個問題：

（一）戰畧和戰術問題：

採取積極防禦，紅軍主力以一部（不超過三分之一）守備北面防禦陣地，阻止敵軍向蘇區前進，主力集結控置於北綫陣地附近，準備捕捉時機，在運動戰中以速戰速决之短促突擊

戰術，各個消滅敵人。

（二）充實紅軍問題：

加强動員工農參軍，限於一個月內充實紅軍主力，繼續每一個縣編組一個模範師。

當討論第一個戰畧問題時，毛澤東曾熱烈發言，他說：這個戰畧提案比較正確，但仍嫌不夠徹底，他認為根本可以不設防，要設防亦僅能派地方部隊守備；紅軍主力應集結於北面之閩贛邊區之寧化、石城間，待敵深入；然後選擇有利目標及有利戰場，以三倍至五倍以上之兵力向敵突擊，機動作戰，每次戰鬥都求速戰速决，一舉而殲滅敵人。我們但求打一次至兩次勝仗後，敵運進攻的形勢即要改變，而予我們更多的勝利機會……。

但討論的結果，李特等堅持要以紅軍主力之一部擔任防守北面防禦陣綫，而將提案通過。第二個擴大紅軍問題亦照提案通過了。

這時已是午夜，主席秦邦憲宣佈：會議準備連續三天，白天不開會，各同志個別自由交換意見，每晚八時開會……旋即散會。

第二天晚上八時繼續開會，討論第三個準備轉移外綫作戰問題：

（一）轉移作戰的目的和方向。

（二）轉移作戰之時機。

周恩來首先提出具體意見，畧云：第五次反圍剿的形勢有繼續惡化的可能，我們希望在今次會議所決定的新戰畧，能將形勢扭轉過來，但對於應付形勢惡化的準備是不能疏忽的，認爲軍事以勝利爲主，我們從事內綫作戰，若不能達到戰勝的目的，就要轉移爲外綫作戰，目的還是消滅敵人，保衞蘇區。因爲我們轉移到國軍封鎖綫之後，即以運動戰向敵人的外翼進攻，或向敵人的心臟地區進攻，敵人即必放棄進攻蘇區，轉移兵力對付我們紅軍主力。這樣敵人對中央蘇區圍攻的封鎖綫，不攻自破，蘇區也就可以保全。但從那一方面轉移作戰？也即是說從那一方向突圍出去，有利於我們轉移及轉移後作戰，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根據現時中央蘇區形勢，是有兩個方案可以選擇：

（一）是向東北突圍，沿閩贛邊轉移到閩浙贛邊，以閩北蘇區及贛東北蘇區爲根據地，轉向圍攻蘇區國軍之外翼進攻，如金谿、撫州均可。或者向浙江之衢州、皖南之廣德等之蘇、浙、皖，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挺進亦可。

（二）是向西南之贛粵邊區突圍，越過湘粵邊區後，沿湘桂邊區北上進入湘鄂西區與賀龍第二軍團會合後，向湖南之衡陽、長沙方面進攻。

這兩個方案，他認爲以第二方案爲最有利，因活動範圍廣大，不受長江及沿海地形之限制。關於時機問題，則認爲必須在敵軍未超越北面陣綫即石城、博生（寧都）、勝利（龍

岡）之綫爲宜。

周恩來報告後，毛澤東即發言：

（一）他同意於內綫作戰陷於不利時紅軍主力轉移外綫作戰。

（二）突圍之方向，他主張向東北沿閩贛邊區進出閩浙贛區較爲安全，因爲這一地區有深山密林爲掩護，敵軍亦較薄弱，若利用閩北山區轉移，可不用作戰而進出國軍封鎖綫之外，北面外翼且有贛東北及閩北蘇區之掩護，至於活動範圍，有蘇、浙、皖、贛各省，儘足轉移作戰。

接着林彪、彭德懷相繼發言，反對周議，贊同毛議。爭持相當熱烈，但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

當時我覺得毛澤東的見解很對，屢欲起而發言，但想到我受過嚴重處分，恢復黨籍不久，也就不願參加這次辯論了。

第二天下午四時，秦邦憲、李特到總司令部，約我到樓上（李特、周恩來辦公廳）研究突圍準備工作，朱德、周恩來、項英均在座。秦邦憲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兩隊北上，爲紅軍主力突圍試探，經過研究的結果擬定：

（一）派方志敏率十九師爲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總司令，向衢州方面挺進（衢州有中共

工作基礎），創造皖、浙、贛邊根據地。

（二）將湘贛邊區六十七、十八兩個師合編爲第六軍團，以蕭克爲軍團長，任弼時爲政治委員，王震爲政治部主任（原是蕭克十七師政委），稱爲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向桂東、汝城間突圍，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與賀龍會合，準備策應紅軍主力突圍後的行動。

（三）將粵贛軍區改爲贛南軍區，並由會昌移至雩都縣城，以龔楚任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劉伯堅爲政治部主任，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如西南之敵情，碉堡建築情形，桃江水之河床探測，湘桂邊區偵探之派遣……等均須縝密進行。

晚上八時又繼續第三晚的會議，開始時由秦邦憲將小會議擬定三個問題提出討論，毛澤東仍出席會議，但沒有發言，其他同志發言情形亦不熱烈，只是稍爲說明後便通過了，會議即宣佈結束。

散會時每個人的心情都感到沉重和悲哀！各自沉默的散去，惟有項英拉着我的手到我的辦公廳坐下，兩眼望着我說：艱苦的工作又交到你的手上了，你要小心啊！我倒不以爲然，我對他說：這個贛南軍區的工作不難做，因爲粵桂合作反蔣形勢已將成熟，我判斷粵軍必不會再進攻南面蘇區，其他的任務我是很易完成的，只是要派偵探時的一筆現金開支請你注意不要爲難我就得了。他聽我說得輕鬆，他亦笑起來，對我說：我以爲很艱難呢？關於偵探人

員所需之現金，絕無問題，將來你到職後，做個計劃來軍委會就是了。

時已深夜一時，他才帶着兩個特務員回去。他走後，我覺得他是對我最關懷的一個同志，我心裏深深的感激他！

我自四月間接代紅軍總部參謀長，歷時兩個多月，是處在緊張的戰爭形勢中，但因爲總司令部的五個主要部門，作戰、軍事教育、供應的部長是紅七軍的老同志，各項工作進行，我不用十分費神；政治部是獨立的，與我只是發生橫的聯絡關係；惟有情報部，業務既重要，人事又不熟悉，我的工作重點，就注意到該部的工作上，部長王錚，是一個有科學頭腦，而且精通無綫電科學技術的人，且作事負責，我很快的便摸清了該部的工作，故在這兩個多月來，我的工作表現是爲中央各領導同志所讚許的。對於各軍團首長的關係，因爲我日夜注意各軍的動態，凡可通電話時，我經常以電話和他們聯絡；不可以通電話的，我便給他們無綫電聯絡，所以很密切，在這期間，我們相處得很好，與我有心病的彭德懷，對我的態度亦已完全轉變，他每次到總部，都來看我，前方情況，亦經常親自直接用電話向我詳述。因此，這一段時間雖然是很辛苦，但精神上是愉快的。

七月初旬，總司令部發表了新的命令：

（一）粵贛軍區改爲贛南軍區，軍區司令部移駐鄚都。

（二）粵贛軍區司令何長工調總司令部另行分配工作。

（三）派龔楚任贛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四）派劉伯堅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五）原屬粵贛軍區之部隊概歸贛南軍區司令部指揮。

（六）紅軍學校校長葉劍英調任紅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紅軍學校校長改由劉伯承接充。

這個命令公佈後，我即偕同劉伯堅到雩都縣城接長贛南軍區司令。

那時軍區司令所指揮的紅軍計有：

第二十二師　師長黃子榮

第二十四師　師長周建屏

會昌獨立師

贛州獨立師

第一、二、三、四、五、六、獨立團。

當時南方前綫除筠門嶺（原粵贛軍區司令部所在地）被粵軍第三軍佔領外，其餘各地無變化。我判斷：廣東廣西正在反對國民黨中央，南面之粵軍必不會進攻蘇區，我的工作重點是，完成紅軍突圍的準備工作：

1、測探贛江上游——桃江水之沿綫水位，找尋徒涉場。

2、派遣四個偵探組：第一組深入廣東之南雄、仁化；第二組，入江西之信豐、大庾；第三組，入南康、贛州；第四組，入湘南之宜章、郴州，在這一帶偵探敵情及碉堡狀況。

軍事之部署調整如下：

1、二十二師進駐雩都縣屬之大墟坳及安遠縣屬之塘村墟，策應龍佈小坌方面作戰。

2、二十四師進駐筠門嶺以北之水口江，策應天心及筠門嶺附近地區作戰。

3、會昌獨立師駐青溪，向滂鄔、安遠游擊。

4、贛州獨立師仍駐大田市、洛口墟，對桃江水西岸之敵警戒，並監視其動態。

5、各獨立團位置和任務如前。

我的工作，很快的全部展開了。我在一個星期之後，即親自出茅店，然後沿桃江水東岸、龍佈、塘村墟、青溪、水口江前綫巡視一次，檢查前綫防禦工事及慰問前綫指戰員，經過會昌、瑞金回雩都。我的工作便告一段落了。

在我這次出巡中，最使我激動的是二十二師指戰員，他們知道我出巡，到達小坌時，即派員和我聯絡，當我到塘村墟時，他們全師集合舉行全師指戰員叙餐大會，來歡迎我；因為

該師是模範團擴編的，我是他們的老指揮員同志，相隔別了一年，人人都想接近我，將我抬起來；他們流露出那種內心的歡喜情形，使我感動得流下淚來！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儘管共產黨用盡方法去消滅人性，用盡方法去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但人性的感情仍舊常在不覺中流露出來。廿二師的指戰員對我如此；我對朱德、項英、葉劍英、張雲逸等的感情又何嘗不是仍舊保存着哩！這種情形，是共產黨的教育失敗嗎？還是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人民？這要留待歷史來證明了。

八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讀五萬份一的軍用地圖，研究湘粵邊境的地形，忽然特務員跑來報告：「毛主席來了！」我連忙放下地圖，毛澤東帶着兩個特務員剛在門外下馬，我便請他到我的辦公室休息，他那時面色發黃，形容憔悴！我問他：「主席不舒服嗎？」他回答道：「是的，近來身體固然不好，精神更壞。你近來好嗎？我有個多月沒有到總司令部去，也有個多月沒見到你了！」

我招呼他洗過臉，抽着烟，他接着說道：「我現在來鄠都督導蘇維埃政府工作。在此將有相當的時間住，我們在一起，一切問題可隨時談談。我住的房子，最好是離你不遠，那就更方便了。」這時鄠都縣的負責同志跑來報告：「請主席到後面園裏休息，那裏是一幢獨立房子，還有半畝園地，一切已安頓好了。」毛澤東便隨着那同志去了，臨行時要我有空暇便

到他的住處談天。

第二天晚上，我和劉伯堅去看毛澤東。他的愛侶賀士珍也來到雩都，手裏抱着一個孩子。幾年不見，她已經從一個天眞活潑的小姑娘，變爲一個沉靜的少婦了！我們談了一小時。毛澤東問起我贛江上游沿岸情況，及紅軍二十二師、二十四師的位置。我一一告訴了他。

我們告別時，毛澤東握着我的手，誠懇微笑地說：「我們是井崗山的老同志，希望你晚上有空時便來談談，我還有許多問題和你商量呢？」因此，我在晚間有空的時候，便到他家中去談談各種問題。毛澤東是很健談的。賀士珍更爲我們弄些可口的食品宵夜。三個人一面談談笑笑，一面喝酒抽香烟，常常談到深夜十二時才返回司令部。

毛澤東住在雩都這段時間，除了雩都縣的地方同志常向他請示工作之外，則沒有其他的領導同志來過，他亦似很安閒，但精神上則常流露出抑鬱和凄凉的神態！

九月間的一個晚上，我們喝了很多酒，談到我一九三三年八月被開除黨籍一年這件事，他憤然說：「這件事完全是周恩來攪的，不過在我們黨內越肯負責的同志則越易遭到處分！我自一九二七年以來至今年（一九三四年），曾受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比如這次十九路軍福建人民政府之失敗，本來是秦邦憲等幾個黨中央領導人，不信任福建人民政

府，認爲是國民黨內部的鬥爭，與我們革命無重大關係；爲圍攻蘇區北面的國軍移向福建十九路軍進攻時，仍認爲是國民黨內部的戰爭，不主張紅軍積極援閩，後來見十九路軍情勢危急，才派一、三兩軍去援閩，但時間太遲了，我們的援軍未到，十九路軍已徹底失敗，致紅軍中途撤回，這個不積極援助十九路軍以致失敗的錯誤，明明是他們幾個中央領導同志應該負責的。但現在第三國際追究責任，卻反說我不肯援閩，給我一次嚴重處分。這種是非顚倒，黑白不分，他們既沒有實際鬥爭經驗，又不肯接受我們老同志的意見，將來還會繼續下去，眞是革命的損失！」他說到這裏喟然長嘆！跟着說：「龔同志！現在不是我們井崗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說至此，他竟凄然淚下！這時他有些輕微的咳嗽，臉部瘦削而枯黃，伴着一盞黯淡的豆油燈，更顯得他的凄凉和沮喪！但他的說話語氣，卻堅定而有力。我當時見他那種充滿悲憤的表情，回想到我自己被開除黨籍時內心的痛苦，很自然的對他發生無限的同情！

十月初旬，紅軍已決定西竄，毛澤東才由鄠都返回瑞金與中央政府人員隨野戰軍突圍。在後來的突圍行程中，沿途遭受國軍的追擊截堵，紅軍損失甚大，許多幹部都表示不滿和動搖。當他們逃到貴州遵義時，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便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便是那有名的「遵義會議」。

善用策略的毛澤東，利用着他與紅軍老幹部長期鬥爭的歷史關係，來檢討這次「突圍」決策的錯誤，將這一錯誤的責任，加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秦邦憲等人頭上，以打擊留俄歸國學生派。這個會議雖僅僅是撤了秦邦憲的總書記職，而以張聞天接任總書記，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重要性又恢復了，由於毛澤東的湖南同鄉任弼時、彭德懷、滕代遠、劉少奇等的協助和大部紅軍老幹部的擁護，由遵義北竄後的黨政軍一切大權，又重新回到毛澤東的手中了。

五次圍剿蘇區北面的戰爭形勢，自五月十三日紅軍退出建寧後，集結在福建之寧化、江西之石城以北地區。第五軍團的十五師擔任守備廣昌以南之頭陂街，白水鎮之綫，六月，這一個月是雙方對峙的膠着狀態。那時，閩、浙、贛區已被國軍在資溪、鉛山之綫隔開，成爲兩個區，一個是贛東北的信江上游區（今之浙贛鐵路綫上饒、横峯綫上）由方志敏率領的十九師爲主力。一個是閩北區（武夷山、福建崇安縣西北地區）由邵式平領導，這兩個區與中央蘇區亦已被隔離。七月間由福建編成的一個師，號稱第七軍團，由蕭勁光指揮，携帶中央派遣方志敏爲第一抗日先遣隊總司令的命令，及全部行動計劃，從福建之清流，沿武夷山脈通過閩北區，繞道浙江邊至信江區，與方志敏會合，將中央的命令及計劃交與方志敏。並將新編第七軍團與十九師合編爲第十軍團，約有一萬八千人，由方志敏、粟裕率領，號稱中國

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於七月中開始向皖、浙邊區挺進。蘇勁光僅率少數特務員沿原路回江西蘇區。

這個抗日先遣隊，挺進至浙江之衢州，因受國軍追擊圍剿，輾轉於浙、皖、贛邊，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玉山附近被國軍擊潰，方志敏被俘（是年七月在南昌被殺），殘部由粟裕率領退回閩北武夷山區與邵式平會合。

蕭克、任弼時率領第六軍團之抗日先遣隊約六千人，於八月八日亦遵照中央命令向桂東突圍，輾轉流竄於湘桂邊境，損失重大，剩下約有一千人，於十二月在貴州省東部地區與賀龍會合，合編爲第二方面軍。

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於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

七月和八月兩個月是紅軍和國軍在廣昌以南、石城以北之地區進行決戰的階段，經過了廣昌縣屬之頭陂戰鬥、白水鎮戰鬥、貫橋戰鬥、大嶺戰鬥，雙方均傷亡慘重，特別是大嶺戰鬥，國軍先頭一個師傷亡殆盡，至驛前戰鬥，紅軍集中三、五兩軍團由八月廿九日至卅一日，苦戰兩日，才放棄這個戰地。退守石城及以北之小松市。紅軍自經過這兩個月的決戰，已知不能繼續在內綫作戰的形勢下戰勝敵人。於是立即加緊進行突圍準備，當時中央政治局

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爲適應以後作戰要求，便利主力突圍，決定新的兵團編組及作戰計劃如下：

一、紅軍主力編爲野戰軍，由贛州以南突圍西進，轉移至湘西地區，然後向湖南國軍之外圍採取攻勢作戰。

二、以紅軍之一部，及地方獨立師，獨立團之大部，編爲中央軍區守備軍，留守中央蘇區繼續作戰，以牽制國軍，掩護紅軍主力突圍。

三、紅軍一、三、五、九四個軍團編爲野戰軍（總共兵力約十萬人），中央黨部及蘇維埃中央政府各機關，均隨野戰軍行動。

四、紅軍廿四師、三十四師、紅軍野戰炮兵團、江西獨立師、福建獨立師、紅軍幹部學校、軍事委員會特務團（總共兵力約三萬七千人）編爲中央軍區守備軍。

五、福建、江西兩省地方部隊除動員參加紅軍，充實野戰軍外，概編爲獨立團，分由江西、贛南、福建各軍區司令部指揮。

六、閩、浙、贛邊區方志敏部，歸中央軍區司令部指揮。

七、高級人事調整如下：

軍事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

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鄧　發
野戰軍總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員　周恩來（兼）
參謀長　葉劍英（後改任學生軍團長，以劉伯承任參謀長）
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中央軍區司令　項　英
政治委員　項　英（兼）
參謀長　龔　楚
政治部主任　陳　毅
國家政治保衛局分局長　譚震林

野戰軍總司令部設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戰（辦理野戰軍各兵團作戰業務），第二局主管情報，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後勤，第五局主管通訊，第六局主管游擊作戰（辦理並指導二、四軍團及各地區游擊作戰業務）。

十月中旬，紅軍主力向贛州以南大庾、信豐間地區突圍西進，沿湘、粵、桂邊區轉向湘黔邊境北進；國軍以何鍵、薛岳、周渾元各軍向野戰軍追擊。並從新調整繼續進攻中央蘇區

部署。

紅軍主力突圍後，國軍即分路啣尾追擊；而沿途各地的國軍，亦分頭截堵、襲擊；紅軍損失慘重，且無停留集中的機會；而預定以蕭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據地的企圖，亦因湘西各地方反共民團的反抗和國軍的進剿而失敗。

於是紅軍主力不能不放棄預定的作戰計劃，繼續向黔川西北逃竄。以後幾經艱險，才經西康、青海而到達陝北。這一段長途的逃竄，便是中共自詡爲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績」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第三章　凋零、淒愴的中央蘇區

紅軍主力——野戰軍突圍前，九月至十月間，蘇區北面之小松市（石城北）石城縣城、雄嶺、古龍岡等地，各紅軍防禦據點，均經過劇烈戰鬥後，相繼失陷，最後是興國縣城之掩護戰，亦於十月十四日放棄；中央軍區的兵力及位置大畧如下：

中央軍區司令部駐西江市（會昌縣屬）

（一）直屬部隊：

1、特務團（一千五百人）駐西江市
2、野戰炮兵團（一千五百人）駐西江市
3、紅軍幹部學校（四百人）駐瑞金麻田墟
4、通訊大隊，無綫電台四座以及電話隊（四百人）駐西江市
5、二十四師（六千人）駐會昌
6、三十四師（六千人）駐寧都
7、江西獨立師（三千五百人）駐石城以南

8、瑞金獨立團（六百人）駐瑞金附近
9、福建獨立師（三千五百人）駐長汀
共二萬三千四百人。
（二）贛南軍區司令部（雩都）：
1、教導團（五百人）駐雩都
2、獨立三十三團（五百人）駐長洛
3、雩都獨立團（九百人）駐雩都北面
4、贛州獨立團（五百人）駐茅店
5、會昌獨立營（二百人）駐會昌以南
6、信豐獨立營（二百人）駐小坌
7、安遠獨立營（二百人）駐龍佈
8、各縣游擊隊（五百人）
共三千五百人。
（三）江西軍區司令部（黃陂）
1、教導團（四百人）駐黃陂

2、江西獨立團（六百人）駐黃陂附近
3、洛口獨立團（一千人）駐永豐以南地區
4、永豐獨立團（一千人）駐樂安以南地區
5、第一分區司令部（二千人）駐東韶
6、第二分區司令部（一千八百人）駐東固
共六千八百人。

（四）福建軍區司令部（長汀）
1、教導團（五百人）駐清流
2、第十五團（五百人）駐寧化
3、第十六團（五百人）駐長汀
4、第十七團（五百人）駐上杭
5、第十八團（五百人）駐龍岩地區
6、各縣獨立營（共約八百人）
共三千三百人。
總共兵力約三萬七千人。

野戰軍於十月中全部向西南突圍後，十月末，國軍攻寧都縣城，紅軍三十四師稍事抵抗後，隨即放棄了。當時我和項英研究作戰計劃，擬定兩個方案：

（一）國軍如仍以大兵團向蘇區圍剿時，我軍即依據閩贛邊區的武夷山脈東、西、南、北各方面，均可按敵情變化轉移戰場，與敵進行游擊戰。以求保存實力，待機策應野戰軍作戰。

（二）如國軍進攻蘇區的兵力不大，我軍有將其擊潰之把握時，即集中兵力轉移攻勢，各個殲滅敵軍，以保全蘇區的領土，配合野戰軍作戰。

我們中共軍區的初期計劃，便是這樣決定了。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業已隨同野戰軍突圍，關於中央蘇區的政治領導，曾有以下的決定：

（一）設立中央政府辦事處於中央蘇區，由項英任主席，以領導閩、浙、湘、贛各省政府工作。

（二）設立中央分局於閩、浙、贛區，以項英爲書記，領導各省黨務工作。

當時福建省及中共省黨委仍設於汀州，由張鼎丞、鄧子恢、鍾循仁等負責。

江西省府及中共省黨部設於東固，由曾山、李賜凡負責。

各縣、區、鄉蘇維埃政府仍保持工作，於必要時，領導游擊隊與國軍進行游擊戰。

閩贛邊區被紅軍佔領的十多個縣，都是山岳地帶，地少山多，但人口亦少，故糧食生產不僅足以自給，而且尚有盈餘。

廣東之韓江各縣依靠其糧食流入爲數極大，根據紅軍佔領前的大概估計，每年經過筠門嶺（江西方面）及汀江（福建）流入韓江的穀米，超過三百萬擔以上，此外尚有土紙、竹、木材、鎢砂及鷄、鴨、豬牲口等，每年輸出亦不少；由廣東及福建沿海地區輸入的物資，如：布匹、食鹽、火柴及其他工業產品以供應農村生活的需要，比對起來，出入口足資平衡而有餘，故這個地區，在紅軍未來以前，是一個很安定的社會。鄉村間農民每天從事生產事業外，是過着優閒自得的生活。我於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後南進中，經過廣昌、石城、瑞金、長汀、上杭等地區，於我們大軍經過時間，常在鄉村的茶寮裏，路邊的樹蔭下，或在鄉村的小樓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樂……等等，鄉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時眞是不勝羡慕之至。可是這個往日寧靜的山區，現在到處都是頹垣敗壁的房舍，及鶉衣百結，臉黃肌瘦的老人和婦孺，或殘廢的病人了。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毛澤東曾感到蘇區經濟的危機，達到了無法支持的境地，他費了很多心血，起草了一個以保障紅軍戰爭物資供應及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爲目的之蘇區經濟建設計劃，提出中共中央會議討論（全部內容請參閱毛澤東選集第

一冊「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但中央領導同志並不重視，而且以：現在蘇區談不上經濟建設爲辭，將它擱置，不予討論。但毛澤東仍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三日的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以主席的身份，提出報告，並督導實施，結果，是年的秋季，表現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事業等方面，均收到了相當的成績。可是因紅軍戰爭物資，糧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戰突圍時，中央蘇區又是民窮財盡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範團由清流南下，道經長汀縣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歲姓劉的中醫生，特地跑來見我，這位誠樸慈祥而醫術頗精的儒醫，兩年前曾爲我醫過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淚縱橫的告訴我：「三十年來我都是靠做醫生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因爲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早年在鄉間買了七畝田，還在縣城開了一間藥店。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我在鄉間的田地被沒收了，一家的生活，於是僅靠着藥店的少數收入和我行醫的酬金來維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欵，我都設法照付，並沒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來，店裏兩位工友，先後都去當了紅軍，店裏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們的工資，我還是照政府的規定，按月送給他們的家屬。惟近來沒有生意，屢次想停業，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爲了什麽，又要我捐出一大筆捐欵。你想，我已一貧如洗，就是傾家蕩產，也無法籌出這筆錢來。這怎麽辦？我想來想去，只有請你救救我，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我聽了他這番

訴說，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義嗎？一則恐怕不發生效力，再則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對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覺得不忍；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離開長汀時，便鼓起勇氣，特將此事面告當地政府負責同志，請他查明辦理。不料，經過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再回到汀州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孤兒寡婦已淪爲乞丐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痛苦，也非常憤怒！好幾晚，我爲了這件事不能入睡。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時正是展開查田運動的時候，我由會昌到瑞金去參加紅軍總部的軍事會議，路經距瑞金十多里的龔坊，因天氣炎熱，到村裏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住的全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當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蕭條！屋子裏的傢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櫈，屋子裏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着四個携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子嚇得哭起來了！我的特務員連忙叫她們不要怕，並說我們暫借此休息片時的，她們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厨房裏去爲我們煎茶。特務員借了她們家裏一個舊臉盆，盛了一盆凍水給我洗臉，她們聽到特務員稱我爲「司令員」，便悄悄地問：「這位司令員姓什麼？」一特務員不經意的說是姓龔的，她們馬上帶着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跟前，求我救救她們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爲家裏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裏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然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那裏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兩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眞是天開眼了，你來到我們家裏，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的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着磕頭，流淚！

這時，從隔隣又來了兩位農民，跑來幫她們說情：「她們家裏實在沒有錢了，請司令員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們寡婦孤兒的六條命！」我問這兩個農民：「你們是不是農會會員？」他們回答說：「是的！」「那麽你們爲什麽不替她們證明呢？」他們無可奈何的說：「我們也曾經說過兩次，村政府主席說我們袒護自家人，假如再說情，連我們都要受處分呢！」處在這個場面，任你鐵石心腸也要感動，何況我一向是懷着人道主義精神來從事革命的呢？過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農民政策太過火了，但因環境限制，使我無法和人

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種種關係，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訴，我對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爲了長汀劉醫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難過，現在擺在我跟前又是這樣一幅血淚交流的場面，叫我怎樣向自己的良心交代？於是，我毅然地答應了替她們想辦法。她們聽了我的話，這才含淚的站起來。不過，這件事，我後來還是沒有辦通，雖然我幾次下決心，必須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將這些實際的情形向黨中央報告，但終於找不到適當的機會，負人負己，慚恨無難自己！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後，農村階級鬥爭更趨嚴重，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掉轉槍頭，參加到反共的隊伍中去。無產階級出身的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也因不滿現實，在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畢業後，也逃出蘇區投降國軍。其他紅軍中下級幹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幹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寧都的赤衛隊長，許多縣份的村、區赤衛隊長，以及大批人民紛紛逃出蘇區，走向吉安、贛州一帶的國軍區域去。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

錢；等到敲搾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爲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所謂「人性」這個名詞，在共產黨的經典中，已經找不到了。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幟，其目的，若從正常的路綫來說，是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建設共產主義新社會。我曾經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眞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薰淘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羣、樂天知命的，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閑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認爲他們是貧苦工農成份。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聽，並且還做得更爲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認爲是革命的積極分子，更盡量的吸收到黨裏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膽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鷄鳴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爲新統治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爲地方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權，或領導着民衆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胡爲了。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

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洩憤。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又將富農稱爲地主，中農稱爲富農，極盡其敲搾勒索的手段。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爲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而一生堅貞不屈的便犧牲了生命。有一個時期，中共也覺得這種情勢非常嚴重，曾發出：「反貪污、反腐化、反保守報復的農民意識」的指示，在黨內展開思想鬥爭，進行思想教育，企圖糾正地方幹部的錯誤。可是，這些流氓地痞的本質太壞，任你如何鬥爭、教育，都無法改過糾正。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爲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蘇區內統治階級的面幕，完全是一羣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像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怎不令純潔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農人民受盡磨折呢！

當紅軍主力突圍走了之後，這班流氓地痞，知道來日無多，有的是竊取公家財物逃出蘇區，有的是擁着嬌妻潛匿深山逃避鬥爭，有的更原形畢露，帶着手槍藉借糧籌欵供應紅軍之名，向稍有存糧存欵的紅軍家屬搶掠，甚至强姦紅軍家屬婦女。這時，鄉、區政府多數已找不到一個負責人，蘇區社會已陷入無政府的恐怖狀態。項英曾嚴飭各省級黨政負責人消除這

種嚴重現象，迅速恢復蘇區秩序，但結果毫無辦法，這就是最後蘇區的狀況。

第四章　政治保衛局

中共的肅反工作是在一九三零年朱毛紅軍佔領吉安縣城開始的，那時是以肅反委員會來負責肅反任務，當時肅反的目標是指向豪紳地主，反動派等階級人士，接着又發現了AB團的恢復活動，遂又指向AB團開刀。當時這種工作的進行，完全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後來毛澤東感到以肅反委員會的名義，及由自己直接領導，易招黨内同志的攻擊，乃於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蘇聯政治警察組織的辦法，成立國家政治保衛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鄧發任局長，由這個機關負起肅反任務，有組織、有計劃的全面去推行。這就是中共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的開始。

鄧發是廣東惠陽淡水人，少年時即到香港在海軍船塢做打磨工人，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時已任工人糾察隊隊長，那時他已加入了中共，曾在香港爲中共做工運及廣東省委工作，至一九三一年入蘇區，即給予政治保衛局局長職，其人體形瘦長，面有麻子，態度剛强而沉靜，說話帶有濃厚的客家口音。一九四六年由重慶飛返延安時因飛機失事，與秦邦憲、王若飛、葉挺等一起去世。

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主要任務，是防止與取締反革命分子的活動，鞏固蘇維埃政權；同時，它又負監視全體黨員、人民與所有高級幹部之責。有權隨時拘捕、審訊、與處决每一個被認爲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黨的高級人員，須要報告中央政治局審査議决外，中下級幹部及普通平民的處决，根本不須要任何機關的核准。

它的組織，在國家保衛局之下有省、縣分局，鄉有特務員和機關部隊中的特務員。他們執行任務時，與各級黨部及各級蘇維埃政府經常取得密切聯繫，以聽取各方面關於反革命分子所有活動的情報；並充份運用黨員爲實施調查工作時的細胞，使他們在各機關，各部隊和鄉村中的每一角落，監視着每一個幹部和人民，同時他們自已也互相監視。

他們逮捕人民或幹部，大多在夜間，執行時往往不說明理由，第一句話便是：「保衛局請你去問話。」一說完便把人帶走，反抗是絕不可能的事。被傳去問話的人，多數是從此失蹤了。失蹤的人絕不會宣佈任何罪狀或透露任何消息。

國家政治保衛局就像一條絞索，套在蘇區每一個人民和幹部的頸上，它高興時，可以讓你在圈子內多活幾天，不高興時只要將絞繩收緊，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個恐怖的魔影，時時刻刻跟隨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終在它的控制之中。

關於政治保衛局特務人員的訓練，是採取秘密方式的，在瑞金時是借紅軍政治部以臨時

特別訓練班的名義進行，遴選特務員，則經由黨組織系統在黨員中調訓，被調訓之黨員初時亦不知其眞實原因，經過訓練後，即派回原部隊服務，首要要求，就是要能絕對保守秘密，不得暴露身份，故在部隊中除了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之外，無人知道誰是特務人員。惟侍從高級指揮員身邊的特務員，可以說是公開的，因每一個指揮員身邊的特務員，多數經過政治部調訓之故。

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政治保衞局仍然存在，只是對其人員稱號稍有更改，稱之爲保衞員，侍從高級人員稱爲衞士。至統治了中國大陸之後，政治保衞局即併入公安部，仍稱政治保衞局，但其工作是獨立的，至於省的公安廳設保衞處，縣的公安局有保衞科，它們的任務是專一的，經常和各級黨委會「紀律檢查委員會」保持密切的聯繫，交換情報，執行它們的任務。

中共在準備突圍西竄時，爲了要使紅軍的組織更加强固，保證在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發生，以保持軍事機密，特將紅軍部隊、地方部隊、蘇維埃政府中的各級幹部與員兵，來一個嚴密的整肅。一時被撤職查辦的幹部達數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縣屬之九保、廠田、沿壩田心墟一帶，設立了十多個收容所。

收容所就是變相的集中營。到收容所的幹部，經過了所長的登記，便有住、有食，還可

在附近行動，但不能離開指定範圍。他們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雖無紅軍駐守，但外圍就不同了，重重疊疊的赤衞軍、少先隊守在路口，沒有蘇維埃政府的路條是不准通行的。

中共爲了要處置這一大批被指爲動搖的幹部，和少數殘餘的「反動階級」，在瑞金北與雩都邊界的大山叢中選擇了一個山深林密的山腹，設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爲審判處，一座警衞員兵及法官的宿舍。離開法庭一百五十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亂石縱橫，荆棘叢生，距離橋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橋上過，就覺得膽戰心寒，恐怖萬狀，這條冷僻的山徑，平日就很少行人，這時經已全部封鎖，特別軍事法庭設置好了，並在不遠的山麓，挖了一條大坑，那些在收容所裏被撤職的幹部、動搖分子、反動階級，便三個五個，一羣兩羣的被送到特別法庭去審訊，但與其說是審訊，不如說是宣判，因爲審訊時，手續非常簡單，只要點了名，便對犯人宣佈：「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裏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說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劊子手，押着犯人到預先挖好的大坑邊，一刀結果了性命，跟着飛起一脚將屍首踢落土坑之中，隨便的扒些坑土將屍體掩蓋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種最慘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後就對他一刀殺掉，或者將犯人推落坑去活埋，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後來國軍克服蘇區幾個月之後，中共所製造的超歷史殘酷的大屠殺才爲人

所發現，「萬人坑」這一恐怖的名詞，始爲蘇區以外的人所知，其實區內的人民，早已聞之戰慄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黃起義投共（詳情見本書第六編第二章第七節），當時中共委他爲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雖然實權操在中共黨員趙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對他很客氣，季振同自己也感到躊躇滿志。

可是，在調整第五軍團幹部的時候，他與趙博生、董振堂的意見發生衝突。因爲他主張以原任警衛旅的團長黃宗岳爲師長，爲趙博生反對，並說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顧革命利益，結果將黃宗岳撤去兵權，調總指揮部任副官處長。因此季振同和黃宗岳大有「飛鳥盡，良弓藏」的感觸！心懷不滿，時有怨言。於是趙博生將這種情況報告上去。中央接到報告，深恐這種情緒會影響到第五軍團內部的團結，便立即將季振同、黃宗岳調來瑞金縣一個鄉村中，名爲「讀書」，讓他有一個研究馬克斯學說和中國革命問題的機會，其實就是將他們軟禁。惟對外行文方面，初期還是用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的名義。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季振同被軟禁期間，我曾去看過他一次，他住在一間很整潔的民房裏，屋子裏有很多共產主義的理論書籍。他的飲食起居都很好。有兩個衛士隨侍在身邊，但他的精神卻很頹喪！我安慰他說：「有機會讀書，是很難得的，將來你一定還要負很重大的責任。」他回答我一

個苦笑，笑裏隱藏着無限的辛酸和痛苦；別後，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聽說季振同和黃宗岳兩人同時被殺害了。

林野是福建龍岩縣人，黃埔軍校畢業的中共黨員。紅四軍在湘南成立時，他在軍部任少校參謀，參加革命歷史，相當長久。

然而，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階級，影響到黨對他的信任。當一九二九年朱德率紅四軍攻陷龍岩時，他的父母被當地農民在暴動時殺害了。當地共幹並要求朱德將林野送交地方處置。但朱德不允，並痛斥當地幹部。因之，林野仍繼續在紅軍工作。

紅十二軍在福建成立，林野調任該軍參謀長。由於他得罪了陰險詭詐的政治委員譚震林，又被調任紅軍學校教育長，並種下了他異日慘遭殺害的禍根。

一九三四年冬，紅軍主力突圍時，林野調野戰軍總司令部任參謀。大軍行了兩天，因爲他的脚部曾受過重傷，行動不便，朱德便要他回中央軍區司令部來工作。當他回到瑞金的那天，他的妻子剛由上海大厦大學畢業，由福建跑來江西蘇區，和他團聚。久別重逢，兩夫婦自然是說不出的喜悅！他倆在瑞金住了三晚，便相偕到江西市中央軍區司令部，請示工作。

他到司令部的第二天，譚震林秘密地跑到我的辦公室中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他的意思，以爲要林野回福建龍岩工作，便回答他說：「司

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材，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岩去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到龍岩去，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的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我聽了他這席話，心裏憤恨極了，像林野這樣一個年青有爲的革命同志，並沒有顯著的錯誤，爲什麽要把他殺掉？譚震林的地位雖然比我低，但他是國家政治保衞局的分局長，直接受中央領導；而且他爲人刻薄，冷酷無情，我知無法阻止他，但心中打算，希望能說服項英，也許能救林野一命。

於是，我找了一個機會去問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過嗎？」他很莊重的說：「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爲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我見他口口聲聲「爲了革命利益」，知道項英已被老譚說服，無可挽回。

那時，瞿秋白和阮嘯仙同住在附近，我平日和他們私交頗深，尤其是阮嘯仙是早年廣東農會的委員。爲多年的老同志，又同在蘇區內工作多時，特別感到親熱。我想若能得到他們

兩個說話，或者還有希望救救林野。於是我立即跑去找他們，將這件事告訴他們，並說：「若將林野殺了，難免影響一般中央軍區司令部同志的情緒。現在要挽救林野，除了你兩人之外，沒有第三者了。」他們聽了以後，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開口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裏（阮嘯仙以後派任贛南軍區政治委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我聽了他們這般說法，只好帶着失望的心情告別而去。

就在這天的下午三時，項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紅軍學校去當教育長，並請他們夫婦吃晚飯，林野夫婦聽了非常高興，雙雙赴約。下午四時正，特務員開上飯來，並爲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我知道林野夫婦吃的是最後一次晚餐，再也沒法救他倆了！眼見到這一對恩愛夫婦，飯後便要慘死，而他們卻一點也不知道！我的心好似有萬把利刃刺在我的心房，每顆飯粒似是石子一般，無法下咽！我忽然間一想，既救不了林野，也應該救救他這個不幸而無辜的妻子，我便對林野夫婦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坐在一旁的項英和陳毅也知道我的意思，附和着說：「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了！」可是他倆卻婉謝了我的好

意，他倆那裏會知道我的眞正用意呢？

結果，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遭護送他倆的特務員殺掉了。

事後，那兩個殺林野的特務員中，有一個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去殺林野，他的妻子見了大叫！雙手拖着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前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過頭來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劈中右肩，這時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他便倒下了。這時他的妻子已給黃同志結果了。」他說完還笑着說：「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呢？」我聽了心裏有說不出的悲憤。有一次我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他帶着諷刺的口吻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

同樣的情形，還有一位紅軍大學上級幹部訓練隊的李隊長，也是在特務員護送途中殺了的。這些事實，紅軍幹部中，很早就互相傳告，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即高級幹部也感到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裏去？周圍左右滿佈着的特務密網，甚至爲我舖床叠被，招呼無微不

至的特務員，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譚震林指揮的國家政治保衞局的「通天特務」，任何行動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稍一不愼，我便會踏上李明瑞的覆轍了，所以我唯有忍耐着。

一天，我在批閱各方送來的文件中，知道紅七軍有十多個同志被撤職，有四個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軍區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並不很遠，我決定去救他們。

我批閱公文後，走出辦公室，吩咐特務員快備馬。項英含笑問我：「到那裏呀！」我故意伸一伸懶腰說：「帶久了兵，不慣坐辦公桌，好久沒有到外邊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馬，鬆鬆筋骨。」

項英忙道：「對的對的，你應該到外面去跑一跑，舒暢一下。」他對我素來很好，並時時關懷我的健康，現在同在一起工作，自然更加親密了。

離開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馬上加了一鞭，飛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隨我的四個特務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到了田心墟，我在這個小市集的街上繞了一個圈子，然後走進一間茶館，在靠近裏面的一張枱子，坐下來喝茶。我看見到四個特務員不住的揩汗，便以很體恤的口吻，要他們坐在門口的桌上喝茶。因爲門口比較清爽，可以凉一凉，這一來，便將他們遣開在十步以外了。

那個小市集尚有五百多個待處決的「囚犯」，但他們仍不知死期之將至。紅七軍被撤職

的一個營長，見我騎馬來了，立即找着另一個營長同來見我。他們見到我如看到久別的家人一樣，不住的流着眼淚，問我能不能給他們一個工作崗位。我見到這些同患難共生死的老同志，內心痛苦極了，明知他們的生命在十天內要完結，但又不敢將秘密對他們明言；我經過考慮後，望望門口的特務員，見他們不住的在喝茶，並沒有注意我們的談話，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輕聲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們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沒有第二條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無關係的人說出來，快些走！」他們領悟我的意思，只說了一聲：「謝謝軍長！」就走開了。

我付過茶錢，乘着馬，緩緩地似遊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報告：「逃了四個第七軍的同志。」經過八天的繼續追緝，知道他們已沿着山地向安遠逃走，幸而他們沒有在中途被攔截，所以我教唆他們逃亡的秘密也不致敗露。壓在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這才放了下來。一方面我慶幸自己，同時也爲這四位七軍同志感到慶幸！因爲他們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第五章 中央蘇區瓦解了

戰爭是要靠人力、物力、財力來支持的，當時中央軍區直接指揮的軍隊尚有二萬三千多人，江西、福建、贛南三個軍區，亦有一萬三千多人，合共起來則有三萬七千人之多，裝備雖不如野戰軍，但力量尚屬非小，比諸朱毛初到閩贛邊區時要强得多，亦比諸第一次反圍剿時的兵力差不多；但由於紅軍主力的突圍以及蘇區經濟的總崩潰，士氣民心都已受到極大的影響，每個人都似有大禍即將臨頭的徬徨心情。我是這個地區最高軍事指揮部的幕僚長，對於今後軍事供應問題，不能不作一個切實的研究。當時由司令部召開一次閩、贛兩省黨政高級幹部會議，檢查了蘇區內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情形，特別是存糧還有多少？當時統計的數字令我吃驚！人力已無可動員了；物力，全部在現有軍事組織之內，此外亦無可利用；糧食，以三萬七千人計算，僅能支持兩個月的供應。

會後，我在百忙中親到長汀、瑞金、雩都三縣地區去視察，所見到的是凋零、悽慘，一片荒凉，到處風聲鶴唳，充滿了日暮窮途的失敗現象，令我非常失望和痛心。我們中央軍區司令部所存的現金只有十萬元，是中央軍區成立時，黨中央發下來以備必要時開支的，兩個

月後，我們怎樣支持下去？我和項英、陳毅三個人從新研究這個迫切的問題，我們在無法中決定將全部蘇區紅軍包括各省軍區獨立團整編爲五個師，一個野戰炮兵團，一個教導團，放棄蘇區，繼續突圍，追隨野戰軍的路綫西進，準備與野戰軍會合，集中行動。並將這個計劃以無綫電報向正在流竄中的中共中央請示，很快的便接到中央的覆電（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內容如下：

一、鑒於野戰軍突圍受挫經驗，中央軍區應立即放棄突圍計劃，而將部隊分散游擊。

二、閩、浙、贛區（中央蘇區在內），成立黨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由項英負責。

三、以龔楚率步兵一個團，配足電訊器材，突圍轉移至湘粵桂邊地區，收集野戰軍遺留部隊，建立新根據地。並在該區設立本黨中央分局、蘇維埃政府、及紅軍總指揮部，該區之黨政軍事宜，即由龔楚負責。

同志們見到黨中央對我如此信任，給予我以獨當一面的黨政軍大權，以爲是莫大的榮幸。但我對這些高級的名位，並不感到榮耀；反而感到責任更加重大，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挫折。毛澤東以中央蘇維埃主席之尊，也屢遭開除中委、警告及留黨察看的處分，那便是最好的榜樣。因爲我們的命運，並沒有掌握在自己手裏，而是掌握在那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及政治保衛局的特務手裏。我們爲什麽一定要受那些魔鬼支配呢？

項英接到這個電報後，表現得很徬徨。他對我說：「我們指揮着五個師的大軍，你走了我怎樣辦呢？」我對他說：「陳毅同志雖然不是軍人出身，但他有豐富的軍事經驗，可將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同志調來司令部工作，就足以領導了。況且以後作戰以游擊戰爲主，儘可能避免陣地戰，軍事問題或許比較簡單了。」他表示中央既有指示，只得照辦。並很客氣的讓我挑選紅軍中裝備優良的部隊，二十四師七十二團（約一千二百人）和兩座無綫電台人員，配足通訊器材，帶了一萬元上海實業銀行紙幣作經費，離開中央軍區司令部的所在地（會昌縣屬西江市）向湘粵桂邊區進發。

紅軍主力突圍後，國民黨軍事當局僅派湖南之何健爲追剿軍總司令及調動圍剿蘇區之薛岳、周渾元兩個軍跟蹤追擊，其餘圍剿蘇區的軍隊均未調動。並派顧祝同爲江西綏靖主任，蔣鼎文爲福建綏靖主任，陳濟棠爲廣東綏靖主任，繼續其碉堡圍剿進攻政策，分區清剿。他們調整部署後，由一九三五年一月起開始清剿工作。由於蘇區紅軍戰意消沉，又缺乏糧食，且採分散游擊之計劃。當國軍大舉進攻時，除了江西軍區曾予堅强抵抗外，其餘紅軍都分散游擊或潛伏保存實力，避免與國軍作戰。由一月至三月這一期間，中央軍區紅軍及地方武裝被國軍搜剿消滅甚多。二月間，江西軍區之殘部由曾山率領分散潛伏於東固山區，三月初旬，贛南軍區之紅軍千餘人由蔡會文率領，向南突圍，被粵軍截擊，傷亡慘重，僅存三百餘

人，流竄至湘、粵、贛邊區游擊。閩、浙、贛區紅軍總指揮（中央軍區改稱），項英及政治部主任陳毅率領紅軍二十四師之一部於三月中旬流竄至粵贛邊區之猷山（又名油山），以後就潛伏大庾山脈山區、福建軍區之紅軍，由張鼎丞、鄧子恢、鍾循仁等領導，潛伏於武夷山區。

至此，中央蘇區已無大股紅軍活動，蘇維埃政權全部被摧毀了，國民黨第五次圍剿蘇區的軍事至三月底亦宣告結束了。

該區紅軍殘餘部隊，待至一九三七年國共再度合作抗日後，編爲新四軍。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我以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的名義，率領着一支一千三百人的隊伍，避開了國軍的主力封鎖綫；沿着鄧都、會昌邊境大山，經馬嶺、牛嶺至信豐之鐵石墟；再經猷山，轉出梅關、南雄間，進入北山；沿途經過了三次戰鬥，突破了小股敵軍和地方團隊的阻截，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到達湖南郴縣之黃茅。

在黃茅休息了三天，建立了當地的秘密組織。然後，緩緩地繼續前進，經桂陽、臨武、藍山、江華，轉入廣東連縣邊區。我每到一個地區，便積極進行收容和連絡工作；並將當地黨的組織、赤衞隊組織、蘇維埃政府組織完全恢復或建立起來。兩個月的時間，建立了由郴縣以西的黃茅至臨武以北，轉入藍山、江華、連縣邊區，長達四百多里，橫跨五縣實大山區

的湘粵桂邊區根據地

我來到湘粵桂邊區的消息，迅速的傳遍了邊區各縣。湘南各縣的地方黨負責人多親來聯絡，或派人請示工作任務。活動於桂陽、常寧、新田間的湘南游擊隊二百人，也派員前來聯絡，紅軍主力西竄時，遺留在湘桂邊區永明、灌陽邊境的紅七軍兩個團，也與我派往該方面的游擊部隊取得了連繫。那時國軍一方面正向紅軍主力追擊，一方面仍以大軍圍剿中央蘇區。在湘粵區作戰的只有湘南保安團，戰鬥力不强。我們曾兩次擊敗湘南保安團的攻擊，一時聲威大振，中共在湘粵桂邊的武裝力量，又迅速的發展起來了。

我這個中共湘粵桂邊區黨政軍最高指揮機構，以郴縣之大陽山、臨武之源頭、連縣之大光山爲基地。由於國軍一時無力也無法向這毗連三省的山區進剿，我雖然過着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閒、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時間和空間。

人民對紅軍進入這一地區，並不像四五年前那麽熱情和歡迎。紅軍野戰軍突圍西竄時也曾經過這一地區，人民所受損失，非常重大；因此他們對紅軍的厭惡，自不待言。雖然他們並不敢形諸於詞色，可是，無言的反抗和憤怒，更令人痛苦和惶恐。而我也早已洞若觀火的看到這廣大人民的一般心情了。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爲，那種滅絶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裏，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然而在這種情勢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渾渾噩噩，得過且過，將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命運，成了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有些人便憂鬱恐懼，終日在愁城中過日子，讓無情的現實，殘酷地啃嚙着他們的靈魂。他們不想脫離黑暗，尋找光明嗎？可憐的是，他們全受着特務員的監視，恐怕光明還沒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殘。

紅軍中的高級幹部，只要稍存半點民族意識，對於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和遙遙控制的第三國際，無不心懷憤恨的。而以改造社會拯救同胞爲革命出發點的我，對於中共這多年來的殘酷手段，更是深惡痛絶。尤其是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老同志，他們假如是爲了革命而戰死沙場，則死何足惜，可是他們的生命竟無辜斷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這裏，眞令人不寒而慄！雖然我現在負荷着三省黨政軍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實不容許長此這樣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夢，我彷彿看到了千千萬萬個鮮血淋淋的蘇區人民，在痛哭！在呼號！在呻吟！在掙扎！在憤怒！在反抗！我懷疑這並不是夢呀！我在親身經歷那些慘絶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現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裝鬥爭短短的八年中間，已經使中國人民

遭受了千萬人的死亡，今後若再盲目地錯誤下去，又不知要慘死了多少人？由於這種心理的發展，我的耳畔似有人說：「饒了我吧！中國再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這種聲音，是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呼聲！

因此，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

然而，身爲一個指揮湘粵桂三省黨政軍首長，在一班特務員時時刻刻的監視中，在黨的組織與各級黨的工作人員環伺包圍之下，脫離和逃亡，決不是輕易的事。所以我時時都警惕自己：「不要做李明瑞第二！」經過了五天的周詳審慮，我佈置好了一個嚴密而決心的逃亡計劃。

我將身邊的特務員，陸續的派出了六個到各部隊作連指導員及排長，名義上是使他們實際掌握部隊，防止指戰員逃亡；而實際是遣開他們，逃避他們的監視。

然後我又故意擬好幾件並不重要的指示，分派給身邊黨的重要助手，要他們到各地方黨部和游擊隊的基地去聯絡，這就只剩下四個特務員在身邊。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我藉着出席指導宜章縣委會議之便，帶着一連部隊，由臨武基地赴郴縣的黃茅，這一連紅軍警衛部隊，並不同國家政治保衛局派來的特務員一樣，要時刻守衛在我身邊的，他們只是在外圍保護着我的安全，根本不會監視我的行動。

到達黃茅的那天晚上，我託詞身體不舒適，要早些休息，吃過飯便上床睡覺。特務員們也因白天的步行過於疲勞，紛紛睡覺去了。我便趁這時爬起床來，悄然的離開了黃茅這個小山村，向南方的故鄉逃去。

我臨走之前，寫了一封信放在床前的枱上，給我的政治部主任何君。他已被派赴桂陽和中共縣委聯絡，我在那信上大意說：「何同志！你回來的時候，我已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爲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眞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走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的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已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麽簡單的理由。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並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

是你們對於我的出走還表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埒村我的家裏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幫助全體同志走出這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爲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麽，人各有志，請從此一別……。」

山高夜黑，只有天空幾點星光，閃爍搖動，點綴這林菁茂密的山徑，我一步緊一步的向前趕路！到星光曦微時，已經離開黃茅數十里了，回望那雲山重疊的湘粤桂邊境，不禁使我有無可名狀的傷感！別了！這濺滿了同志們和同胞們的碧血的莽草長林！別了！這埋葬了我的心的碎片的古嶺深山！